

# 看, 这个 丑陋的中国人

——柏杨



亲爱的朋友：漱渝先生

1996年又在圣诞歌声中告尽，回忆年初，我们曾凝视厚厚一叠日历，如今瞬眼全逝，倍感心惊。

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主编一系列夫妻作家的合集。柏杨与香华合集列为第十部，名《我们的和弦》，柏杨部份为直排右翻，香华部份为横排左翻，十分别致，于四月出版。

柏杨所著《异域》，由于人瑞小姐（Janice Yu）译成英文 The Alien Realm，于五月在伦敦杰纳斯出版公司（Janus Publishing Co.）出版，距中文1961年问世，相隔三十五年，对人瑞及出版英译本的杰纳斯公司，深为感谢。

由周碧瑟博士不辞辛劳坚毅完成的《柏杨回忆录》，于七月一日出版，对碧瑟及出版此书的远流公司，深为感谢。

柏杨于1994年出任国际特赦组织台湾分会创会会长，两年内连续三次巨大手术：心脏、眼球、脊椎，体力视力俱退，乃于今年辞职，但被第二届理事会推为荣誉会长，深为感动。

财团法人人权教育基金会第二届董事会，仍由柏杨任董事长，董事为：周碧瑟（仍兼执行长）、王荣文、张鸿仁、杨启航、许素朱、黄日灿。今年二大工作：（一）设计一项划时代的“结婚证书”，唤回久已模糊的家族记忆，建立新兴世家。（二）筹建“绿岛垂泪碑”，开创“记忆文化”，向传统的“遗忘文化”挑战，使历史上人的恐惧、屈辱、冤酷，得以稀释消失，转化成为哀矜、警惕。碧瑟任建碑会会长，除董事外，另恭请庐世祥、曾志朗、卜大中、吴祥辉、周俊吉共十二位朋友，任建碑委员，都是中生代精英。

今年下半年，是柏杨演讲最多的半年，台北国立师范大学聘为“驻校作家”，演讲四次，又在台北阳明大学、台中静宜大学、中坜圣德基督学院、中原大学台北海基会、《工商日报》主办设于台湾大学和设于台中东海大学，佛光基金会主办设于台南讲堂，分别讲演。而静宜大学那一场，题目就是“绿岛垂泪碑”。

公共电视台拍摄《柏杨传》，七月十六日，柏杨、香华、周碧瑟、陈丽真，与公共电视台节目制作人宋颖莺率领下的摄影队，同赴绿岛，在国防部特准下，进入原感训监狱故址，在原四房录影。就在厨房之侧，柏杨参观从未曝光的特种囚犯单独囚房、约两个榻榻米大小，阴气森森，不禁毛骨悚然。成诗一首记行：

晚霞如火烧古城	群山齐动传笳声
孤岛有情长夜泣	蛰龙沉睡海吐腥
无边风雨萧萧去	曙色朦胧一线明
法场鲜血囚房泪	痴心仍图唤苍生

柏杨长女冬冬携女静霞、次女毛毛偕婿曹长安，分别于三月、四月，由河南辉县及陕西西安，先后来台北探望柏杨及香华，住香华书房，停留一个多月，又多一次骨肉团聚。

香华今年（1996），也很丰富。

元月，她的散文集《南斯拉夫的观音》，由台北圆神出版社出版。此书塞尔维亚文译本为 Caj Ne Govori（取书中一首诗《茶，不说话》为书名），

于南斯拉夫首都贝尔格莱德 (Be1grade) Nolit 出版社出版。 四月，香华并应邀赴贝尔格莱德办首发式及记者招待会。

三月，香华散文集《小鸟啁啾而过》，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列为《域外著名华文女作家散文自选集》第四集。

台北县立文化中心，主编《北台湾文学》系列，邀请台北县作家参与，香华的《沉思·絮语·传真》列为第二十八部，于七月出版。

香华策划一项国际文化交流活动，由国父纪念馆及佛光山文教基金会邀请南斯拉夫诗人画家靛山·弭引 (Dusan Pajin) 及罗马尼亚前文化部长、诗人兼画家墨林·索列斯库 (Marin Serescu) 一齐来台访问并举办画展。启程前，墨林因染肝病住院，不能成行。仅靛山携画前来，于八月三十一日起在国父纪念馆举行为期一周“南斯拉夫日与夜”画展。十二月，接到消息，墨林先生终不治逝世，深为哀伤。

另一项国际文化工作——香华主编的《中国当代诗选》，由罗马尼亚作家杜善·拜士奇 (Dusan Baiszki) 翻译为罗文，第一次登上国际电子网路，内容含盖台湾、海外、中国大陆三地的华文当代诗人作品，年底并在罗马第米索拉 (Timisoara) 出版成书问世。

十月，香华经香港赴广东中山，参加第三届国际华文诗人大会，并应中央电视台之邀，再专程赴北京接受访问。

香华在台北警广“诗的小语”节目，今年是第三年。八月间介绍南斯拉夫九十岁高龄女诗人的《我没有时间》之后，接到很多信件和传真，索取译文，香华深受鼓励，使她对于把诗带给大众的工作，兴趣更浓。

香华女儿碧心，于十一月结束在台北的“尖端公司”，偕婿柯定康 (Klaus) 前往马来西亚定居，他们在台十年，也住揽翠大厦，骤然离去，不复闻外孙女尚亚 (Sonjia, 三岁半)，外孙维克 (Victor, 一岁) 的笑声、哭声、闹声，至为黯然。

最近才发现我们的猫熊熊，最喜欢吃红尾鱼，原来过去十年它胃口不开，所以一直处在半饥饿状态，如今得其所哉，吃得越来越胖，不过，一不顺心，还是会咬人。

最后，愿上帝赐福每一个人平安、健康、快乐！

柏杨香华

1996.12

亲爱的朋友：漱渝先生

每逢年节，倍思亲友。

今年（1995）年，是我们家灾难最多的一年，柏杨自一九七七年出狱，健康一直稳定，可是自去年心脏开刀，身体息剧衰弱。今年阴历年除夕（元月三十日）左眼微血管出血，最初还希望自行吸收，后来旧血未尽，新血又裂，半年内出血六次，视线全失，无可奈何，由荣总眼科总主任刘荣宏先生开刀，香华和苏基夫人文慈在手术室外守候四小时，幸度难关，唯视力大为衰退。

九月，香华在台北大安森林公园参加“秋诗翩翩”朗诵，柏杨在台下作听众，双腿剧痛如烧，急送荣总请神经内科主任刘秀枝女士检查，判定脊椎第四、第五节间软骨突出，复健无效，于是由神经外科主任黄俊一先生开刀。香华、文慈、城城，和蔡素贞小姐，在手术房外守候。手术成功，曾一度担心下肢瘫痪，今报平安，不过迄至圣诞，仍在学步。

年初，设于美国的“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颁赠柏杨“1994年度促进中国民主杰出人士”奖，时柏杨眼睛尚未开刀，四月二十六日，与香华同往领取，并在大会致词。

从本年年初，日本作家黄文雄先生来访，就《丑陋的中国人》，提出八十个问题，柏杨一一作答，定名《酱缸震荡》（《再论〈丑陋的中国人〉》）。于八月间，由台北星光出版社出版。

本年，柏杨最高兴的一件事，是接受国立阳明大学之邀，于六月十日，该校改制后第一届毕业生典礼上演讲，对一个一辈子从没有在任何学校（包括小学）毕过业的人来说，觉得有无限殊荣。

柏杨因身体需要休养，十一月二十五日，辞去国际特赦组织台湾分会首任会长一职。正如罗兰夫人说的：“自由、天下多少人假藉你的名字为恶”。柏杨从这个职务中，产生最大的忧虑是：“人权，将有多少人利用你迫害人权”。

香华受柏杨长期拖累，但仍为诗全力以赴。

就在陪柏杨赴美国前，四月十五日，旧金山 Taoran Press 一连出版了香华的两本英文诗集，一本 Affection is Everywhere（《千般是情》），一本 Waiting for Snow（《待雪》），印制十分精美。赴美后、香华特地到旧金山蒙特市拜访 Taoran Press 主持人夫妇。

香华自从在警广主持“诗的小语”节目，受到听众退多鼓励，但该节目只读别人的诗，于是决定向另外一个“有声书世界”踏出一步：读自己的诗。去年（1994）几乎费了一年时间，与青年音乐家翁至鸿先生合作，录制《茶·不说话》。由台北远流公司分别制出 CD 及录音带有声书问世，七月七日于台北诚品举行发表会，无论如何，这是一项创举，我们十分高兴。

十月，是香华的东欧月，她和东欧有缘，今年仍去了南斯拉夫，并且再应罗马尼亚文化部之邀，使她和两地的关系更为密切，她的中文散文集《南斯拉夫的观音》与塞尔维亚文译本，明年春将分别在台北及贝尔格莱德同步发行。

最后，报告一个消息，柏杨和周碧瑟博士合作的《柏杨回忆录》（柏杨口述，碧瑟执笔），已进入三校，明年春天就可以出版。寄上一则剪报，代替说明，不再向您嗦。

我们的猫熊熊，日渐成熟（它已届九岁）——不常咬人了，而且，很通

人情。

祈求上帝，保 我们大家身体健康。

柏杨香华

1995.12

好友漱渝先生：

每年，都向你报告我们一年来生活的紧张，和孜孜不息的努力，实在有一种“老牛自知夕阳晚，不用扬鞭自奋蹄！”的心情。

今年（1994），是我们大地震的一年，柏杨被开膛破肚。自1988年柏杨前往大陆，得了感冒，回台之后，发现心脏动脉稍有阻塞，当即往长庚医院诊治，凡六年之久，今春，才由荣民总医院查出严重恶化，心脏内科主任张茂松作心导管检查（在长庚治疗六年，不知心导管是何物），四条动脉中阻塞了三条半，会随时猝死，于是立即转往三军总医院，六月十五日，由心脏外科主任魏峥开刀，又发现第四条血管也阻塞百分之九十，而腿上静脉已经取出，不够使用，临时由心脏内侧，找出另一静脉血管接替。手术六小时，香华与钟文慈、陈玉二友，彻夜守候，义女刘元旭更从旧金山赶回陪伴。迄十二月十五日止，整整六个月，已完全康复，比开刀前另换一人，大喜过望，柏杨在麻醉药过了之后，从没有一丝疼痛，庆幸得遇神医。

柏杨心脏手术前，也忙碌一阵：

二月，在陈宏正、王荣文、周碧瑟、陈正炜、杨启航协助下，人权教育基金会正式成立，柏杨大梦跨出第一步。

三月，柏杨应旧金山民主协会之邀，与香华赴美讲演“政治婆媳文化”，三月三日往，三月十一日返。三月十三日，应电视“台湾风云”节目之邀，随制作小组赴火烧岛。再想不到此生还能重踏当年囚房，铁窗粪池均在，景物依稀，柏杨在灯光下进入“四区”时，听到围观官兵低低相告：“他是烈士！”人世沧桑，感慨流涕。

柏杨心脏手术后，生活平静，于十月获得1994年台湾“十大男人金像奖”，困香华赴欧，由蔡素贞扶持前往会场领奖。其他时间全用来复原休养，继续校订《资治通鉴》，也偶尔接受访问，除此之外都在酣睡，与熊熊相拥而眠。熊熊声名日噪，有朋友小孩看电视时，忽见柏杨，大叫：“快来看呀，熊熊的爸爸在电视上！”

今年（1994），有关评论柏杨的书，出了两本，一本是中央大学教授李瑞腾著《爱情挣扎——论柏杨小说解析》，台北汉北出版。另一本是广西大学教授雷锐、刘开明合著《论柏杨式幽默》，分别由桂林漓江、台北星光出版。

香华的收获也可观，所主编的塞尔维亚文《中国现代诗选》，本年（1994）初在南斯拉夫首都贝尔格莱德出版。香华自己诗选的罗马尼亚文译本，稍后也在罗马尼亚出版，书名Matase si vinfiert，中文意思是“诗与温暖的酒”。会塞、罗文的朋友，请来信告知，一定寄上请指正。南斯拉夫亚历山大·彼德罗夫（Alexandar Petrov）来台作淡江大学客座教授，访问期间，香华担任口译，并把讲稿译成中文，由该校出版，作为学术译丛之一，定名《诗人的时空》。

六月，香华应第四届亚细安文艺营之邀赴马尼拉，专题演讲“从人口输出到文化输出”。

十月，香华再赴东欧，先到罗马尼亚拜访译者Dusan Baiski，再赴南斯拉夫参加每年例行的十月国际文学会议，最后转捷克参加国际笔会第六十一届年会，得见同为作家的捷克总统哈维尔。

香华一路风顺，可是，在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火车站。却被几位吉普塞人扒走了信用卡及一些现金，直到贝尔格莱德才能打电话到台北挂失。

十二月，香华应邀赴大陆深圳参加国际华文诗人笔会第一届年会，当选理事。

香华仍继续在警广电台主持每周一次的“诗的小语”节目，并延伸出一个崭新的构想，就是出版“有声诗”——定名《诗的声音》（PTM Poetry Telemusic）录音带和CD，付出一年的时间和精力，年底已完成百分之九十，预定明年（1995）新春问世，届时再向你报告。

还有一件喜事，幼子垣垣结婚了，新娘名叫齐怡。不知道敢不敢奢望，明年（1995）抱孙。

柏杨香华

1994. 12. 台北

好友漱渝先生：

提笔写贺年信时，台北天气虽暖，但圣诞树已纷纷出现，新年迫在眉睫，向你恭贺新禧，报告平安！

感谢上帝的恩典和你的祝福，今年（1993）是我们最丰收的一年。

首先，柏杨完成九百万字巨著《柏杨版资治通鉴》。当二月底最后一册（第七十二册）出版时，距一九八三年九月第一册出版，整整十年，十年固如一弹指，但也催人更老，看到十年前六十四岁照片及录像带，原来当时还是少年。远流公司总经理王荣文先生特于三月七日，在台北市诚品书店艺术空间，置酒庆祝。那天，亲友云集，情谊洋溢，假如二十五年前早知道有今天的荣耀温暖，被捕时就不至于那么悲苦。蒋纬国先生也临会场，在致词时代表他老哥蒋经国先生表示歉意，使人动容。

北京友谊出版公司印行的简体字版《柏杨版资治通鉴》（改名《现代语文版资治通鉴》），以及香华翻译的南斯拉夫《温馨的边缘》（与《乘着光的梯子下降》合辑）韩国《践踏缤纷的落花》，两本结集，同步出版，于庆祝出版节当天，在北京工人文化宫举行“首发式”，邀请我们参加，于是我们在九月作第二次大陆之旅（第一次在一九八八年，回台北后，柏杨曾写“家园”记行）。首发式严肃隆重，与台湾有异。会后赴书展现场签名，读者拥挤，从他们眼神中，读到一种特有的关切和惊喜，难以忘怀。香华于翌日先返台北，柏杨转赴郑州，会晤失散五十年之久的一弟二妹。

从黑龙江专程赶到北京的徐天祥夫妇，早一天到达北京，老态龙钟，衣服褴褛，叙及别后情况，不忍卒听，当年他如用赠我的十四银元南下，今天我们的位置将恰恰交换，但他对四十年前赠金往事，已不复记忆，幸是如此，如果是我遗忘，而他还记得，人世沧桑，情何以堪！

香华数度出国，四月应南斯拉夫文科教国际交流协会之邀，前往访问十天，访问结束后，立即绕道意大利，转赴克罗地亚共和国，出席第五十九届国际笔会，对造成巴尔干半岛悲剧原因，感慨至深。

五月，香华应新加坡《联合早报》之邀，主持征文评审。归途经香港时，恰逢香港笔会改选，香华被选为理事，很是高兴，想不到乐极生悲，信用卡、香港护照、以及所有现款美金、港币，全被扒走，几乎流落街头。

八月，管家林太太在我们家十年之久，已成好友，特制一点小小礼物致赠，作为纪念，想不到最后才弄清，她已将满十二年，何以有此误记，十分抱歉，只能自怪年老。

十月，香华再赴南斯拉夫参加十月国际文学会议，在会议上提议，联合大多数代表，签名致电各有关国家元首，要求解除对南斯拉夫经济制裁。并与当地学者出版家，商定出版塞尔维亚文译《中国诗选》事宜。又会晤文化部长，文化部长盼来台访问，加强两地文化交流。朋友都调侃香华是“南斯拉夫大使”！

今年，香华终于找到一个“长期工作”，元月开始，台北警广播电台聘她主持“诗的小雨”节目，每周日晚间10：40播出20分钟，六月期满，警广播电台又续约一年，延至明年（1994）六月，你如果有时间，请你一听，调频网FM 1049·兆赫，或调幅网AM1260千赫，以及警广交通台调频网94.3兆赫。

柏杨自三月七日后，一些朋友认为他已脱离苦海，却不知工作更重，一则讲演增加，二则全力投入《通鉴》校对工作。



当这封贺函完稿时，柏杨写的《路，要你自己走！》一书，由星光出版社出版，我们还以为今年出不了。

熊熊，乏善可陈，依然故我。

最后，给你寄上一份“缘起”，这是柏杨的另一个大梦！内容不再重复报告，千言万语，请你指教！

恭喜、再恭喜！

柏杨香华

1993, 12. 20. 台北

好友漱渝先生：

今年（一九九二），因为上帝的赐福，和朋友的援手，在我们的小天地中，是一个忙碌的年，和一个丰收的年。但也有霉运：其一，春节赴南非渡假，十六个小时的直接飞行，再加上感冒，使我们同时在约翰尼斯堡病倒，并同时住进医院。长达十天，花了一笔使人心胆俱碎的医药费，医生嘱柏杨少作长途不着陆旅行。其二，从年初开始，柏杨视力就急剧衰退，不久就无看报写稿，《通鉴》不能中断，只好勉强支持，亲友信件几乎全停，十分抱歉。幸遇良医，写此信时，有些微好转，已可把字写到格子里。

元月，香华的《爱荷华诗抄》英译本 A Chinese Woman In Iowa 由美国 Cheng & Tsui 公司出版，为香华第二本英译书。

二月，杨文娟小姐编《她的人·她的诗》，由台北星光出版社出版，内容收集报章杂志对香华的报导和对她创作的评论。

三月，柏杨编《就是他》，也由台北星光出版社出版，内容收集报章杂志对孙观汉先生的报导和对她创作的评论。

五月，柏杨的《丑陋的中国人》英译本 The Ugly Chinaman，由澳洲 Allen & Unwin 公司出版。

七月，是香华最喜悦的一月，三本译诗同时出版，所译的韩国诗人金素月先生诗集《践踏缤纷的落花》，和南斯拉夫诗人亚历山大·彼德罗夫 (Dr. Alexandar Petrov) 诗集《乘着光的梯子》，均由台北远流公司出版。另外，所译的南斯拉夫诗人 山·引 (Dr. Du San Pajin) 诗集《温馨的边缘》，由台北巨龙公司出版。

八月，双喜临门，柏杨于一九八二年出版的《柏杨诗抄》于一九八六年译成英文 Bo Yang Poems Of A Period，而于去年（一九九一）获国际桂冠诗人奖，并于今年正式通知，柏杨不能远行，由香华代表前往美国凤凰城出席国际桂冠诗人协会年会，代致得奖谢词，料想不到年会结束时，协会宣布香华获今年（一九九二）诗人桂冠奖，十分高兴，捧冠而归。

九月，香华赴以色列参加世界诗人第十六届大会，得晤阿拉伯诗人。

十月，韩国为他们的诗人金素月诗集得以译出中文，举行盛大庆祝晚会，香华专程赴汉城，以特别来宾身份致词，第二天即返台北。立即飞南斯拉夫参加一年一度的十月国际作家会议。恰逢香华的塞尔维亚文诗集 CBNAH KYBAHO BNHO（中文译名《丝和温暖的酒》），由南斯拉夫 KPY EBAU 公司出版，在贝尔格莱德等城举行新书发表会，结识很多朋友。

十一月，世界华文作家成立大会在台北举行，香华因是香港分会理事，被选为代表兼香港代表团秘书，参加开会。

全国预防医学学会聘柏杨任爱滋病防治执行委员。

十二月，香华当选为国际笔会香港中国分会理事。

最后报告的是，《柏杨版资治通鉴》，本年（一九九二）自六十六册写起，年终时已写完第七十二册，总算全部译完。远流公司准备明年（一九九三）三月出版三十六册的精装本。整整十年，柏杨每天早上八时坐在书桌前，直到午夜二时就寝，除了吃饭时离开外，倦时靠椅背假寐，一醒就继续工作，十年如一日，没有假期，没有寒暑。自一九八三年开始写第一个字，柏杨书房就被喻为劳改营，柏杨则被喻为劳改犯，十年之间，总共写译文九百多万字，读原著四百六十多万字（包括每一个标点和注解），校对一千八百万字（要亲校两遍）。但虽然译完最后一字，却没有如释重负的感觉，因为

后续工作至少还要数年之久，劳改仍将继续，不过将比较轻松。

家人都很平安，熊熊猫更懒更肥，天一睡大觉，又不准洗脚。希望明年（一九九三）幼子垣垣能够结婚。寄上我们由衷的祝福。

柏杨香华  
1992.12.21

好友漱渝先生：

又是圣诞花红季节，很多朋友平时音信不通，靠一年一度贺卡，互报平安。现在，先告诉你，我们这一年来做些什么：

柏杨译《资治通鉴》，今年（1991）共出版六册（61—66），只剩下六册（67—72），明年（1992）此时，铁定全部完成。回想一九八三年出版第一册，已整整九年，不禁一惊。

二月，我们赴印尼巴厘岛渡假，回程经雅加达，印尼地处热带，北中国已陷苦寒之际，那里仍穿单衣。

五月，香华主编《生或死》，由台北星光出版社出版。

六月，柏杨应邀到马来西亚，分别在吉隆坡及马六甲讲演。并探望几被世人遗忘的[穿山甲人]张四妹。回台北时，在桃园机场跟由德国回台北的香华，在入境大厅相遇，真是巧合。

八月，我们住的村落——花园新城，举办一项艺术性社区活动，定名“起舞”，为时一周，有讲演、有展览、有舞蹈、有跳蚤市场。香华应邀当“起舞”一书文字编辑。

九月，香华赴土耳其参加“世界诗人大会第十二届年会”，会后到米兰、巴黎小住，于十月赴南斯拉夫，参加该国主办的国际文学集会，曾跟各国诗人在贝尔格莱德举行朗诵，电视台全程播出。

十一月，香华返台，散文集《秋水无尘》也由健行出版社出版。

十二月十一日上午七时十五分，幼女佳佳，在澳州雪梨，生下一女孩，英文姓名 Pate Elverton（有点男性化），我们为她取中文姓名“艾美”。

今年，柏杨著《家园》德文本(Rückkehr in die Heimat)，由 Jurgen Ritter 翻译，德国布鲁克玛亚大学出版社出版。

今年，我们尝到资本家的威力，缘香华在台北国泰人寿公司投保寿险，不料被国泰公司指控隐瞒胆结石开刀解除契约，没收保险费。香华曾向消费者文教基金会申诉，才发现国泰老板蔡宏图家族，专靠此手段经营自肥，财大势大，无人敢碰。我们不准备诉讼（这正中他们诡计，因为他们的钱可买到无罪判决），而只等柏杨明年（1992）译完《通鉴》，当撰写《蔡姓邪恶家族》一书，向金权反抗。好友中如有蔡家资料，无论文字或图片，都请你拷贝一份见寄，台湾因为有这种人存在，而被人认为贪婪之岛，是我们所有人的不幸和耻辱。

除了蔡家使人小烦，今年都很平安，寄上对你无限的祝福！也盼望知道你这一年的情形，我们是这么的对你关心！

柏杨香华

1991. 12.台北

好友漱渝先生：

我们或计远隔天涯，或许近在咫尺，但因为现代社会忙碌之故，一年几乎难以见一次面和通一次电话。现在，当九十年代第一年（1990）结束，圣诞歌声乍起之际，向你竹报平安，一年之中，我们做了什么。

柏杨还在继续《柏杨版资治通鉴》的翻译工作，今年共出版六册（50—60），进入倒数十二册的第一册（铁定七十二册完成）。

七月，柏杨小说《异域》改编电影完成，开始在曼谷拍摄，电影公司邀香华前去上一秒钟的镜头，作为宣传。香华于拍片后，赴曼谷开会。

香华既在曼谷，柏杨在七月末赴加州 Santa Cruz 出席浩然基金会讲习会演讲，这是多年来柏杨第一次单独远行。自己很能照顾自己，除丢了一叠《通鉴》校稿外，没有丢别的东西。

八月，香华飞汉城参加国际诗人大会第十二届年会。

九月，《异域》在台湾全岛四十余家电影院同时上演，造成轰动，开国语片票房纪录，深感兴奋。

十月，《异域》在香港预演，电影公司邀柏杨、香华去香港出席酒会及记者会，匆匆来去。柏杨赴港签证仍多困难，申请费时月余，多次入境改为一次入境。

十二月，香华应韩国国际文化协会友人之邀，再飞汉城，柏杨于稍后自台北赴新加坡出席一项“儒家文化的特质”会议，香华于汉城访问结束后，直飞新加坡，跟柏杨会合、旧地重游，一同回台北。

一年真是匆匆，柏杨视力稍为衰退，但儿女媳婿都很平安，长子本城仍从事房地产，幼子本垣仍在中研院及台大任教，孙儿忠忠三岁半（明年四月三日才四岁），到处乱跑，见东西都抓来研究。我们的猫熊熊，喜欢睡觉、咬人，很胖。报告好友得知，祝福你们，也请赐我们祝福。

柏杨香华  
1990.12.台北

## 只缘身在此山中（代序）

张香华

他的风貌一直在变，我不断地发现他无数个另一面。

在陌生的场合中，每当有人发现我就是柏杨的妻子时，总会惊愕地打量我。甚至，有人更直率地问我：柏杨的人是不是跟他的笔一样的锋利？这类的话我被问过太多遍了，每一次我的心中都会兴起一种复杂而微妙的感觉。这种感觉分析出来有几分有趣、也有几分好笑。因为，我想起了遇见柏杨前后，他给我的种种印象。

前些时，一位从前我教过的学生从远地写信来告诉我，当年我在课堂上讲到泼辣文章时，曾向她们介绍过柏杨。回想起来，当时，从未谋面的柏杨给我的印象是：文笔恣纵，外表嬉笑怒骂，而内心愤世嫉俗，想象中他是一个怒目金刚型的人物。那段时候，我生活的天地很小，教书生涯，除了课本之外，就是学生，其余一点点空闲时间，我徜徉在诗歌音乐的云天雾地里，和生冷僵硬的现实社会，有一段远远的距离。我从没有料到，有一天、自己和这位手持矛槊，出入人间的人物，会有任何关联。

第一次见到柏杨，令我相当惊奇。我固然从不相信他本人就如笔下所描写的，是一个年迈苍苍的糟老头。但，他的气质沉静，举止温文，仍十分出乎我意料之外。尽管他手中一根接连一根的纸烟，隐隐地透露出他内心的焦的不宁，然而，大致说来，他给我一种文质彬彬的印象。

把我们俩人的结合姻缘，说成是一个“痴”字，我以为并无不当。传统上中国人喜欢用“缘”来解释男女的结合，我觉得这说法也很圆满而浑成。有一则笑话说、有人问一位结了婚的女子：“你当初怎么会爱上你丈夫的？”

“他戴了一条我最喜欢的颜色的领带。”女子答。

听到的人笑起来，认为这个答复不是真正的理由。那么真正的理由是什么？

——真正的理由很难用一句话来表达。总之，当爱情叩对了门，有千百个理由支持你开门。

一个暮冬的黄昏，柏杨和我对坐在坐落台北市公馆的一家咖啡室里，他望着我、用一种苍凉而低沉的语调，婉转地说出他和我都需要有一个归宿时，那一刻，我真是紧张极了，我的心在颤动，因为，我不知道我们相爱是不是够深？

我在沉思。这时，窗外暮冬的街景，有点寂寥，日影欹斜黯淡。没有人能给这个问题答复，包括柏杨和我自己。在我写给柏杨一首题名（单程票）的侍中，有过这样的诗句：“曾经，我们都是行路难道上，苦绝的畸零人”。经过了忧患劫难，我们太需要彼此互相依靠了。我们俩人的命运都像被腰斩过似的，面对一切要重新开始的未来，我们的相遇，使彼此的勇气倍增。

深入的了解一个人并非易事。柏杨给我的印象，随着频繁的接触而逐渐改变。初识时候的风度翩翩，已经慢慢褪去，代之而起的是坚定、硬朗，而意志昂扬。之后，他的风貌一直在变，我不断地发现他无数个另一面。

我曾经给柏杨一句评语：“你这个人，既复杂而又统一。”复杂的是他对社会众生百态的洞悉。和历经险的曲折人生。统一的是他仍然是那么真挚，那么奔放，那么倔强——即或被有些人诟病为“任性”，而始终保持着他活

泼生动的感情。他直着脊梁述说他长坐冰块和右膝伤残的惨痛遭遇；他用顽皮而淘气的口吻，叙述他趁隙捡取一小截烟屁股，再经济地卷成细细的老鼠尾巴来吸食的故事。在那个故事中，一小片碎玻璃，就是代用的火柴，被他珍宝般的珍藏着……这些狱中禁锢生活的一二，听得我入神，听得我心疼如绞，滴下泪来。而有谁知道，这个倔强、坚韧的灵魂，竟有处世天真像孩子的一面，及一颗感情澎湃像海潮般热烈的心！

他办事效率之高，写作量之大，让我惊诧。许多次相聚归来捧着十年前所著的一叠叠厚重的书籍，每次，我都有种丰收的喜悦。我向他说：大学四年我都没读那么多书，这些书，够我读完另一个大学了。认识了他，使我有种目不暇接的充实感，我不再感到孤绝。

我一直不忘我们第一次晤面后的情形，深夜回到寓所，兴奋而疲倦，几乎倒头就睡，还来不及整理他给我的印象。翌晨，我到学校去，一进办公室，就赫然发现他的一封信，信封上没有贴邮票，显然是派人送来的。信上短短的几句话，很令我感动。我拨了一个电话给他，这个电话拨开了我们共同生活的序幕。后来，我们每一次会面，他总是随身携带着稿件，利用等候的片刻，不停地修改校订。那时，他正在校对他在狱中完成的历史丛书。看到他勤奋的一面，我领悟到，这个人是不能错过的。他的速度太快，效率太高，他不会在你的面前再三徘徊。

这段时候，柏杨寄住在罗祖光先生改装过的、别致而小巧的汽车间里。现在，朋友就称它作“柏杨故居”，我们很纪念这个名称。初次到那“故居”去，那种凌乱中的秩序很吸引我。改装过的汽车间，墙上有壁纸，地下铺着地毯。写字间和客厅合并，他可以一面忙着接电话、一面振笔疾书，一面招呼我，和我交谈，嘴上叼着一根烟雾缭绕的纸烟。进到里面，是一间小卧室，用一排高大的书架充当墙壁，隔出一条甬道。我一眼看到一长列整齐的廿五史，立刻想起了，它们曾陪伴他度过九年多的艰苦岁月。我忍不住用手去抚触它们，仿佛是抚触到柏杨滴下的斑斑汗渍和眼泪。书架上，有一叠叠的剪报资料，分门别类地收集在一个个活页夹里，我随意浏览了一下，名目繁多而且非常有趣，譬如说，有“瘟官”“钱”“债”之类，也有“理发”“烟酒”，还有一类叫“屁”，我觉得新鲜而好奇。这时，柏杨匆匆忙忙进来，抱起一堆换下来的衣服，冲到浴室去，我听到他开动洗衣机的声音，我走进去，把他手中的衣服接过来。看到柏杨过着孤寂的独居生活，一切琐事都要亲自处理，我禁不住感到凄怆。

我逐渐愈来愈喜欢这个“汽车间”，我喜欢逗留在房里为他整理资料，喜欢帮他清除书桌上的烟灰碟，喜欢为他清洗衣物。一面在房里工作，一面倾听他在客厅和朋友交谈传来的音浪。我想象的“家”，就是这种感觉，有男主人的声音，令我感到温暖、安全。从此，我一有闲暇，就到那儿。那一带因为是住宅区，夜晚特别安静，远处有一条铁路不时传来火车通过时，发出规律而有节奏的轨音，伴着一两声汽笛的长鸣。从低窄的汽车间后窗望出去，越过黑黝黝的原野，一节连一节明亮的车厢，在寒冷的静夜里倏忽而过，瞬间又复归黑暗、寂静，此时默坐在柏杨身旁，我的感触良多。

和柏杨在一起，让我觉得笃定而可靠。虽然和这样一位“是非边缘”的人物结婚，有人觉得我大胆冒险。有一位同学，以往和我过从很密，听到我们要结婚的消息后，曾四出打听，最后仍害怕得不敢前来参加我们的婚礼。其实柏杨本人丝毫没有使我恐惧不安的理由，他是我所见到的少数极温暖而

热情的人，加上天性豪放，率性起来，顾不了轻重，一义愤就忘了得失利害，诸如此类罢了。至于外在环境加诸他的危险，原需要很冷静而很深城府的人，才能脱身得了的。柏杨是一个不设防的城市，他感情太浓，用情太深，又不擅长运用心机。难道，一个人不趋迎时尚，又不诡变巧诈，就该被目为危险人物吗？我不能了解。

柏杨住在汽车间的期间，生活所需品，几乎无一物无来历。罗祖光夫妇供应的家具器皿，梁上元赠的洗衣机，寒爵送来电扇，林紫耀为他装电话，陈丽真、谈开元选购的衣物，二十年前在台南成功大学任教时的老同事戴瑞生，寄来了巨款，一个穿草鞋时代的同学范功勤，带了一包馒头来让他果腹，创造梅花绣的杨秀治女士和读友吴觉真女士，常常调制一些精美的食品点心，送来给他。而孙观汉先生——柏杨的恩人，跟大家一齐送他电冰箱、电视机、冷气机；案头有东方望的赠诗，墙上有史紫忱的墨宝，每一样东西，都充满一份深挚的情意。此外，汽车间里还有一两件深含历史纪念意义的物品，那是一床旧毯子，和几套颜色不相搭配，补了又补，破得不能再破的衫裤——柏杨在绿岛时所穿的囚衣，我在帮柏杨整理床榻时发现了它们，毯子和衣物上，赫然用墨笔写着一个号码：297。啊，那段名字被抹去的日子啊，我抚触到它们留下来的痕迹，感觉到亲人受苦的伤般的伤痛。我想象得出，穿着这些褴褛不堪囚衣的柏杨，清癯消瘦，满头银丝，踞坐在绿岛阴暗囚室的一角，而我一点也不觉得他狼狈，我觉得他傲岸峥嵘。

更深入静的夜晚，柏杨常常和我谈起他在绿岛时的生活情景：无尽的潮音，寂寞的拍打崖岸的绝响。夏天太阳毒热，炙晒着懊热的囚室。一日三餐，囚房的铁门定时打开一个小洞，饭菜从外边地上推送进来，十几个囚徒默默地吃完简单的囚粮。每天晨起，在荷枪实弹兵士的监视下，作规定四十分钟，实则长短不一的户外散步，不准弯腰，不准坐下，动辄遭到叱喝……夜晚，室友们围绕着唱一首苍凉的老歌——《老黑爵》。这首歌给我很深的感触。我曾经垂着泪，写过下面一首诗，纪念那段可哀可泣的日子。

#### 我爱的人在火烧岛上

有一个岛屿  
有一首歌  
有一个我爱的人  
过去，他曾经出现在我的梦中  
那时，我在海上挣扎救生艇的木桨折断了  
我随处飘泊  
找不到岛屿  
听不见歌  
遇不着我爱的人

我爱的人在火烧岛上  
没有美丽的青山、溪流  
没有碧水涟漪  
只有恶涛巨浪  
烈日风沙



青草枯黄  
菜蔬焦死  
飞鸟敛迹  
窗栏外的白云，凝结成硬块

那时，我爱的人绕室唱一首《老黑爵》  
他苍凉的歌声掩没了我的身影  
他衰退的视力  
不能辨识我的容貌  
他不能知道我疲惫的心  
因为他比我更疲惫，疲惫于无望

如今，我爱的人  
来到我身旁  
伸手给我，救我出灾难  
使飘泊成为过去  
疲惫已如拍落的尘土  
他教会我对抗风浪，修补断桨  
他教会我观察天候星象  
我们用臂弯围成一个避风港  
我们用温暖的眼色，点燃火苗的希望  
我们将合唱壮丽的诗章

不能忘记那些没有星月的黑夜  
只有海潮的哨音，日晒的烙痕  
如今，我们纪念那个岛屿  
我们怀念那首歌。

理智说来，打算跟一个刚刚脱离长期监禁的人生活一辈子，应该是有所顾虑的。例如，他的健康如何？他的心理是不是正常？姚安莉就曾警告我：“关了十年的人，你会遇到一个神经病！”其他的朋友也都这样为我忧虑。但是，在一次大家聚会中，她们和柏杨竟一见如故，我看得出来，她们不但接受他，而且很喜欢他。分别的时候，她们只留下一句话给我：“他可以好好地照顾你，你也要好好地待他。”但，那段时间，柏杨常常无端觉得心悸；经常要吃镇定剂，白天也不例外。

婚后，我陪柏杨到医院去做了一次全身体检。我告诉自己，不要奢望他全部通过。一星期后，结果出来了，他的心悸查不出生理上的原因，血压、心脏也都正常。但，继续有一段相当漫长的时间，夜晚睡眠中，我常常听到他在梦里发出惊叫和长长的叹息，仿佛一个人被推下峭壁悬崖，发出来的绝望呼喊。也有些时候，他像受了委屈的孩子，在梦中无端地哭泣。

随着他服用镇定剂的数量慢慢减轻，睡梦中也比较恬静，我开始愈来愈放心。我觉得他是一座山，那么沉雄峻伟，有风景，又有宝藏。我快乐得不得了。可是，就在这时，另一个困扰人的问题出现了：他不断地抱怨他的眼镜没配好，换了一副又一副。每当戴上一副新眼镜时，他连声说好，一两天

之后，问题又来了，他开始怀疑验光验得不准确，头痛和眼球胀痛困扰着他，这样持续了一段日子，我再陪他到医院去检查，终于真相大白，发现是眼球内微血管破裂，淤血沉淀淤积的结果，造成了视觉的障碍。

九年多来，在囚室内只有一支高高悬在天花板上四十支光的日光灯，柏杨不停地写作，完成了三部历史研究丛书，它们是《中国人史纲》、《中国帝王皇后亲王公主世系录》和《中国历史年表》，以及一堆可与腰齐的尚未完成的稿件。光线微弱，过度辛劳和营养不良的结果，柏杨损坏了他的眼睛。医生宣布说，这种症状分为四级，第四级是全盲，而柏杨已到了第二级。而且，药物治疗的效果很有限，唯一的办法是，节制看书，减少写作。

这项宣判对柏杨的打击太大了，不仅立刻妨害了他的工作，更威胁到他的心情。并且，如果一旦恶化，就太悲惨了。失去了光明，将是怎样一种无情的惩罚啊，而柏杨何辜？为什么冤酷总是尾随他不舍？在体检一切正常之后，偏偏出现了眼疾。上天有教世人罹患疾病的权杖，却敲在足胫挫断的人身上。

远在德国的虞和芳得到了消息，立刻来信，要柏杨到她辗转打听出来的名眼科中医师张齐贤处求诊。至此，柏杨的眼疾才算见到了一线曙光。那些每日早晚服用的，奇奇怪怪的药丸药散和熬成的汤药，减轻了他不少针刺般的痛苦。另外，又从一位熟谙医道的朋友处，学到了按摩法。这样一日数回，不间断地辅助治疗，似乎给了他一些信心和鼓舞。

一年的时间在焦的中过去，服用中药一直未断，经秦重华大夫介绍给他的一位朋友检查，知道淤血已经渐渐消散；但，眼球内部的细胞一部分已坏死，新的病名叫“黄斑部变性”，所以，视力并未恢复，看东西看不完全，也不够稳定，时隐时显，而仍不断胀涩。

平日柏杨和我谈话中，很少谈到眼疾这个话题，因为，显然这不是言词可以解决的事，而在我们的心底，隐忧的阴影不免攫住我们，好像春天三月里，外头花事烂漫，我们却在屋内毛玻璃前欣赏风景一般，我们的心，有一面总不能完全晴朗起来。

而柏杨案上永远堆积着作不完的工作，单是历史研究丛书的校对，就已经足够使他的眼疾加重。我虽然也曾建议由我来代劳，可是他说：“校对和生孩子一样，都是没有办法请人替代的。”无可奈何之余，我想到上天给过柏杨的种种考验，我不相信他有通不过的难关。

有人把创作比作生产。每当柏杨新书出版，我无不怀着一则以喜，一则以忧的心情。我应该最清楚，每一本书的诞生，背后付出多么艰辛的代价，而柏杨是个多产的母亲。一个朋友要柏杨列出他全部著作的名单，柏杨说：“我全部著作大概有四十本吧，或许五十本，我自己都记不清楚。”柏杨的确像母亲哺育一个接连一个诞生的孩子般，劳瘁不已。而这许多著作，也同样报偿了他母亲一般的喜悦。在我们生活的天地里，有一个地方柏杨最乐于厮磨其中，那就是书房。他常对我说：“书桌是我喜欢的地方，每次一坐在书桌前，我的心就特别地宁静。”因此，我们的生活缺乏休闲活动。游山玩水的雅兴，很难提得起来。看电影、听音乐之类的享受，更属奢侈。我们的娱乐和工作分不开，哪儿还有时间去消遣？

有些人以为，写作的灵感是件很奥秘的东西，需要用异数来培养。我在柏杨的写作过程中，找不到这份特殊的情调。他总是坐下来执笔就写，写倦了，从书房踱出来，自我排解地说：“我真不想写了，我想出去玩玩，悠悠

闲闲，多好。”话才说完，只见他又踱回书房，继续埋首伏案。就这样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周而复始，成了我们生活的日程表。柏杨的生活没有一般人想象的绚丽色彩，没有波澜起伏的情绪变化，甚至没有骚人墨客的闲逸雅兴，跟他作品变化多端的风格，似乎很不相称。柏杨常常自嘲地说：“我觉得我不像个文化人。”可是，他丰富的作品告诉我们，他是个地地道道出色的文化人。不过，从我们生活的角度来看，柏杨和我的生活，却是单调、刻板的。

“我是个梁山泊好汉型的性格。”柏杨常自我嘲弄他自己。事实上他确实是梁山上的人，看到别人遭遇困难，喜欢自告奋勇地表示：“我帮你想个办法。”他喜欢拔刀相助地问人家：“和你为难的是谁？我去找他干。”他天性乐于助人，而这种爽直、勇于承担的行为，常常把一些乡愿型，老于世故的人吓住。

也有人把他的豪情侠义，当作偏激。举一个例子，台湾盗印之风一向十分猖獗，曾经有一位出道不久的女作家，因为书籍被盗印，由她的父亲出面向一家出版商求助。那天，正巧柏杨和我也在场，听到了那位父亲的叙述，柏杨登时气得跳起来，他叫道：“我去找他算帐。”女作家父亲的反应，却是顾左右而言他。事后，我们听到这对父女对柏杨的批评是：“这个人太冲动。”柏杨的行径与他的年龄和遭遇，都太不相称了。

乐于助人并不是一件轻松容易的事，不久前，冒着寒流来袭的隆冬，柏杨为了替一对刚成家的年轻朋友谋职，四出奔走。那天，他忘了戴他平日少不了的护膝——柏杨右膝伤残，一块突出的骨头，无情而刺眼。回到家来，酸痛难当，一面呻吟，一面像完成一桩大事似地兴冲冲地说，“大概没问题了，我已经找到人，亲自拜托过。今天爬了六楼，那里的电梯坏了。”我赶紧拿出薛俊枝远自美国寄来的电毡，替他裹在膝上，这时，我忍不住又流下泪来。

可是当柏杨把好不容易奔走得来的结果，兴奋地告诉谋职无着的朋友，要他明天去见主管时，对方却淡淡地说：“明天吗？明天呀！明天我忙，改天行不行。”这位年轻人显然已经忘记他焦的求职的事，此刻，他只悠悠地说：“其实，我做什么事都差不多，我看我就不去了。”连一句道谢的话都没有，在一旁又恼又伤心的我，几乎不能相信这件事的转变。啊，我仿佛亲眼见到这一幕——柏杨爬着一层层的楼梯，不时用手按住他的右膝，迎面寒风砭人肌骨，而这时，我真怀疑，在森森冷面高墙矗立的大楼前，这个满身鳞伤，筋疲力尽的独行侠，是不是和身后画面太不调和了？还是这种典型的人物已经落在这个时代的布幕之后？

小时候，我曾被书中的一句活深深地感动过：“但愿我心如水，处处齐平。”我一直向往那样一个境界，以为大地被春水沃灌过，处处都是润泽，开满了芳菲的花朵，天空没有鹰鹫盘旋，地上蛇蝎敛迹。这一切反映在人间世上，就是爱心洋溢，没有愤懑，没有嫉恨和忿争，到处都是亲爱、和谐。可是，经过现实人生的一再冲击，告诉挣扎的我，“齐平”两个字的真正意义，我不再存有往日梦幻想法。我现在服膺的人生态度是：爱其所当爱，恶其所当恶。面对着层面不同的柏杨，他突兀峥嵘的言论，和侠义行为的背后；有一颗充满了良知的爱心，我快乐地接受了他的每一面。

冬天早晨醒来，柏杨告诉我，他严寒的北方家乡，他的童年故事：继母冷酷无情，把他这个十岁不到的孩子，孤伶伶地丢在和全家人隔离，坐落后

院一间独立的空房里。每年冬天，他一双手生满了冻疮，痛痒难当，抓得溃烂，出血流脓，一直烂到次年春天才结痂复元。每个寒冬清晨起床，冻得直打哆嗦。一心只盼望，在那件破棉袄内，能有一套弟妹们都有的棉布衫裤。可是，寒风从四壁钻进来，他仍旧套上那件油渍污垢，已经穿了多年的“空壳榔”棉袄，瑟缩地爬起来，面对一个冷酷无情的新来的一天。可怜的孩子啊，柏杨。

“没娘的孩子像根草”，以他家庭小康的经济状况，荷包蛋酒酿之类的点心，却永远轮不到他，只有看着继母所生的弟妹们吃，而他呆立在一旁垂涎。父亲长年在外地工作，很难得回家来了解这个前妻留下来的孩子的生活状况。那时，柏杨多么盼望家中有个人爱他、关心他。有一回，他忘情地奔向继母的面前，想讨好她，却换来一顿叱责和冷嘲。从此，他只有把一份很深、很浓的爱，寄托给遥远而不常回家的父亲。而父亲回家的日子总是那么渺茫，即令在家的時候，也像绝大多数中国上一代传统的家长、在子女面前，除了“庭训”之外，很少言语，更谈不上感情的交流和思想的沟通。但、就在这肃静的气氛中，只要有父亲在家，还是个稚子的柏杨，已经享受到最大的天伦之乐。他快乐地跳蹦着，他恢复了童稚的天真和自由，他活泼地唱着歌，恣意地向父亲撒娇，向父亲讨钱买糖果来解馋……这一切，任何一个幸福的孩子所能拥有的一切，都不曾发生在他真实的生活里，只默默地出现在他的心中，在没有任何一个人知道的，他寂寞的小小的心田中。如今，许多个夜晚，当他写稿写累了，停下来休息，我常常给他端上一碗酒酿，再加一个荷包蛋。看他吃得香甜，我在想，那个狠心的继母，该有一副怎样的心肠？从他的一生，我肯定他倔强的个性，成型在他十七岁那一年。他跳起来用拳头反抗继母对他的殴打和辱骂。之前，这种待遇原是家常便饭，他总是逆来顺受，可是，这一次不同了。他已经忍无可忍，他在地上画了一条线，凌厉地警告他的继母，不准越过。继母疯狂地扑过来，他迎头给了她一顿痛击，然后立刻逃走。柏杨终于离开了这个缺乏温暖的家，他艰难地跨出了他的第一步。回忆往事，他常常告诉我，如果当时他的父亲讲一句挽留他的话，他就不走了。然而，父亲只是叫了一声他的小名——小狮儿。然后，叹息了一声。于是，小狮儿成了今天的柏杨。柏杨说：“有能力报复而不肯报复，和根本没有能力报复，而空言不报复是两回事。”他，绝不伪善。

柏杨喜欢下围棋，可惜我不通棋艺，在家中他没有对手，只听他谈起过围棋的基本原理。他说下围棋必须先建立两个据点，才能立于不败之地。我觉得在人生的棋局上，几仆几起，愈挫愈坚的柏杨，也有他的两个据点，那就是敢爱和敢恨。除了对人充满了浓烈的感情，所放射出来的阳光一般和煦的爱心之外，他从不讳言他的嫉恶。嫉恶酱缸——憎恨人们因私害公，忧心社会的腐败落后。他想打破闭塞、固陋和僵化。他想消除凶残专横黑暗的恶势力，指责非理性死不认错的心理。他不能谅解那些不为别人着想的人，和嫉妒别人长进的人。他认为那都是进步的最大障碍，是反淘汰之所以形成。他为这一切奋斗，付出了几乎把他摧拆的代价。我曾经向他说：“我敬重你的奋斗，我认为你是个不屈不挠的英雄典型。”他告诉我：“一个人的英雄气概，和奋斗的意志是一阵一阵的，不是一成不变的，需要鼓舞和支持。”我凝视着他，把这话牢记心头。

曾经有人告诉我，在柏杨入狱之前，他的交际很广，真所谓门庭若市。如果真是如此，这意味着多么严重的虚妄。现在，我们交往的朋友，虽也形

形形色色，或清或浊，但总有两个必备的条件，那就是“真交情”和“真性情”。由于他笔下涉及的范围广、接触到的人物中，有纯正、充满理想的青年学生，有富正义感的各界人士，有视他为洪水猛兽的道学先生和官场人物，也有赞扬他、仰慕他的柏迷。有的读者频频写信来要和他见面，或索签名照片等等，有的称兄道弟，有的尊他为老翁。有的呼冤、求救，要求代为伸张正义，也有的和他论辩争执，更有的破口大骂，指他离经叛道。每回打开信箱，收到一封封读者来函，我就计算着他要花多少时间来写回信。不论这些来信立场如何，他从不肯让任何一个读者希望落空，总是亲自执笔回复，并且把这些信件收藏起来。因为每一封信的往返，都是一个问题的探讨，一份感情的交流，没有一封信是交际应酬。我也因此结识了不少良友。

我们的生活中，酬酢不多，但，终不能全免。不论我参与与否，他总是教我分析各种聚会的意义，什么是交际宴会，什么是应酬知己，水太清则无鱼，要用什么样的心情去承受不同的友谊，我从他那儿学习到许多处世和人情。而他一再告诉我说：“我是个过感情生活的人。”每当我们旅行到一处，他一定不忘吊古访友。在嘈杂的街头，他会倾听一个卖口香糖孩子讲述自己的家庭状况。当他被囚在绿岛时，从报端知道了贫苦患病者的消息，他仍辗转寄他能力所及，为数很小的钱去给人家。当然，他会冷面对待一些见利忘义，势利凉薄的熟人，然后，开一句国骂：“他妈的！”

一般人喜欢用婚前婚后判若两人，来作夫妻调侃的话题。我想，这并不切合柏杨和我。我们在爱情的光环之中，可能把对方估量和实际有一点小小的出入。但，我们不断地滋长，不断地培养，不断地追求，我们永远有更多、更多的不断，从往日绵延过来，向未来不停地探索，在一首《春讯》的诗中，我写道：

当岁月磨我们成茧  
当苦难缚我们以千丝万缕的缠绵  
是什么使我们破茧而出？  
是什么使一再结硬壳的生命  
再度温热、柔软  
而重新吸纳日耀月华？  
我们俩人都在努力，不让对方失望。

有人称赞柏杨精明能干，我承认。有人说他糊涂，我也承认。柏杨在人生舞台上，扮演过许多不同的角色，如同他的文笔一样，是个多重性格的演员。他除了成为一个作家之外，还经过商，在东北时，卖过矿场用的坑木。来台湾之后，一面鬻文维生，一面做出版生意，在文化事业还不及今天一半蓬勃的当时，他的出版社干得有声有色。他还奉过公职，当过报馆编辑，干过小学中学教员，当过大学教授。他入狱之前，还正在一所大学里任教，讲授《文学概论》。当然，他还失过业，流过浪，一心只想吃个馒头。抗战时，他最大的愿望是有一枚金戒指和一顶钢盔。

生活经验这么丰富的人，竟会糊涂，头脑不清，真是令人不可思议。事实上，他经常一面用电子计算机加减简单的数字，一面拨电话到中央研究院去，找研究昆虫的安莉为他验算答案。他时时坐上公车，心不在焉，不是发现坐过了站，就是搭错了路线。有一天，我回家来，走到二楼时，发现他手上拿着钥匙，正在开别人家的门，我问他怎么回事，他才发觉自己的家在三楼，他气呼呼地说：“怪不得，怎么也打不开。”这种事他会重复再三，有时是

跑到四楼去。于是，找钥匙、找眼镜、找图章、找剪刀之类，在我们家中一日数起，闹得满头大汗，气得快要发疯。去年（1978），孙观汉先生先后两次到台湾来看我们，而两次柏杨都深更半夜打电话问观汉先生，自己的皮夹子是不是在他那里。观汉先生说：“我看你这个皮夹子迟早要丢掉的。”

至于说到我，我毕竟也不如柏杨当初以为的那样齐全和美好，我会把开水烧干、水壶烧焦，做事老是粗心大意又没条理，我的字迹也没有别人传说的工整秀丽。不过，柏杨的字迹更是有名的拙劣，一家刊物上曾有人为文，称他的字是“还原体”——跟小孩子写的一样，他的字和他纵横的文笔，终不能相配，使他遗憾不已。另一件使他遗憾的事，由于他比我年长二十岁，以致当我的朋友和他相处时，常把他当长辈看待，他老大不愿意。他还会跑老远去买东西，结果付了帐，却空手回到家来。柏杨自己对饮食和穿着都很随便，从不考究；我既非巧妇，也不强自装作。认识对方，也认识自己的短处，彼此都不多挑剔，就可以安静过日子吧！有人说，恩爱夫妻在当时都是不自觉的，而我们两人的生命历程，教给了我们如何感恩和珍惜。

我曾经问过柏杨，从绿岛回到台北，要花多少时间，才能重新适应这个相隔九年又二十六天的世界。他给我的答复是，当他步下飞机的刹那，只花了一秒钟，就适应这个世界了。他是这么有弹性，他关心这个社会，他面对得起种种问题，没有时间让他彷徨、犹豫。而我是亲眼看到他——重新振起的人。

微风细雨的夜晚，雨滴落在雨遮上，滴嗒有声。在没有庭院的公寓房子里，可以模拟几分雨打芭蕉的情趣。柏杨在写字桌前，抬起头来倾听屋外的风雨声，他告诉我，这是他最感到宁静的一刻。我相信这一刻是我们生活中最婉约的一面。其余的时候，我们总是紧张、忙碌的时候多，像一出热烈的戏，锣鼓喧天，饶钱齐鸣。

柏杨视线的障碍，使他常常在写稿时，停下来辍笔长叹，他闭紧了双眼，用双手捂着脸，一语不发地靠在椅背上养神。我突然发现他像一个身经百战归来的老兵，脸上刻着风霜的痕迹，和光荣的标志，啊！我心胸中有太多的话想说，却硬在喉头，我走过去，靠着他，轻声地告诉他：“我在你的身旁，我就是你的眼睛。”

一九七九年三月

看，这个丑陋的中国人  
——柏杨

## 有三个生日的『野生动物』

天下所有人都知道自己的生日，中国人甚至知道自己出生的时间是几分几秒；只有他，什么都不知道。不知道自己的生日，属于世界上无与伦比的小事，没有人会为它眨一眨眼，可是，假如有一天，忽然有人宣布他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作家，恐怕就要劳动一大批考据学家忙得团团乱转。

据说，他出生于一九二〇年，这是他唯一记得的数字。不过到了后来，连这个数字也不敢十分确定，因为事实上，并没有一个人告诉过他，包括父母。母亲在他生下来不久即行去世，中国人的父亲向来把儿女的出生养育归于母亲的职责，更不会记住儿女的生日。这个数字的来源，似乎是从家人口中，偶尔听到，因而留下印象的，日久天长，或许记错，或许讲的人根本不是讲他，而是讲别人。他还模糊记得他的生日是阴历九月初七，不过，更加不敢肯定这个日子。二十世纪二十、三十年代的内陆乡村，几乎仍是原始社会，除了大人物或是世家子弟外，很少有人为一个孩子庆生。所以他的生日是哪一天，毫无意义。他的出生就像一个动物族群中一只小驹，诞生在茫茫的天地之间。

一九四九年，他二十九岁（假定他的生年没记错的话），流浪到台湾，在行政组织严谨的台湾区公所办户口时，因为不能肯定他的生日，所以临时起意，顺口报出一个印象中不容易忘记的日子——十一月一日，那是东北第一大城沈阳市在国共内战中被共产党军队攻克的日子，当时他正在沈阳办《大东日报》。所以他选了十一月一日成为他户口上正式记载的生日，一直保持了二十年。一九六八年的三月七日，他被调查局以“共产党间谍”以及“打击国家领导中心”的罪名，逮捕入狱，要求处死。其后，又被改判有期徒刑十二年。于是从此，他就以三月七日做为他的生日，不但纪念他的苦难，也强调自该日起，对笼罩他一生的蒋家父子政权的唾弃。然而，正当大家已经接受他的生日是三月七日时，却在稍后出现的文件上，发现他真正被捕的日子是三月四日。为什么发生三天的误差？这和传统官场作业有关，原来法律规定，任何刑事案件，调查机关收押被告，不得超过四个月，而且冠冕堂皇的宣示：如果超过四个月，被告在拘押期间所有的口供与证据，都作无效，用来保护被告的人权。而他是一九六八年七月七日由调查局移送台湾警备司令部军法处的，如果不把拘押日期从三月四日改为三月七日的话，调查局的拘押行为就完全违法，他则完全无罪。所以，特务们就把被捕日期后延到三月七日，这是诬陷手法小动作之一。仅只生日一项，竟有这么多曲折变化，难道一开始就命中注定一个小人物求活不能、求死不得的坎坷一生！

跟生日同样暧昧的是，他不知道生在那里。有人说，他生在父亲当县长的河南省通许县县长宿舍；有人说，他生在河南省开封县东桐板街；没有一个人明确的告诉他，到底他生在那里。只是，在他长大后，发现他被归类为河南省辉县人。

现代的辉县人，尤其是居住县城东北六公里的常村郭姓居民，他们所有的记忆，最远追溯到三百年前那个令人作呕的明王朝末年。那是一个无边无涯的大黑暗时代，整个中国北部大约五百万平方公里、比一百五十个台湾都要大的面积上，发生被贪官污吏制造出来的可怖饥荒，旱灾、蝗灾，所有含叶绿素的叶子，全被啃光。大地如焚，河水干枯，一片焦土。饥荒的灾民，互相交换子女，烹杀煮吃，当孩子们都吃尽的时候，他们吃观音土——一种



白颜色的松软石头，经水煮过，会变成浆糊，人们把它喝下去，暂时填满肠胃，可是不久它就凝结，恢复成石头硬块，既不能消化，又不能排出，直到一个一个活活胀死。

就在山西省洪洞县，一个郭姓大家族几乎被饥饿消灭，残存的一些族人，在一棵大槐树下，把一个铁锅摔破，分给每一个支派的族长，然后互相祝福，四散逃命。他们相约等这场灾难过去（人往往认为灾难会过去，以寄望于未来），总有一天，大家从四面八方返回故土，重建家园。万一到时候子弟已互不认识，锅片就是信物，可以为证。

于是当中有一支从洪洞县出发，向东逃亡。那是一段悲惨凄凉的旅程，中途幼儿夭折，老年人逝世，沿路写下悲苦的河南辉县先民移民史。他们翻过高达两千公尺的太行山，继续向东逃亡，终于在太行山东麓的辉县定居，他们的子孙一直传到现在。转眼三百年，锅片已经不知道何处而去，子孙们对往日大槐树下摔锅片的故乡，早已失去记忆。今天，当辉县人被询问到这个故事的时候，只见他们的一脸茫然表情，透露无限人世的沧桑。

他，柏杨，就是这支苦难先民的后裔。

从柏杨不知道生日和出生地，如果推测他有一个原始、贫穷、没有一点文化的家庭，也并不过份。不过，他们却是小康之家。惭愧的是一直到年纪很大，特别向亲友查问，才知道他的祖父名叫郭统。除了这个名字外，对祖父本人，以及祖父以上的祖先，一无所知。只知道祖父有两个儿子，大儿子郭学忠，二儿子郭学慈。学忠就是他父亲，从小念过四书，在清王朝政府被推翻、中国五千年专制制度结束、中华民国成立之际，读过当时开风气之先的警察学校，后来当过一任河南省通许县县长，又当过开封县警察局官员。到了一九三一年，中国军阀大混战，父亲参加反抗军——第八方面军，在樊钟秀将军手下当交通科长。这一场内战，是地方军阀阎锡山、冯玉祥，及樊钟秀等联合的反抗阵线，与中央军统帅蒋中正对决，在中原地带（也就是河南省）会战。这场会战中，反抗军一开始就失利，樊钟秀被中央军的飞机炸死。

樊钟秀之死，说明了世界上确实有很多绝顶聪明人，实际上却是那么愚昧无知。那时候中央政府的空军，不过只有几架飞机，偶而派一架到前线侦察或轰炸，全靠驾驶员的肉眼观察，没有任何仪器，威力有限。但是，每逢飞机在空中出现时，都会引起反抗军官兵的惊慌，恐吓力十分强大。因为人们一辈子从来没有见过一个东西可以在天上乱飞，而且可以击毙人马。那螺旋桨的刺耳噪音，能使全城居民，像发生地震一样的呼叫。第八方面军总部设在许昌县城，官兵也因惊慌过度，跳嚷喊叫着四散奔逃。对于这一项来自天空的心战威胁，冯玉祥有一项心战的措施，他告诉反抗军说，乌鸦是拉屎的，乌鸦屎拉到你们头上过没有？飞机难道比乌鸦多吗？炸弹难道比乌鸦屎多吗？你们怕什么？

这一项漏洞百出的心战教育，对那些几乎全部来自贫苦农村，头脑简单的反抗军官兵而言，是至理名言，完全接受，而且在酒酣耳热之际，还讥笑那些对空袭心怀恐惧的人：“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认为自己才是天下第一智士。这种不允许别人反驳的安全感，成为一种理直气壮的信念，以至于连樊钟秀都确信不疑。于是，有一天，当他乘坐当时很少见的漂亮小轿车出城视察前线阵地的時候，遇到中央政府的飞机正好在天空出现，卫士建议停下来到附近躲避，樊钟秀嗤之以鼻说：

“乌鸦屎掉不到我们头上，你怕什么？你这么胆小，还不如回家抱娃娃去！”

那架飞机在天空上只盘旋了一圈，驾驶员虽然不知道车子里是樊钟秀，但可肯定车子里必然是当时的重要人物，于是，投下炸弹，车子和车子上的人，全都粉碎。

这件父亲亲身经历的往事，他从小就印在心中，刺激他产生一种思考，那就是，无论是哲学或科学，无论是政治或军事，无论是文化或商业，一旦最高指导原则犯了错误，一定是一场悲剧。而它是不是错误的，并不一定不可以验察，只要允许公开辩论就行了。一旦不准许公开辩论，指导原则变成皇后的贞操，不容许置疑，它一定会产生错误。

他就在这样的家庭中长大，父亲郭学忠于樊钟秀被炸死、第八方面军瓦解、反抗阵线失败后，逃回开封，改业经商，从事花生进出口生意。在不久即统一中国的国民党看起来，他是一个北方军阀的残余，政治对他，从此绝缘。至于亲生母亲是谁，他不知道，只记得她仿佛姓魏，家住辉县西关，如此而已。他不知道母亲的名字，不知道母亲的容颜，也不知道母亲那一年死亡。在一个从没有人告诉他生日的家族里，更没有人告诉他为什么母亲年纪轻轻竟然去世。

而且甚至于一直到小学四年级以前，他都不知道他叫妈妈的那一个女人，不是他的亲娘。四年级的时候，他才听到一星点关于亲娘的消息，唯一的嫡亲姐姐郭育英，抱着几个月大的他，孤独的站在床头哭泣。育英跟他是一母同胞，她没有受过什么教育，就嫁给一个父亲朋友的儿子窦清淮。窦清淮长得什么样子，以及窦家情形，他并不清楚。他只和姐夫见过一面，但是没有交谈过一句话。那一年正是反抗军失败后的次年，一天傍晚，一个年轻人仓促的闯到家来，和父亲在窗下密谈，然后满脸惊慌的踉跄离去。父亲告诉他说：“这是你姐夫，有人告他是共产党。”

从此就再没见过他，后来听说他终于被捕，在刑场上被枪决。育英姐一直守寡，带着唯一的小女儿窦芳爱，母女相依为命，直到老死，苦死。

姐姐是这世界上最关心，最疼爱他的亲人。她比他更是时代的受害者，缠小脚，几乎不识字，使她无法维持自己的生活。她在继母进门之后，首先受到冲击。因为继母进门后第一件事就是迫使正在读小学二年级的姐姐停止学业，草率嫁人。以后，他回到辉县读百泉初中，欠了附近摊子很多的糖果钱，被债主追逼得无法招架、只好向姐姐求救。他是一个混沌的人，那年，他十四岁，根本不知道姐姐那么样的贫穷。姐姐拿出所有的储蓄，不过一串钱（当时的一块钱银圆可以换四串钱），她仍托人带给他，嘱咐他千万节省使用。这一点钱，根本不够还债，不到两天他就把它用光。那个时候，乡下学生已经开始流行穿制服，制服的最大特征，就是裤腰跟传统式的裤腰不一样，而又是机器对口双线缝纫，跟手工的单线缝纫不同，他非常羡慕那种摩登的长裤。但是，已经中落的家道，供不起他做这样的制服，他天生气，向已经出嫁、贫穷而又丧夫的姐姐要钱。姐姐没有钱，就亲手裁布缝纫，为弟弟做只有机器才可以做得出来的长裤，对口缝纫是那么的辛苦，他仍不满意，扔在一边，连一眼也不肯看，惹得姐姐落泪。

一九三七年，抗战爆发。一九四九年，他被内战的战火驱逐到台湾。四十年后，重返故土，姐姐已于前一年逝世，临死还拿着他这个不争气弟弟的信，叫别人念给她听。

## 『人皆有母，我独无！』

“人皆有母，我独无！”这是柏杨对自己身世的叹息。

西方有一句话：“上帝不能跟每一个人同在，所以赐给他一个母亲。”但上帝并没有赐给他一个母亲。正确的说，是赐给了他一个母亲，但在他最需要母亲的时候，上帝却把她夺回。带他长大的是继母，这位继母是满洲人，她非常漂亮，也绝顶聪明（可悲的是，她只有聪明，没有智慧），没有人比得上她更能说善道。她原来是一个满洲籍官员（河南省怀庆府道台）姨太太所生的儿子的妻子。一九一一年代，清王朝灭亡，民国建立，那位满洲官员从高位上跌下来，一病而逝。不久，继母的丈夫也一病而逝，全家只剩下婆媳二人。大概就在这个时候，父亲中馈乏人，就把寡媳娶进家门，也把婆母接过来。婆媳的身份变为母女，问题是，她们到底不是母女。这位可怜的婆婆，孩子们都以北方的习惯叫她姥姥。

继母共生有两个男孩跟两个女孩。以他判断，继母一定携带了她丈夫与她公公的全部财产，嫁到郭家。所以，她在家庭中，居于强势地位，颐指气使，没有任何顾忌。因为她没有受过什么教育的缘故（那个时代所有妇女受教育的机会非常少），她时常对父亲破口大骂，侮辱到祖宗三代。而且，她发起泼来，简直像一头疯狂的野兽，趿拉着鞋（鞋子被压下后跟当作拖鞋穿），不只是在家里叫骂，而是到门外大街之上，有行人来来往往的地方，一面走，一面挥动着手势，高声叫喊，每一次几乎都是父亲把她半劝半吓，扶持回家。吵闹本应该就这样结束，但是不然，这不过是更大吵闹的开始。她回到家里，仍然继续她的诟骂，愤怒得擂着桌子，把桌子上的东西掷向窗户或掷向墙壁上的字画，砸碎的声音和家人围在她面前祈求息怒的声音，使她更觉得自己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反而加倍兴奋，然后再悲从中来，号啕大哭。等到眼泪哭尽或她觉得哭下去已经没有意义的时候，她就干号，干号过久，她会上气不接下气，艰辛的气喘，并口吐白沫，眼看就要毙命，这时父亲总是从抽屉拿出经常放在那里的“喷射管”（一种可以伸进口腔，把药粉喷到喉咙的一种管状器材），喷一种粉剂（到现在他也不晓得是什么药），喷到她喉咙深处。这时继母脸色苍白，双手与双臂痉挛，骂声渐小，最后变成呻吟。这种闹剧每次都需要一个小时或两个小时，而每隔一月半月，总要上演一次。

夫妻吵架吵到这种程度，在他心中留下深刻的烙痕。虽然那个时候，他还不知道继母不是亲娘，但对继母的泼辣手段，早生出强烈的反感。除了这种镜头之外，他跟每一个孩子一样，对一个并不知道不是亲娘的母亲，仍充满了孺慕之情。他是多么渴望继母能够抱抱他，亲亲他，喊他一声乖儿子。然而，在他的童年里面，从来没有发生过这种事。

每一天早上，两个弟弟和两个妹妹，被各人的奶妈安置在桌前，吃各人的牛奶和荷包蛋时，只有他没有人理会。他也站在桌前，既饥饿又渴望温暖的心灵，使他东看看，西看看，左跑跑，右跑跑，希望有人也给他一碗，结果当然没有。眼看着香喷喷的荷包蛋和牛奶，灌入弟妹的口中，有时候，有些弟妹还拒绝早餐，也没有一个奶妈愿意把它递给他，她们总是自己逕行坐下，把它吃光。他眼睛瞪得大大的，呆呆的望着那红红的荷包蛋和热腾腾的雪白牛奶，口水从嘴角淌下来。只有一次，他喊叫说：

“妈，我也要吃。”

继母冲进来，一耳光打到脸上。她愤怒的倒不是他胆敢要求吃荷包蛋和牛奶，而是他的口水，继母认为他没有出息，诟骂说：

“叫炮头（这是开封土话，就是被枪毙的头），你也配吃？”

从此以后，他就没有再期待妈妈会给他牛奶和荷包蛋。每一次，都是自己用袖子擦干口水，默默地走出房间，饥肠仍然辘辘。他一直不知道，为什么全家孩子们，只有他一个人不能吃。

开封街上有一种贩卖江米甜酒（南方叫“酒酿”）的小贩，一根扁担前面挑着一个小柜子，柜子上有一个小人的泥制火炉，炉子右边有一个小小风箱，左边放着若干小碗，柜子下面放有一大罐酒酿和一大罐白糖，后面挑着一点木炭、木柴，和一桶清水，这在当年，是足以使全城小孩子欢喜若狂的美食。小贩经常把担子放在有小孩购买的地方，拉开嗓子高叫：

“江米甜酒！江米甜酒！”

兄弟姐妹们只要听到这个叫声，立刻争先恐后地跑出院子，冲出大门，站在担子边上，用同样的声音高叫：

“江米甜酒！江米甜酒！”

江米甜酒不久就到了兄弟姐妹的手上。他像一个冥顽不灵的小动物，每一次都随着大家飞奔而去，也站在担子前面，高叫：

“江米甜酒！江米甜酒！”

然而，江米甜酒永远不会到他手上，因为小贩明确的知道，弟弟妹妹身上都有钱，吃过后各人都会付各人的，而他身上则从来没有一个铜板。所以他每一次都似懂非懂的，慢慢把手放下，两只眼睛骨碌碌的绕着那热气熏面的酒酿，一直看到弟妹们吃完后付罢钱一哄而散，才自言自语，用脚踢一下地面的小石子，低着头回到他的破床上，直等到几天以后，那种江米甜酒的声音再起。

后来有一天，他从别人口中（大概是佣人吧），忽然发现亲娘原来是继母，不但有前夫，而且跟前夫还生了一个女儿。这消息对一个孩子来说，应该是一个晴天霹雳，但他似乎比其他男孩子粗糙得多，并不因为这个原因而去探听亲生母亲是谁，也可能是因为那个时候，身边并没有可以探听的人。亲姐姐和继母以前所生的姐姐都已经嫁出去了，没有人能告诉他更详尽的讯息。而他对继母也没有敌视的心理反应，甚至忽然间为继母的未来，忧心忡忡。因为有一次，他去城隍庙游逛、看到“十八层地狱”的一个场景：一个女人赤身裸体地跪在那里，被两个面目狰狞的小鬼，用钢锯从她头上锯下，把她锯成两半，血水顺着锯口流下，凄惨可怖。城隍庙里的道士告诉他，这是再嫁夫人的下场，凡是再嫁夫人，死了之后，小鬼就要把她锯成两半，一半给前夫，一半给后夫。他被这种残酷的手段吓怕了，连做梦都梦见继母被锯成两半，他深为继母的命运悲哀。但是一个十几岁的男孩没有办法解决继母这种灾难，所以很多次，他从梦中号叫惊醒，束手无策、但是他不敢告诉任何人。因为从城隍庙那个景象，使他隐约感觉到；再嫁是一种丑闻，所以他不敢告诉任何人他内心的焦虑。

当然，继母对他并不是没有和颜悦色的时候。记得一个夏天的夜晚，他光着脊梁，趴在院子里一张竹床上，迷迷糊糊乘凉。父亲正要出门搭火车南下去许昌（第八方面军司令部所在），穿过院子时，关心地对他说：

“快回去，快回房间睡觉，这里会受风寒。”

送父亲出门的继母，也柔声的重复一遍说：

“快回房间睡觉吧！这里会受风寒。”

这是他记忆中，继母给他唯一一句最温暖的话。他这个十几岁小男孩的幼小心灵里，觉得忽然温暖起来，第一次尝到母爱给自己的力量。他趴在那里，咀嚼这份母爱，从来没有出现过的幸福感充满全身，渐渐的睡去。

可惜这童年第一次美梦——真正的美梦，几分钟后即行破灭。继母送走了父亲折回房间，经过庭院时，劈头劈脸的就对他暴打。他脸上的血，顺着继母戴着戒指的手指流出来。还没有弄清楚是怎么回事的时候，已听到她尖声地叫骂说：

“你这个叫炮头，每次你爸爸在家的时候，你就仗着爸爸的势力不听话、找别扭，叫你回房睡，你偏睡在院子里，叫你爸爸认为我不疼你是不是！现在你爸爸不在家，你还仗势谁？我要活活把你打死！”

那一次不知道谁救了他，当他回到房间时，满身疼痛不堪。

他一个人住一间大房子，只有一张床，一条褥子、一个枕头，一条棉被，和一个尿壶，春夏秋冬都是这样。没有人给他打扫整理，他自己也不会打扫整理。尿壶放在枕头旁边，每隔两三天，提到厕所倾倒一次。夏天的时候，这间房子会发出一种臭味，那是尿和汗的混合体。而冬天是他最大的灾难，他从小时候开始，一到初冬，双手就开始发红发肿，那是严寒引起的皮肤反应（也就是所谓的冻疮）。手背被冻以后，天气稍微转暖，即痒不可止，忍不住要去搔它抓它。孩子没有分寸，往往抓破了。接着天气再冷，手再红肿，再搔再抓，血痂破裂，血再流出。等到天再转冻，旧肿未消，新肿再生，旧痂未愈，新痂重结。这样反反复复，不到一个月，双手就肿得比原来要厚一倍以上，全是冻烂而被抓破的鲜肉或鲜血，痒痛交集。每一个到郭家的访客，都会感觉到吃惊和怜悯。他常听到客人们叹息：

“可怜！你是一个没娘的孩子！自己要保重！”

他这才逐渐的感觉到，继母跟亲娘不一样，悲哀和怨恨在心中滋长。不过，事实上，他不是个可爱的男孩，他倔强、逃学、功课不好、总是打架，也就是在一般情况下，被认为是不听话、不乖的男孩。他虽然努力讨好继母，但是性格上使他学不会卑膝奴颜，也说不出讨人欢喜的一些话。而他又好吃懒做，据他记忆所及，几乎没有一个长辈真正由内心喜欢过他。他除了爱吃零食外，还爱买书。那时，他最爱看的有“小朋友”杂志，以及一些薄薄的儿童读物，像“牛话”、“鬼话”之类，这是一个少年人无力负担的。他曾经欠当时开明书店将近两块钱的书费，那时学校的伙食一个月才三块钱，这个天大的数目字，逼得他暗暗的写信给远在许昌的爸爸，要求爸爸悄悄的寄钱给他还债。做父亲的不会体念一个孩子的穷困和恐惧，他写信给继母，责备他乱花钱，要继母给他钱还债。当他痴痴的在暗中盘算父亲会不会来信、会不会寄钱，以及如何寄钱的那些日子，一个孩子的神经完全绷紧，不能承受任何一点点声音的刺激。有一天，继母把他叫到跟前，面带微笑的用一根大姆指粗的麻绳，绑住他一条腿，和反伸在背后的两只手。他知道事情严重，而且预感到他写信给父亲的事件爆发。他想挣扎拒抗，可是看到继母的笑容，不像是责备他的意思，而心中也暗暗的期望，父亲并没有写信。一直等到竹棍劈头劈脸打下来时，他已经无法逃走。他只有跪下来哀号：

“再也不敢了！再也不敢了！”

他不知道再不敢做什么，对一个无助的、被捆绑的小孩，唯一的希望是藉着“不敢”两个字减少毒打的痛苦。继母收回她的笑容，用另外一个使他

心都冻结的面孔说：

“你长大了，可以给你爸爸写信了，是不是？”

然后是竹棍一次又一次的打下，比急雨还快的速度，遍布他的全身。双手被绑在背后，他无法抱头，于是把头埋在床下，脊背和小腿承受了所有棍棒。他哀号的声音终于引起了家人的营救，他们把房门冲开（继母是关着门打他的），大叫：

“太太，你会打死他的！”

这一次，他终于逃出一死，但他逃不出灾难，一个没有亲娘的孩子的的那种灾难。

学校每次放学，小朋友的家长都纷纷来接，只他没有，他始终是一个人孤单的来、孤单的往。清晨，他爬起来，悄悄的走进父母的睡房，在床头小桌上，总有父亲前一天晚上给他放的一个铜板（二百钱）。他就拿着，到巷口摊子上吃一顿早点。有时，父亲忘记放那个铜板，他就饿着肚子前去学校，没有一个人会关心他的饥饿和冷暖。有时父亲不在家，他明知道床头不会放铜板，但是仍痴痴的蹑手蹑脚，前去探看究竟，然后失望的跑出家门，听到自己肠子发出的咕噜声音。

他对这种现象，从没有感到难过，因为他从小就没有过温暖，可是每天上学下学，他却感觉到孤儿的凄凉。有一次，忽然大雨倾盆，最后一节下课铃响，成群结队的家长们，拿着雨衣雨伞，在走廊上，或闯进教室，纷纷找他们的孩子，孩子们也叫跳欢闹，扑到他们亲人的怀里，大手牵着小手，或小手牵着大手，纷纷离开学校，最后，终于走尽。雨势仍然很大，空无一人的教室，空无一人的校园，只有大雨倾泻的声音，和满地冒出来的空泡。雨像钢丝一样的穿过天空，十几岁的他，感觉到无情的冰冷，他明知道没有人会来接他，但仍盼望家人会突然出现。一个男孩心里的眼泪，像雨一样的流下，他靠着窗子，呆望着灰蒙蒙的天际，紧抱着书包，不知道在等待着什么，只是呆在那里，像睡梦一样的迷蒙。终于他猛然惊醒，一位老师站立在面前。

“你等家人来接吗？”老师问。

“是的。”他回答。

“他们怎么还不来，天都快黑了？”

夜幕已经降临，而雨仍未停止，他不知道怎么样回答老师的问话，愣了一下，然后，拔起脚步，顺着走廊，奔向校外，大雨瀑布一般的泼到他的身上，一路上，他听到店家们的惊喊：

“这个小學生怎么在雨地里乱跑？”

半个小时后，他终于冲进家门。家人都聚集在堂屋的台阶上看雨，小说上那种温馨的镜头——妈妈紧抱着冒雨归来的孩子——没有出现。出现的是一声吆喝，那是继母的暴怒，她跳起来，抓住他的头发，开始打他耳光，叫骂说：

“你这个叫炮头，看你把自己淋成这个样子。你知道你爸爸今天回来，故意淋给他看是不是？那我就打给他看。”

在家人劝解下，继母终于松开了手，他逃回到自己的小屋，自己脱下衣服，钻到被窝里发抖。他从继母口中得知爸爸今天就要回来的消息，感到无限兴奋。

## 可怕的算术，可恶的老师

童年时候的凄惨生活，父亲并不是不知道，所以，当他在许昌第八方面反抗军供职的时候，常常把他单独带在身边，但也造成严重的伤害。他一生在求学上所遭遇到的困难，使他终生没有在一个学校毕过业，从小学到大学，每一个学校如果不是被迫离开，就是被学校开除。假定他在人生旅途创造了一些奇迹，这个终生不断被开除、从没有毕过业的现象，应是一项奇迹。回忆求学历程的艰难和坎坷，怀着无限的惆怅。

他没有读过幼稚园，一九二〇年代开封似乎还没有幼稚园。在他记忆中，有一天忽然被父亲送到省立第四小学读二年级，那一年正是一九三一年，入学不久，就发生九一八事变。什么是九一八，什么是东三省，什么是日本军阀，什么是沈阳，什么是北大营，对一个十岁的孩子来说，没有一样知道。他最深刻的记忆是、当老师在课堂上告诉大家，日本军队侵略中国国土、屠杀中国人民时，全班小孩随着老师的嘶哑声音，哭成一团。当时老师用“千钧一发”这个成语，形容中国命运，解释说中国的命运就像一根头发，下面悬挂着千斤重量的钢板，他和小朋友们紧张得小身体都浑身淌汗，第一次为国家付出重重忧心。“千钧一发”是他第一个学会的成语，也是使他为爱国付出生命的起步。

朋友们都知道他的算术非常之差（他到七十岁，对九九乘法表还不太熟悉），但他并不是压根没有算术才能。读小学二年级时，发生平生第一件最光荣的事。有一天，老师在黑板上出了一道乘法算术题，征求同学解答，全班都不会，没有一个人敢举手，只有他举手，走到黑板前把它答对了，那位女老师十分高兴，就把手中用的粉笔（尖端在出题目时已经磨损了一点）送给他当作奖品。他小心翼翼的把那粉笔带回了家，可惜不能向家里任何人炫耀，使他们分享他的喜悦。再小心翼翼的保存那支粉笔，直到遗失的那一天。

然而，他的算术天才就到此为止。再也不能提升。不久，被父亲带到许昌，有一天，当他从许昌被送回开封要读三年级的时候，发现第四小学已开学几个月了，拒绝接受他入学。父亲就运用人事关系把他送到省立第六小学，而且插入四年级。

这样一个跳跃式的窜升，对大人讲起来没有什么，可是对一个孩子来说，算术这一门，首先就跟不上，而且除了自己苦恼外，他无处倾诉。假使在一个正常家庭，父母可能为他请家庭教师。但对他来说，继母不打他，已经是幸福的生活了，没有人关心他的学业和他的学校生活，严格的说，只是像一个野生动物，让他住在那间幽暗、寒冷，又肮脏的房子里，自生自灭。偏偏那一年，第六小学施行新式的“道尔敦”制。什么是“道尔敦”制，到现在也弄不清楚，依稀的记得“道尔敦”制是依据小学生的兴趣，有时合班上课，有时分班上课。算术差的同学，仿佛可以分开独立上另外一种课，于是他的算术就永远的更无法长进。这种算术的恶履利爪，从他小学四年级的时候就抓住他，深入心肺，几乎把他撕成碎片。他在第六小学读了几个月后、又发生变化。不知道什么样的原因，激起了继母的暴怒，她用一柄切西瓜刀（北方人专用来切西瓜的一种特制的刀；像前臂那样长，半月形的弯曲，刀口并不十分锋利，刀背比较厚）追杀他，他大哭着逃走。在逃出门槛的时候，被绊翻在地，继母用西瓜刀砍下来，砍在地砖上，地砖都被砍出灰末。家人上去把她拦住，他只有蹲在街头墙角大哭。

父亲得到消息，从许昌赶回开封，发现他的后妻和他前妻所生的孩子，已不能并存，就把他交给正在河南大学读书。他的堂弟郭学沃，把他带回老家辉县。辉县距开封三百公里，位于开封的西北方，在太行山的东麓之下。在此之前，他从不知道世界上还有一个辉县、更不知道还有一个老家。这是一个使人胆怯的迁徙，可是他大概天生迟钝的关系，并没有特别的恐慌感觉。反而觉得能到一个没有继母的地方，那太好了，简直是天堂，所以高高兴兴的随着堂叔上路。辉县对他来说，果然是一个自由自在的世界。今天，朋友都知道他是一个语言的低能儿，可是那次迁徙，却用不到一年的时间，就把开封话完全忘记，而改说一口辉县话。他认为辉县话是全世界最难听的语言之一，不过，他学习语言的能力，跟学习算术的能力一样，就到此为止。

他的老家，在辉县县城东北约六公里的地方，名叫常村。再两公里之后又有一村，名叫沿村，这两个村庄约有五百户人家，就是本书开始时所叙述的从“山西省，洪洞县，槐树下，摔锅片”逃难出来，在此安家落户的郭姓一支家族。对这个庞大的郭姓族群、他所知道的，也仅是如此。

所知道的另一件事，就是他们家务农为业，祖父以上的名字，全部不知道。荒凉穷困的乡村文化就是如此的简陋，只知道曾祖父共有九个孙子（但不知道曾祖父有几个儿子）。在这九个孙子中，父亲郭学忠排行老大，同一个母亲的弟弟郭学慈排行老五，携带他回辉县的郭学运，是最末的弟弟老九。父亲是“学”字辈，他这一代是“立”字辈，下一代是“本”字辈，再下一代是“迺”字辈。这种用字来排辈份的文化，可能始于大分裂的南北朝时代，是一种凝聚家族向心力的方法。在这一点可以看出东西文化最大的不同，西方人称呼爸爸的弟弟为约翰叔叔或强生叔叔，显示出来他们个体的独立存在。中国则称为二叔、三叔、四叔、五叔，表示他们亲密无间的团结，个体完全消失了，以致很多中国人只知道他有二叔、三叔、四叔、五叔，而不知道他们叫什么名字，向朋友介绍时，也不知道怎么介绍、因为朋友总不能跟着他叫三叔、四叔。辈份或排行，事实上是一种脆弱的形式，《资治通鉴》上可以看到，当一个家族内哄互相屠杀时，仅仅靠一个字相同，或排行顺序，没有一点作用。

他家里也是如此，虽然有“学”字辈、“立”字辈，看起来血浓于水，实际上，亲情的冷淡，使他在小小的年纪时，都深为吃惊。以致不久就产生一个具体印象：

“家族不如亲戚，亲戚不如朋友！”

父亲和五叔学慈，是一母同胞兄弟，当时还没有分割遗产，所以常村有一座祖屋，由五叔居住，而在辉县县城里，父亲另有一座四五个院子的巨宅。这座巨宅空空荡荡，父亲就请一位表婶，专责照顾他——给他煮饭和洗衣服。这位表婶姓什么，是怎么一个亲戚关系，他全不记得。但是她为人慈祥、宽厚，十分健谈。他从继母手中，逃到这个小小的自由天地，已经踌躇满志了。而且，不久就暴露出野性的一面，喜欢顶嘴，喜欢逃学。继母那种严苛的管教虽然没有了，却又跌进一个毫无管教的陷阱。

一到辉县，就被送到县立小学，仍读四年级。就在四年级上，遇到影响他最大的恩师，名叫克非，可能是犹太裔的中国人，命他们这些小學生叫他克非老师，教他们国语和作文。克非大约二三十岁，瘦瘦的，精神奕奕。记忆最深的一件事是，克非老师为他们讲解一本新文艺小说《渺茫的西南风》，事隔六十多年，内容已经模糊，但仍记得克非老师上课时的情形。有时坐在



讲台上，有时坐在学生的课桌上，态度很自然很和气，脸上一直挂着笑容，在说到哀伤的时候，一脸悲痛。

在一九三〇年代，一个小学老师竟在课堂上讲解课本外的小说，实是一种创举。辉县是一个荒僻的县城，会请到这样的老师，是辉县人的福气。就因为克非老师的讲解，引发了他内心潜在的阅读兴趣。

除了像《渺茫的西南风》这样的新文艺小说，他开始偷偷地看《三国演义》、《水浒传》、《七侠五义》、《小五义》、《续小五义》等等，以及新式的武侠小说：《江湖奇侠传》、《荒江女侠》等等，看得如醉如痴。

四年级结束后，克非老师不知去向，柏杨从此再也没有见过他，而他也根本不知道柏杨，即令知道，也不会晓得柏杨是对他心怀感激的学生之一。

这个短暂的少年黄金时代，不到一年就结束了。小学五年级是柏杨另一个苦难的岁月，再没有克非这样的老师了，级任老师是一个名叫侯万尊的年轻人，那一年他从初级师范学校毕业不久，相当于初中程度，算术特别好，什么四则题、鸡兔同笼、什么繁分数、假分数，无不精通。那时候，他大概只有二十几岁，聪明能干，可是性情暴躁。柏杨的算术程度恰好跟他相反，什么四则题、什么鸡兔同笼、什么繁分数、假分数，一个也不会。仅这一点，就足以使他怒不可遏，认为柏杨既愚笨而又不肯用功。他对于既愚笨又不肯用功的学生，唯一的办法就是打，每错一道题，就打五手板。每天算术课时，柏杨总要挨十手板或二十手板，每一板下去，手都痛得像火烧一样。柏杨想到如果父亲在的话就好了，他可以到学校向老师讲情，自己便可少挨几板。但是不知道父亲身在何方，而且他也不敢写信，恐怕落到继母之手。回家面对乡下人的表婶，又无从倾诉。所以每天上学是他最痛苦的时刻，既不敢不去，去，又害怕那不可避免的无情手板。当一个孤儿，他没有第二个选择。

侯万尊不是只打他一个孩子，而且打所有算术不好的孩子，一个叫秦鼐的同学，也经常被打得哭哭啼啼。有一天，秦鼐那位身为邮政局局长的父亲，到学校找校长抗议，立刻引起轰动。抗议的结果如何不知道，但经常挨打的同学，尤其是柏杨，渴望着这项强大的外力，能阻吓侯万尊的板子。

第二天上课的时候，侯万尊站在台上，宣布说：

“我不在乎任何家长抗议，只要学生功课不好，或者是犯错，我还是要责罚。”听了之后，心都凉了。不过，这项秦鼐事件，使聪明的侯万尊发现，有家长呵护的孩子不要打，没有家长呵护的孩子仍是他的出气筒。出气筒，是的，由管教学生变成拿学生当出气筒，是一个脾气暴躁的教师的自然倾向。柏杨的算术从此恶性循环，一辈子都无法提升，对他的升学，造成致命的杀伤。这是他平生中最痛恨的一位老师，他不能原谅他的暴行。有一次，大概一个星期天，他在校园里打篮球，侯万尊也来参加，他连投两个球都进篮了，柏杨捡起球来又传给他，并故意讨好的叫一声：“侯老师，再投一个！”不知道这句话有什么不对，侯万尊突然脸色大变，喝问道：“你怎么敢对老师这种态度？跟我来！”他虽不知道闯了什么祸，但他知道他闯了锅，而且是大祸，双腿几乎重得抬不起来，低着头像囚犯一样的跟在侯万尊的背后，一直走到他的宿舍。宿舍门上钉着一个牌子，上写“仰民室”，仰民，是侯万尊的别号。侯万尊一进房间，就抽出手板，向他狞笑说：“伸出手来！我不打你的右手，好让你写字，我打你左手。”侯万尊端详着他恐惧的面孔，冷冷的问：“你说，叫我打你几板？”柏杨完全变呆了，他想说几句乞求讨饶的话，但他的性格使他开不了口。主要的是他想认错，又不知道错在那里，

又恐怕认了错，使侯万尊更为发怒。他只一心想到怎么逃过这一场毒打，一股被羞辱的恨意从心中升起，他的心灵向侯万尊咆哮说：“你为什么问我？板子在你手里，你要打多少就多少，你怎么会听我的？你欺负一个孤儿罢了。”

但他忍耐着尽量把语气放缓放软，忽然间脱口而出，说：

“随便。”

“我就打你这个‘随便’。”

侯万尊暴跳起来，大声叫骂，一面用手板雨点般打上伸出来的他的小手，他痛得大叫，每一板子下去，小手都被打得摔向背后。侯万尊并不痛苦，仍大叫：

“伸出来，伸出来。”

在这一生中，他就后悔他当时不敢拔腿逃走，痛恨自己畏缩，没有胆量。尤其是他必须自动伸出手挨打，是他一生中最早的一次重大侮辱，他不能忘怀。他把侯万尊恨入骨髓，心里想：

“我长大了一定要报复。”

几十年后他终于长大了，甚至于长老了，他虽然没有报复，但却转化成一种强烈的诉求，那就是他反对任何体罚，认为凡是体罚学生的教师，都应受到严厉的谴责。

这是他最后一次被打，大概挨了十几板后，侯万尊才让他捧着渗出鲜血的小手出门。他害怕学校，又逃不出学校，天地之大，他看来只是一个牢笼。

有一天，在柏杨住的“老司院”空地一口水井里，人们打捞出一具跳井自杀的尸体。他望见那光着上背的男性尸体，脚上头下的从井里吊出来。隐约听说，那是县政府的一位职员，因为家庭过度贫穷，无法赡养家小，才投井自杀。就在那刹那之间，十二岁孩子的柏杨兴起投井自杀的念头。可是他没有付诸实施，因为他一转脸就遇到一个同班同学，大声告诉他一条生路，那是一份招生简章，同学高高举在手上，喊叫着跑着。这位同学也是挨打族群的一员，所以柏杨立刻就会悟到是一个天大的消息。果然，那份简章上说：在辉县县城北方约三公里的百泉镇上，新成立的私立百泉初中，招考一年级新生，除了高级小学毕业生可以报名外，高级小学五年级肄业生也可以用同等学历报名。他正在就读高级小学五年级，这消息使他高兴得发疯，没有告诉任何一个人（事实上是全世界没有一个人肯垂听他的咨询，包括表婶在内），就悄悄的带上毛笔盒，前去投考。

这是一生中唯一的一次充满自信的考试，半个月以后，学校发榜，他被录取。辉县是一个荒僻的县份，教育并不发达，百泉初中虽然是当时该县唯一的最高学府，但因全县没有几个高级小学的缘故，唯恐怕招收不到学生，所以包括他这种菜鸟在内，才勉强招足了两班。

百泉初中的环境十分优美，天下没有几个学校像百泉初中那样的紧傍着小河小桥，百泉这两个字，当称“百泉乡”的时候，它只是一个普通的村庄，而在百泉乡的中央，苏门山下，有一个“百泉湖”，那是一个美丽而巨大的池塘，湖水清澈得可以看出从底部冒出的泉水水泡。像星宿海是黄河的发源地一样，百泉湖是卫河的发源地，百泉初中就在百泉湖下方不到半公里的地方。可是这么好的环境，学校却设在一座破庙里边，包括学生宿舍在内，全是用借来的庙宇和民宅，因为距县城有三公里之遥，所以柏杨也成了住宿生。

一般小孩第一次离家到学校住宿的那种依恋或畏惧的感觉，他一点都没

有。在开封时，他一个人住一间房子，回到辉县，也是一个人住一间房子，而宿舍里，小朋友拥拥挤挤反而觉得热闹有趣。不过那些小朋友都来自四面八方的荒村僻壤，尤其是来自山地的学生，讲得一口比辉县话还奇怪的盘上话（“盘上”是辉县北部山区地带，海拔约一千公尺）。他们是当时典型的山地居民，呆头呆脑，言语粗鲁。最初，他们十几个人一个寝室，木板床紧紧相连。有一天晚上，和隔床来自盘上的一位名叫尚均的同学，一言不合，他闪电拳头已击中柏杨的胸膛，柏杨看他个子既大而又蛮不讲理，不敢还手，吃了闷亏，但以后他们成了好朋友。十年后，尚均当辎重兵团驾驶兵，还载着当时已是兰州大学学生的他，西出玉门（甘肃省玉门县，不是玉门关），饱览西疆的景色。

他以辉县平地人的身份看盘上山地人，县城距盘上大约二十公里，认为盘上人言语奇怪，没有教养。而开封人看辉县人，也认为辉县人言语奇怪，没有教养。北京人看开封人，同样认为开封人言语奇怪，没有教养。南方人看整个的北方人，也认为北方人言语奇怪，没有教养。后来更发现，外国人认为中国人也都言语奇怪，没有教养。这种观察和感慨，虽累积了四十年才得到，但它确是源于尚均那猛烈的一拳。

柏杨考取初中，对自己而言，是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第一，他终于彻底摆脱了恶师侯万尊；第二，他开始学习英文，用不了两个礼拜，就把二十六个字母既会写又会背，可惜他的英文程度就到此为止，以后再也不能提升。好比说，那个 the 字的发音，他几乎念了一年多，几千万遍，还是不会。因为他念英文，完全是用中文注音的，而 the 字的发音是没有恰当的中文可以注的音。然而，使他对英文完全绝望的一件事，发生在第一学年，学校开课不久，英文课本上有下列的一句话：

“ I have a pem. ”

柏杨就注音“爱”“海夫”“恩”“盆”。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万万想不到，书被磨来磨去，字迹有点模糊，“恩”变成“思”，“盆”变成“盒”。他就读说：

“爱海夫思盒。”

英文老师是梁锡山先生，河南大学毕业，眼睛瞪得像一对铜铃，问道：

“思盒？思盒？思什么盒？哪里来的思盒？你怎么读成思盒？”

他慢慢走到柏杨面前，把他吓坏了，赶紧低头找书再看，因为惊慌过度，连“思盒”也不见了。可是梁老师却耳聪目明，把英文课本夺过去，一眼就看到了毛病出在哪里，顺手拿起了砚台，敲打他的脑袋，重复说：

“思盒，思盒，看你还敢不敢再思盒？”

这一次是柏杨上初中第一次挨打，以后虽没有像小学五年级时那样打不离身，但也唤回了他自以为从此完全摆脱了挨打的恶梦。他的英文程度是这样的低落，算术程度更在水准以下，雪上加霜的是，初中课程除了算术一门课以外，又加上代数，除了代数以外，又加上物理和化学，每一门课都是一个苦难，使他无法应付。他真不明白，世界上竟然有这么多学问，学也学不完。

最致命的老师，还是算术与代数的老师，柏杨已经无法记得这两门功课是怎么读的，根本不晓得代数是什么东西。很多同学以及一部份老师、总夸奖他聪明，他确实聪明，但一个人一旦聪明到认为不用学习就什么都会的时候，就已经走到尽头了。就在百泉初中，十二岁的他，揭起了“横行”革命，

仇视所有横排的书籍，包括英文、算术、代数、物理、化学，决心对它们连一眼都不看，上课也只打瞌睡。大家不是都说他聪明吗？聪明不能使他学会功课，却使他交了不少狐群狗党的好朋友，考试的时候，专门传小抄给他。所以，他的功课虽然天下最烂，但考试成绩总是漂漂亮亮的。同样的，他考试成绩虽然漂漂亮亮的，但是他的功课却是天下最烂。举个例子，他一直读完了上下两册化学，可是“原子价”是什么，直到二十世纪要过完了，仍然不知道。

至于物理学一位朱姓的老师，是一个长胡子的小白脸，扭扭捏捏像个大姑娘，也是大学毕业生，不过程度跟他同样差劲。朱老师一上课，就把书本上的课文一字不漏的抄到黑板上，再由学生抄到练习簿上。在记忆中，朱老师从没有和学生说过一句话，学生从来也不敢问他什么问题。无论是物理或化学，百泉初中没有做过一次实验。这样的一个乡村草莽学校，能够持续下去，也是一个奇迹。

可是，也有使柏杨怀念的老师，第一位是国文老师刘月槎先生，河南省陈留县人，也是英文老师又兼校长的梁锡山读私塾时候的老师，已经很老了，（可怜，那个时候不过六十岁，以现代眼光看起来，离老还差大大的一截），脸上堆满了像核桃一样的那么深刻的皱纹，顽皮的学生就给取下一个绰号叫“老核桃”。刘老师非常欣赏柏杨的作文，每一次都批上一个“甲上”，使得他在学校里声名大噪，也使他飘飘然自命不凡，忘了自己是谁。虽然他对“横行”功课一无所知，但仍然昂首阔步，好像是一个功课最好的学生一样。实际上，他的国文程度，并不如刘老师所嘉许的那么好，因为刘老师也是一个半调子他记得当时作文，开头常用的一句话是“满天星斗，月明如画”，刘老师总是在旁边加上双圈。直到五十年后、同样教国文的妻子香华，告诉他那不是月明如画，而是月明如昼；而且，当满天星斗时，月光不但不可以“如画”，也不可能“如昼”。半世纪荣耀，一下子破灭。

另外一个可爱的老师，确确实实是一位可爱的老师，是一位音乐女老师，已记不得她的姓名。大概最多不过二十三四岁，面颊红得可以挤出苹果汁来、教百泉初中的时候，已挺着五六个月大的肚子。有一次音乐课，学生隔着窗子看到她丈夫护送她从邻近的乡村师范学校，走向百泉初中。她丈夫可能在百泉师范教书，右手拉着她雪白的左手，另一只手提着一个小提琴，小心翼翼的扶着她跨过水沟。他们这一群野孩子，从来没有见过这种场面，和这么漂亮的女人和这么亲密的夫妻关系，就在教室里大声呼叫，用脚跺地，双手握拳，拚命的擂动书桌，一直把训导主任引过来，幸好，没有人挨打。但这位女老师好像只见过一次，却终生难忘。

柏杨考上初中后不久，继母从开封也回到辉县。她昭彰的恶名使大家害怕，和他家一墙之隔的二叔郭学涛的妻子，立刻把两家往来的唯一小门，用砖堵死（四十年后，当东德兴建起柏林围墙的时候，他第一个想起的就是家里这个围墙），以免受到继母的牵连或影响。这项强烈反目的措施，他并不知道它的原因。后来才发现，就在他回到辉县这两年间，父亲跟继母，统统吸上了鸦片，房地产几乎全部卖光，在开封不能立足。又过了不久，父亲也跟着回来、他们才发现他已就读百泉初中。父亲表示说，本来计划把他送到开封省立初中的，大城市学校的学生跟乡下学校的学生会有很大的差别，但是既然已经念了乡下的初中，也就算了。

## 第一次被开除

继母突然在辉县出现，一开始的时候，使柏杨吓呆了。但是，因为第一，辉县到底是郭家的老宅，来往的都是郭家的亲友，第二，她刚刚回来，一切还很陌生，所以他所恐惧的挨打，竟然没有发生，也许是新环境的新鲜感，使继母暂时收敛起她的凶性，甚至还面带笑容。他从没有享受过这样的待遇，于是，立刻就忘记过去所受的种种凌虐，而且还感觉到有一种骄傲，觉得晚娘跟亲娘一样，第一次尝到父母双全的温暖，在这一段时光中，他无比的快乐。辉县家宅共有四五个一连串相连的院落，大门在一个街道上，后门在一个广场上，那就是当时很有名、现在已盖满了房子、早被人遗忘的“老司院”。从“老司院”的后门进来，就是一个菜园，表婶就在那个菜园里种些黄瓜、丝瓜、茄子。他对这个很有兴趣，尤其非常喜欢搭黄瓜架，也会用井水灌溉，有时候摘下来最嫩最脆的黄瓜，一面走，一面吃，是最大的乐趣。

可惜，好景只维持了很短一段日子。有一天，当他玩耍回家的时候，没有进门就听到继母跟父亲吵闹的声音，最熟悉的开封家里那种扯破尊严、下流的嘶喊和辱骂，突然间重现眼前。继母那种厉声尖叫和不停的跳脚，辉县人虽然原始落后，没有见过世面，但是也没有见过女人这样发威的场景。大家所受的惊吓，远超过习惯这种叫骂的柏杨。

他躲在墙角，脸色发白，看到父亲愤怒的冲进房子，披上大衣，拿起皮包，一直走出后门。那是很明显的，父亲要离开辉县这个家，摆脱这个失败的婚姻所带给他的折磨。而从继母的诟骂中，知道父亲要再回开封。他忽然惊恐起来，很想扑上去拦住爸爸的去路，但是又不敢，于是身不由主的远远跟在父亲背后，一路追踪，从家的后门，穿过空荡荡的“老司院”，穿过东大街，穿过南大街，一直望着父亲的背影。在大衣的包装下，看不出来他的身材，但他知道父亲非常瘦弱，年纪很老了（那一年，父亲不过四十几岁，可是在一个十几岁的孩子看来，确实是很老了），而且一直咳嗽。每一声咳嗽，都使提着手提包的右手抽动，他为可怜的爸爸流下眼泪。静静地追下去，爸爸就在前面人群中忽隐忽现，最后出了南门。南门外，就是一条通向新乡的二十公里长的马车大道，他发现父亲会一直步行走到新乡（那时候还没有任何代步的工具），而到新乡后再坐火车前往开封。

柏杨原来并不知道为什么追赶父亲，也不知道追到父亲后，又要做什么。现在他忽然兴起一种强烈的欲望，希望如果追到父亲的话，盼望他能把自己带在身边，一块回开封。而就在出了南关后，行人逐渐稀少，他没有办法隐藏，父亲突然转回头来，看到了他。他也看到了父亲，又惊又喜，他在心里喊：

“说不定爸爸会带我走！”

正当他要跑到爸爸身边的时候，爸爸忽然大喝一声：

“你干什么？马上给我回去！”

他稍微一呆。

“快回去！快回去！”父亲厉声说，“你要挨揍？”

他立刻转身飞奔，再也没有回头看父亲一眼，而就在他踏进家门的时候，已听到继母冷冷的尖叫声：

“叫炮头，你仗势你爸爸在家，横冲直撞，现在，你爸爸走了，我看你还仗势谁？”

骂声还没有结束，一个父亲平常用的书桌上檀香木做的大约拳头大的纸镇飞了出来，击中他的胸脯，他往后踉跄了几步，栽倒在地。继母随而冲上来，用一个小板凳砸下去，他抱住头部，哀号着逃开，一面哭一面跑，一直跑了两三公里，跑回学校。

在这种环境下，柏杨的功课注定低落。当他在百泉初中升二年级的时候，二年级共两班，一班成绩较好，一班成绩较差，同学们就把较好的那一班称为白菜班，较差的一班称为萝卜班。他当然被分到萝卜班，有时，他去问刘月槎老师功课，刘老师总是和和气气地回答说：

“你好好用功，我提升你到白菜班。”

可是，不幸，他这一辈子都读不上白菜班。

他虽然功课出奇的低落，可是，那个时候，正是发育的年龄，却是非常能吃。全校小朋友的伙食，也跟他们的班级一样，分成两团，一个伙食团被称为“白菜团”，可以吃白面馒头，而且有肉，另外一个伙食团被称为“萝卜团”，只能吃玉米面做的窝窝头，一碗稀汤和几粒咸菜，稀汤里根本没有一滴油。“萝卜团”一个月只缴一块银圆，“白菜团”则需两块银圆。表婶每月给他的伙食费是一块银圆，所以只好参加“萝卜团”。

玉米面窝窝头绝对可以喂饱肚子，但是，一个像他这样年龄的孩子，需要吃三四个才会饱，而玉米面粗糙又没有味道，难以下咽。最残忍的是，这两个伙食团门靠着门，相邻而立，每次吃饭，对他来说，都是艰难的考验。他们所谓的饭厅，就是厨房前面的院子，没有桌子，没有椅子，也没有小板凳，各人端着各人的碗，围绕着院子，蹲下进食。白菜团的同学们手里的白面馒头发出一种清香，热腾腾的炖肉，更刺激辘辘的饥肠。他一辈子都不会忘记那种贫富差距带来的创伤，渴望吃一口肉，一口就好，按理来说，他家那时的情况，依弟弟妹妹每天早餐可以喝牛奶吃荷包蛋的标准来看，他还是有资格参加“白菜团”的，他吃不到，因为谁叫他是没有亲娘的孩子？他的眼睛不断望着那白馒头和肥肉，当有人望过来的时候，他会立刻把头转到别的地方，表示自己并不在乎吃什么。很多年后，有人向他宣传人类天生是素食动物的时候，他完全不能接受，他认为人类天生的是肉食动物，拒绝吃肉是违反上帝的意思，不准别人吃肉是一种对别人的惩罚。因为正餐使他一直有一种饥饿的感觉，所以就向校门外那些卖零食的摊贩买零食，当然没有钱买，于是乎，又犯了开封时代的老毛病，请求摊贩老板准他赊账。那时候能够读初中的学生多少还受人尊重，于是老板答应记账。连三岁的孩子都可以猜得出来赊账的结果是什么，他欠了根本无法偿还的一笔巨款，大概有三四元之多，雪上加霜的是，有一次他管伙食团，把钱挪用了吃零食，竟欠下面粉摊也有三四元之多，债主就堵在学校门口，他连校门都不敢出。

可是不敢出校门并不能解决问题，学生总是要出校门的，逼得他快要发疯，穷极计生，他带着债主回到辉县县城的家，溜进仓库，让那些债主用脸盆当作斗，把麦子装到口袋里还债。那时候，表婶恰好不在家，家里另外一个老人就是姥姥。姥姥默记脸盆倒麦子的次数，估计约有两石之谱（一石十斗），她告诉了表婶，表婶写信告诉了在开封的父亲，父亲写信叫表婶揍他，表婶当然不敢动手，因为她到底只是郭家的佣人。

在这里要说明的，继母在父亲奔回开封后不久，也回开封，却把她的婆母送回辉县与他们同住。在正厅的两端，备有一间卧房，表婶住另一端，柏杨跟姥姥住一端。他对姥姥泄漏他偷卖麦子的秘密十分不满，不过他只有心

里不满，没有表现出来，姥姥是一个忠厚的老实人，也是一个最可怜的老人。年轻的时候，她当一位“道台”（郡长）金屋藏娇的姨太太，当年的美丽，和享受的荣华富贵，恐怕属于天上人间。可是恶运向她下手，民国成立，身为满洲人的“道台”下台，儿子也不久死亡。她则随着媳妇以娘亲的身份到他家，她的财富和显赫的“道台夫人”地位，最初还相当受人尊敬。可是，财富不久就被耗光，在家中就逐渐的没有地位了，在他的记忆中，只有过两三次，继母叫他一声妈，其他时间都是呼来喝去。他一向认为姥姥就是继母的亲娘，一直到有一天知道这项复杂的关系时，才对姥姥十分怜惜，为姥姥难过，有时听到继母刻薄的责骂她，更感觉到她老来孤苦，内心的绝望。

姥姥去世前，又被送回开封。她临去之前，并没有祖孙话别的场面，只是有一天，他放学回家，别人告诉他的。她这一去，从此没有再见。

柏杨自认小时候是一个坏孩子，因为他没有受过什么家庭教育，没有累积下教养，个性又十分顽劣，无法成为一个驯服的乖乖牌小白兔。他喜欢看的武侠小说，恰好和他潜意识中的反抗性格结合。现实生活中，除了挨打外，没有享受到多少温暖，只有一次，是在开封，当他十岁的时候，一位同班女同学，送给他一个用泥捏的风箱玩具，大概有一个大人的大姆指大，用墨涂得黑黑的。那是他一生中第一次拥有的玩具，放在口袋，放在床头，想着那位女同学，可是胆量忽然小起来，不敢和她讲话，直到回辉县前夕，却把它弄丢掉了。但那个女孩子的印象并没有丢掉，一直留到现在。

后来，到了辉县小学五年级，那时候的女生几乎都比他大，而且没有开封的女生那么清秀，他自然和她们玩不在一起，不但玩不在一起，反而几乎天天发生冲突，随时都在吵架。前面坐的是一位女生，他总是把毛笔放在桌边，使毛笔头露出半截，那女生往后一靠，一定沾一背墨，她总是大叫：

“我非告你不可！”

“非者，不也，”他说，“非告就是不告！”

结果当然是告了，告给侯老师，每一次都挨一顿手板。

只有一位女同学，个子小小的，纤巧玲珑，坐在第一排，和秦黧同桌，秦黧就是前述那位父亲向侯万尊抗诉的同学。这个可爱的小女生，名叫邓克保，却是一个男生的名字，他一直想找机会和她讲话，但她从来不理他这个野男生。

秦黧和邓克保两位同桌的小朋友，命运似乎都不太好，听说秦黧在考取大学后过世，邓克保小学毕业后也过世了，不知道害什么病。四十年后，他在台北《自立晚报》连载报导文学《异域》时，就用邓克保做笔名，并成为小说中以及电影中男主角的名字。这本书使他和邓克保一直结合在一起，她是他唯一记得的童年女伴，不，是童年女同学，仅仅是女同学，因为他们从来没有讲过一句话。假设这是一场美丽的恋爱的话，大概就是他的初恋吧！

辉县虽然是他的故乡（老家），可是他却像是一个流浪天涯的孤儿，继母在父亲离家出走后，也跟着回到开封，辉县偌大的庭院中，只剩下同样孤苦的三个人，一个是他自己，一个是跟仆人没有什么分别的贫寒表婶，另一个就是日夜呼痛、哭诉无门、六亲无靠的姥姥。事后回想，柏杨发现他的家道就在这个时候迅速中落，距鸦片战争约五十年，鸦片的剧毒开始侵入他们这个小康之家，使他们这个刚脱离农村、跃升到都市、新兴的小资产阶级，从吸第一口鸦片开始，不到四年（他在辉县县立第一小学和百泉初中那段日子），迅速的接近赤贫。他并不知道这个经过，但在辉县一连几进的深宅大

院，除了他住的那一进院子和靠后门的那个菜园以外，全都被父亲卖掉，而后门也就成了大门。他当时的年龄还不能直接感觉到家庭的衰败，但从表婶给他的伙食钱，只能够参加萝卜团，不能参加白菜团，才有贫寒的感觉。凡是参加萝卜团的同学，多少都会受白菜团同学的轻视或欺侮，不知道这是一个文化现象，或是个别的气质，有钱的大人固然看不起他的穷朋友，有钱人家的小孩似乎也同样看不起他贫苦的小朋友。这对穷孩子的自尊是一个很大的伤害，他们于是乎经常采用暴力——打架、骂粗话、跟老师对抗等等手段，来平服自己内心的自卑，他是这个族群中最出名的一员。

他的功课之糟，是“天下”皆知的事，但最初行为还有一些大城市文明的痕迹；后来，这些文明的痕迹一点都没有了，他想到的，除了玩，还是玩。第一个最大的志愿就是想当一个篮球健将，可是篮球却打得不好，得不到体育老师的赏识。虽然他非常努力地练习，但班队、校队，全没有他，他就省吃俭用，自己买了一件背心，到裁缝店，前边缝上“泉中”二字，背后缝上一个“2”字（本来想缝上“1”字的，但他很谦虚，所以只缝上“2”字，表示校队的二号人物）。平常不敢穿，只星期天或星期六下午才敢穿。而那个时候，却没有篮球可玩，篮球都锁在训导处的柜子里。无可奈何，只好去偷，偷到了后，就在球场上，投一次篮又投一次篮，然后回到城里冷清的家，当然顺便也把篮球带到家里玩。

四十年后，在北京遇到同班同学——后来当了高干、而又退休了的朱光弼。朱光弼询问他偷球的技巧为什么那么高，因为他偷了几次球都顺利的得手，有一次，朱光弼跟他一块去偷，忽然门锁响动，他飞快逃掉，朱光弼却被捉住，挨了一顿揍。

骑脚踏车是那个时候学会的，游泳也是那个时候学会的，当然是狗爬式。狗爬式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非常消耗体力。有一天，一群同学到百泉湖去玩，有人提议游泳。那时候辉县还没有“游泳”这个名词，所谓游泳，当时称为“洗澡”或“浮水”。一个年长的同学问他：

“你会不会？”

柏杨逞能说：“当然会！”

当他随大家扑通扑通像鸭子一样乱七八糟从岸上跳下去之后，一股刺骨的冷冽，使他觉得不妙，游不了一分钟，就浑身瘫软了，身子忽然下沉，而脚却接触不到湖底，心里更加惊慌，喝了一口水，叫不出来呼救的声音，被旁边一个同学发现，抓住他的头发拉到岸边。这是他一生中遇到的第一次自找的“天灾”。如果那一次淹死了，天下最欢喜的，恐怕就是继母。

他在百泉初中横冲直撞，就在二年级末期，校长梁锡山卷师，为了提升学生们的程度，规定星期六下午和星期天照常上课，全体学生都要留校而由老师们义务为大家补习。这种循循善诱的情谊，在以后多少年的日子里，一想起来就深为感动，可是那个时候年龄还小，不能领会善良老师的苦心，而且，他的基本性格也在成长中逐渐显现出来。星期天本来是应该玩的，为什么不准玩？而且他争的也不一定是玩，而是对这种无理的压力有强烈的反弹意识。

这时候一个叫冯立勋的同学，比他大八九岁之多，已经结了婚，遇到星期六，当然强烈的渴望回家和他的小妻子相聚，可是一个人又不敢逃走，就诱惑柏杨和他一起行动，这正符合柏杨的愿望，于是两个人步行三公里，高高兴兴，半跳半走的回到县城。冯立勋一头栽到他那个温柔乡里，不肯出来，



把柏杨一个人孤苦伶仃的丢在大门外。他也不知道他们在家里搞什么，或有什么奇怪的东西，使冯立勋这么着迷（他的年龄还不知道什么是闺房之乐）。他等了又等后，只好跑回自己冷清的家。第二天就是星期天，一觉醒来，走投无路，又没有其他地方好去，只好再走三公里回到学校。就这样的，事情爆发了。

走进学校大门时，全体同学正在上课，大院子非常的寂静，满地都是炙热的阳光。全校师生的眼光，从各个窗子望出来，注视着柏杨这个小小的身影，孤独的走向萝卜班教室。偏偏梁锡山老师正在班上补习英文，默默地看着他入座，然后走到他的面前问说：

“你到什么地方去了？”

“回家。”

“你不晓得学校不放假？”

“不晓得。”

梁锡山脸色变青，他心里也在沸腾，他想喊：

“你明知道是星期天，为什么不放假？这是应该放假的，你剥夺了我们的权利。”

当然，他还不懂得“权利”二字的意义，但心里确有反抗的冲动。结果他没有喊出来，因为他还是有点害怕。梁锡山老师从他手中夺过来英文课本，挑出一段，叫他背诵，用不着算卦就可以知道结果。他连念都念不出来，更不要说背，支支吾吾了一阵，全班同学都看着他，一点声音也没有。梁老师把课本摔到桌上，因为用力太猛，课本在桌上跳一下，滑落到地面。梁老师接着用手想打他，他不知道哪里来的胆量（大概是大家注目的眼光，逼着他不得不表演英雄行径），一举手就把梁老师的手掌挡住，这是一个天大的反抗事件，梁老师也愣住了，喝道：

“你敢动手？”

柏杨也喝道：

“你敢动手？”

梁老师已经被逼到墙角，无法结束这项师生面对面的冲突，于是大怒说：

“学校不要你这种坏学生，给我滚出去。”

他也被自己的行动吓住，但是已经下不了台，除非讨饶，可是又不肯讨饶，因为害怕罚跪。跪，是继母给他的一种最轻微、最平常的刑罚。于是，他也叫喊说：

“走就走，你摔坏了我的英文课本，赔我的书。”

梁老师扭转身子，气冲冲的走出教室，叫说：

“找一本英文书给他！”

一会儿功夫，一个工友拿着一张布告，贴在布告栏里，大家慢慢地围拢上来，一个一个瞪大眼睛，张大嘴巴，注视着那张布告。那是一张开除他的学籍的布告，上面写着：

“郭定生冒犯师长，开除学籍。”

这是一项滔天大祸，超过他所能承受的，他不知道下一步做什么，又不知道父亲知道后有什么反应，免不了要挨揍。英雄气概霎时间没有了，但仍做最后挣扎，他冲上去，把那个布告撕下来，然后大声说：

“梁锡山，你赔书！”

梁老师派一个工友把书塞到他手中，几个身旁同学向他小声警告：

“你还不快逃，他们叫警察去了。”

他这才觉得真正不对劲，本还想逞英雄，站在那里，表示毫不动摇，但实在是害怕到极点，于是就像一只土拨鼠一样，狼狈地顺着小径，跑得无影无踪。

这是他错误的第一步，一生中第一件使他后悔终生的事。假定人生能重来一遍，他绝不会冒犯梁锡山老师，因为梁老师性情温和，对学生十分爱护，很负责地教学。可惜，那时候的他，完全不能领会，等到能领会的时候，听说梁老师已经逝世。

至于另外一位教国文的刘月槎老师，虽然总是给他的作文九十分，又不断宣称：“把郭定生从萝卜班擢升到白菜班。”但他对他的印象并不好，他只是一个没用的上一代的老秀才，放着“国文”正式课本不教（上面有鲁迅等当时名家的文章），却印一些自己写的被称为“范文”的大作。

## 狠继母与海洛因

被开除的消息终于从表婶的信中让父亲知道了，父亲来了一封三四张纸密密麻麻的信，沉痛地责备他的恶劣行踪。最重的几句话，他到老年的时候还记得，父亲要他跪求校长收回成命。如果在父亲的押解之下，他可能跪求校长，但靠一封严厉的信，他根本理都不理，连信都不肯看完，拔腿去玩自己的了。父亲对这个远在天边的无法无天的儿子，也无可奈何。姐姐从乡下赶到城里，除了哭泣以外，也没有其他办法挽救这个僵局。父亲的信件虽然没有产生力量，但姐姐的眼泪使他有一种罪恶感，既惭愧又厌烦。最后，还是父亲让步，写信叫他前往开封，他在辉县四个年头，悄悄而来，狼狈而去。

到了开封，本来预期父亲会揍他一顿，结果没有。父亲老了许多，而且卧在病床上。那年父亲不过五十多岁，却显得那么憔悴。而且，最吃惊的，他回到的已不是四年前离开时的东铜板街三进院子的巨宅，而是位于八府仓后街的一个大杂院。大杂院的三面都属于同一家花生行，他们家只占着东厢的三间。就在这三间屋子里，住着父亲、继母、妹妹、弟弟，再加上柏杨，那种拥挤的情况，可以想象。而厨房就设在屋檐底下，上面搭一个遮雨的蓬子，下面仅可容身。当年那种有奶妈，早上喝牛奶、吃荷包蛋，以及跑到街上喝江米甜酒的日子，都成为过眼烟云。现在的情况几乎接近赤贫，父亲靠着新组成的花生业同业公会过日子，辉县还有若干亩田地，就在这个时候陆续卖掉，来维持这个残破的家。其实，父亲仍可以回辉县老家过一种足以维持最低生活水准的日子，不知道为什么不去，却在开封和赤贫搏斗。人们都以为他过不惯乡村的平淡生活，其实，父亲所以不回去的原因，比这个严重得多，那就是继母由吸鸦片烟，已沦落到吸海洛因。那是一九三一年代初期，鸦片横扫中国，几乎深入每一个角落。有些有钱的人家，尤其是大地主，甚至鼓励自己的子弟抽鸦片烟，那是一个只有简单而又自以为聪明的脑筋，才做得出来的评估。他们把每年抽鸦片所开支的费用，折换成田地，认为一个人抽鸦片七十年，只要消耗九十亩田就够了。如果他们家有五百亩田的话，吸五辈子都吸不完，却可以使儿子沉湎在烟榻之上，免得他出门上学，一去不回，或者是吃喝嫖赌，把家产败光。这项评估太单纯了，却不知道吸毒是会升级的，继母在吸了四五年鸦片以后，改吸海洛因。

海洛因是人类有史以来最美的剧毒，像太白粉一样的细末，吸食的时候，只需要一张锡箔纸（香烟盒里那张防潮纸），把雪白色粉状的海洛因用小指的指甲（这可能是中国男人喜欢把小指指甲留长的原因之一）挑起一点点，放在锡箔纸上，划燃火柴，在锡箔纸下边轻微一烤，那一小撮海洛因粉末，立刻化成一缕似有似无的青烟，冉冉上升，这时候，瘾君子立刻把鼻子凑到青烟上，深深吸一口气，毒品立刻进入全身，前后只要几秒钟。一个烟瘾袭来的人本来全身瘫痪，无气无力，眼睛发直，毫无克制能力地流着口水，那种狼狈的情况，使人震惊。千万记住，吸毒的人没有羞耻心，绝对没有羞耻心，女人就在这个时候卖淫，男人就在这个时候偷窃，只要能得到一包白粉（仅仅一小包白粉而已，大概为普通药房配药那种药包的十分之一）。药包到手之后，眼睛立刻发出贪婪的凶光，用发抖的双手把它小心翼翼地打开，吸过之后，你才发现，海洛因真是神奇，它可以使你完全变成另外一个人，眼中凶光立刻变成亮光，智商顿时会超过普通人若干倍，而且行动利落得像一只猿猴。

这就是继母毒品生涯的写照，父亲一度也参与吸毒，在倾家荡产之后才被迫停止。但继母却在卖了儿子、卖了女儿以后仍然吸毒，这当然是以后的话。父执辈不断向继母规劝，不断发出警告，要求继母戒掉。每当父执辈规劝继母时，不用等到开口，继母立刻就分析毒品的可怕性，甚至于连海洛因的制造过程，和经销过程，中盘、小盘的剥削情况，以及毒品对身体的严重伤害，都十分精辟，说到最后，她提到海洛因价格的昂贵，并举出实例，某家某家都是良田千顷的富户，现在全都卖光，女儿在街头任人玩弄，讲到痛心的地方，继母会流下眼泪，泣不成声，发誓她一定要戒断。如果她不戒断，她就是没有心肝的禽兽。客人所知道的吸毒的坏处，继母全知道，而继母从深层挖掘出来的深一层的害处，连来说服她戒烟的客人都震惊得无话可说。柏杨和弟弟妹妹们，在一旁亲眼看到听到，每一次都深深感动，认为家庭的灾难终于过去了。然而，继母照样吸她的毒。

这就是家庭破败的原因，好在青少年对家庭贫富的感觉并不十分的敏锐，何况他睡在房子的墙角，比起当年家未败时，一个人睡在墙角，没有什么差别，同时，无论什么时候，他身上总是没有一分零用钱。

## 居然考取高中

回开封后，走投无路，手中没有初中毕业文凭，又没有可以报考同等学力初中二年级毕业期满的证明，开始承受没有证件的熬煎，证件的威力是如此的强大，使柏杨无法抵抗。真不明白，既然学校有入学考试，为什么还要证件？既然允许同等学力，为什么一定要初中二年级肄业期满证书？他找不到答案，即使找到答案也没有用，而且即令取消所有投考资格也同样没有用，因为他根本考不取。主要的是数学，初中的数学科目共有三次，一是算术，二是小代数，三是平面几何。算术不用说了，他根本不会，小代数只学了半年多，连方程式是什么都弄不清楚，至于平面几何，从没有听说过，因为三年级才教平面几何，他在二年级末期就被开除。

这个时候，开封龙亭一条街上，开了一家“开明英数补习班”。他看到招贴，要求父亲准许他去补习，父亲给了他三块银元，叫他报名。那是一家野鸡补习班，只有一个摆着七八张桌椅的破旧教室，学生也只有他一人。教师一条腿微跛，柏杨早已忘记他的姓名，但他认为他是一个伟大的教师。这一辈子历次考试的血战中，就靠这位老师教给他的一点点本领，打遍天下。不能想象，如果没有遇到这位老师，他更会沦落何方，狼狈到什么程度。

就在补习班，他学习从没有听说过的平面几何，而且在短短的两三个月中，竟把那平面几何，弄得滚瓜烂熟。这是一个很特别的现象，一个对算术和小代数白痴的学生，竟然对平面几何如此的熟练，说明他确实有数学的潜能。他对平面几何迅速进入情况，是因为刚刚来到开封，一切都很陌生，既没有狐群狗党的朋友纠缠，又不知道到什么地方游荡。更重要的是，也没有一个人再夸奖他天纵英明。而且考试逼在眼前，不用功不行，死心塌地的下了真正的苦功。

那时候最使青年学子崇拜的是省立开封高级中学，它的入学资格非常严格，非初中毕业不可，不收同等学力。而他什么文件都没有，结果父亲的朋友，在开封高中当训导员的王伦青先生，不知道用了什么方法，准许他报名。

考试的时候，数学共出十题，包括算术四题、小代数四题、平面几何两题，他两道几何全答对了，得了二十分（他到现在还认为，发明只要有一门功课零分，就不能录取的人，简直是“整人为快乐之本”，他们的目的是要考倒学生，而不是要考取学生）。至于英文，他有个传统的战法，那就是请英文好的长辈，写一篇一二百字的英文作文，里边包括自传、小时候的生活、父母的爱护，与自己将来的希望，以及如果考上学校，对国家的抱负，表现出自己是一位上进、爱国、爱乡土、爱父母、兄友弟恭的好学生。这一年，柏杨十七岁，就发明了这样一个百战百胜的考试法宝。不管出什么题目，他只要把这一篇文章背熟，一字不改地抄上就对。至于物理、化学，他一筹莫展，已忘记用什么奇妙方法解决这两门功课的困难。最后，终于发榜了，在强烈的太阳照射下，人头钻动，校门口水泻不通，他从第一名开始，找到备取的最后一名，再从备取的最后一名，找到正取的第一名。然后横着找，从第一排的右边，找到第一排的左边，再从第二排的左边，找到第二排的右边，这样一排一排翻来覆去的找。然后再换一个方法，从左到右找姓名的第一个字，然后再找姓名的第二个字，再找姓名的第三个字，反正是找了一个多小时，就是看不到自己的名字，他知道完了，脸上是汗水或泪水，已分不清楚，眼前一片模糊，胸口猛烈地跳动，他不知道怎么回事回去面对父亲。所花的巨额

补习费全部落空，以后怎么办呢？这时候，听到旁边有人在哭泣，他也想哭泣，可是仍咬着牙，没有出声。正当他低下头，拨开人群要走的时候，听到两个同学在远处谈话，一个说：

“ 噢！郭立邦那小子怎么会考取？真是出了鬼！ ”

他简直是像听到一声霹雳，一个箭步跳上去，抓住他们中一位的右臂，大声问：

“ 我在哪里？我在哪里？ ”

这个时候，假设那同学说：“ 只是一个玩笑！ ” 他真的会心碎，幸好那同学指出他名字的位置。原来，这才是真正可以用上那个“ 忘了自己是谁 ” 的成语。他原来是叫郭定生的，这次报名不敢用郭定生，因为已被开除了，百泉初中准把开除的事报到教育厅，所以父亲把他改名郭立邦。对他来说，这个名字非常陌生，他本能的在榜上找郭定生，怪不得怎么找都找不到。

对他而言，这真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骄傲，只读了初中两年（还不到两年），就被开除的坏学生，功课又是那么烂，竟然考取全世界最好的高级中学，高兴得简直要发癡，他本来不会吹口哨的，现在也会吹了，看到那些开封女子师范学校的女学生，理都不理（当然，她们对他也理都不理。）

父亲对他考取高中，当然很高兴。可是父亲好像不知道省立开封高中是这么的值得夸耀。尤其是有些人，包括父执辈或同院花生行那些伙计，问他说：

“ 你在哪个学校读书？ ”

他骄傲的回答：

“ 高中。 ”

对方往往追问说：

“ 哪个高中？ ”

柏杨最不能忍受这种愚蠢的反问，因为天下只有省立开封高级中学才是值得一提的高中，只要提“ 高中 ” 两个字那就够了，不需要提它的校名。可是，他虽然因考取了而沾沾自喜，功课程度却不能相配，不但不能相配，简直比在百泉初中时代所受的压力更大。因为百泉的时候他在萝卜班，所有的孩子都来自荒村僻壤，就是高明也高明不到哪里去。现在开封高中的同学，来自全省各县精英，口音不一样，仪容不一样，功课超出一般水准很多。当他发现有一位同学，可以用英文讲故事的时候，简直吓得要死，他一辈子都赶不上他们。而数学里面，取消了算术当然很高兴，可是又改教了代数跟三角，更是要命。尤其想到，二、三年级还要学立体几何跟微积分时，恨不得立刻疯掉。他终于悲哀的发现：读书真苦！那时候，还没有招兵买马的行动，如果有的话，他早就逃走从军报国去了，实在受不了那些“ 横行 ” 的英文、数学的折磨。

## 以惨败告终的『初恋』

他除了上学被功课搞得苦不堪言、奄奄一息外，另外还有一项烦恼，就是找不到女朋友。那时候，政府正在严厉地禁止妇女缠足，一个小学或初中毕业的女学生，经常被县政府聘为“放脚委员”，到乡下各地去宣传缠足的危害和天足的好处，还挨家视察，发现有五六岁小女孩缠足的，就要求立刻停止。这是中国自从有政府以来，大概五千年吧，唯一的一项确实实为人民谋福利的善政。而他们这个自称为优秀民族的中国人的回报，却是把那位放脚委员的女孩暴打一顿，在邻居们叫好吆喝声中，夺门而逃。这就是二十世纪初叶，中国乡村中最精彩的景观。

在这种社会基础上，识字的男人，也就是读过书的知识分子，为数不多，绝大多数的中国人都是文盲。设在辉县沿村的郭家祠堂，在二十年代曾经有过赏格：本族青年小学毕业的奖赏二十银圆，中学毕业的奖赏五十银圆，大学毕业的奖赏一百银圆。那时候农村的雇工，一年工资才二十银圆。一百银圆能够购买年轻人五年的劳力，这在乡下是一个令人吃惊的数目。从此柏杨发誓要拿这项奖学金，来减轻日渐衰老的父亲负担。可是终告失败，因为他一辈子什么学校都没有毕过业。

男性的知识分子已经如此稀少，女性的知识分子，更稀少得可怜。不要说识字的女性，就是从没有缠过足、一直是天足的女性，在三十年代仍是罕见的稀有动物。柏杨有一位堂兄郭立生，省立汲县师范学校毕业，曾经拿到祠堂五十银圆的奖赏，被乡人尊敬为最有前途、将来可到县城跟县长平起平坐的年轻绅士。他师范学校毕业的那天，媒人就不断到他家说媒，把她们手中的姑娘美化得貌如天仙；柳叶眉啦，瓜子脸啦，面若银盆啦，三寸金莲端正正啦。只要“三寸金莲端正正”一出口，堂兄就会像爆竹一样的跳起来，把媒人赶走。以致毕业了两三年，还没有娶妻成亲。父母心焦愤怒之余，决定用强制手段，堂兄才被逼说出他的最低条件，第一，女方必须上过学堂，第二，女方必须是天足，从没有缠过足。这在九十年代绝不值一提的条件，在三十年代却是天大的难题。最后堂兄终于屈服，不识字没有关系，但必须没有缠过脚。即令屈服到这种地步，仍然无法达成愿望。他父母央求了好几个媒婆，到全县各乡去打听消息，结果发现，全县天足的女子倒是不少，可是都在十一二岁以下（她们都是中华民国成立以后，父母冒着家族或邻居的嘲笑，而拒绝给她们缠足的）。天足的适婚女子全县里几乎找不到一个，这造成了堂兄家里一个重大风波。他的父母怎么也不了解，他们的儿子竟然不喜欢小脚，闹得堂兄几乎离家出走。五十年后，柏杨重返家园，才得到这件公案的结局，郭立生后来终于在新乡县物色到一位没有受过教育的天足女孩（她在她的故乡几乎嫁不出去），迎娶到家。现在，她早已去世，立生堂兄住在他嫁到获加县的女儿家里，常往返获加县与辉县之间，从他脸上似乎还可隐约的读出青年时代这段奋斗史。在这个古老的传统社会，仅仅是使人明白缠足是不人道的，天足是美的，就这这么的不容易。因之，柏杨从小就开始怀疑中国人对美和丑的鉴赏能力。女性知识分子竟然少得如同沙漠里边的小百合花，家里如果出现一个高级师范或高级中学的女学生，那简直能轰动全县。柏杨一直到十八岁，从没有见过一个高师或高中的女学生。其实，倒是真的见过一个，那是辉县老宅邻居张老太太的女儿张少筠。当他读初中的时候，少筠已经读省立开封艺术师范学校，他们这一群孩子都叫她五姐（她家

有五个女儿），每次她从开封放假回来，那种城市女学生的打扮，真叫他们这群野孩子们晕头转向，天天围绕着她转，又不知道该说什么。她比他们这群孩子其实也不过大三岁，柏杨有时候做成人状，仿佛大人的口气，不叫她五姐，直接叫她的名字少筠，她也顺口答应，柏杨就高兴得不得了，可是也仅止高兴而已。那位都市小姐根本就没有把乡下小萝卜头看在眼里，有事的时候就差遣他们跑腿办事，没有事的时候，想跟她多说一句话，她都不理。其实，即使叫他说话，他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而现在，他到了开封，而且读的是“世界第一名校”——高中（全世界人都应该知道它是开封高中），气势非凡，勇气大增，自信心也大增。虽然那时候，高中学生还没有听说有谁在谈恋爱，但是他自认为有顶尖的资格去交女朋友。那时候的恋爱，都发生在表亲之间，一旦双方面关系是表兄妹，那简直是天造地设，铁定的一对，非恋爱不可，这由一十、二十年代，民国初年畅销的小说书上，描写的都是表兄妹恋情，可以得到证明。在这种情况下，柏杨束手无策。他已经不想成为篮球健将了，而急于成为进入开封高中后、才学习了几天的网球健将，因为他在练习打网球时，能把网球打到墙外，他必须从门口飞奔出去，到马路上捡球，常使那些路过墙下正在读师范的女学生，叽叽喳喳地捂着嘴笑，这时候他就大为得意。

有一天，他在捡球抬起头来的时候，看到一个书包上的名字：何玉倩，那个书包的主人是一个什么样的女学生，是胖？是瘦？是高？是矮？统统不知道，而只知道她的名字。回到学校，就在脑筋里构思，怎么样写一封信给她。

过了好几天难捱的日子，信终于写出了，密密麻麻五张信纸，这是他平生第一封情书，可惜已不记得详细的内容。但只是坚信这篇文章如果正式的写在作文簿上，老师一定会批一个甲上。反正是，小心翼翼地贴上邮票，投入邮筒。从此，天天到学校信箱那里观望。为了避免同学对他的行动起疑，他就宣称并不是来看信的，因之也不在乎有没有信。这真是一段难熬的日子，上课几乎全听不进去（其实没有这封信，也听不进去），只好逃课去打网球，没有对手的时候，就一个人面对着墙打。有一天，那一个伟大的日子终于到来，像当初看榜时候一样，柏杨从一排信中忽然发现了自己的名字。他跳上去把它拿下来，不错，是他的名字，而且字迹写得那么秀丽，信封又是开封女子师范学校。他的心几乎跳出胸腔，他想：他的心脏病大概就是那个时候种下的！

不过，奇怪的是，信竟然没有封口，只有一张信纸，上边写的大意是：

“你年纪轻轻，不用功读书，却给女生写信，我们已把它公布到我们学校布告栏里。看你以后还敢不敢？”

这是一个无情打击，对一个十八岁的青年来说，更羞愧难当。尤其是把自己的信公布在女子学校的布告栏里。他完全被打败了，当场把信揉成一团，塞在口袋里，坐在一个墙角，很久很久都站不起来。他不仅后悔写这封信，而且还非常的害怕公布在女师墙上那封自己写的信流落出校门，落到父亲之手，或落在开封高中同学之手。同时也非常痛恨这一位叫何玉倩的女生，竟用这种置人于死地的手段，而只不过为了炫耀她自己曾经被男生追过。

这件事终于悄悄消失，他也渐渐地恢复正常，但不会忘记这次打击。使他一辈子坚持一项做人的原则：绝不利用朋友的真情善意，来达到自私的目的，因为他曾受其害。



不管怎么说，这第一次轰轰烈烈的恋爱就这么灰头土脸地结束。

## 西安事变——崇拜蒋中正

就在被第一次恋爱搞得昏头转向的时候，这个拥有五千年历史的古老中国，正遍地沸腾——贫民饥饿沸腾，日本侵略沸腾，共产党武装革命沸腾，全国人民抗日情绪沸腾，而且，都到了临界点。当时的他所知不多，只知道一件事，就是一年前读百泉初中的时候，有一天，发现很多人挤在布告栏前，仰头观看全校唯一的一份报纸，头条的标题是：

政治会议通过根绝赤祸案

政治会议是什么？谁也不知道，但是却知道赤祸就是共产党，共产党就是“共匪”，共产党怎么会称为“共匪”？也没有一个同学了解。只知道共产党的军队在江西省组织了中国人看都看不懂的“苏维埃共和国政府”，突破中央军的重重包围，翻山越岭，向西穿过湖南省、四川省，越过秦岭，进入荒凉的陕北，另组陕、甘、宁边区政府，虽然这是一场又一场的血战，但距河南却遥远得很，对于一个十七八岁的孩子来说，尤其遥远。可是就在柏杨考取高中那一年，国民政府实行全国高中学生暑期军事训练，这是一个大规模而非常有功效的思想统一运动。意大利首相墨索里尼送了一架飞机给中国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中正先生，作为座机，蒋中正把墨索里尼当作学习对象。学生集中训练，于一九三六年暑假开始，为期三个月，严格的德、日式教育下，学生们除了军事操练外，主要的是接受法西斯教育，像称蒋中正为“领袖”，不再称呼他为“蒋委员长”。而一提起来“领袖”，站着的人都要立正，坐着的人都要起立。站着的人立正比较简单，双手双脚靠拢就行了，坐着的人起立，可是像旱地拔葱一样的，桌子往前推，椅子和板凳向后倒，一阵混乱。尤其是“领袖”二字，不像“立正”二字那么明确，大家行动不可能一致，有的先站起来，有的后站起来，一不小心很可能跌倒。笑声嘘声和惊恐声，会同时爆出，这种法西斯动作，一直维持到撤退到台湾后的六十年代，把起立改为原地挺胸，闹剧才算停止。柏杨的杂文《立正集》，灵感就是从这里产生。

这时候国民政府正在全力执行安内攘外政策，高中军事训练是安内的一部分工作，而另一部分工作，与年轻学生无关的，就是政府的中央军，跟共产党的红军，在陕北对峙。蒋中正计划先行铲除共产党，然后再对抗日本侵略。然而蒋中正却在这个政策上失败。

江西省的红区战场，蒋中正投下去的是中央嫡系精锐部队。可是在陕北边区战场，他却用九一八事变后从东北撤出的东北地方军作为主力，蒋自任剿匪总司令，而命东北地方军统帅张学良先生当副总司令。这真是一个自以为得计的大政略和大战略，他保存了他所控制的中央军部队的完整，如果共产党红军被东北地方军消灭，蒋中正当然大喜若狂。如果东北地方军被共产党红军消灭，蒋中正也会同样的高兴。因为当时中国各省地方军的所谓杂牌部队，到处都是，假如能够借共产党红军之手，消灭其中最顽强的东北地方军，当是借刀杀人的第一等奇计。

但是蒋中正高估了自己，因为这项阴谋是如此的明显，连十岁小娃都看得出来。中央政府更明目张胆的，对东北军人员的补充，严加限制，使东北军死一人，少一人，死一连，少一连，于是当柏杨正在为恋爱所苦的时候，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西安事变爆发，蒋中正被张学良扣押。就在事变的第二天，《河南民报》上的头条还登出来：

### 蒋委员长飞抵洛阳

这真是瞒天大谎，不久，广播才传出“西安发生兵变，蒋委员长被扣”的消息。全国立刻陷于惊恐，平常人对蒋中正的认识，只知道他是中央政府的灵魂，拥有最高权力，虽然国民党已开始把他推向神的地位，但是不过刚刚开始，并没有深入人心，西安事变使这个运动迅速成为事实。蒋中正被扣押，全国好像失去了重心，柏杨那时刚刚接受军训，正对他热烈崇拜。

这件事在历史运转法则上，使柏杨有很多醒悟，人生，挫折不可避免的，如果处理得不好，它就变成灾难；如果处理得好，它反而是更上一层楼的阶梯。

西安事变两个礼拜后和平解决，张学良亲自护送蒋中正乘专机飞返南京。张学良被判十年有期徒刑，蒋中正痛恨张学良入骨，因为这场事变使他神经质的懦弱，完全暴露，所以他对张学良虽然无法判处死刑，却嫌十年时间太短，十年刑期期满以后，蒋中正仍下令继续囚禁，三十年后，蒋中正、蒋经国父子相继逝世，张学良才被释放。

## 忍无可忍揍继母

柏杨在开封的家，虽然败落到只剩下租来的三间破屋，可是继母的声势却因吸海洛因更为急躁。她弄不到钱，就把煤块装到麻袋里偷运出去。父亲身体更形衰弱，靠变卖老宅剩下的一点积蓄过日子。继母要钱，父亲不给，继母又恢复东桐板街时代的咆哮咒骂，照样的辱及郭家祖宗三代。柏杨的愤怒从小累积，累积了十几年，现在已是高中学生，忽然感觉到自己已经是一个大人了，不能忍受年老多病的父亲继续受辱。那一天，父亲躺在屋内病榻上，继母在院子里，不知道为了哪桩事情，她暴跳如雷，诟骂父亲，那副狰狞和泼辣，同院花生行的伙计从来没有见过一个女人不要脸时的发泼场面。有的傻笑着，有的呆呆地看着，纷纷从屋子里出来围观。柏杨一股冲动，冲到继母面前，但仍然有点胆怯，只是用较平常微粗的声音阻止她：

“不要骂了！”

继母愣了一下，十八年的积威使她毫不把他放到眼里，叫骂的声音反而更大，并挑战的说：

“你这个叫炮头，你们满门都是叫炮头的郭家，男盗女娼，你站到我面前，敢怎么样？你敢打我？”

一个“打”字，为他指出了一条明路。柏杨几乎浑身颤抖地（那是过度的害怕，也是过度的愤怒）在地下划一条线，大声叫：

“你敢过这一条线，我就打！”

继母的眼睛冒出火焰，她不相信在她鞭子下不断哀号、匍匐、乞求饶命的那个男孩，竟敢如此凶悍。于是她毫不在意的直冲过来，想冲进房门。就在这一刹那，柏杨击出重重的一拳，这是向“二十四孝”挑战的一拳，也是向几千年传统礼教挑战的一拳。继母应声倒地，开始在地下打滚哀号：

“你敢打我呀！”

他跳上去，又是一拳。继母这时才发现十八年来她所用的那一套魔术，已经完全失效，她面对一个她从没有想到过的叛逆局面。于是改口大喊：

“郭学忠，你叫你儿子打我是不是？我跟你儿子拚了！”

父亲在房里发出微弱但十分焦急的吼声：

“小狮儿（柏杨的乳名），你干什么？还不住手！”

他扑上前去，在继母身上又施一拳（他对自己笨拙得不敢用脚去踢她，十分自恨）。继母在众目睽睽之下受到继子的殴打，突然害怕起来，唯恐他拿起就在手边厨具上的菜刀，于是她改诟骂为哀号，大叫：

“救命啊！救命啊！”

父亲在屋里，上气不接下气的大叫：

“小狮儿！你要气死我！”

他听到父亲挣扎着起床的声音，有点惊慌，看到躺在地下哀号的继母，不知道如何善后。于是，就一溜烟的拔腿跑回学校。回到学校后，心情定下来，才发现他又一次的闯大祸。过了好几天，他才畏畏怯怯地回家。一面走一面幻想面对的景观，像继母扑上来和他对打，或者父亲拿个棍子对他一顿臭揍，或者继母已经逃走——那是最好的结局了！他蹑手蹑脚进到三间破房，坐在父亲床前，一个传奇的场面发生了，父亲不但没有揍他、骂他，更没有任何追究，只衰弱地说：

“你看，你妈正在房间给你做棉袄，去向她陪个罪！”

他心战胆惊的站到继母面前，并没有陪罪，因为他不知道怎么陪罪，只是站在继母的身边，等待着继母一旦动手，他就还击。继母的表现，也是一个奇迹，她微微地笑着，十分温暖的说：

“来，比一比，穿上合适不合适，合适的话，妈再给你做。”

这是他自从有记忆以来，听到继母口中吐出的最甜蜜的声音，他感动得几乎要跪下来求她宽恕。但他没有这样做，因为他觉得不对劲，他并没有解开自己心中的结，不过，事情终于这样过去了。

两三个礼拜之后，他又回家，继母在院子里，听到他的脚步声，回头说：

“你等一下，妈正在给你煮江米甜酒！”

院子里正好站着花生行帐房蔡掌柜，他也站过去，蔡先生说：

“你妈待你不错！”

他尴尬的点点头。

“傻小子，”蔡先生说，“你可小心点你妈给你煮的东西！”

他呆了一下。蔡先生低声说：

“你看你妈的嘴角！”

他看到继母的半个侧面，发现她的嘴角向上撩起，一种邪恶的心情，使他打了一个寒颤，但自己也陷于困境，他没有理由不吃继母煮给他吃的东西，唯一的方法就是不常回家。

多少年后，甚至到今天，他垂垂已老，仍不后悔对继母的这次反抗行动，而且恰恰相反，如果他不把继母殴打那一顿，他这一辈子都不会原谅自己的懦弱。

#### 投奔延安遭夭折

作为一个侵略者，日本真是世界上最拙笨的一国，美国四出侵略，在世界上反而落个“美”名。人们都相信中国跟美国之间，从来没有发生过战争，其实错了，中法战争时，天津附近的法国军队战败，美国军舰立刻偷偷地向中国开炮，支援法军，清政府无可奈何，忍气吞声，只好假装不知道。英国的侵略，建立了世界性的殖民地，这些殖民地后来都成为拥护英国的友邦。只有日本，皇军所到之处，除了种下仇恨的种子外，其他没有任何收获。

中国的腐败、落后，与内部严重的分裂，把日本诱惑得如痴如狂，认为如不把这个邻居一口下肚，简直天理不容。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本军队在河北省宛平县芦沟桥，假装一个士兵失踪，向中国展开大规模灭国绝种性的疯狂攻击，在算盘上（算盘是中国最古老的计算机），他们明白地计算出中国必亡的结论。

当七七事变的消息传出时，中国全国再度陷入疯狂，一种要求抵抗到底的民心，没有人可以阻挡，于是，共产党同国民党合作，陕北红军被改编为八路军，江南红军被改编为新四军。柏杨在年轻时候像每一个男孩子一样，想在战场上成为英雄，以致连做梦都梦见到前线上挥动大刀杀敌。于是，就在七七事变后不久，高中二年级的他，投笔从戎。所谓投笔从戎，就是去投考河南省军事政治干部训练班。除了火炽的爱国心驱使他投入这个大洪炉、大时代外，还有两个并不十分光明，但却十分重要的秘密动机。第一是他渴望早日离开继母，免得遭受毒手。第二是他无法弄到初中毕业证书，开封高中一再催促缴验。父亲也找过训导员王伦青先生，王先生只有办法使他报名考试，没有办法使他通过证件关卡，开除学籍的大祸随时都会发生，这种压力足以使他精神失常，他希望（一辈子都这样希望）跑到一个用不到文凭的

地方，老死在那里！军事政治干部训练班，设在南阳县，训练三个月，毕业之后，省政府负责派任工作，最高可当联保主任。读过王安石变法的人，都会了解，“保”是中国政府最基层的单位，大体上等于现在台湾的“里”，若干“保”可以组成“联保”，也就是九十年代的“乡”，联保主任就是乡长。这对一群十八九岁的青年来说，简直是天大的诱惑。而就在这三个月集训中，他第一次受到共产党那种神秘的和温暖的触摸。

一天晚上，同是来自开封高中、比他高一班、功课好得人人尊敬的同学张纯亮，把柏杨叫到一个灰暗的角落，搂着他的肩膀，低声的告诉他，共产党在陕北有一个高尚的革命圣地，全国优秀青年从四面八方的涌向那里，参加真正的抗日工作，问他愿不愿意也去参加！那时候他正崇拜蒋委员长，自然不相信还有其他革命圣地。

张纯亮把陕北描绘成一个美丽乐土，大家像兄弟一样的互相照顾，那是一种革命感情，不过生活很苦，平庸的年轻人总是寻找藉口不敢参加。柏杨不认为自己平庸，就这样的，他成了张纯亮精挑细选出他所认为的优秀青年。不久，一次聚会时，他们决定某一天晚饭以后，各人分别向队上请事假、病假，或返乡探亲假，在东门里集合，由张纯亮充当班长，好像出操一样，把他们带出城门，这样可以避开岗哨的检查。共产党自有他们的地下交通网，把他们送到陕北。南阳、延安之间，直线距离一千公里，当中隔着高耸云天的秦岭山脉，沿途还有国民政府的军警和地方政府的岗哨，段段阻截，可能随时受到逮捕，遭到枪杀。但他们这一批人，热血澎湃，准备接受任何挑战，可是，最后并没有出发。因为就在约定出发的前一天晚上，张纯亮被捕，柏杨遥远地听到嘈杂的人声和凌乱的脚步声，以后就再也没有消息了。张纯亮所聚集的那些同学，互相都不认识，也不知道对方的面貌，张纯亮本人也没有招供出他所集结的同学名单，因为他们没有听到继续逮捕的风声。

伟大的陕北革命圣地没有去成（这是他一生中唯一可能加入共产党的机会），结业的时候，联保主任的高位也没有派到柏杨头上，而是随着大多数同学，被保送到设于武昌左旗营房的军事委员会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简称“战干团”。他们从河南去的同学，约有五百人左右，编成一个大队，番号是第五大队。柏杨被编到第十三中队，中队长是中央军官学校十二期工兵科毕业生吴文义先生，这位东北籍的长官，在柏杨一生中三个最关键时刻出现，是柏杨生命史上重要的一位恩师。

这是他第一次离开本土，进入中国中部第一流的都市，武昌和汉口，队伍穿过英租界的时候，也第一次看到真正的英国国旗，以及滚滚的长江和热闹烘烘的码头渡口。一切都是陌生的、新鲜的，使他大开眼界。

“战干团”训练时间是六个月，前三个月是普通训练，后三个月是分科训练。柏杨的好奇和好动使他报考了谍报队，丰富的幻想中，他希望当一个神出鬼没的间谍，像“七”一样（那时候当然还没有“七”）杀敌立功。然后以一个平凡人的姿态在街上闲荡，没有人知道他对国家有过伟大贡献，可是却在一个秘密组织中受到尊敬。这个愿望没有能够实现，因为谍报队（第九队）的队长是一个南方人，好像是浙江人，他那种像鸟叫样的国语和傲慢的态度，与吴文义比较起来，简直是两种人类。间谍生涯遂到此为止，柏杨又返回吴文义那个中队——第十三队政工队。

可是，中队长虽然很好，相当于排长的区队长李龄，却是一个毒疮——柏杨生命中第二个侯万尊。天下所有的错误从此完全发生在他身上，打扫厕

所、禁足、禁闭、挑水，李龄一不高兴或一高兴，他都会被罚。双手举枪，两腿半分弯，伏地挺身，二十个是起码数，有时候挺到六十才命令他停止，有时候挺到跌倒在地。但是，同班的另一位名叫叶子忠的同学，命运却好像活在九霄云端，柏杨常抨击他小白脸，从这项抨击，可看出柏杨的长相，实在够不上什么水准。每次打野外或行军的时候，他本是第一班的排头，叶子忠是排二，但李龄却认为他头脑不清，而命令叶子忠当排头，这对他真是一个最大克星。三十年后，叶子忠当了台湾省电影制片厂厂长，而柏杨却正在火烧岛坐牢，又一次证明人生确实有不相同的命运。

六个月的训练使他另有感受的是：他结识了许多外省籍的同学，像叶子忠，就是南京人，这些外省籍的同学，对从河南来的青年，几乎不约而同地有一个最大的惊讶，即令是中学生或大学生，也都是满口脏话。脏话是一个野蛮族群感情上最粗糙、最原始的发泄，河南处于中原地带，将近一千年以来，水力被破坏，居民被屠杀，终于成为一片荒芜，小民除了穷困，还是穷困，仅比陕北、甘肃、贵州稍好一些，没有多余的钱或多余的知识，使孩子接受教育，所以脏话成为每个人的口头禅。使他们在那些文明程度较高的他省同学——像来自安徽、浙江、湖北，四川的同学面前，抬不起头来。一个安徽同学曾经向柏杨质疑说：

“你们河南人这么样粗野，怎么交女朋友？”

“女朋友？什么是女朋友？”

柏杨自从第一次轰轰烈烈恋爱之后，再没想过这个名词，但是，现在开始想到了。于是，他就尽量地使自己变得文明，不过进步很慢，因为没有人教他。

“战干团”是国民党政府为阻截风起云涌奔向陕北的青年潮，所设立的收容机构，思想教育是它最主要的课程。其中有一个课目为“领袖言行”，一个教官在讲起领袖的英明时，声称：

“全国军队，以团为单位的动向，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行军、驻扎，什么时候在那个地方作战，领袖都了如指掌。”

从同学们脸上的表情，可以读出来那种对领袖的忠心尊敬。柏杨最光荣的一次任务是，蒋中正到“战干团”训话，真是震天动地。十三队被派出当仪队，而他以第一排（区队）第一班（分队）排头的资格，昂然地站在营房大门的内侧，使他第一次看到“最高领袖”的威严。整个左旗营房，鸦雀无声，两千多人的学生总队，像豆腐干一样地排在演讲台前，即令一根针掉在地上，也可以听得见。正当大家紧张得要崩溃的时候，营门传来三番接官号，一两位少将级的官员轻轻地从营门跑进，站在仪队旁边。刹那间，三番接官号停止，阅兵号起奏，更是一种令人沸腾的军乐，一个平常只能看到相片的大人物突然出现，后边跟着一群随从。蒋中正穿着全副军服，缓缓地走到仪队面前，仪队向他敬礼，他举起截白手套的手，向举枪致敬的仪队还礼。柏杨既兴奋又紧张，第一个想到的是，有一天回到辉县，可以向乡亲们夸口：我见过领袖。大概是兴奋紧张得过了头，他竟忘了举枪。蒋中正当然不可能发现这种错误，但专门发现别人错误的人可太多了，李龄就是其中一个，检阅结束后，李龄认为柏杨故意的侮辱“最高领袖”，要把他送军法审判。没人相信那时候的青年子弟兵会侮辱领袖，所以李龄的苦心没有实现，而他在关了三天禁闭后，憔悴不堪地被释放出来。大家对他那种乡巴佬的紧张，引为笑柄。

这时候，日本已开始轰炸武汉，空袭警报后，“战干团”同学每次都疏散到左旗营房正对面、只有一条马路之隔的蛇山。大家听到谣言说，从被击落的日本飞行员尸体上，搜出作战地图，发现蛇山一带红点最多。可是看不到团部有什么新的指示，不但没有新的指示，反而仍命大家一大早就起来爬上蛇山，躲避预期的空袭。

一天上午，空袭警报响起，大家奔向蛇山，不久即听到紧急警报，柏杨和几位同学趴在地上，抬头望向天空，隐约的听到飞机逼近的声音，就在半空中，“呼！呼！呼！”稳定而沉重，从南向北移动，霎时间，大地如死。他看到九架轰炸机，在头顶正前面的上方出现，那是最危险的角度，可是当时他并不知道。忽然，几乎像是从地面拔起东西一样，原来高射炮开始反击，日本飞机附近布满片片炮弹爆炸的白烟。那九架飞机，像一个整体一样，稍微向上一扬，仍继续前飞，就在飞机的机腹下，突然出现几十个黑点，顺着飞行方向对准蛇山。一种“沙——沙——”，炸弹磨擦空气发出的啸声，把整个蛇山罩住。接着是眼前一黑，大地再度震动。柏杨用标准的伏地姿势，双手抱着后脑，恨不得把自己的头压进地球。然而他的身子反被弹起来，跌下去，弹起来，再跌下去，只听到一片号叫。大概只有十秒钟，日本飞机从头上飞过去，可是蛇山已过了好几个世纪。大家上山时是排队而来，下山时则零零落落，像一群溃败的散兵游勇。柏杨抓住水壶，正要喝水的时候，忽然发现他抓的是一个人的右手，他大叫：

“队长！队长！”

接着是扔下那只被炸掉的手，就往下爬，被一个满是血的尸体撞倒，他站起来再跑，看到一条腿就挂在左旗营房的电线上。从此，学生们都吓破了胆。

不久后，有一天，天色阴森，不知道是哪一个大官莅临，全体学生集中广场，听候训话。训话还没有开始，大官还没露面，警报已发出凄厉的长号，声音令人发抖。全体同学竟然一哄而散，跑上街头，跑向田野。队长的吆喝怒骂，甚至恐吓要把大家枪毙，都阻挡不住。他和几个人一直跑到一个矮堤的旁边趴下来，害怕得不得了，害怕死，其实真正害怕的是残废。这个时候，他最大的希望是有一个钢盔。他对他的害怕不觉得惭愧，但对于自己像大家一般的四下逃命，却非常惭愧，责备自己不配作一个军人。



## (11) 长城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

六个月在警报声中结束，大部份同学被派到部队当政工官员，而柏杨则和少数同学被送去参加三民主义青年团工作人员训练班考试。

三民主义青年团是蒋中正以国民党总裁的身份，在国民党内建立的私人小组织，它有一个和国民党同等庞大的系统。中央设中央团部，省设支团部，专员区设区团部，县设分团部。工作人员训练班——人们称它为“青干班”，设在武昌珞珈山武汉大学，受训的时间只有短短的一个月，但却是一个陪伴他终生的一段时光。“青干班”一共有四个中队，三四百人，大家都是那么年轻，他尤其年轻，才十九岁。而有些同学已经将近三十岁了，又有相当的社会经验和地位，看他不过是个顽童。在那一种自认受国家重视、身负救亡图存重责大任的雄心勃勃气氛里，豪气万丈，认为乾坤就在他们手里，可以扭转。最使大家感动的，是蒋中正几乎每隔几天都要来作一次训话，使他感觉到和最高领袖是那么的接近。

在“战干团”的时候，集体宣誓加入国民党。一个来自乡下才十九岁的青年，简直弄不明白自己的位置，在一夕之间，长官告诉他：

“你是英明领袖的子弟兵！”

柏杨是既兴奋又惊讶，不敢相信会有这么大的荣耀。他下定决心效忠领袖，愿为领袖活，愿为领袖死。从他当仪队的那时候起，就单方面的这样赤胆忠心，假使这时有人行刺蒋中正，他会用他的血肉之躯，保护领袖、跳起来挡住子弹，或趴在即将要爆炸的炸弹上。

武汉大学建筑在珞珈山半腰，是他见到过的最美丽的大学之一。校园的一侧是一望无际的东湖，他和一批同学几乎每天都去游泳，他的游泳技术突飞猛进，脱离了狗爬式，学会了自由式、蛙式、仰游，而且学会了跳水。有时大雨倾盆，雷声隆隆，还有耀眼的闪电，整个东湖被笼罩在雨网之中，湖边的游泳池上，只剩下他一个人在那里反复地跳水。他根本不知道有任何危险，所以没有惧怕。在那段日子里，“青干班”的训练非常松懈，永远记得那时学会的一首歌，李叔同的“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这首歌。今天，五十年后，他仍然会唱。每当歌声远时，他就回到那一去不返的青春年龄，三四百位年轻小伙子，在武汉大学的体育场上，席地而坐，由那些年轻的女同学领导着教唱，草绿色的裙子，随风飘荡。其中有一位女生，名叫钱纯，不过二十二三岁年纪，她唱得那么好，而她主持小组会议时，那么有条有理。她好像是南方人，那么漂亮，那么大方，柏杨简直把她当成天使，不要说跟她讲一句话，连走近她都不敢。可惜后来，她被派到二百师，在衡阳火车站上被日本飞机炸死。

就在训练快结束的时候，日军接近武汉，“青干班”同学被送上火车，向南方开拔。记不得是哪一天，他们坐在敞篷的车厢上，毫无忧虑地歌唱欢笑。走到汀泗桥（那是国民革命北伐时最激烈的战场），突然之间，大家一齐发出恐怖的尖叫，一架日本军用侦察机，飞得那么低，两个巨大的日本国旗的太阳标志，在他们头上擦过，呼啸着一掠而去。火车立刻停下来，队长叫大家四处疏散。大家立刻躲进北伐时北洋军阀所留下来的战壕，乱草密布，几乎看不到太阳。而就在这时候，日本的两架战斗机，开始扫射，大家趴在战壕的角落，连呼吸都不敢，惟恐飞机上的日本驾驶员听见。低空扫射和高空轰炸那种恐怖是不同的，有一种无处可逃的感觉。奇怪的是，将近二十七

分钟的密集扫射，竟没有一个同学受伤。可是当他们想再坐火车的时候，发现火车头已被炸烂，于是他们全体只好一齐徒步前往长沙。他一直认为蒸气式的火车头，像家里烧水用的铁锅一样，里面装的全是滚烫的水；想不到日本炸弹解开了这个谜，原来里边装的全是他所无法了解、像人小肠一样弯弯曲曲的钢管，不禁大为怀疑，水都到哪里去了？

到长沙后，被安顿在一家空荡荡的民宅住下。虽然公家还供给伙食，但是，一个最大的困难，他这一辈子都无法克服，这时更为严重的，就是他一直穷得一文不名。如果出去游玩，没有赶上吃饭，就必须饿到下一顿。尤其是九月以后，天气渐冷，他穿的还是单薄的短裤军装，已经不能抵抗寒意，每一天坐在寝室地板上，双手抱膝，一言不发。一位名叫赵蓉的女同学，年龄和他差不多，那一天，她忽然拿了一件黑色的上衣（好像是男女不分的学生上衣），悄悄走到他跟前，把它塞到他手中，微笑着说：

“穿上吧！”

他是一个还没有开化的北方野孩子，已经忘记对她说谢了没有，他只是立刻穿上，感到一股温暖，但他没有胆量再去找她讲第二句话，可是对她终生不忘。和赵蓉感情最好的另一位女同学，名叫周伦，她以舞剑受到大家的注目。柏杨到了台湾后，她也到了台湾，和一位军官结婚，住在台北县五股乡。他曾经到她家里看她，问她赵蓉的消息。赵蓉在大陆没有出来，周伦也不知道她的下落。等他重回大陆，仍怀念这段往事，可是，人海茫茫，不知道向谁问起。

柏杨在长沙住了不到一个月，发现气氛越来越紧，家家户户都关门闭窗。他们这一批年轻学生每天逛长沙市中心名胜天心阁，天心阁下一个动物园，游人也越来越少，动物开始挨饿，已经没有人喂它们了，不断发出凄凉的哀号。第二天，同学们忽然发现，有些大厦的柱子上，出现耀眼斗大的日文标语，他们虽然不认识日本字，但是知道不是汉奸干的，而是中国人向日本军人所作的心战喊话。这是一个不祥之兆，长沙显然要放弃了。就在那一天的黄昏，一辆吉普车把柏杨、范功勤，李森和刘湔尘四位同学，载到一栋房子里，中央团部临时办公室就设在那里，当时已凌乱不堪。组织处长康泽先生最亲信的秘书汤如炎先生，派柏杨当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直属豫北分团主任，其他三人都是干事。每个人又发了一笔钱，命他们立刻动身，从长沙南下，然后绕道回到已经被日本占领的豫北地区，展开工作。有趣的是，三十年后的六十年代，汤如炎在台北当立法委员，和另两位廖姓、王姓立法委员，竭力反对节育，竟主张把支持节育的柏杨阉掉。他则在杂文中称他们为“廖王汤”，以与专治妇科的“中将汤”媲美。

柏杨到今天都不知道选中他当主任是什么原因，另三位同学年龄都比他大，不过从此他就成了国民党干部。多少年后追思，这么潦草轻率地派遣，事实上并没有把他们当成什么干部，只是临时搭配，既没有教给他们求生的本领，也没有教给他们任何组织宣传的训练，就把他们送到日本占领军地区，像驱逐一群羔羊到狼群里一样，任凭他们自生自灭。

当时的战场情况，已经发生很大变化，国民党政府为了阻挠长驱南下的日军，炸毁黄河堤岸，一个人工的黄河决口，造成空前悲剧。就在郑州与开封之间的花园口，堤防破裂，像一个大坝的崩塌，几十层楼高的水势，奔腾而下，二十公里以外，都会听到吼声。洪水像千万条翻腾滚动的恐龙，沿着低洼地区，直奔东南方两百公里外的淮河。乡民被吼声从梦中惊起，大水已

当头灌入，吞没一个村庄像吞没一个蚁穴一样，无数中国人（没有人知道确实人数）被自己政府一个轻率的决策埋葬，开封城本来在黄河之南，竟一下子到了黄河以北（抗战胜利后，黄河再度改道，开封才再回到黄河以南）。他们四个人一行，冒冒然登程出发，当他们徒步离开长沙，沿着铁路南下时，看到国民党军队的增援部队正沿着铁路北上。到了易家湾，忽然间背后红光冲天，历史上有名的长沙大火，就在这时候冲入天际。可是，等到长沙变成一片焦土之后，日军距长沙至少还有二十公里。他们绕道新化，益阳，沙市、襄樊、南阳到第一战区长官司令部所在的洛阳。就在洛阳，他们脱下军服，换上便衣，四个人分别先行潜回各人的家乡，约定一个月后，再到当时唯一尚在国军手中的林县集合。

辗转跋涉，柏杨回到自从被百泉初中开除便再也没有回去过的辉县，投奔常村五叔郭学慈，这虽然是日军的占领区，但日军仅只集中驻扎县城，中国庞大得像一个大海，日本军事力量无法彻底控制，只靠一些愿意当外国走狗的汉奸——皇协军，维持治安。

## (12) 包办婚姻与传统丧礼

柏杨突然归来，使五叔和两位堂兄、堂嫂，大为欢喜和惊奇。他们第一天就把决定告诉柏杨，父亲曾经依据传统礼俗，在若干年前，为他定下亲事。她是县城南关的女儿，名叫艾绍荷，比他大三岁。他从来不知道有这门亲事，也从来没有人告诉过他，包括父亲。最初他有一种被侮辱的心情，提出反对，可是，五叔和整个家族（从二叔到九叔）坚决支持五叔的立场。唯一的姐姐也从她寡居的婆家山屯村，带着孤女赶到常村，哭哭啼啼的规劝，认为郭家是一个大家族，不能够做出这种丧尽天良的退婚行为。因为被退婚的女人被人嘲笑，一辈子都嫁不出去。他要求先到开封探望父亲，再到林县跟同学们会合，然后再回来结婚。大家仍然反对，姐姐尤其坚决。一般人认为他是一个非常坚强、顽固、永不顺服的人，实际上，有时候，他却不是这样的性格。他这一生有大多数的時候，都是放弃坚持己见，接受别人的支配，这一次的婚姻，就是一个例证。他一直惭愧这次对礼教的顺从，假设人生能够重来一遍的话，他绝不会犯同样的错误。有几回，他冲动得想趁半夜逃走，但因为抵不住姐姐的眼泪，没有逃成。于是在十九岁那一年，他结婚了，这是他第一次的婚姻，这次婚姻带给他终身歉疚，绍荷有旧式女子所有的美德，如果他能安于种田生活，他们会白头偕老。

但是，父亲在开封病危，他仓促赶到开封，看到的却只是一具棺木。父亲，这个乡下出生的知识分子，身跨两个王朝——大清帝国和中华民国，不能够抗拒当时官场文化的主流——鸦片和海洛因，终于家破人亡。父亲去世时五十七岁，因什么病致死，没有人告诉他。父亲以一个农家子弟，闯入复杂的城市世界，不久就被腐化，仍不得被淘汰出局，潦倒以终，把儿女们留给一个吸毒的妻子，那比留到虎口还可怕，虎还不吃子。临危时没有一句话嘱咐儿女，继母说，爸爸在死前只叫了一声“大爷”。“大爷”，是辉县本地人对父亲的称呼。就在棺木旁边，继母用香烟盒里的锡箔纸吸食海洛因。日本在它的占领区内，执行毒化政策，所以中国人吸毒是公开而合法的。柏杨暗中盘算，一块钱银元的代价，不过只能化作一缕青烟，那个消耗量，像恶魔的无底深洞，任何人都填不满。在把父亲灵柩运回辉县祖坟安葬前，继母特别为父亲举行一项“点主”大典，这是他又一次硬碰硬地向儒家的传统礼教屈服。

五十年后，直到九十年代，他才发现：中国人并不信神，而只信鬼。这项发现就是在三十年代这次点主大典上播下的种子。因为在中国社会，他从没有看到任何一项祭神大典有这样的隆重，也从没有看到任何一个比祖先更伟大、更尊严、更有权威的神。

“点主”大典是儒家学派如山如海的丧礼中，一个小得微不足道的仪式，但已使他兴起无法遏止的愤怒。“点主”是这样的，丧家用木板制成一个牌位，牌位上用毛笔写一行字，大概是“郭学忠之灵位”之类的文字。在郭字上端用毛笔写一个“王”字，而请一位地立地方上有名声有势力的绅士当点主官。请点主官并不容易，往往要送一笔可观的聘礼。于是他这个长子，就被搞得头昏脑胀。仅只跪的次数和跪的诡异，就万世不得其解。大概是这样的：

司仪官喊：“跪！”

他就跪下。

司仪官喊：“起！”

他就站起来。

司仪官又喊：“跪！”

他再跪下。

司仪官再喊：“一叩首！”

他就向灵柩叩一个头。

司仪官又叫：“起！”

他又站起来。

司仪官又叫：“跪！”

他再跪下。

司仪官又叫：“起！”

他又站起来。

司仪官又喊：“跪！”

他又跪下。

司仪官叫：“二叩首！”

他就叩头。

司仪官叫：“三叩首！”

他就再叩头。

司仪官叫：“起！”

他再起来。

这时候，他已浑身是汗，简直站不稳了。认为三叩首之后，总应该结束了吧！哪知道这才是第一波跪起循环的开始。

司仪官接着又喊：“起！”

他站起来。

司仪官又叫：“跪！”

他又跪下。

他除了跪跪起起外，无法阻止礼仪之邦这项传统的古老礼仪。对父亲的哀痛和尊敬，使柏杨对这项礼仪不敢有任何的反抗，只敢暗自在那里置疑，而且随着年龄增长。“跪”“起”了大概一个多小时以后，终于进入点主的高潮，点主这穿着长袍马褂，手拿一支新购买的毛笔，在盘子中沾满了猩红的朱砂，往牌位上“王”字上面，点上一点，成为一个“主”字。乐声与鞭炮声同时大作，拥挤不堪的“吊者”，也就跟着十分“大悦”。

点主大典不过是一个烦恼的焦点，使柏杨惊恐的还是继母。她不会忘记他殴打她的羞辱，从他到开封，直到祭典那一天，他常在她脸上看到微微翘起的左唇角。这时，父亲的一位好友于香圃先生救了他，于伯父是东北人，很多年前入关，一直追随他父亲做事。日军占领开封后，以东北人为主的占领军特务机关，也在开封建立。人不亲地亲，经过东北同乡的介绍，于伯父也进了那个单位，而且因住开封太久。得地利人和之便，官位很高。就在点主大典的前二天，于伯父头戴日军瓜皮帽，脚穿长筒马靴，腰挂东洋刀，带着两个同样装束。但从态度上可看出是比他的枪位低的军官，大踏脚步，走到灵堂，从口袋掏出一封信，双手捧着，放在父亲棺材前的供桌上，脱下军帽，深深一鞠躬，手扶军刀，大声喝道：

“大哥，小狮子是你前妻唯一的儿子，今天竟然有人陷害，揭发他是中央探马，要不是落在小弟之手，小狮子今天无命可逃。大哥！你对我恩重如

山，有小弟就有小狮子，不许有人害他一根毫毛，这封信是谁写的？大嫂’/他横眉怒目的转向继母，“是不是你写的？”

继母惊恐的回答：

“我不识字，怎么能写信？...”

于伯父转向柏杨：

“从今天开始，你晚上任在我家，日本人那里有我担当。...”

突然问，他拍着柏杨的肩膀，流下眼泪，说。

“小狮子，你的命真苦！于伯父在大家尊敬、震惊的眼光中，大踏步跨出大门，柏杨一直送他到十字路口。

“你快点离开开封，”于伯父叮咛他说，“灵柩后天就启程，我会派人送你到黄河沿/点主大典后的第三天、他护送父亲的灵柩，匆匆上路，返回祖籍辉县，于伯父亲自送出城门，这是柏杨最后一次看到他。后来，柏杨在书上常看到有人引用一句话。

“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

每一次，只要看到这十个字，他就想到于伯父。而且，再想到六年之后，抗战胜利，于伯父的下场，深深感到椎心悲痛，此生已无以为报。

父亲的灵柩放在两辆前后相连、人力挽动的架子车上，穿过干枯而满是细砂的黄河故道，再穿过京广铁路，历时三天两夜，终于运到祖坟。继母则跟其他弟妹，另坐火车回乡。就在父亲的棺柩冉冉垂下墓穴的时候，他才感到父亲真的是死了，永远不再回来。而自己是那么样的孤单，于是跪下来，用头撞地，放声大哭，呼唤：

“爸爸！”

这一声爸爸，突破了儒家礼教给他的另一种禁制，原来家中长辈一直警告他，当哭父的时候，不可以哭出声音，这是礼教上对一个君子人物最低的要求；只能唤“爹”，不可以叫“爸爸”，因为爸爸是洋式称呼，违背传统、正在幽冥路上前进的父亲幽魂，将听不到你的声音。他被吓坏了，不愿父亲一个人寂寞的走向幽冥，于是乎他声声哭爹，问题是这一辈子从来没有叫过一声爹。“爹”这个字引不起他一点父子亲情。

直到他忽然叫了一声爸爸，使他回复到真实的位置，于是，大雨倾盆般的伤心泪水，使他匍匐在墓穴旁，拦住父亲的棺木，不准放下。全族人从没有见过一个成年男子这么哭父母的，认为他显然的违反了礼教。

安葬父亲之后的第二天早上，一个东北口音的男子，进门拜访，把他拉到一旁，低声说：

“你快点逃走，于伯父挡不住，你妈不断在告，而且今天就走，一分钟也不要停。”

那人留下一叠储备券，仓促告辞，连一杯茶也不肯喝，而且不肯讲他的姓名和他的去处。柏杨仓皇进屋和绍荷道别，她一面为他整理包袱，一面哭泣，他又一次尝到生离死别，于是离开了辉县，一离开就是四十年。

四十年后，重返家园，绍荷早已再嫁，而且不久逝世。重拜父坟，往事历历。

### (13) 千里迢迢辗转重庆

他连夜北上，进入被称为“盘上”的山区，两天后赶到林县河涧镇，和范功勤、李森、刘滉尘会合，加速成立早就应该成立的三民主义青年团。豫北二十五县，这时只有林县仍由新五军据守，西边是太行山，那是共产党的大本营，北面则是共产党游击队。他找到一家民宅，挂起招牌，布置起了办公室，他们的顶头上司远在万里外的天边——重庆，他们没有经过任何专业训练，只是在珞珈山诗情画意地度过了一个美丽的夏令营生活。除了愿为英明的领袖而死以外，不知道要做什么，而他们的年龄如此之轻，他不过二十岁，其他人不过二十二三岁，现在却把组训青年、对抗日本和共产党的沉重任务，交在他们手上。他们不知道如何去办，中央团部也没有告诉他们如何去办，只是把一些油印的文件，千辛万苦地颁发下来，可怜他们这群年轻人，连公文都不会写。他们不过是被牺牲的棋子，中央团部潦草塞责，随随便便地派遣，表示又成了一个分团，如此而已。”要想混日子也不容易，那是瞬息之间千变万化的沦陷区后方，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果然，一天下午，河涧镇上的军队突然增加，马嘶声、人叫声，显出气氛有异寻常。一个消息说：“八路军已攻下林县县城。”抗战开始的时候，国共合作对日作战。共产党红军改编为第八路军，朱德当第八路军总司令（从此“八路”就是共产党红军的代名词，而且成为使国民党惊恐的代号。直到台湾光复，五十年代初期、台北市公共汽车，各路都有，独独没有八路）。抗战开始后，政府军在各战区纷纷溃败，幸亏祖先们留下来一个广袤的土地，使日本的皇军筋疲力尽。八路军在抗战时候，最有名的一次是平型关的百团大战，虽然没有百团，但确实是硬碰硬打了一仗。国民党最初把共产党称为“异党”，后来转变成为“匪党”，很多青年被枪毙，被活埋，被丢入黄河，到死都不知道他们触犯的是哪一方？和他们爱国到底犯了什么罪？黄昏以后，河涧镇一片寂静，家家闭门，不见灯光。国军开始向东撤退，林县距河涧大概十五公里，他们一行四人仓促的捡起行李，随着零零星星的残兵败将，也向东撤退，没有目标，不明情况，没有一个有关系的人可以探听消息，只知道随着大众，一步一步，摸索前进。不久，他们就进入另外一个山区，天上没有月亮（有月亮的话，也是被乌云遮住），万山丛中也没有灯火，也没有狗。山径是那样的狭窄而崎岖，有时候，旁边就是悬崖，栽下去是不可避免的粉身碎骨。大概午夜过后，他们走到一块狭小的梯田，在上面疲倦不堪地睡去。第二天继续逃亡，饥饿干渴交集，站在山头，看到前面山麓有一个村落，而且听到鸡鸣，他们兴奋地顺着山径而下，结果，近在眼前的村落，足足走了十四个小时，天黑了以后才狼狈地走到。村头一个农家全部财产只有一只鸡，但是不肯卖，多少钱都不肯卖，最后才勉强用高价卖给他们四个窝窝头。窝窝头有拳头那么大，他饿火中烧，抓过来，张开大口，一下子几乎咬掉一半，正要咀嚼的时候，只听见一种微小的奇异响声、口中忽然间塞满了细砂，一粒一粒的细砂，像当时跳远坑里用的那种细砂，过度用力的牙齿，使细砂发出怪响。他大叫一声，喷了出来。那不是真正的细砂，而是窝窝头被咬碎了的颗粒，无论是味道和硬度，都和真砂没有分别。其他三个人没敢张口，而干瘪的山民夫妇被他的动作吓住了，他最初是愤怒，大叫“这怎么能吃？这不是人吃的！”

刹那间，他万分羞愧，为自己这种身不由主的反射动作羞愧，“那不是

人吃的”，难道山民夫妇不是人吗？他这一生做了很多冒犯别人尊严的事，这是其中之一。多少年之后，读到元曲赵五娘的悲惨歌声：

“这糠哦，与米一处飞！”

他那一次吃的，就是使赵五娘流下眼泪的糠。北方农家穷苦，连黍米（小米）的壳都不敢抛弃，碾成粉末后，就叫做糠，蒸成中空的馒头模样，就叫窝窝头。柏杨幼年虽然吃尽了苦，也仅是没有肉吃，没有白面吃而已，在这次逃亡途中，才第一次吃到绝对难以下咽的糠，这件事情使他终生难忘。

“中国人竟这么彻底贫穷！”

他开始怀疑：中华民族是不是一个优秀的民族？如果是一个优秀的民族，为什么到了二十世纪，农民还在吃糠？他们一直逃到一个不知名的村落，忽然间遇到流亡的安阳县政府，才知道他们已经离开了林县，进入安阳县境。就在安阳县政府，见到主任秘书韩彬如先生，他拿出中央团部的电报，要接管豫北分团，并命他们四个人前往洛阳报到。这又是一个突变，但也使他们如释重负，因为他们自知年纪太轻了，不足以担负这项重任。

“你看，”韩彬如说，“做团务工作，要社会关系，像我接管之后，到什么地方去，想要几匹马，县政府就会拨给我几匹马。你们怎么能行？”

就在这不知名的安阳县万山丛中，他们一行四人，摸向洛阳。再往东走就进入日本皇军占领区，刚走到安阳县第一大镇鹤壁镇南方五六公里的地方，就遇上了麻烦，四五个手提长枪、农民装扮的壮汉，拦住去路。

“站住！我们是八路军，你们是什么单位？”

他们四人操外地的口音，无法拒绝回答这个问题，只好说：

“我们做小生意。”

他们开始搜身，在口袋中掏出仅剩下的几张钞票。

“我知道你们不是做生意的，一看就知道你们四个是坏蛋，”其中一个人大笑说，“看你们的票子，就知道你们是中央军。”

他们支支吾吾分辩不是中央军，只是卖布的小贩。

“你身上用中央银行的钞票，当然是中央军。对你们实话实讲，俺可是鹤壁镇的皇协军，现在有两条路由你们选。”他表示愿意选。“一是跟我们一块到鹤壁镇去见日本人，二是把中央军的钞票留下，放你们一条生路。”他们一行当然愿意接受放一条生路的条件。他们选择了第二项，终于渡过黄河，到了洛阳。



## (14) 防空洞巧遇蒋中正

到洛阳后，柏杨被派到偃师县分团当干事，“主任”的官衔没有了，对有些人而言，这或许是一个打击，但他在官场上有迟钝的一面，对于这项贬职，无动于衷，真的认为，一个革命青年不应该计较任何名分。不过，不久他从内心里开始改变，这改变虽不能使他重视官位，但却发现上进的重要，人生最大最新的诱惑，在引导着他踉跄迈步。

那时候，战时陪都重庆，有一个中央训练团。这是国民党培养干部的基地，分别从全国各地选拔党、政、军优秀干部，到重庆参加有时是一个月、有时是三个月的中央训练团，使他们能和中央高级官员亲近，产生一种敬畏的向心力，他不久就被保送受训。坐火车到宝鸡（就是秦穆公发现神鸡的地方），在宝鸡转乘四天路程的长途汽车，到达重庆。

重庆这个战时首都，街道像旧金山一样，高高低低，一年之中，约有六个月的漫长时间，大雾迷漫，对健康非常不利。可是，抗战初期，用雷达投掷炸弹的设备还没有发明，全靠飞行员的目击，所以雾季反而成了这个山城的保护网，至少六个月内，不会发生空袭。而另外六个月的晴朗天气，则是“跑警报”季节。家家户户都有一个防空袋，里面装着一天的民生必要用品，机关职员甚至于还带着必须处理的公文。每天早上都先仰望山头挂的警报风球，当出现一个球时，表示日本飞机已从武汉机场起飞；当出现二个球时，表示日机已进入四川省境；当出现三个球时，表示日机已接近重庆，或已在重庆上空。往往，太阳还没有出山，一个球已行升起，空袭警报发出像受伤的野狼一样的那种哀号，然后，全城的人都逃出家门，奔向附近的防空壕洞。重庆建筑在山脊两侧，所以防空壕洞既普遍而又坚硬，从来没有发生被炸塌的事情。

可是，就在柏杨去的那年六月，碰上大隧道惨案。大隧道是指重庆山脊唯一的一条防空洞，几乎是把山掏空，从西方的入口到东方的出口，长度大约有好几公里，每隔一段距离，开一个洞门，供民众进出。惨案发生的那天，日本飞机从上午即行轰炸，全城在隆隆巨响之下发抖，那时候的中国，已经没有空防的能力，日军有时候只保持一架轰炸机或战斗机在上空盘旋，就足以使山城变成死城。大隧道中既潮湿，空气又不流通，避难的人又拥挤不堪，干渴饥饿，空气不足，每一个洞口都放下栅栏，加上铁锁，防止市民在空袭期间到街上乱跑，引起日机的投弹和扫射。到了下午时分，隧道里的男女发出呼号，要求出来。可是，把守洞口的士兵没有一个人动心。等到晚上，日机离去时，已经没有几个人能活着出来了。这是中国防空史上一个最大的耻辱，事后好像只把卫戍司令刘峙免职。刘峙是国民政府中有名的饭桶将军，他除了拍马逢迎外，什么都不会。惨案虽然使他去职，但依照传统官场文化，他不久就另外发表新职，而且是升了官。

最感荣耀的一件事，是和蒋中正曾躲在同一个防空洞。那次空袭，发生在上午十时，中央训练团在重庆浮图关下，警报响时，他们被带进一个庞大无比的半隧道之中，那就是说，三面都是天然岩石，侧面开向山谷，面积足有几十个足球场那么大。当他们在所携带的小凳子上坐定以后，看到蒋中正正在护卫之下也走进来，洞的深处摆了张大桌子，桌子旁有一张藤椅，他就在那藤椅上坐下，卫士们四周站立。不久，轰炸开始，大家可以听到远远的重庆市区的爆炸声。柏杨忽然想到，如果这次把蒋中正炸死，历史上不知道怎

么样描述这一幕，又怎么描述他们这些陪死的无名小卒。

中央训练团使学员产生向心力，蒋中正把他的照片送给每一个学员，而且亲自一一点名。送给学员的照片，确实使人动容，最高领袖权势大到没有极限的时代，家里如果挂一张蒋中正签名盖章的照片（当然是别人代签代盖），不但是一种光荣，也多少有一点保护作用，使一些小头小脸的牛鬼蛇神有所顾忌。至于点名，那就跟普通军队里、学校里的点名一样，蒋中正拿着十行纸写出的名册，然后一一呼叫。

“张三同志！”

“李四同志！”

张三、李四就立正、举起右手，高声答应：

“有！”

然后，蒋中正就往张三、李四脸上、身上，打量一两秒钟，在名册上用红笔点上一点，或打一个勾。那些来自低层的干部，没有比这时候跟英明领袖更亲近了，这种点名方法比赠送照片，更能使人产生预期的效果。有一次，一个在陕西工作的同学，在吃饭的时候还在喜不自胜的呢喃着说：

“点名之后，领袖对我有了印象。”

突然之间，柏杨反应说：

“放心吧，领袖对你不会有印象，点名是叫你对领袖有印象。”

一句话说完，全桌同学都呆住了。有的人急忙把筷子放下，好像大祸就要临头，柏杨也察觉到自己的失言。这时候同桌上一位官阶上校的分队长，用筷子做个手势，叫大家继续吃饭。然后，莞尔一笑，对他说：

“你的嘴太快了，已快到足可以断送自己的地步。”

柏杨只是想一语点破那位同学的冥顽，全没有想到它的危险性。他赶紧低下头，以这位分队长的话作为勉励，立志不再多嘴。可惜，他是一个没有福气的人，个性使他不吐不快。后来，遇事不但仍然说出来，更糟糕的是，甚至还用笔写出来。

## (15) 买假证件再度被开除

在重庆一个月的期间，柏杨的思想发生急剧变化，柏杨回忆到长沙大火之夜，有一个年纪比他大将近十岁的同学，是一个大学毕业生，当中央团部秘书汤如炎询问他愿不愿意到沦陷区工作时，他坚决表示希望留在中央团部工作，柏杨暗中讥笑他是一个懦夫和老奸巨猾。这次，柏杨到了中央，才发现世界之大，不是他这个地方性的小干部所可以想象的。那位自请留在中央团部工作的同学，因为有好的资历，已经当了组织处的一个组的副组长，手握全国工作干部的升迁调补，趾高气扬，已没有一点同学的情谊。而其他珞珈山的同学中，也有六七位被中央团部保送到复旦大学（重庆）、四川大学（成都）、武汉大学（乐山）。他们一个个神采奕奕，一旦大学毕业，就跟八十年代一旦取得博士学位一样，前途如锦。而柏杨不过是一个高中二年级肄业的地方性土包子小干部，他发现当初长官们勉励他们献身革命、不必继续读书的训话（国民革命就是大学），是一种诈欺。这使他改变志向，一定要上大学，即便是上一天大学，只要履历表上学历栏可以写上“大学肄业”，也比“高中肄业”体面。

在没有离开重庆前的那几天，他疯狂地寻觅上大学的路径，终于发现根本不可能，因为他没有高中毕业或高中二年级肄业期满的证件，而且，即令有，中央团部也不可能无缘无故保送千里外的一个低级地方干部。

绝望地回到偃师，觉得眼前一片漆黑，不甘心这样被低学历所吞没，所以他继续不断地解决他的困难，决定参加明年“西北区大专院校联合招考”。于是，他重新收拾起那残破不堪的功课，故技重施，再演习一遍几何，再背一篇英文作文。刻苦到连晚上睡觉，都不停地自言自语。其次，他要找一个假证件报名。一个朋友把他辗转介绍到洛阳城南五公里，一个村子里的朋友，可以给他一张证件，只要花五块钱银元就可以了。他千难万难地凑了五块银元，到了月底取件的那一天，拿着银元徒步前往，一路上心跳不断加速，这是决定他一生前途的一张纸。他不知道是哪个学校，也不知道能不能买到手，万一对方没有呢？那怎么办？他从来没有这样焦虑过。原野上行人很少，小径旁边就有一座小小的土地神庙，他站在庙前，用最虔敬的心情祈祷：

“请你保佑，给我一张证件吧！”

他买到的证件是一张甘肃省立天水中学二年级肄业期满证书。甘肃在那里？天水在那里？都远在西疆天边，已经管不了那么多，他就用这个证件，参加西北区大专联考。

考过之后，静等着放榜，这是人生最难度的一刻。他坐卧不安，吃不下饭，而且一想到不被录取后的日子，就一阵阵的晕眩。

就在发榜的前一天，信步走到一个市场，看见一间小屋里有一位算命先生，他不安的走进去，问说：

“先生，考学校事可以问吗？”

那位盲卜师声如宏钟的说：

“可以。”

他缴过钱，摇过六爻课。盲卜师根据他正面（字）、反面（闷）的口述，仔细推敲，然后说：

“考什么学校？”

“我参加西北区大专联考，不知道能不能考取？”

“可以考取，”盲卜师用扇子敲着桌面说，“不过，得靠后了！”

他狂喜的跳出来，又回头问一声：

“你的卦准吗？”

“当然准！”盲卜师严肃的说，“不准，砸我的摊子。”

他从盲卜师的自信，也感染到了自信。可是，出门走了几步，又恢复了茫然。算卦到底是算卦，万一考不取，砸了摊子又有什么用？又像个泄气的皮球，站也不是，坐也不是。

第二天，他前去看榜，发现他被分发到省立甘肃学院（若干年后改为国立兰州大学）法律系。他当然高兴，但也若有所失，再想不到盲卜师的“得靠后面”指的是学校名次，不是指个人名次。西北共有九个院校，国立西北大学、国立河南大学、国立西北农学院……而甘肃学院是所有院校中最末尾的一个。兰州在西部一千多公里以外，那时候还没有铁路可通，坐长途汽车要整整

四天。但他没有选择的余地，决定抛弃一切、西奔前程。

他到了甘肃学院，就在办理注册登记时、注册组一位组员翻看他的文件，露出浓厚的困惑眼神，问他说：

“你在天水中学念过书吗？”

“念过！”但他心跳起来。

“民国二十八年有二年级吗？”他沉吟说。

“有。”他开始浑身发毛。

那组员继续沉吟说：

“我是天水中学毕业的学生，仿佛那一年还没有二年级。”

“有。”他舌头都硬了。

“好吧！等我查查看。”

很明显的，假证件已露出破绽，他把行李提到宿舍，坐在那里发怔。这挫折是他不能克服的，只有被开除的份。但同时他也在安慰自己那事最快也要到一年以后才能查出来，一年时间，又该有多少的变化？他为读书受了很多折磨，开封高中的往事，又重现面前，他无心听课，也无心游玩，日坐愁城。

第二年的夏天，同学们纷纷离开，各返乡。柏杨假证件被拆穿的时间，一天一天的逼近。有一天在街上闲荡，忽然遇到几位百泉初中的同学：袁凤鸣、朱好仁、尚均（就是揍他一拳的家伙），他们这时候都在辘重兵团当驾驶兵。袁凤鸣高高在上当连长，每人开一辆大卡车，好不威风。他们运送新兵到新疆，归途再到玉门油矿运汽油回来，要他一块兜风。他连宿舍都没有回就跟他们出发了，他希望深入新疆，永远不再回来，永远不再受证件的压迫。

这是他第一次进入河西走廊，这个在唐王朝时还是一个黄金地带，宋王朝以后，却一直残破到今天。“大西北！建设大西北！”多么伟大的号召，可是这个西北却一片贫穷。山丹县一带，他发现中国人最最贫穷的一面，比河南省安阳县山区吃糠的山民更要贫穷。白天时候，全家人（包括十七八岁的大姑娘），几乎赤身裸体地蹲在土坑上，身上披着已变成黑漆漆、全部打结的老羊皮，全家只有一条裤子，谁出门谁穿，回来后折叠好放在床头，这就是世界上五大强国之一的中国农民生活。有些司机看到这种情形，大笑大叫。他心中感到的却是绞痛，和无限羞愧。

他最后没有去成新疆，因为新兵到了酒泉就另外有车运送，辎重兵团的车队直接前往玉门油矿去装载汽油，他当然随着前往，目睹到当时中国唯一的油矿。他不能用科学术语介绍这个油矿，他是一个科学白痴。似乎是纪元前八世纪时候，在那万座荒山之中，有一座老君庙（祭祀太上老君，也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哲学家李耳先生），老君庙背后有一个小小的水潭，比一口井大不了多少，水色乌黑，水质粘得像稀稀的浆糊，居民们常跋涉几十里路之遥，带一桶回去，家有病人或晚上孩子拉屎时，就用破布沾一点桶中的潭水，用“取灯”（穷苦人家用的土制的火柴）把它点燃，火光可以支持半个小时以上，当地人视为神明。

这座水潭就是冒出地面的原油，就在玉门县西南二十公里的万山丛中。原油随时都会从地下渗透出来，中国人忙于做官和内战，没有人理会这个天然资源。直到抗战前不久，经济部资源委员会才成立玉门油矿局，正式开采。在轻轻一碰，原油就大量流出的情况下，油矿局没有那么多炼油设备，只好把它们输导到山谷，两头堵住，经过一两个月，原油就蒸发得所剩无几了。

不过，柏杨不久就不为国家大量损失原油忧心，而为自己忧心了。油矿里连一个饭铺都没有，只好靠从新疆进口的青色葡萄干度日，结果大量呕吐酸水，饿得奄奄一息。等到随车队回到兰州，一走进校门，就被一个同学抓住，附在他耳朵上悄悄说：

“ 你被开除了！ ”

该来的终于来了，是那个天水中学假证件害了他。

“ 学校可能已通知了警察局， ” 那位同学说， “ 你要小心！ ”

他溜进学校，回到寝室，甘肃学院位于清王朝“贡院”旧址，每一个学生都有一间宿舍，所以没有惊动任何人，悄悄地背起行李，溜出大门。千辛万苦远奔边陲，读大学的梦，就这样的破灭。大学！你的大门怎这么难进！他庆幸有这一趟玉门之行，得以悄悄的脱身，否则的话，可能会被叫到教务处，指控伪造文书。他找一个小客栈住下，躺在床上，仰望着天花板，不明白洛阳南庄那位朋友，为什么卖给他一个这么容易辨识的假证件，他想哭，但哭不出来，一生，有很多次这样的遭遇，想哭一场的时候却没有眼泪。

感谢苍天，正当他想要投奔辎重兵车队、去当司机的时候（这是当时唯一的一条活路，不然他会饿死在兰州），忽然想起来，他在飞机场检查站有位相识不久的朋友，于是去找他，哭丧着脸问他能不能给一个工作。他盘问详情，然后忽然说：

“ 你拿我批的单子去买飞机票，我送你到重庆。 ”

这句话，柏杨听了两遍之后，才相信不是拿他开心。抗战时期，飞机的班次和座位都有限，能不能搭上飞机，全看机场安全人员能不能批准搭机申请。所以，一个没有人事关系的官员，即令你是部长，候机十天半月也是非常平常的事，而他一个穷学生，居然可以顺利地买票飞到重庆，简直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不可思议的事。他就把准备应变的钱，买了一张机票，直到上了飞机，他才相信这是真的。

这位朋友，名叫张辛伍，江西人。十年之后，国民党军队完全崩溃，柏杨在上海遇到了落魄的他，请他随自己一同上登陆艇，一起到了台湾。

柏杨飞到重庆，举目无亲，在中央团部做事的“青干班”同学，又都陌生，无人可以投奔，就在两路口上清寺一带徘徊又徘徊。两路口有一个中央团部消费合作社，就在合作社门前，遇到了正下班出门的女职员崔秀英。她

听柏杨问路的口音，晓得是她同乡，就把他带进合作社，介绍给她那些同事，住了一晚。第二天，柏杨坐驿马车到沙坪坝，找到百泉初中同学买枢运（买，是一个奇怪的姓，他信回教，可能是阿拉伯人的后裔），那时读中央大学地质系。在百泉初中读书时，柏杨因买枢运的功课太好而揍过他，但并不能把他的功课揍坏，现在，买枢运上了中央大学，柏杨却是一个被开除的流浪汉。

那时候，中央大学挤满了来自全国各省各大都市的考生，真可称之为满山满谷，买枢运就把他安置在一间破教室里，睡在一块黑板上。教室里另外还挤着五六个本省同学，一口四川话，他似懂非懂。

在甘肃学院时，柏杨就跟迁到河南省内乡县的母校——开封高中——当初允许他不拿证件就投考的王伦青老师，取得联络。王老师天大的恩典，给他寄了一份开封高中二年级肄业期满证件（严格的说，这是一个伪造的真证件，因为他只在二年级读了几个月）。他本准备一旦天水中学案件爆发，就拿这个证件接替，这当然是个白痴的想法。可是，现在用得着了，他用同等学力报考中央大学。

如果他能考取中央大学，整个人生会完全改变，因为这次证件是真的。可是，他当然考不取，就凭那两道几何，和一篇英文作文，以及临时加工的生物学，竟想考取当时全国第一流的最高学府，简直连自己都笑出声音，不过他确实全力以赴。

考试那一天，几何没有问题，两道全答对了。英文作文题目是 University，看了之后，心口凉成一团，什么是 University？University 是什么？他根本不认识这个字，猜都无法猜，那一次，他背了三篇英文，不知道用那一篇才好，就只好硬着头皮随便找一篇抄上。

下课后，遇到也是百泉初中同学前来投考的朱光弼，而下一节是生物，柏杨问他：

“你可知道孟德尔三定律？”

“什么是孟德尔三定律？”朱光弼瞪大眼睛问。

“你连孟德尔定律都不知道，还考什么大学？”

“混蛋，快教给我！”

就在短短的几分钟之内，他告诉朱光弼孟德尔三定律。结果下一节生物课考试时，果然出孟德尔三定律。朱光弼并不靠这孟德尔三定律而考取，但是，他稍后确实考取了当时全国最好的、设于昆明的西南联大，柏杨却名落孙山。垂头丧气地搬出中央大学，大梦又醒了一个。他在这万般落寞中，和崔秀英发生了感情，仿效当时最流行的办法，他们在两路口租了一个房子同居。

## (16) 不读大学心不死

俗话说：“不到黄河心不死。”柏杨上大学的心，早已到了黄河，但他的心仍然不死。一面找工作，一面准备明年再参加西南各院校大专联考。人生有很多难以预料的际遇，神差鬼使，他的一个长辈在设于青木关的教育部战区学生招致委员会当主任委员，柏杨去找他，他把柏杨安置在设于重庆市两路口川东师范旧址的该会“重庆登记处”，当一名小职员。那一年，他已二十五岁，既看不到未来，也不敢回想过去。然而，一个机会像闪电一样的出现。

青木关距重庆大概五十公里，从四面八方沦陷区逃到重庆的流亡学生，早已筋疲力尽，所以招致委员会特地在川东师范旧址设立登记处，由岑文华先生当主任，另外有两个干事作为助理，他就是其中之一。沦陷区学生前来登记时要填具表格，写明原来的学校、科系、年级等等。根据带来的证件，由登记处主任在调查表上签注意见，转报也设在青木关的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再分发到各大学继续就读。有时候，没有证件或证件不全的学生，由岑主任口试盘问后，略微可信，就在调查表上加签“考核属实”。有时候，岑主任不在，柏杨就代他签注意见，而且签出自己的大名，教育部也不问究竟，一律分发。这样持续了几个月后，一个奇异的灵感突然进入他的脑海。他跳起来说：

“我为什么不能够分发自己？”

不过，有一个难题，他不能用郭立邦的名字登记，这么一个小小的困难，竟困扰了他两三个月之久。最后，一个从南京逃出的学生前来登记，他是汪精卫政府中央大学政治系肄业三年期满的学生，具有全部的成绩单，货真价实的证件，柏杨如获至宝。尤其，那个学生的名字几乎使柏杨跳起来，他叫郭大同，柏杨去照相馆把郭大同的证件翻照下来，再把原件改成郭衣洞（也只能改成郭衣洞，没有第二种改法），再拍下照片。先把郭大同照相的文件签注意见报上去，过了两三个月，估计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已经分发，然后请朋友用郭衣洞的名字填写一份登记表，再由他签注这样的考核：

“经严格盘问考察，该生确系为中央大学政治系三年级肄业期满学生，建议分发同级学校。郭立邦。”

至于照片，柏杨签上“后补”，以后当然也没有补，这种例子太多，教育部从不追查。

寄往青木关教育部后，每天数着日子。普通情形下，不到两个月，学生本人就可以接到分发令，可是两个半月后，仍没有消息。于是，那一天，他向同事借了一套整齐的中山装，把钉有补钉的皮鞋（这是抗战时最常见的装束），擦得发亮，搭巴士前往青木关。他到教育部高等教育司，代表岑文华主任，前去查询沦陷区学生郭衣洞的分发事宜。高等教育司一位官员接见，对他的辛苦及负责精神，十分嘉许。查卷后，告诉他，郭衣洞已被分发到国立东北大学，要他回去安慰那位从南京流亡到重庆的可怜大学生，通知书日内即行寄出。

这真是一个叫人难以置信的好消息，他喜孜孜的回到重庆。屈指计算，距他上次参加联考，已经一年了。这一年中，日本对重庆的大轰炸，已迹近停止，生活的平静，尤其是他与崔秀英同居，又结交了很多朋友。那时，每个人都觉得自己的前途辉煌，他感觉到比他们任何一位都更好。他还不

布他又成为大学生了，唯恐怕是一场空欢喜，但经旁敲侧击的打听，才发现，本设立在万里之外、辽宁省沈阳市的东北大学，于九一八事变后（他那时候正读小学二年级）辗转迁移，现在设在四川省的三台县，在重庆北方三百公里，从重庆如果沿着涪江而上，可以抵达三台城下。不久，教育部的分发令寄到，柏杨向岑主任辞职，说了一大堆谎言之后，岑主任脸上露出慈祥和关切的笑容，说：

“你搞的鬼我全知道，快上学去吧！”

他身子忽然发抖，他这个无母的孤儿，到了后来，有人夸奖说他无所畏惧，其实不然，他最畏惧的是：加到他身上的恩惠或温暖。岑主任像父兄一样的恩情，使他永记。三十年后，他们在台北重逢，岑主任经营一家水泥公司，他那稍后结婚的夫人，在巴西驻华大使馆当主任秘书，那个时候前往巴西的移民，有很多都由柏杨担保。

他这一生一直不遗余力地鼓励和帮助年轻人在国内或出国读书升学，一方面知道求学的艰难，一方面也是深受岑文华的感召。

崔秀英和朋友们送他在两路口搭巴士，前往三台。东北大学设在三台县文庙，他这时候第一次使用郭衣洞的名字，谨记着当初从郭定生成改成郭立邦时，几乎忘记自己是谁的往事，一路上，就一直念着这个新名字，而且很懊恼把“同”字改成“洞”字，而没有改成“桐”字，可是已无法挽救了。东北大学是一个以收容东北流亡学生为主的大学，他到教务处报到时，教务长亲自向他问话，一面拿出他的照相证件，翻来覆去看，他开始流汗，害怕提出问题，包括：“中央大学在南京什么地方？”“政治系主任是谁？”幸好，教务长没有问这些，但却问了另外一个致命问题，使他几乎立刻被驱出大门。教务长说：

“你已经学了三年，日文怎么样？”

犹如五雷轰顶，他呆了一呆，小聪明救了命，说：

“我在南京加入三民主义青年团，整天做地下工作，谁去学鬼日本话？”

教务长莞尔笑了笑，挥挥手叫他出去说：

“快去宿舍报到吧！我们还要编级考试。”

他心里在唱歌，找到宿舍，大概等待了一个多星期，教育部分发的插班生，以及其他学校自动转来的插班生，大约有二十几人，在一间教室里，举行甄别考试，这是他第一次面对着没有英文及算术的考试，胆量大了很多。虽然政治系一、二、三年级所有的功课，他都没有读过，他也不怕。他对“政治系”下了一个定义：那是一个识字不识字都可以读的系！而且，自己是从南京来的沦陷区流亡学生，深受政府关注，只能降级，不能开除，因而有恃无恐。又是一个星期，布告栏里贴出甄试结果，他被编到政治系三年级就读。人生真是奇妙，他这个在大学只读过一年级的学生，现在合法的成为三年级的学生，二年级是一个空白，他对不能够进四年级，一丝一毫没有抱怨，三年级对他而言，已是一个大号的惊喜。

教育部那个科员，怎么会把他分发东北大学，而没有分发设在重庆的中央大学、重庆大学，或设在成都的四川大学、华西大学，以及设在乐山的武汉大学，而分发设在三台的东北大学，根据什么理由？没有人知道。但是，有一件事非常明显，办公桌上一个无心的作业，往往使人的命运产生基本变化，假定他不读东北大学，以后发展的轨道，可能不会走向台湾。

就在三台，柏杨幸福而满足地过着大学生生活，天渐渐入冬，四川的冬



天绝不是没有棉衣就可以度过的，而流亡学生却没有棉衣。那时候，基督教会在三台设立一个学生公社，准备了很多灰色粗布棉大衣，借给最贫苦的学生，他在穷的程度上是目共睹的，所以他也借到了一件。但他却吸上了烟，成了难以负荷的最大开支。那时候买烟，不是一包一包的买，而是一支一支的买，有一个景象常在学校对面小铺出现，他几乎每天都要去一趟，把一张揉着的钞票放在桌上，举起食指，大言不惭的说：

“司令牌，一支。”

然后带着一支司令牌纸烟，回到学校，在大庭广众中吸起来，十分得意。

入学不久之后，学校突然发生罢课，到底为什么罢课？真正主要的原因，当时并不知道，现在也不知道，只记得其中有一条标语是：“力争粪费”。以他的性格，应该非常赞成罢课才对，而且罢得越久越好，最好一罢两年，当罢课结束之日，也就是毕业之时。不过，他是千辛万苦才进大学之门的，了解到读大学之不易，和大学生涯的可贵，认为能读大学是一种福份，不应糟蹋，而应珍惜，所以他并不支持罢课。每天到大街上游荡，只在心中暗暗希望罢课早日结束。

罢课终于结束，对他没有任何影响。但他却从“力争粪费”这项活动，发现一个战乱不断、而又落后贫困的社会众生的深层现象。东北大学全校男学生只有一个厕所（女生宿舍当然另有女生厕所），男生宿舍走到男生厕所，最快要五分钟，这是一个漫长的距离，白天还好，每一个人都有憋尿的能力，可是到了夜晚，寒风袭骨，爬出了被窝，要走五分钟，才能摸到（那时候还没有电灯），简直是一种苦刑。同学们于是索性来个不顾一切的大解放，出了寝室门，就在院子里小便。冬天结冰时，院子里冰块高高的堆起，全是尿液冻成，夏天则是一片腥骚，简直不像是一个大学，而像一个庞大的鸡窝。远在男厕所的粪便，因为有那么多生产者，所以每隔几天，就要被掏一空，卖给当地农民作为堆肥。

教育部每个月都发给学生代金，注明是国家借给学生的学费，将来毕业后要分期偿还。代金数目已不记得了，每月都在增加，可是物价飞涨，代金不够伙食费。那时候就流行一种“见饭愁”症候，八人一桌，四菜一汤，汤只是一碗咸水，四个菜没有一个可以下咽。偶尔有一盘花生米，立刻被抢一空，以致大家不得不立出来一个互相遵守的公约，就是：“只可骑马，不可坐轿。”骑马是用筷子夹一粒花生米，坐轿是把筷子横下来，可以一次铲起两粒、三粒。在这种情形下，同学们唯一的希望，寄托在出卖粪便的堆肥费上。伙食是半个月一期，每月十五日 and 每月三十日，中午和晚上都可以吃到一顿肉（最丰富的是晚饭，大概每人可以吃到一大块），所以，力争粪费成为罢课运动的动力。然而，沦陷区学生饥肠辘辘，平常没有一点脂肪，突然一次吃下大量的肥肉和猪油，肠胃不能适应，往往泻肚。他上铺就有一位同学（那时候十个人一个房间，五张床，都是上下铺），每一次都逃不过此劫，而且一晚上拉两三次之多，柏杨劝他以后加菜时少吃点吧！

“不，”他正色说，“拉死也得吃！”

东北大学学生分为两大族群，一是本省同学，来自四川全省；二是外省同学，来自全国其他各省。外省同学差不多都是流亡学生，本省同学都是有家有室，生活富裕，他们不会跟着外省同学吃相同的饭菜，于是另组伙食团，最大的不同有两点：一是早上吃干饭（外省同学早上吃稀饭），二是每顿都有肉，这使他回到百泉初中时那种白菜团和萝卜团的时代。不过他已没有初

中时候那种哀怨，只有一种惊讶，就是无论本省与外省同学，对于这种明显的贫富差别待遇，竟然都无动于衷，认为是天经地义。

食色性也，男女同学间最容易恋爱。不过，那时候男同学有女同学的八倍之多（其他各大学大概也是这个样子），一直使女同学的身价居高不下，外省同学因为穷得出奇，也就先天地屈于下风。那时候三台没有其他娱乐，东北大学学生唯一可做的一件事，就是晚饭后，到县城狭窄的街道上压马路。偶尔有男同学邀得女同学并肩而行，立刻成为天大的新闻。本省同学衣服穿着比较华丽，而且出手阔绰，和女同学压马路之余，还可以请她到小馆吃一碗猪肝面，而外省同学则攒钱攒上一个月也不见得能请得起，所以，外省同学纷纷大败。不过也有一些东北籍的女生，宁愿跟同族群的同乡男生搞在一起。

恋爱事件都很平常，没有造成特别风波，只有一件事，发生在柏杨入学的次年。一对平常形影不离、几乎已被肯定成为夫妇的毕业班同学，那一年发生变化。因为他们高一班，柏杨入学的的时间又太短，并不知道内情。直到事情发生的时候，他被一个同学叫住，用惊恐的声音吩咐说：

“快去车站，找到张素娥，告诉她韦真翰自杀了，要她无论如何回来。”

柏杨向南门外跑去，看到张素娥正提着行李在那里等车。他把话告诉她，认为她一定会跟着他回校。出乎意料之外的是，她并没有，最初一脸惊愕，接着变成不耐烦的神色，说：

“车子马上就到了，这班车不走，今天就再没有到成都的班车了。”

这回答大出柏杨意外，他有点冒火，几乎要把她拖回来，但仍勉强忍住，大声说：

“你们是情人啊！”

张素娥犹豫了一下，把行李交给他，随他走回学校，一路上，没有说一句话，他把她送到韦真翰的寝室，里面挤满了人。有人开始欢呼，安慰病人说：

“你发什么傻，张素娥不是回来了吗？你们自己面对面谈谈吧！”

大家陆续散去，柏杨看到张素娥进入宿舍，用手把门关上。他也回到宿舍，觉得自己是个侠义之士，做对了一件事。

可是，到了第二天中午吃饭时，听到消息，张素娥和韦真翰过了一个晚上之后，第二天仍悄悄地走了，一些男生开始咒骂那个女生是贱货，不要脸。柏杨最初也跟着咒骂，可是柏杨觉得很不对劲，忽然想起来，张素娥这样做定有她的原因，男女两个人发生肉体关系并不等于跟对方写下了保证书，她为什么不能离开他？只要她想离开，她就有权离开。女人和男人睡一觉，就等于是签下卖身契，万世不能翻身，这是古老的男人压制女人的手段，在二十世纪大学生脑筋里居然存在，使柏杨大为惊惶。可是当有一天，他在饭桌上提出这个看法的时候，大家攻击他是个异端、伤风败俗。但他发现他的思想，从文化到政治，在不断蜕变。

这种备受攻击的情形，使他想起中央大学的买枢运。那年暑假，柏杨和三四个四川籍的应考生，挤在一个破教室里，买枢运告诉柏杨，那三四个应考生是他的家教学生，对他十分厚待，每天都给他买两瓶牛奶和两块面包，买枢运也用心的教。三四位应考生十分感动，友誓说，即令他们考不取，也要继续供应老师牛奶和面包，直到老师毕业，柏杨听了后，忍了住讥笑说：

“做你的春梦！”

“力什么？”买枢运说。

“这话连孩子都骗不了，”他说，“不过是目前有求于你，一时甜言蜜语。你跟他们非亲非故，不要说他们考不取大学，即令考取大学，也不会再理你。”

买枢运脸色大变。

“你真笨！”柏杨继续说，“竟看不出只是利用你！”

买枢运的眼睛射出一种洞烛其奸的光芒，鄙夷地说：

“郭定生，你到社会上做了几年事，什么都没有学会，只学会了老奸巨猾。你知道他们待人是多么样的真诚，怎么用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看了买枢运认真的态度，柏杨感觉惭愧，他只是就人之常情来判断，对那几个应考生并没有特别的恶意。相形之下，买枢运像个天使（事实上，他真是一个善良正直的好友），而自己却像一个瘪三。买枢运那种鄙夷的眼光，像火焰一样的烧得他在教室里住不下去，只好搬到另外一个教室。不过，不久，还没有等到发榜，就在联考结束的第二天，那几个应考生就不见了，牛奶、面包也不见了。买枢运找到他叹气说：

“你怎么知道的？”

“我并不知道，我只是有那种感觉。”

多少年来，“感觉”常使柏杨洞烛机先，但也常使他备受伤害。

对他来说，读政治系简直是易如反掌，什么国际公法、国际私法，以及那些当时已记不清楚的功课，都不是问题，只需要考试前两天，买包四川特产的油米子花生（那是世界上最好吃的花生），请一位书呆子同学，做一次重点复习，就完全解决了。其实回想起来，当时的考试确是犹如儿戏。像三民主义这门功课，他从来没有上过，而上过课的同学，为数实在不多，老师也乐得你爱上不上，说：

“十个人上课，我给十个人讲；五个人上课，我给五个讲；一个人上课，我给一个人讲；没有人上课，我给钱讲。”

考试的时候，有些和教务长比较亲近的同学，曾幽默的提出建议：

“三民主义用不着考，学校可以请三民主义老师和其他两位老师站在台上，叫学生鱼贯而入，指认谁是三民主义老师，如果指对了，三民主义就算及格。”

教务长骂他们胡说八道，把他们赶走。

当时日本败相已逐渐显露，同学们看报的风气十分浓厚（虽然常是昨天的报），阅报室常挤得水泄不通，太平洋战争打得天翻地覆，但柏杨记忆最深的一场战争，是由于一个有趣的报导。当日本大本营宣布把美国第七舰队摧毁，已全部沉入海底时，美国太平洋海军司令部发表一份公报，证实日本大本营公报的真实性，但却加一句说：

“美国已将第七舰队捞起，以每小时四十海里的速度，向日本海岸败退。”

意大利和德国的无条件投降，是天大震荡。希特勒在战争开始的时候，向德国人保证说，一九一八年永不会再现（这一年德国向英美投降，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而现在，希特勒和他的情妇躲在防空洞里，一方面自己结婚上床，一方面声嘶力竭呼吁德国人民为他战死。喧腾国际十二年之久的希特勒的感性誓言：他一辈子都不结婚，因为他爱德国，已和德国结婚，现在却硬生生地跟一个活女人海誓山盟，这一些对柏杨而言，都是严肃的教育：

相信政治人物的承诺和誓言的人，不是转用它欺骗别人，就是已成为无可救药的白痴。

德国和意大利投降，轴心国只剩下日本，任何一个人，包括东北大学门口卖纸烟的那位不友善的伙计（他从不肯赊烟给柏杨），都知道日本已穷途末路，问题是能不能再战，全世界说了都没有用，日本大本营说了才有用，而日本大本营竟宣布说：

“日本还要再战，直到帝国人民全部战死，三岛化为一片焦土。”

耍狠的话是吓不住人的，大家有一种怀疑，不知道日本人怎么收拾摊子？这时候国际部开始在各大院校招募远征军。盟国有个计划，要从印度出发，向东方反攻，穿过缅甸、泰国，直到越南，中国远征军就负担这个任务。种种优待的条件，使正在学校读书的学生非常动心，主要的是可以到印度去玩一下，这一点已经够了。当时报上就曾经嘲笑说，如果远征军从埃及出发，报名的会更多。

很多人劝柏杨从军，很明显的，从军就等于毕业。可是他没有任何时候比现在的意志更为坚定，打死他，他也不会离开好不容易才挤进来的大学，他一定要货真价实地读到毕业，而大学毕业是他一生奋斗的唯一目标。

可是，当他刚升上四年级的那个暑假，时局发生巨变。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日，天气晴朗，学校正放暑假，校园显得清静寂寞。刺耳的蝉声把人聒噪得发呆，街上几乎没有什么行人，同学们除了睡觉，还是睡觉。睡觉后鬼混一阵（青年时代好像有用不完的光阴），晚饭时候，懒洋洋去餐厅，重复一次“见饭愁”，接着就半饥半饿到街上压马路，有几个零钱的同学，甚至还到茶馆泡茶，或者到茶馆后院打麻将。可是，那天傍晚时分，气氛有点异样。大概六七点钟左右，由县政府收音室（全城大概只有县政府有个收音机，据柏杨所知，东北大学师生，从来没有想到买一架，因为那贵得可怕）收听、抄写、油印，并分送有关机关的新闻简报，只有十六开那么大的一小张，这时候，在东北大学走廊的布告栏上出现，第一条消息是这样的：

“美国投下原子弹，日本宣布投降。”

先看到的同学，像疯子一样，跑到街上，招呼大家快回去庆祝，全校一片欢腾。日本投降，简直不可思议，比今天——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忽然听到美国向古巴投降，还不可思议，理由很简单，那是不可能的。日本的崛起和傲慢，武力的显赫，加上他们一再宣称全国战死，简直不能想象竟然也会屈服，尤其向包括中国在内的同盟国屈服，这真是历史上最震撼的一页。同学纷纷议论的是：如何迁校和如何返乡？东北大学原址在沈阳，当然是迁回沈阳，同学不管是哪一省人，当然全随学校迁往沈阳上课。沈阳和三台直线距离二千二百公里，就在这个时候，满洲帝国依然存在，这对封闭在内陆已久的青年学生来说，更是最大的刺激。

天已入夜，大喜若狂的同学们，在东大唯一的广场，燃起营火，找了很多木柴，甚至学校的破板凳、破桌子，都投掷进去。熊熊火舌舐向天际，舌影忽亮忽暗的掠过每位同学的面颊，看得出内心的喜悦，那是一百年之久所盼望的喜悦。可是，大家却像埃及金字塔修筑法老王坟墓的一群被割掉了舌头的奴隶，只呆呆的站在那里，没有语言，没有声音，围着营火，像一大堆参差不齐、刚出土的兵马俑和木乃伊。这景象敲打柏杨的大脑，想到德国投降时，美国人和英国人的高歌狂舞，他心里怀疑起来，这些大学生为什么没

有一个人高歌？为什么没有一个人跳舞？他几乎是立刻就找到答案：他们是一个没有歌声的民族、没有舞蹈的民族。传统文化真是一个大酱缸，不要说不识字的小民，即便是高级知识分子的大学毕业生，一个个也都被酱成千屎橛、酱萝卜。反传统文化的思想，被这次营火启蒙。

什么是原子弹？一颗原子弹竟然能使一个庞大强悍的帝国投降，它一定可怕得不可想象。但它是怎么制成的？没有一个同学追问，在以后的日子里，也没有一个教授向大家解释。而日本虽然战败，但他们在原子弹投下后，立刻就知道它是原子弹，柏杨心中有一种感慨：日本仍是一个一流的强国。如果投在中国，恐怕三年之后，也不知道他们遇到了什么。

## （17）日本投降，离乱未已

日本投降，结束了日本和中国一百年来的恩怨，日本吐出来从中国夺取的东北四省和台湾岛。日本人在东北所创造的满洲帝国，树倒猢狲散，也结束了十四年来所扮演的尴尬角色。

国民党是当时中华民国的执政党，大权在蒋中正之手，名义上，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先生是国家元首。可是，蒋中正却是一位反体制的先锋，他一方面创造法律，一方面也破坏法律。当国家元首是林森时，他另行创造一个中央——军事委员会，自任委员长，也就是全国最高领袖。全国各地的省政府和战区长官司令部之外，他另行在各重要城市设立“行营”，成为中央与省之间的二级机构。后来，一九四三年，林森过世，由谁来继任国民政府主席？成为国人关心的焦点。而就在那个时候，国民党修正国民政府组织法，过去的主席是没有军权的，修正后则主席成为军事最高统帅，大家立刻知道，蒋中正要自己出马当国民政府主席，不再抬别人的轿子了。果然，第三天，他就被“任命”为国民政府主席，而他也下令把各地的委员长行营，改为主席行辕。这一连串的小动作，说明他已踌躇满志，对眼前的功业，开始沾沾自喜，柏杨对他崇拜的热情，逐渐降温。

日本投降后，他还有一年才能毕业，一年后，一九四六年，总算是平安地读完了大学，毕业典礼刚举行罢，他就飞奔到照相馆拍了方帽子照片，心里暗暗庆幸，虽然他用的是旁门左道的方法，但上天仍然垂怜，让自己完成学业。那时候，几乎每天都有相关的学生社团，到小馆作毕业欢送的宴会。那是一个热闹的季节，也是他兴高采烈的季节，大学毕业，多么桑耀，连上帝也不能改变这个事实，他充满了自信，趾高气扬，但也使他暴露了性格上顽劣的缺点，他从不喝酒，任何情况下都不喝酒。一次复一次的同学欢送会上，传统的敬酒方式，和他的性格发生冲突。传统敬酒，一向不管别人死活，只知道用各式各样的手段，威迫利诱，甚至哀求，目的只要对方喝酒，而且声称：

“你如果把我当成朋友的话，请喝下这杯！”

柏杨从小就不接受这种敬酒，尤其是对“你不喝下这杯，我们交情一笔勾销”的威胁，有强烈的反感。因为他对酒过敏，一点点酒就会浑身发出红疹，痛苦不堪。敬酒的目的是表达自己的友情，使朋友高兴，而不是表达自己的霸气，使朋友痛苦。所以，有几次为了拒绝喝酒，掀翻桌子，不欢而散。后来检讨，他拒绝的不仅是酒，而是那种气氛和那种心态。粗脖子、红眼睛的，那种把自己的快乐建筑在别人痛苦上的敬酒，那是一种蛇饮。

东北大学毕业典礼是哪一天举行的，已经不记得，反正是举行了，地点在大礼堂。他和那一届的毕业同学坐在前排，由校长臧启芳先生致词。

他的讲话引起了雷动的欢声，师生们都深具这样的信心，因为这是事实。可是，大家不久就发现，乐观不过是一场空欢喜。在空欢喜消失前，柏杨面对着毕业后的出路，十分彷徨，有很多要好的东北籍同学，都劝他随着学校前往东北，另创江山，他怦然心动。那时候的教务长是许逢熙先生，也是河南人，站在同乡的立场，劝他回河南发展，而不赞成前往东北。许逢熙说：

“一个外省籍的青年，跑到万里外的东北，连个倚靠都没有，你能做什么？”

但柏杨有他的想法，那时，他们几个志同道合的同学在学校组织了一个

“祖国学社”，是一个专门和左倾同学对抗的学生组织。他们都拥护比柏杨低一班、叫杨德钧的同学，当他们的“大哥”。杨大哥是三民主义青年团东北大学分团的干事，一批青年，包括柏杨在内，每天围绕着他，出壁报、开笔战。有时候左倾同学把祖国学社的壁报半夜里砸毁，祖国学社的同学也用同样的手段，半夜里把他们的壁报撕烂。祖国学社拥有五六十个同学之多，自以为形成一种力量，到东北去，那个地方跟祖国隔离了十四年，可以大有发展。而许教务长所提到东北没有倚靠的顾虑，柏杨从没有考虑过，认为那反而是一种挑战。

他先到重庆，和崔秀英见面，秀英在他去了三台后不到一年，就是“十万青年十万军”最热闹的时候，生下一个女儿——乳名毛毛，是一个可爱的小女孩。柏杨主张一起到东北，秀英坚持要先回她的河南息县老家。她只有一个寡母，还有一个弟弟，必须先回去一趟。柏杨改变主意，希望先送她回家，再回辉县看他那仓促离开的结发妻子艾绍荷（当然，他对崔秀英瞒着这段婚姻），然后再下决定。可是，由重庆回河南南部，有千里之遥，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和一个带着小孩的小职员，收入只能糊口，无法负担这项旅费。这时候，杜文澄伸出援手，他是柏杨甘肃学院的同学，非常风趣，有见识，又有能力，写得一手好字，那时在公路局调度课做事，负责车辆管制，于是安排一辆司机也是河南息县人、而正好前往宝鸡的公务运输车，把他们当作黄牛，免费载到宝鸡。他们再改换陇海、平汉两条铁路到信阳下车，雇架子车转到息县。秀英母女见面的场面使人动容，那种难分难离，使柏杨感到亲情的温暖，加上当地有一个中学的校长前来探望，顺便约他们在他们学校教书。这时，他几乎瘫痪了，想一想，就在那里教书也好，犹豫之间把原定休息一个礼拜后即行出发的计划一延再延。再想不到，事情发生突变，一天早上，还没有起床，仿佛听到从城外传来的枪声。谣言说，大别山的人民解放军已经进入县境，城里开始紧张，城门站上了武装岗哨。柏杨非常懊恼，翻身跳起来，教秀英火速收拾东西，他急急去西关探听消息，并看能不能雇到架子车，准备立刻出发。顺着人潮，一直走到西关，除了人们脸色有点不安外，一切都很正常，他在市场好不容易雇到一辆愿到信阳的架子车，即行回城。走到城下，城门已经关闭，柏杨敲门呼叫，城门上的守卫大声警告快点离开，人民解放军就要攻城。那个架子车夫看到情形不对，掉头走掉。柏杨开始惊慌，听到郊外的疏落枪声开始接近，这是解放军夜战的序幕，西关街上的店铺开始关门。柏杨想到自己操的是外地口音，就更加惊慌。于是，顺着马路向西信步走去，希望找一个路旁的小庙，暂时躲在那里，等候开城。不久，他发现有人向城门那里前进，从衣服上看出那是人民解放军，他本能的向田野跑去，尽量离开马路，在田埂那里躺下，眼看到人民解放军越来越多，心结成一团。

夜色刚刚来临，枪声像鞭炮一样的密集，城里守军反击，柏杨将近一天没有吃一口饭，饥饿、惊慌、恐惧。他起身顺着马路向西走去，一夜的行程使他筋疲力尽。第二天早上，在路边饭铺里吃了早饭，听说人民解放军已经攻陷息县，斗争也同时开始。他强作镇静，一直到了信阳，精神恍惚，是留在信阳等候息县消息呢？还是北上回辉县呢？还是南下去南京，再转往东北呢？无法决定。就在信阳客栈门口，他遇到了原籍信阳的战干团一位同学鲍克勋有事要去南京，他把心一横，决定去南京。

南京是个以六朝繁华闻名于世的金陵古城，一连六个王朝充当首都，更

因抗战初期受日本人灭种性的大屠杀，成为一个悲情城市。日本人因为人口太少，竟然想用屠杀的手段灭绝中国人，太违人道。使人大惑不解的是，德国已为纳粹的暴行向世人道歉，世人尊敬日耳曼民族是一个光明磊落、高品质的民族。日本却始终拒绝承认他们曾经侵略，一味玩一些只有小小孩才玩的花样，把“侵略中国”改为“进出中国”……真使人作呕。

鲍克勋到国防部预备干部局办事，柏杨摸索到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团部，那时候刚开过团员代表大会，很多东北籍的代表，在一个空旷的办公室席地而卧。他也在那里打了一个地铺，和一些东北大学的老友，以及“青干班”的老友纷纷会面。大局仍然浑沌，得不到息县消息，黄河以北的人民解放军，已把新乡、辉县重重包围。每一想起秀英正盼夫归来，临走时毛毛还拍着身边的小凳，叫：“爸，坐坐！”而更远的结发妻子绍荷，又是如何度日。如能在南京留下该多好，可是他虽已大学毕业，仍无法在中央团部谋一席之地，走投无路，乃决定仍照原定计划前去东北，等待时局平静。

启程北上的日子到了，柏杨和几位同学赶到上海，购买赴天津的船票。上海给他最大的刺激是：那是另外一个国度。所有人讲的话，什么宁波话、上海话以及其他乱七八糟的话，外地人完全不懂，于是，发生了不少火爆场面。一个复旦大学山西籍同学，在虹口上巴士时，向售票的上海佬大吼说：

“阿拉、阿拉，你再阿拉，老子揍你！”

仗着他是大后方李的那种余威，上海佬吓得脸色铁青，赶忙道歉说：

“阿拉以后不再阿拉。”

买船票时，需要填一份表，一个非常慈祥的老太太走近柏杨，唤一声：

“阿哥……”

“阿哥”以后所有的话，他全听不懂，尴尬地接过老太太递过来的登记表，问老太太的姓名，老太太当然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终于另找其他年轻人。他最大的感想是，一个国家为什么不能有一个共同使用的语言？政府官员每天都好像十分忙碌，难道对他的国民不能互相沟通，毫无感觉？语言不同，是政治纷争的主要一个原因。

上海除了“阿拉”使人感觉是另一个国度外，其他使柏杨惊然心惊的是，那里的人山人海，好像全国人都集中在黄浦滩几条马路上。

轮船从上海启航，一出吴淞口，柏杨便晕船，晕船的痛苦使他视坐船为畏途。幸好上帝知道他害怕坐船，所以在二十世纪稍后，教飞机取代轮船，否则的话，柏杨就只能沿海走走，什么地方都去不成了。

最后，到了天津，转北宁铁路到沈阳，住进位于沈阳市北郊的东北大学。

和三台的东北大学相比，沈阳的东北大学雄伟壮丽得像一个独立王国，仅工学院，就拥有一个修理火车头的庞大工厂，如果要绕东北大学一圈，步行的话，恐怕要六七个小时。

东北大学是柏杨千辛万苦求学的终点，他到沈阳时，已是初冬，北国寒冽的冷风，跟四川迥然不同，何况他又交回了学生公社借给的棉大衣。好在，那时候有救济总署的国际救助物资，那是来自西方文明国家民间捐赠的御寒衣服。他随着还没有毕业的同学，被带到仓库，挑了一件勉强合身的毛制品大衣，和一个八角帽，这是他到东北来第一件冬装。

柏杨自从大学毕业就没有收入，靠过去节俭下来的一点储蓄（其实他到后来已加倍浪费，一天要买两支烟，而且升了一级，不但不吸土制的司令牌，还吸货真价实的美国烟。日本一投降，美军的剩余物资大量流向中国，十分



便宜，司令牌完全被市场扫地出门。后来到了南京，第一次吃到巧克力糖，发现简直是世界上第一美味，可惜价钱太贵，他发誓当有一天有钱买上整整一盒时，一定把它一口气吃光)。可是，到了沈阳后，面对自己身无一文的“闯关东”的抱负，忽然茫然，不知道怎么闯法。一位同班同学被学校延聘为助教，那种感激欢喜的表情，真叫柏杨惊讶。有人也建议他到中学教书，如果教书，又何必跑到几千里外的东北？可是除了这条路，只有饿死。于是在当初祖国学社负责人杨德钧、苗景隆、廖衡等人怂恿下，在小西边门找到一个日本商社的房子，不知道杨德钧运用什么关系，就搬了进去，在门口挂上“祖国文化馆”的招牌，希望开一家书店。祖国学社的成员满腔热血的要爱自己的祖国，可是这群幼稚的大学生，不久就纷纷游离出去，最后只剩下他和苗景隆。

然而再也想不到并没有开成书店，他反而一夕之间，成为一名木材商人，抚顺县东面几个山头的树林，都在他的大名之下。分析起来，稀松平常，不过一场官商勾结的把戏而已。本溪煤铁公司正需要大量坑木，那就是，挖掘煤矿时，一面挖掘，一面用树干把坑道支起，免得崩塌。这种坑木材质虽不好，需要量却非常庞大。当地木材商人和新来的接收官僚，既对不上话，也搭不上线，于是，有人找到柏杨。他有一位老师，当沈阳师范专科学校校长，他有一位朋友在本溪煤铁公司当副总经理，就这样的柏杨去向那位副总经理推销。一分钟前，他还不知道什么叫坑木，一分钟后，他却成了一名坑木商，讲得头头是道。那正是一个非常恰当的时机，副总经理正为坑木大为烦恼，很多商人向他们推销时，满口承当并找有铺保，答应限期内把坑木送到本溪车站，可是结果全都一去无踪。有些当然是存心欺骗，但也有一些货真价实的木材商人，千辛万苦从山头把树木砍下，运到火车站时，却被国军抢劫一空，拿去劈柴取暖。所以当柏杨向他保证一定可以运到的时候，副总经理相信老同学的学生，同意这笔买卖。大概经过一个月的往返折腾，柏杨取得了十两黄金的佣金。

十两黄金的佣金是当初木材商指天发誓所承诺的数目，可是到真正拿到支票的时候，木材商的面孔开始不一样了。最初是先给他二两，剩下的八两作为投资，最后则出言恐吓说：

“我告诉你，你是一个外省人，我们把你扔到野地里，叫狼吃掉，你家里十年都找不到你的下落。”

这是柏杨平生第一次商业行为所遇到的挫折，使他看到翻脸的迅速及彻底的镜头，大为震惊。他故作镇静的告诉那些商人：

“我如果二十分钟后不走出中苏联谊社（这是当时的五星级饭店，木材商的写字间设在那里）我的同学就会报警，指出你们的名字。我不怕死，我如果怕死，不来东北，而且你们今天如果不立刻付款，我马上就打电话到本溪，报告公司你们这个骗局。”

这样才把他们镇住。实际上柏杨从没有想到好朋友为钱会生出那么恶毒的念头、说出那么恶毒的话，根本没有心理准备。他们只好开出支票，柏杨不准他们划线，立刻到银行提出现款，第二天换成十两黄金，全数交给廖衡保管。

十两，在那个时代，穷困学生眼中，是一个天文数字，他们就用它来维持祖国文化馆的开支。

可是，好景不长，一个晴天霹雳又打到他头上，再也想不到，假证件的

事又东窗事发，这是一九四七年的事。那年暑假，东北大学刚刚开学，听到风声说：柏杨被教育部永远开除学籍。

一位叫吕文达的好友从北陵坐马车赶到小西边门，告诉他这个恶耗。

“怎么回事？”他惊骇的问。

原来，日本投降害死了人。学校把毕业生的证件送到教育部，教育部查对南京中央大学档案，发现根本没有郭衣洞这个学生，明显不过的是伪造文书，于是下令开除学籍。不但开除东北大学的学籍，还通令全国院校，宣布柏杨的罪状，任何院校不得收容。这个置人于死地的通令，只有兽性发作的人才想得出来。他怔怔的仰头望天，这一生为了上大学所付出的眼泪，现在全成泡沫。他伪造证件固然触法，但何至赶尽杀绝，不留一条生路。侥幸的是，他总算没有留在学校当助教，也没有到其他中学当老师。

不过，不久之后，柏杨却糊里糊涂地当上大学教授。东北籍教育家徐延年先生在沈阳成立私立辽东文法学院，大概看他是重庆来的外省人，在社会上又相当活跃，于是请他当政治系副教授。这个正在向教育部申请立案的草创学府，还没有赶得上看到教育部开除他的文件。稍后，他遇到“青干班”同学徐天祥，徐天祥又把他介绍到设于北大营的陆军军官学校第三分校，跟他一起当少校政治教官，每月有主食和薪俸，生活得以维持。而且，情况开始好转，徐天祥取得一个军中将领的支持，答应每月给他们一个连的补给品，要他们办一家日报，这一连三件事，都是救命船，因为那巨额的十两黄金，在他们不谙撙节的花费下，很快就被消耗得差不多了。

——四十五年后，柏杨在台北接到一本《辽东文法学院师生小传》，在世的师生，仍有二百余名，卷中还刊出他的小传，并记载说：“一九八八年十月二十九日下午三时许，中国文联组联部主任、中国书法家协会领导小组负责人佟韦，代表我们同学在北京饭店房间，拜望了阔别了四十年的老师——台湾著名作家柏杨，和他的夫人台湾著名诗人张香华女士，互相寒暄之后，柏杨老师请佟韦转达他对同学们的问候，并表示下次回大陆探亲，定要看望大家，同时还询问了徐院长安西、匡扶教授和几位同学。此时，佟韦将他书写的条幅，《遥寄台湾柏杨先生》（徐竹影作诗）：‘隔海凭栏无限情，元宵佳节忆先生。盃中一两相思月，饮到三更映到明。’赠给柏杨老师。先生极为高兴，连说：‘字写得好，诗也作得好。’表示回到台北，一定挂在客厅正中壁上，以示留念。”想不到一个轻轻脚印，竟留给柏杨如此深远的温馨。有意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人生，大概就是这样。

柏杨在沈阳市中华路找到一栋房子，挂起《大东日报》招牌，买了一部印刷机，搬出祖国文化馆，和徐天祥以及另外一位从辽阳逃出来的警察界朋友孙建章，共同住进报社，开始筹备出报，包括向中央政府申请登记。

(18) 『我们是蒋匪！』

《大东日报》的登记，政府始终没有批准，国民党是一个愚笨的党，它严厉地控制报纸的登记，认为可以籍制新闻自由，所以四十年代真正中国人的心声，反映在当时的杂志上，而不反映在报纸上。不过，幸而政府没有批准，如果批准，他们的损失将更惨重。

更大的挫折来自于整个时局的变化，国军在东北拥有最精锐、最现代化，而且远征过印度的武装部队——新一军和新六军等，他们从军服到武器，全是美式装备。可是，经过两年内战，东北剿匪总司令从熊式辉到陈诚，从陈诚到以饭桶闻名于世的卫立煌，甚至身为国民政府主席的蒋中正，都不能挽救东北的危机。四平街一战之后，陈明仁将军突然被中央撤职，军法审判。大家已经发现，以蒋中正为首的国民政府，已公然向民心宣战。局势遂像从山顶滚下来的坠石一样，不可收拾，各大城市纷纷被人民解放军占领。最后，偌大的东北只剩下一个沈阳和一个锦州。沈阳街头的人数一天比一天减少，不但高官富商纷纷逃亡，连贫苦的小市民也纷纷搭飞机远走北京。

贫苦小民搭飞机逃难，写下了中国社会史上最重要的一页。设在北京的华北剿匪总司令部雇用民航公司的飞机，把大量军粮和武器运往东北，飞机回程时，舱位全空，沈阳有些单位就利用这个空舱，疏散他们的员工，当员工疏散得差不多后，空舱依旧。有些人就利用机会，包下空舱，向民间出售机票，从中赚取佣金。

不管谁申请买票，都要东北剿匪总司令部批准，以堂堂的剿总之尊，竟去处理小民的机票，荒谬得不但使人失笑，也使人震惊。报纸上也有人作温和地攻击，认为“剿总”应该掌握大局，不该过问鸡毛蒜皮小事。“剿总”反应十分激烈，叱责他们是匪谍的言论，企图掩护匪谍逃往北京，之后就再也没有批评的声音了。这小故事隐藏着一个大的意义，事实上，“剿总”官员，没有任何大事可做，批准机票就是他们唯一能做的重大事。整个军事行动——战略的、战术的、后勤的，以及陆海空军联合作战计划，剿总都不经手，而由蒋中正在遥远的南京决定，甚至一个团的出击或撤退，都由他直接指挥。“直接指挥”应该是国军在这场大规模内战中主要失败的原因之一。历史上处处可以看到直接指挥的悲惨结局，只是，所有自命不凡的头目，总是喜欢直接指挥，因为，只有直接指挥才可以显示自己的权威和英明，十分过瘾。

东北的末日终于来到，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一日，上午，柏杨冒冒然去北大营第三军官训练班，探听能不能领到薪俸，发现北大营全然一空，官兵们已全部撤退到沈阳市区。息县那次被隔绝在城外的镜头，重现眼前，他大为恐慌，急行折返沈阳，街上有一种诡异的气氛。回到《大东日报》社时，厨夫告诉柏杨说，解放军已经进入市区，住在炮子坟（炮子坟距《大东日报》只有二十分钟路程）。这时候，他才看到当天出版的《新报》，四十五年后，仍记得它的头条标题：

沈阳城外 共匪不多

柏杨没有心情看内容，只感觉到这样的标题，令人啼笑皆非。傍晚时候，街上已经没有行人，柏杨、徐天祥、孙建章、廖衡，挤在楼上小房间里，面面相觑，说不出一句话。他再一次遇到前途尽毁的悲剧，一生的努力，一夕之间，又化成云烟。他现在面对的是一个完全不了解的新世界，他是一个失败者，而今年已二十八岁了，他们四个人唯一的财产，只剩下那位将军支援

他们的二三十袋面粉，又能坐吃几天？

第二天上午，解放军大批进城，车队也鱼贯而入，穿着灰色棉军服的男女青年，坐在卡车上挤成一团，解放军中有些女孩子还打开胸前的钮扣，让怀抱中的婴儿吃奶，震天的歌声和笑声，一辆一辆的在《大东日报》社前面奔驰而过。柏杨不知所以地面对他们的欢乐，这幅画面，深刻的印在脑海。

他去辽东文法学院打听消息，一位组长满面愁容地坐在那里，告诉他说：

“真糟糕，我们学校好不容易在伪教育部立案，现在，又要重新申请立案了。”他一时没有听懂。

“伪？哪个伪教育部？”

他以为指的是满洲帝国教育部，因为人们都喜欢在满洲帝国所有的单位加上一个伪字。

“当然是南京伪教育部！”

这是柏杨看到的第一条变色龙，真不了解他怎么会变得这么快，而脸上一点也没有难为情的痕迹，早上还称中央教育部，中午就自动加上了“伪”。回顾两年来，东北朋友自动称“伪”的那种心情，有深刻的感受。“真”与“伪”完全跟着政治气象走，片刻都不迟疑。他怅然若失地回到《大东日报》社，门口已有解放军的岗哨。他们的规定是，人可以自由出入，不闻不问，但东西只可以带进，不可以带出。

事实明显，他们即令想苟延残喘地留在沈阳，也不可能。第一、他们是外省人；第二、他们所拥有的几十袋洋面，在扫地出门政策下，实际上已被全部没收。于是，决定放弃一切（其实这时已没有“一切”了，只剩下两肩一口），逃亡北京。

柏杨、徐天祥和孙建章三个人这次逃亡，有一个特别的方式，那就是脱下平民便装，穿上临时买来的国军军服，唯一不同的是，把军帽上的青天白日国徽拿掉。前一天晚上，他们聚集到辽东文法学院办公室，第二天凌晨，就以国军打扮，雄纠纠、气昂昂的，走向沈阳火车站，想买一段南下的车票，能买到哪里就买到哪里。他们所以改穿军服，因为那正是共产党所实行的宽大政策和既往不究时代，统战心战的颠峰。凡是国军，只要手中不拿武器，都可以大大方方地“还乡生产”。他们恰好抓住了这个机会。

四十年后，他和孙建章在台北被调查局逮捕，一个叫李尊贤的调查员问口供问到这里时，把笔愤然的投在桌子上，发出磔磔的冷笑，大声叱骂说：

“你们竟然能穿国军的衣服走出匪区？这就够了，你们证实你们自己是匪谍。”

当时除了这套军服外，每人还拿了一张通行路条，至于这三张路条是哪里的？已无法记忆。好像一张是孙建章用肥皂刻了一个图章，另两张是解放军发的货真价实的通行证。他们从别人的手中买来，用去墨水改造的。

走到沈阳车站后，暗暗的吃惊，偌大的车站，平常一向人山人海，喧声沸腾，这时竟然静悄悄的，鸦雀无声，变成一个古老的废墟。其实，倒并不是没有人，仍然有很多人，而且人山人海，全是平常凶暴得不可一世的国军官兵，现在却是那么有秩序地鱼贯排列在各个售票窗口，有的甚至排到车站外的广场上，有的像S形转来转去。吃惊的是，没有一个人吵闹和大声讲话，也没有一个人插队，好像一夕之间，都成第一流国民。

徐天祥在一旁说：“共产党真行！”

柏杨回答说：“不，这是恐怖下的产物，中国人没有管束自己的能力。”

抗战末期，政治腐败到极点，军事是政治的延长，军风纪也完全荡然，国军和土匪海盗，没有分别。不要说从来不排队，甚至从来不买票。一旦巢穴倾覆，只好排队买票，而且还排得这么规矩，只不过失去靠山，胆都碎了。

售票窗口打开，才发现南下的火车只能买到皇姑屯，而皇姑屯距沈阳只有一站。他们到了皇姑屯，安静地出站，站外挤满了农家用的马车，这正是乡下人农闲赚外快的时候。他们雇了其中的一辆，南下山海关。这是一趟奇异经验的旅途，入夜之后，马路两旁涌出大批全副武装的人民解放军，紧夹着马车进发。这批解放军是林彪的第四野战军，南下攻击北京，人民解放军军风的严明，使他们咋舌。在黑暗中，那些彻底执行军令的战士，常常高声发问：

“你们是哪个部队的？怎么有车可坐？”

柏杨总是回答：

“我们是国军。”

当对方一时听不懂，或弄不清楚什么是国军时，他就作一个总结说：

“我们是蒋匪！”

那些纯朴的战士们就一言不发，从没有一个人刁难。马车夫有时还吆喝他们：

“让路，让路！”

他们每次也都踉踉跄跄地让路，见惯了国民政府军队的凶恶，柏杨从内心对解放军生出敬意，这岂不是古书上所说的：

“妇孺与王者之师争道！”

解放军的行动跟传统的行军方式，恰好相反。他们于夜间上路，天亮时进入村落，分住民家，早饭后，门口从来不站岗哨，一个村落里，虽然驻扎了大军，但是外表一点也看不出来。他们的岗哨都站在屋顶上，居高临下，一览无遗。除了解放军，还有成群结队，没有钱雇车的国军残兵败将，他们带着干粮，低着头，有时混在第四野战军的行列中，一步一步南下，跟解放军的方向虽然一样，却拥有两样心情。

就在山海关附近，柏杨看到一个国军军官，断了一条腿，鲜血一滴一滴地滴在路上，双肩架着支架，一步一跌，跌下后再艰难的自己爬起，然后再一步一跌。他是湖南人，他说他要回家，家里还有母亲、妻子，还有弟弟。他在新六军当少尉，眼睛大大的，十分清澈。柏杨送给他一块大头，他收下来，他将来定要回报。

多少多少年后，海峡两岸开放，来台的很多大陆军民重回家园，这位军官下落不知如何，恐怕已成春闺梦里的人！

## (19) 在古城北京的日子

柏杨和徐天祥、孙建章三个人（廖衡回他的故乡哈尔滨探亲，稍后也辗转来到台湾），终于穿过山海关，到仍在国军控制下的唐山，再坐火车转往北京。这是一个悲凉的下场，他们住在一个朋友介绍的小公寓里，眼睛望着天花板，口袋里空空如洗，肚子开始饥饿。孙建章去投奔在十六军当连长的朋友，他和徐天祥忽然想到，他们以第三军官训练班教官的身份，可以投奔设在北京旗坛寺的陆军军官学校第一军官训练班。于是去了，一个上校组长一看见他们的狼狈装束，就拉下脸来，用拳头敲着桌子说：

“你们为什么不抵抗？”

他们呆在那里，不敢坐下。

“你们为什么不抵抗？”徐天祥已经气结，柏杨结结巴巴说：“我们是文职人员，不是带兵官。”“你还强辩，革命军人就是随时准备牺牲。”柏杨回答说：“北京朝不保夕，看你去当革命军人吧！”说完之后，拉着徐天祥走出办公室。维持尊严是要付出代价的，柏杨和徐天祥陷入绝境，只好四处拜访朋友，东一顿西一餐地维持生活，很快地就瘦得不成形。他后来找到一位辉县小同乡，在新六军当少校的常咸六。常咸六不知道害什么病，双目突然失明。柏杨和徐天祥经常到他家——口袋胡同二号，他太太总为他们准备一杯茶，有时也请他们吃碗面条，可是仍难忍饥饿。有一次，柏杨和徐天祥在西单马路上，毫无目的的闲逛，他忽然厉声说：“你活该挨饿！”徐天祥看一下柏杨。“你活该挨饿，”他愤怒的说，“你受过高等教育，却喂不饱自己的肚子，你饿死都不足惜。”

“你说谁？”徐天祥问。

“我说我。”

柏杨对饥饿和贫穷充满了憎恨，不能原谅自己的无能。

他忽然遇到那位连孟德尔定律都不知道，却考上西南联大的百泉初中同学朱光弼。他现在是北京大学四年级学生，这时候，柏杨才知道他在西南联大读书时，已是一个共产党员，是北京地下党的重要人物之一。柏杨就常到北京大学，跟他对床而眠，听他讲些无产阶级革命的种种故事。如果肯洗面革心的话，他答应由地下管道，把柏杨送到城外人民解放军总部；柏杨说他愿意洗面革心，但不肯到人民解放军总部。

这时候，一个人是不是向共产党靠拢，成为检查他是不是进步人士的唯一标准。可是，柏杨性格上不喜欢拘束，觉得人性尊严和温情扶持，是人类共有的美德，这感觉使他不甘心屈从，但意识形态上的差异，并不伤害柏杨和朱光弼两个人的感情。每天早上，他都陪柏杨到豆浆摊吃烧饼油条，往往先让柏杨坐下，然后他站在旁边数他口袋里的钱。有时说：

“只能吃一碗豆浆。”

有时说：

“再加一个烧饼。”

有时遇到财大气粗的日子，他就大声叫：

“管饱！”

柏杨这时候就吃一碗豆浆、两个烧饼、两个油条。朱光弼很少自己也坐下来吃，他总是先在学校吃泡稀饭，因为两个人吃，钱就不够了。

北京城里，街上人潮汹涌，挤满了国军官兵，也挤满了象征那个时代特

有的小贩，手里托着一串银元，在西单徘徊，口中单调的叫着：

“买俩卖俩！”

这是钱贩子，从事银元和当时流通货币——金元券的兑换工作，从中赚取差额，利益十分可观，那时候金元券像瀑布般的下跌。小贩在这个巷口，一个袁大头可以买金元券五亿元，走到另一个巷口时，就可以买五亿五百万元，等他再回到原来那个巷口时，一个袁大头已涨到五亿一千万，到不了晚上，一个袁大头可能换六亿了。但大家仍在绝望中制造希望，甚至有人说，国军已反攻到廊坊，更有人坚称他确实听到炮声，这是一个垂死挣扎的幻梦，沈阳陷落前后，人们也都传说国军在营口登陆。

同时盛行的还有卦摊，每人问的问题都一样——前程。卜卦的答案也千篇一律，只有两个：一是你就留在北京！北京是福地，自有贵人助你；另一是吉祥在西北，西北有贵人（那时候西北还在傅作义部下董其昌将军之手）。事后的先见之明，福地还在东南——大海中的台湾，可是，没有几个人知道中国还有一个台湾，就是知道也跟知道太阳系有个月球一样，远在天涯，不是人们可以随便去的地方。

忽然，毫无迹象的，有一天，傍晚时分，华北剿匪总司令部派人在街上发放传单，要市民于晚上六点钟，一定回到各人的家，收听重要消息。大家已经察觉出来，这是一个不祥之兆，可是无法确定它的内容。很自然的，当夜幕低垂，六点钟正的时候，柏杨、徐天祥等，都聚集在常咸六狭小的房子里。就在这时，收音机宣布：“请听众十分钟后，听重要广播。”

不久，收音机再次宣布，请听众五分钟后听重要广播。不久之后，收音机第三次宣布：请听众一分钟后听重要广播。一分钟后，收音机在万籁无声的空气中，慢慢地说：“华北总部、人民解放军联合公报：第一……”没有人记得详细内容，仅只“华北总部、人民解放军联合公报”这几个字就说明了一切，傅作义投降，北京陷落。用共产党的话说，“北京解放。”

刹那间，在家中听广播的人，几乎倾巢而出，到街上访亲寻友，探听消息。至于探听什么消息？谁也不知道，只是像被捣坏了窝的蚂蚁一样，张皇四窜。

第二天，柏杨到街上，北京已出现另外一种气象。每一个路口，都有三个哨兵，一个是华北总部战士（这时已自动拿下“剿匪”字样），一个是人民解放军战士，一个是北京市警察。

柏杨找到朱光弼，他把他领到刚成立的人民大学门口，要推荐他去读研究部。

“国民党会毁了你，你有志难展，”朱光弼说，“共产党有无穷天地，爱才如命，你要留下来，新国家需要你。”

柏杨支支吾吾，答应一定留下来。

两天后，人民解放军堂堂皇皇进入北京，街上挤满了人群，一半以上是大学生，当然也有小市民，可是他们跟站在两旁看热闹的国军的残兵败将一样，脸上充满了怀疑。但却是年轻学生们长久盼望的日子。他们在街头兴奋的奔跑，扭着秧歌，还在旁边用口琴斯斯文文地伴奏。共产党既然提倡它，它就成为青年们的光环，很多学生乘着还没有涂掉国徽的国军十轮大卡车，在街上奔驰高歌。

这时候，北京只剩下一家报纸，那就是《世界日报》，它的宅板成舍我（后来他在台北创办世界新闻学院，保护了不少被蒋家父子迫害走投无路的

知识分子)虽然不在北京,但他的这份报纸每天出来的时候,成群结队的读者,围在贴报栏下,默默读着上面的新闻。

《世界日报》刊载国军反攻部队,正向天津及杨村挺进的消息,间或隐约暗示舰队逼进大沽。淮海大战虽只结束二十余天,国军虽早退守长江以南,事实上不可能立即卷土重来,向千里外的孤城发动攻击,不过沉到海底的人,连动荡的海草,都会当作是救生绳索。北京城里国军的那些残兵败将窃窃私语地转告,心里燃烧起不应该燃烧起的希望。但柏杨对这份报纸永难忘记的却是,它正在连载张恨水先生的一篇小说《开门雪尚飘》,描写抗战胜利后,复员回到北京的一对年轻夫妇,丈夫是一个位置低微的小职员,太太漂亮非凡,丈夫的同事和丈夫的高几级的长官,都向她展开攻势。有一次,妻子应邀参加舞会,丈夫尾随着进入警卫森严的大院,从大厅窗子向里偷窥,只见妻子貌如天仙,而那些自己平常见面向他们鞠躬、他们连一声“哼”都不会回应的高级长官们,现在一个个笑容满面奉承谄笑的围绕着自己的妻子,作丈夫的心都冻结了。柏杨还记得小说中,宴会后那天晚上回家,他们夫妇的简单对话:

“我们不应该那么早结婚,”丈夫叹息说,“你不属于我这个阶层。”

“天不早了,睡吧!”作妻子的说。

这样的对话真是传神,柏杨当时就想:“我写不出来。”

故事的结果是,第二天一早,丈夫一觉醒来,妻子已不在身边,桌子上留了一封信,写了几句措辞简单的抱歉的话,向丈夫告别。丈夫惊慌的打开屋门,发现已下了一夜的雪,雪花片片,仍在院子里飘,连妻子的脚印也看不见了。

这正是抗战胜利后的故事,大概因为柏杨太早尝遍世态炎凉,所以使他感到特别叹气回肠。

这份自由报纸大概出了十天,就被查封。查封的理由是:剥夺国民党特务的反动武器。柏杨决心离开北京,向几千公里外从没有去过的南方疆土逃亡。

然而他哪里都不能去,因为身上没有一分钱,连蹲在街头吃碗“茶汤”的钱都没有。就在阴历年的除夕(那应该是一九四九年的二月了),正在常咸六家中发呆,徐天祥走进来,坐在他对面,问说:

“你走不走?”

“我想走,可是我没有钱。”

“国民党已经完了,你往哪里走?”

天祥笑笑看着他。

“可惜,”他沮丧说,“我身无一文,寸步难行。”

天祥从口袋中慢慢的抓出一叠银元,放在桌上,一个一个把它叠起来,叠得高高的,用手指数了数,整整十四元。然后,把它推到他面前,轻轻的说:

“拿去。”

“这算什么?”他问。

“这算你的路费,拿去就是了。”

“你哪里来这么多钱?”

“你不要管,拿去就是了。”



“你自己为什么不用？”

“国民党气数已尽，没有生存的希望，我就留在北京。”

十四元，足够柏杨逃到上海。于是急急联络几位东北大学的朋友（那时孙建章已随着十六军撤退）匆匆结伴南下。他们的行程是由北京坐火车到天津，再由天津坐汽车到济南，由济南坐火车到坊子，穿过无人地带，再到仍在国军掳守中的青岛，然后从青岛乘船到上海，到上海后再作下一步的打算。

于是那一天（大概二月十日左右），在常咸六家脱下军服，换上百泉初中同学这时刚从北京师范大学毕业的杜继生所赠的长袍，和几个朋友，跟几个月前从沈阳出走的情形一样，在晨曦朦胧中，悄悄打开大门，悄悄踏上街道，回头向杜继生、常咸六夫妇告别，冷风刺面，他连自己都不知道他到底在做什么！然而，也就这样的，他离开了北京古城，挤上满是残兵败将的火车，只听汽笛最后一声哀鸣，忽然想起来，远在辉县，他于逃亡后才生下来的女儿冬冬，又想到留在息县的另一个女儿毛毛。刺脸的寒风，从脸上移向心头，碎成片片。面对茫茫前途，孑然一身，这一年，他二十九岁，一生努力，化成一片模糊的眼泪。

## (20) 横渡台湾海峡

上海的繁华不亚于两年以前，而且更乱。柏杨在上海码头下船之后，望着滚滚北流的黄浦江和人潮汹涌的黄浦滩，偌大的中国第一大城市就摆在面前，他不知道往哪里投奔，不仅仅是落寞，而是绝路，十四个袁大头现在只剩下了两个，而下一段的人生，还没有开始。这两块钱能支持几顿饭呢？吃完了以后又该怎么办呢？他拎着小包，在黄浦滩徘徊流连，坐下来休息了一会，起身走一会，再坐下休息。他焦的愤怒，而又羞愧难当，一股勇气使他走向江边，想索性跳下去，这一辈子就再也不用烦恼了。

可是，就在他犹豫要跳的时候，听到一个东北口音的呼喊：

“东北来的同学，快点上车，我们要去四号桥。”

柏杨立刻跳起来，朝一辆已发动了引擎的大卡车奔去，上面插了一面好像什么救济会的旗子，这个巧合把他拉在阳世这一边，直接送到设在四号桥警察公墓的难民收容所，墓园里搭了一排草棚，里边有竹子扎的两排上下铺，他就下面一排躺下来，睡了一大觉，醒来后，正好难民收容所开饭，就吃了一个饱。

在难民收容所停留的十几天内，时局有大的变化，国军被人民解放军彻底击溃。这对大多数人来说，是个意外，但对柏杨来说，几乎完全在意料之中。国军的腐败和丧失民心，已经到了谷底，军纪荡然无存，军队既不知道为什么作战，也不知道为谁作战。柏杨在上海那段时间，翻阅一些几个月以前的旧书报，书报上介绍蒋纬国将军领导的装甲部队，每辆坦克车上，竟都配有一位其貌如花、服装入时的女服务员。而刚到任的广东省主席宋子文，第道命令却是要各县修一个飞机场，以便他前往视察。覆亡逼在眉睫，还在那里儿戏，使柏杨悚然。相反的，人民解放军的清新形象，却是有口皆碑。

淮海战役一失败，上海的人心更乱，金元券以山崩的速度贬值，总统蒋中正宣布辞职，由副总统李宗仁先生代理。谣言说，中央政府将迁往广州，柏杨没有别的选择，只有随政府再向广州逃亡。这时候他手里还有两块银元。

那天早晨，他躺在竹床上，睁着眼发呆，忽然听到上排几个年轻的东北同学，在那里谈话，大意是说，设在台湾左营的海军士官学校，正在上海海军码头招生，招生主任吴文义先生是东北人，但对他们这些同乡的东北籍青年，却拒绝接受他们报名。

“吴主任叫我们找保人，”其中一位青年叫，“怕我们是匪谍，我们从东北跑到这里，那里找保人？岂不是故意刁难？”

“什么？吴文义？东北人？”柏杨抬头问。

“是的。”

“他从前在那里做事？”

“听说在战干团当队长。”

“对了，就是他，”柏杨大叫，“他是我的老长官，我可以做你们的保人，带我去见他。”

这真是一项传奇，偶尔窃听到的一段话，和一种喜爱帮助别人的天性，使自己命运再起变化。当柏杨在七八个东北籍同学簇拥下，见到吴文义的时候，吴先生接受他的敬礼，听了他的陈述，愉快的说：

“没有问题，你介绍多少人我都可以收。至于你，你在干什么？”

柏杨老实报告他的窘境。

“跟我去台湾吧！”吴先生毫不犹豫的说，“明天一早就开船，你今天晚上以前，一定要来找我，我会把你带到台湾。”

这好像是梦中又做了一梦，柏杨急急地返回四号桥，找到从北京一起出来的东大同学熊镇父女，和堂弟郭立熙。正要离开时，忽然之间，在重庆便相识的于纫兰女士跟她的弟弟、弟媳、妹妹、侄儿、侄女，刚从东北（她最后当锦州女子师范学校校长）逃到上海，也被送到四号桥。柏杨跟她一照面，就拉她跟她一家人同行。于大姐是一个小心谨慎的人，问柏杨说：

“你要不要先跟吴主任谈一谈，我们再去。”

“用不着先谈，我完全当家。”

这是已经落伍了的两肋插刀性格，不过，时间确实来不及，海军码头到四号桥足有十数公里之遥，公共汽车转来转去，到了码头，太阳已快落山了，岂能回来再去？就这样的，他们上了登陆艇，在甲板上打下地铺。当夜，海军码头一片清静，只看到市区万家灯火。

第二天一早，登陆艇缓缓驶出吴淞口，长江浩荡，心思万端，默默无语，渐行渐远，终于海天一色。这样的缘份，使柏杨离开上海。当他再回上海的时候，已在四十年之后。

登陆艇在台湾左营军港登陆，当时就听说有位“青干班”同学在海军总司令部做事（“青干班”教育长桂永清将军如今当海军总司令，依照当时军中习惯，他带了好多“青干班”同学到海军），于是，柏杨找到在青岛曾经碰过面的侯洵。侯洵曾任青岛海军司令部军法官，国军阵营中少有的青年俊杰，尤其他贵为军法官，却一贫如洗的操守，令柏杨尊敬。又找到同是青干班同学的岳家军，他确实是岳飞的后裔，和一个护士小姐结婚，住在日本式的军官宿舍里，一个家整洁而安定，使柏杨大大的羡慕。后来又找到在海军士官学校任政治部主任的赵诚，赵诚劝柏杨留在士官学校当教官，他没有经过思考就满口答应。可是等了二十多天，赵诚的签呈被上级批驳，因为那个时候，正在人事冻结。人生的道路上，一个小石子有时候都会使你转变方向，走入另一个世界。当时赵诚的签呈如果批准，柏杨一定会跟赵诚、岳家军、侯洵一样，四十年后，从上校职位上退役。

左营无地栖身，于是向吴文义先生告别，北上台北，这时候才开始真正的深入台湾本土。柏杨从没有爱过一个地方像这样一下子就爱上台湾，没有什么大道理，也没有什么口号，只是在很多细节上，体察出自己这份感情。高耸云际的椰子林，只有童话书上才有，现在正到了童话王国。仿佛家家户户都有一个水井，水井旁边都有一个水池，装着满满的水，明澈而清凉，舀一瓢浇在头上，能使每一个毛孔都感觉到舒畅。还有，到处都有潺潺溪流，包括台北市，台北街道两旁的排水沟，都清澈见底，小鱼游来游去，还有小小的像小姆指一样可爱的螃蟹。柏杨对黄澄澄香喷喷的香蕉尤其钟爱，对一个一辈子都没有见过香蕉的北方人来说（他这一辈子其实曾见过一次香蕉，是在开封水果店里，皮都变成漆黑，弧单单的一只挂在梁上，价钱贵得吓死人），那种诱惑力非常强大。柏杨买了很多根，装在上衣两个口袋里，即令在左营那个严肃的海军基地，他也是一面走一面吃，一直吃到口吐酸水，再也不能吃为止。至于凤梨，那更是仙果，北方土著不但没有吃过，也没有看见过，甚至没有听说过。真正使他爱上这个地方的是岛上的居民，那时候，他（包括几乎所有的外省人）根本不知道岛上竟拥有三个族群，一是马来族，被称为山地人的原住民；另一是华人后裔的被称为闽南人或福佬人的漳州、

泉州人；另一是同属华人的客家人。大家的语言并不相同，但对他并不重要，因为反正谁的话他都听不懂，因此也无法分辨他们语言的差异。这时候政府开始推行国语（北京话），柏杨虽然不会说北京话，但他那一口河南土话讲慢一点，也还可以让人听得懂。借着这样的交流，有生以来他第一次感觉到在外地被接纳——在四川的时候，他是外省人（下江人）；在东北的时候，他也是外省人（关里人）；现在来到台湾，身份并没有改变，照样仍是外省人（大陆人），可是，没有一个地方使他感觉到像台湾这样的，有一种气候、土壤、人情、风俗融合在一起，令人感到被接受的温暖。

台湾中华人的两大族群——闽南人和客家人，都有一种移民的性格，那就是包容性。从大陆来的外省人，大致上分为北方人和南方人。北方气候严寒，冰天雪地，生存不易，对南方的“三秋桂子，十里荷花”有梦寐的遐思。和南方人比较，柏杨觉得南方朋友的胸襟比较宽大，人和人相处尽可能的维持礼貌，保持从容，为自己也为别人留余地。一个穷苦没落的朋友前往投靠，他们总会善言接待，献一杯茶。而北方人比较紧张，朋友一进门，主人第一件事往往就是哭穷，把自己形容成一级贫户，以使进门的朋友在听到主人即将饿死的惨境之下，不能开口求援，只好起身告辞。

这些以往的经历，很快的就使柏杨爱上这个番薯形的岛屿，即令后来在这岛上受了很多苦，甚至几被枪决，但他的感觉没有改变。

从左营搭火车，他几乎一路吃香蕉吃到台北，他不知道吃香蕉和吐酸水之间有什么关系，所以吃了又吐，吐了又吃，一直吃到实在吞不下去，这就是俗语所说的“吃伤了”才止，所以几乎足足有两三年之久，他一根香蕉都不吃。

到了台北，又是人海茫茫，不知道向谁投奔。在火车上，柏杨听到一群青年学生说：台湾省教育厅在火车站前的七洋商行（就是现在天成饭店那个位置）被腾空的大楼里，设立流亡学生招待所，而且有饭供应。他就随那群人到七洋商行。一进门，只见有好几百人挤满在里面，听候教育厅分发学校。柏杨不是在校学生，连登记都没有办法去办，每天唯一的事情，就是躺在床铺上，仰望着天花板，又回到上海四号桥警察公寓招待所那种绝望的日子。

就在这个时候，南京陷落，接着上海陷落，台北人心慌乱。

## (21) 莫名其妙成『匪谍』

珞珈山的“青干班”是一个政治机缘，时间虽然只有一个月，但是它却集结了足以影响若干人前途的社会关系。一九四五年，总统蒋中正的儿子蒋经国，在重庆浮图关中央训练团原址，创办了中央干部学校，招考研究部第一期（奇异的学制、奇异的名称），完全是蒋经国私人干部培育中心，那些研究部第一期的若干学生，曾经主宰台湾政坛三十年。蒋经国用人的标准，第一顺序就是研究部第一期的学生（至于研究部第二期，以及普通科学生入学的时候，蒋经国的兴趣已经转移，不再重视）。所以，六十年代台湾政坛上，有一句谚语说：“非干不行。”“干”是个双关语、指你要想当官，可是非“干部学校研究部第一期”出身不行。蒋经国先生想跟国民党的中央政治学校（稍后改为政治大学）媲美，他效法中央政治学校的架构，既没有在教育部立案（他如果立案，易如反掌，但蒋家父子的作为总是表现出威权凌驾法律之上），又没有冠上三民主义青年团字样，没有人知道这些干部是谁的干部。

“青干班”的初名是“三民主义青年团工作人员训练班”，后来改为“三民主义青年团干部训练班”。蒋经国创办了中央干部学校以后，为了安抚和吸收当时已在全国各地青年团具有实力的“青干班”同学，就把“青干班”改为“中央干部学校第一期”。“青干班”同学经此一改，也就成了蒋经国的学生。学生虽是学生，却到底不是真正的学生，所以当时也有一个比喻：“青干班是门神，开门时在里面，关门时在外面。”不过，“青干班”同学也就在这门里门外，吃一点政治上的零碎点心。

柏杨就在走投无路时，遇到了“青干班”年纪最大的学长李荷先生，他那时候已当上立法委员。他的一位朋友瞿绍华当教育厅人事主任，一纸派令，柏杨就成了屏东农业职业学校的人事员。

屏东在北回归线之南，比北台湾更接近热带，柏杨到差后第一件事就是去买两件这辈子第一次穿的香港衫，在独自一间的小屋里，安静地过日子。每天上班下班，打算终老天年。可是好像是上天注定的，坎坷的路程不但没有结束，还不过是刚开始，和以后他所受到的灾难比起来，在大陆上那些折磨，实在是微不足道。

柏杨的薪水，除了生活开销之外，添购了一些衣服，还买了一架可以听短波的收音机，每到晚上的时候，就收听一段北京人民电台的京戏，当然也附带收听几句华南一带战况的报导。当时台湾已经戒严，收音机也不普遍，他每晚开收音机，除了扰乱邻居的安宁外，当然也引起别人的注意，尤其是特务的注意，可是他自己却没有丝毫警觉。

于是，常常的，像在沈阳、北京时一样，向同事们谈论国家大事，尤其糟的是，柏杨特别赞扬人民解放军纪律严明，不拿人民一针一线，对撤退到台湾的国军行径，深恶痛绝。恰好报上一则消息，一个军人没有车票，硬闯出车站，收票员尾追到军营，要他补票，结果招来一顿殴打，使柏杨感到羞耻。晚上，快要入睡时，两个普通装束的中年人进来，很客气的要柏杨前去谈谈。

“去哪里谈？”

“你去了就知道。”

就这样的，柏杨被吉普车载到火车站，押上火车，一直驶向台北。押他

的人，不但没有语言，在火车的晃动中，也看不清他们的表情。他像木头一样，被夹在中间，满腔愤怒、一点都不知道事态的严重。第二天，天一亮，到了台北，他们把柏杨送到设干青岛东路的台湾保安司令部军法处看守所，一进大门就听到从一排木栅里面，发出哄堂的叫声：

“欢迎新客人！”

柏杨被推进其中一个像兽笼一样的房间，里面塞满了赤背短裤的囚犯，他爬到房间的一角，在一个庞大的马桶旁边坐下。

“你犯了什么罪？”有人问。

“不知道。”柏杨说。

“哈！你明明是一个匪谍，怎么说不知道？”

这时候他才有点害怕。

“来到这个地方的人都是匪谍！”

“匪”就是共产党，有时候再加上一个“共”字，成为“共匪”，“谍”指的是共产党的地下工作人员。以后四十年间，“匪谍”成为台湾人民一种最可怕的巫虫，不小心碰上，立刻家破人亡，身败名裂。就在看守所，柏杨跟一位年龄相若的人，谈得非常投契，他叫杨启仲，是一位中学老师，因为同事在他的宿舍发现一本艾思奇编的《唯物论辩证法》，被送到这里，已经两个月了，还没有问过一次话。

押房拥挤不堪，只能容纳十几个人的兽笼里，有时能塞进三十几个人，大家只好蹲在那里，轮班睡觉，伙食既简单又肮脏，大多数人都泻肚，马桶就在身边，臭味还在其次，有时还有粪汁溅出来。柏杨无法静下来思索怎么会落得这种下场，陷入他从没有想过的困境，呼天不应，唤地不灵，没有人告诉他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也没有人指引他怎么自救。从每天不断塞进来的囚犯口中，知道外面正大肆疯狂逮捕，一个人因身上插着红花在新公园被捕，一个士官因不小心掉了帽徽被捕，但很多人都是因为“偷听共匪广播”，柏杨胆怯起来，万里渡海，难道为了到台湾断送残生？早知道应逃回辉县，或逃回息县，反正不过如此！

就这样，柏杨受到漫长的囚禁，没有人问一句话。直到一天上午，守卫叫出去二十几个人，带到大厅，接受审判，每个人询问的时间，大概五分钟。柏杨进去后，台上坐着一位法官，他已十分疲倦了，一脸的不耐烦。柏杨还没有站定，他就开始宣判说：

“阅读非法书刊，为匪宣传，处有期徒刑十五年。”

像五雷轰顶一样，柏杨哀声叫道：

“法官明鉴，我从没有阅读过任何一本共匪的书，就是在北平的时候也没有。”

“你没有看过，这《唯物论辩证法》是谁的？”法官问。

“法官明鉴，那不是我的书。”

“不要狡辩，带出去。”法官说。

他挣扎哀求说：

“法官明鉴，那不是我的书。”

“不是你的书，”军法官说，“难道是我的书！”

一个书记官附身跟法官耳语，法官自言自语说：

“杨启仲的判决书，怎么放在这里？你叫什么名字？”

柏杨把名字告诉他，法官翻了又翻，自言自语说：

“ 又是一个没有判决书的人，带回去候审。 ”

柏杨回到押房，而杨启仲就再也没有回来。时至今日，不知他可仍在人世？仍在台湾？

终于有一天，他再被叫到军事法庭，另一位军法官宣布说：“ 窃听共匪广播，处有期徒刑六月。 ” 而就在当天，他已羁押了七个多月，他高兴得几乎要喊他青天大老爷，可是面对的问题是到那里去找保人？全台湾恐怕没有一个人肯保一个匪谍。押解他的那个班长（囚犯对看守法警的尊称）看出柏杨的困难，告诉他说：

“ 如果你有八十块钱，我可以替你买一个保人。 ”

八十元是一个大数目，幸而柏杨身上恰恰还有八十元，收押时被收去保管、言明出狱时领出交付。就这样的，他走出看守所，但已囊空如洗。当他跨出那个小门，仰天叹一口气，发现又一次的四顾茫然，无处投奔，身上又无一分。感谢神灵，就在这个时候，忽然遇到刘滉尘。他在工矿党部做事，恰巧路过那里，而工矿党部设在台北市华阴街，距离不远。柏杨向他借返回屏东的路费，刘滉尘把他带到工矿党部，警告说：

“ 你被人带走，一去半年，有什么理由相信学校还保留你的职位？你应该先打个长途电话问个清楚。 ”

柏杨惊醒过来，捏造一个姓名打电话去试探，对方直率说：

“ 郭衣洞已经被开革了。 ”

这就是柏杨的一生，他总是不断的失败，而且是惨败。

他被神秘逮捕，依当时白色恐怖的气氛，应是有去无回，可是却被草草释放，连判决书都没有给一张，似乎和国际局势有关。在他坐牢的七个月期间，韩战爆发，发表白皮书本来要放弃国民党和蒋中正的美国，突然重新把台湾抱起，从弃儿变成宠物，美国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国民政府的声势一下子从谷底升到中天，信心也随着倍增，对那些人山人海的政治犯，无法一一处置，才把一些他们认为不足轻重的案件作一清理，大批释放，柏杨不过是幸运者之一。

但幸运只能使人恢复自由，不能恢复工作，柏杨只好到刘滉尘服务的工矿党部睡地铺度日。在那个时代找工作真是艰难，尤其是台北的雨似乎比南部多得多，每一次穿着湿淋淋的皮鞋到一些长辈家拜访，在玄关那里简直无法脱鞋，除了袜子湿淋淋的不能上榻榻米以外，袜子上的破洞，也使柏杨难堪。就这样，失业和破洞的湿袜子，就像连体婴一样的在柏杨记忆中不可分割。在台北碰壁又碰壁后，忽然得到李森的消息，他在省立新竹中学当人事员，于是投奔李森寄住。不久，在省立台南工学院（后来改制为国立成功大学）附设工业职业学校当人事员的范功勤来信说，他可以介绍柏杨到他们学校当历史教员。虽然，柏杨对历史一窍不通（事实上，学校的课程，他没有一门通），不过他已没有什么选择。

“ 附工 ”，是他最安静的一年，认识了担任教务主任的戴瑞生、文兰华夫妇，成了他们家庭的常客，并且收他们的儿子作为义子。他们是一对非常厚道诚实的朋友，柏杨漂泊半生，终于尝到一份温馨。而三十年后，当他从火烧岛回到台北，他们夫妇立刻给他寄来一个月薪俸的巨款。

柏杨住在“ 附工 ” 教职员宿舍，只有六个榻榻米大，但他真是盼望就这样的度完他的余年，他太疲惫了。可是苦难不会这么轻松放过他，第二年，学期快要终了时，大家下学期的聘书都已经发下，只他没有。范功勤暗中告

诉他说：

“你的名字报到教育厅，教育厅一直没有批准，因为你有被屏东农校开革的纪录。最好还是早一点离开，找一个县立的或私立的学校，他们教师的资历不报省教育厅，只报县教育局，可能蒙混过去。”

于是，柏杨带着简单的行李，再一次踏上流浪的道路。

一个外省人，在光复初期，曾入过狱，有被开革的不荣誉背景，根本不可能找到工作。在炎炎烈日下，他不停的一间学校一间学校访亲问友，结果得到的答案是一样的：

“没有空缺！”

最伤感的一次是去埔里中学，那个美丽的镇和优雅的学校，使柏杨爱不忍去，可是教务处商主任却无力帮助。但他告诉柏杨，东北大学校友杨德钧，在南投县政府当教育科长。对柏杨来说，这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急急赶往南投，杨德钧义不容辞地把他介绍到草屯初中当国文教师。

草屯是一个温馨的小镇，就在那个小镇和小规模的学校里，他结识了当时同事、后来成为历史学者的朱桂先生。而那些学生孩子中，有好几位，像后来在师范大学当教授的廖吉郎、在电信局当处长的曾武臣，以后一直和柏杨保持联络。

草屯是那么美，尤其是教员宿舍建在小山丘上，上下课时要走十分钟的马路或田径，悠然自得。夜晚，山丘上只有风声，他就在孤灯下，读了不少学校图书馆有关文学的丛书。但他的心并不能安定下来，一直到证件被县政府教育局批准，薪饷被核定之后，才长长地舒一口气。

第二学期还没有结束，柏杨的一位老师胡蒂葵先生，从台北来信，叫他抽空北上。他遵照指示去了，心想要到台北这个首善之都去，他这个南部的土包子，应该注意一下穿着，于是，临去前，特地用最低的价钱买了一套蹩脚西装，这是平生第一次穿西装。胡老师原来在东北资源委员会当处长，柏杨以为他可能介绍一个永远可以摆脱假证件阴影的其他工作。（22）受歧视的基督徒柏杨生在一个没有明确宗教信仰的家庭，一个人孤独地在辉县上小学时，照顾他的表婶，是一位乡下农村妇女，恐怕是佛道混合祖先崇拜的一种泛宗教徒，经常请一些三姑六婆型的老太婆，在家演出神灵附体节目。当焚香叩头之后，“九天仙女”（当时辉县民间最盛行的女神，她是天老爷玉皇大帝的女儿，她不是佛教的神）就从天上下凡，附到一位老太婆身上，那老太婆随即打哈欠、流泪，低声吟唱：“九天仙女下天庭，来到人间走一程，将是坐在高堂上，不知请俺啥事情？”善男信女就跪下来，向她提出疾病、平安等等疑难杂症，九天仙女会一一回答。他从小不信这种装神弄鬼，有时他肚子痛，表婶就请九天仙女给他扎针，九天仙女虚拟一个手势，他就故意的躲开，让那位老太婆仍煞有介事的继续扎针，而且念念有词。柏杨却提醒她，大声叫说：

“针扎到柱子上去了！”

老太婆因为被拆穿而老羞成怒，一拍桌子，站起来就走，一面走一面说：

“不诚心，不会灵！”

不过，他虽然不信神鬼，却非常喜欢那种神秘气氛，尤其是焚出来的香味，他常幻想，日后长大了，要在四合院角落空地上，盖一座小庙，供上一尊佛像，点上三支香火。

他跟宗教的关系，从那个时候就开始；而跟基督教的渊源，却延后了六



七年。一九四二年，那时他正调到偃师，有一次日本发动空袭，他躲在一个山麓的防空洞里，这时除了他，另外还有一位将近中年的妇女，手里拿着一本圣经。当日本飞机低空掠过，发出刺耳的噪声时，她忽然跪下来，举手向天，祷告说：

“主啊！保佑我们偃师的人，保佑我们——防空洞里两个人！”

柏杨大声说：

“那一个人是谁？”

她缓缓说：

“那一个人是你。”

柏杨真是一个野生动物，不但不知道感谢，也不知道欣赏她的慈悲，反被这突然而来的关爱弄得不知所措。

“你叫谁保佑我？”

“当然是主！”

“谁是主？”

“主是耶稣基督。”

“那个钉死在十字架的洋鬼子吗？”

“洋鬼子”是那个时代对外国人的通称，即使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中国，还有许多人改不了口。

“他不是洋鬼子，他是主！”

柏杨开始奚落耶稣基督，那个妇女，呢喃的祷告说：

“主啊！宽恕他！他做的他不知道。”

这一幕在警报解除后，他就完全忘记。

然而，十多年后，当他在台北，从保安司令部看守所出来，投奔新竹李森时，一个星期天上午，在新竹街头徘徊，看到一群基督徒出入教会，忽然像有一个灵光在那里一闪，使他看到防空洞的那一幕，每个带着圣经年龄稍长的女信徒，在他看起来都像防空洞里的那位虔诚的妇女。于是他身不由己地随着她们走进教堂，一个人孤伶伶的坐在后边，听牧师讲道，然后一个人再孤伶伶的回到宿舍。从此，他几乎每天都要去教堂一次，遇有聚会时，也顺便参加。不过，他跟其他任何教友都没有来往，只买了一本圣经，沉缅到里面。

每次翻开圣经，偃师那位女信徒宽恕他的图案，就历历重现眼前，甚至，他可以清晰的看到那位女信徒身边的碎瓦乱石和一些微弱小草。

在台南“附工”教书时，他参加安息日会。安息日会是基督教中一个特别的教派，它跟其他所有的教派都不一样，它是守星期六的。那就是说，星期六是安息日，在这一天，大家都不工作，而普通教会休息的星期日，正是安息日教会的星期一。这样说来，会把人说得糊涂，只因为全世界只有中国人才把 Monday 译成星期一，Tuesday 译成星期二，使人对日子有一种顺序的感觉，如果像日本人一样，把 Monday 译成月曜日，Tuesday 译成火曜日，对安息日就不会那么陌生了。其实现在的月历上，也可以看出安息日的正确性。第一排是星期日（日曜日），普通教派是日曜日休息的，还没有工作就先休息，岂不违反圣经旨意？而安息日会，在工作了六天（星期日到星期五）之后的水曜日（星期六）才休息。

这一段教会经验，使柏杨在应胡蒂蔡老师之约，到了台北后，踏上做梦都梦不到的另一个历程。

他满怀期望地到了台北，才发现胡老师并不是介绍工作，而是介绍女朋友——齐永培女士。当然，没有人知道他在大陆上还有婚姻，他更不会自动宣扬。不过，事实上，大家也并不是全不知道，来台湾的外省年轻人，连同年长的老一代，几乎都包容一件事，男的能婚就婚，女的能嫁就嫁。那时政府有一个连自己都不相信的口号：“一年准备，二年反攻，三年扫荡，五年成功”。重返大陆虽然不像后来那样完全绝望，但是，也都知道，那件事是多么的渺茫，也都互相体谅，甚至鼓励在台湾落地生根。

和永培第一次见面的时候，齐家有位客人在座，是台北仁爱路浸信会的长老，兼“国际青年妇女协会函授学校”教务主任，发现柏杨对圣经很有心得之后，就邀柏杨到他们设在台北中山北路的函授学校当教师。这是一个远离证件、核薪，开除，革职等噩耗的好机会，而且他们的待遇很好，每月美金三十元，折合新台币一百二十元，而中学教员每月才七十元。

当暑假开始的时候，柏杨离开草屯，到了台北，立刻去函授学校上班。第二年，他和永培结婚，生了两个男孩，大儿子城城，小儿子垣垣。他们曾经过了三四年的平静日子。永培朴实、勤俭，是一个可敬的女性，可是两个人的性格发生严重冲突，他第一次证实性格决定命运的真理，这是一个错误的婚姻。

函授学校对柏杨的帮助很大，他本来就喜欢读圣经，圣经事实上是犹太人的古代史，一个故事接一个故事，十分引人入胜；而批改学生作业和回答学生提出的问题，都需要充分的圣经知识。他发现，对一个东方人而言，如果不了解圣经，简直无法了解西方，圣经是西方文明的基础。

不过，函授学校不是一个久居之地，归根究底，那里不能避免种族歧视，不但如此，还有严重的阶级存在。这是柏杨第一次和外国人共事，特别敏感，而且愈来愈觉得不对劲，譬如：外省人（mainland）每人每月美金三十元，本省人（local）每人每月只有二十五元，美国人则又是另外一种更高的待遇，这种措施使柏杨对基本上的教会精神，感到怀疑。最后，终于再一次闯下大祸，被赶出大门。

那是不久以后的事，一九五三年元旦，校长司派克（Spark）先生宣布：“本校没有任何假期，照常上班。”而当时政府规定，元旦是开国纪念日，放假三天。中国籍职员都敢怒不敢言，可是却没有一个人敢向外国人表示异议。当他们建议教务主任、总务主任向校长反应时，两位老先生都微笑摇头，不作任何答复。柏杨并不比别人更为勇敢，但他注意到，当七月四日美国国庆时，美国人都不上班，只有中国人上班。而当十月十日中国国庆（指国民党当局所谓“国庆”）时，美国人也不上班，中国人还是照样上班，再加上这次元旦事件，中国教师没有一个人敢提出抗议。柏杨决定用他的方法表达出来，表面上看来只是反抗美国人种族歧视，其实，他更愤怒这些中国人的畏怯和奴性。

元月一日、二日、三日，一连三天，柏杨像幽灵一样，在台北大街小巷逛来逛去，准备接受即将来临的风暴，其中，也一度懊恼的警告自己：“你这算干什么？刚吃了三天饱饭，就竟然向外国人挑战！”

元月四日，他假装没有发生任何事情似的，走进办公室，依照平常规矩，悄悄坐上座位，正庆幸一切平安，心里想顶多扣三天薪水罢了。司派克先生已呼唤柏杨的名字到他办公室去，语气温和但态度坚定，他问：

“你一连三天没有上班，是吗？”

“是的。”

“有什么原因呢？”

“因为这三天是我国开国纪念日，全国放假。”

“但是我宣布过，我们不放假。”

“我认为我们应该放假，因为这是我们国家的纪念日。”

“基督徒是无国界的，你不适合这里的工作，会计室已经给你结好帐了，请你离开。”

“我接受，但是，明天早上的早祷，我是不是可以来主持，作为最后的告别式？”

这是柏杨临时被逼出来的反击诡计，司派克先生当然不知道，所以他立刻答应。

在基督教团体，每天入座办公以前，全体职员都要聚集在一起，由一位年高德劭的兄弟姐妹主持，例行的做一个简短的早祷，然后各回岗位工作。

第二天一早，柏杨提前十五分钟赶到妇主协会（一分钟都不敢迟到，迟到便失去机会），大家团团坐定。他简单说几句跟大家道别的话，然后开始祷告，他大声说：

“主啊！天上的父！感谢赞美你赐给我们今天团聚的机会，从明天开始，我就要离开这里，到别的地方侍奉你。我已经被开除，只因为元旦一连三天是我们国家的开国纪念日，主啊！我相信你会允许你的子民庆祝他们的国庆。我们千辛万苦，颠沛流离，逃亡到台湾，深知我们的国家既危险又衰弱、在世界万邦之中，微不足道，可是我们总算有个国家。你已经允许你的子民以色列人复国建国，因为你爱他们，难道你不允许你在台湾的子民爱他的国家吗？我们多么庆幸，还有一个国家，即令是弹丸之地，主啊！……”

祷告到这里的时候，听到大家的抽噎，柏杨自己也被自己的哀伤感动，泣不成声。

这个早祷的地方，恰恰位置在会长郝益民先生房间的门口，跟校长室只隔一个窗子，因为会长一口流利的中国话（而且是河南开封话），所以柏杨的祷告，字字句句，他都听得清楚。一时大家自悲身世，哭成一团，早祷结束之后，会长把柏杨叫到他办公室，立刻教他复职，并且给他两个星期的假期休息。柏杨受宠若惊，但他不愿把他的悲愤变成威胁，只要传送出去就够了。当他走出校门时，校长的秘书兼翻译追上来，告诉他说：

“基督教是无国界的，你不要太坚持！”

“没有国界吗？”柏杨瞪着他说，“看看摩西怎么出埃及的。”

就这样，他离开了青年妇主协会。基督教给他的裨益太多，所以虽然离开时并不愉快，不过他对这个协会和这位会长，一直心怀感谢。

## (23) 一言难尽『救国团』

柏杨的野性，与其说是原始的，或浪漫的，毋宁说是倾向文艺的和文学的。他从少年时代，就被各式各样的武侠小说迷住，还几乎浏览了当时大部分传统的社会小说，像《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甚至看不懂的《儒林外史》，和十分艰深、用文言文写的《聊斋志异》。

对一个十几岁的孩子而言，他所读非主流的书，占去的时间实在太多，假定能用其中三分之一的时间去读算术，三分之一的时间去读英文，而不去读家长和教师们一提起来就青筋暴胀的非主流书籍，这一生一定过得平平顺顺，快快乐乐，会和现在大大的不同。

百泉初中一年级的時候，才第一次接触到中国文坛上的旷世名著——《红楼梦》，但是对这本书的印象不佳。因为四大厚本已看完了两本，还看不到打架，他立刻就认定那不是一部好书，把它扔得远远的，真正使他崇拜的第一位现代作家，却是张恨水先生。

在高中入学考试前，为了准备功课，到开封图书馆读书，偶然间从书架上发现一本张恨水写的《啼笑姻缘》，立刻被其中的情节抓住，每天都看到下午闭馆，被馆员吆喝赶走。男主角樊家树与女主角沈凤喜，何丽娜的传奇式恋爱，使他走到街上都一直惆怅若失，几乎把新学会的平面几何忘光。

从《啼笑姻缘》、《金粉世家》、《大江东去》，直看到歌颂国军常德保卫战的《虎贲万岁》，只要是张恨水写的书，他有见必买，一直到有一天，买到署名也是张恨水作的小说，看了几页之后，忽然觉得完全不对劲——只知道不对劲，不知道哪里不对劲，反正怎么看都不对劲，翻查版权页，才发现作者是“张恨冰”，冒牌蒙混。从此，他就以张恨水的知音自居。

张恨水的作品，采用中国传统章回形式，这是最困难的一种形式。仅只是章回的题目，如果没有相当程度的文学素养，根本就写不出，而且对话密密相接，那才是真正的上臻功夫。

考上开封高中后，才开始接触完全采取外国形式的新文艺。看过当时很多著名作家的作品，最喜欢的还是鲁迅，特别是鲁迅小说的沉重和积郁，那种每一个字都像石磨一样在心灵上转动的压力，把问题冷峻地刻画出来，他的小说对柏杨的影响，极为深远。

不过，真正对他写作启蒙、以后对他写作有帮助的，却是一部既平凡而又奇怪的书，那就是《作文描写辞典》。自三十年代大陆，直到七十年代台湾，市面上不知道出过多少种版本，内容大致上分为人物篇：“少女”、“流浪汉”、“老人”，“病人”、“秃头”，风景篇：“小溪”、“河流”、“斜阳”、“小径”……还有感情的描写，像“失恋的少女”、“恐怖的古刹”、“火灾”……等等，至少也有四五百页，编者从各位名作家的作品中，寻找有关段落，文后都注明摘自某作家某书。大陆是那么的广袤，书的种类又是那么的繁多，而价钱又是那么的贵，不要说是一个学生，就是中产之家也无法看遍所有文艺作品。可是，却可以透过这本书，一窥文坛全貌，尤其是摘录下来的，都是精彩片段，读者很容易由惊讶而好奇，由好奇而购买他们的书。柏杨就是从这样的“类书”中，兴起对文艺的兴趣，和对作家的崇拜。像对丁玲，有一段描写她挨家逐户寻找她的丈夫胡也频，使人真为她的处境哀伤（胡也频那时候也不过二三十岁左右吧，因为思想左倾而被国民党特务逮捕，悄悄枪决）。其他作家，像章衣萍、沈从文，也都是靠《作

文描写辞典》引荐，进入他们的世界。

到台湾后，以往多年的南北漂泊，使柏杨心中产生很强的写作冲动，只是没有机缘。青年妇女国际协会的事情发生后，他写下平生第一篇散文，投寄到当时台湾最大的一份杂志——《自由谈》，而且被采用发表。题目已经忘记，不过影响倒是记得的。刊出后，当时联勤总部财务署长吴嵩庆先生写信邀柏杨到他家共餐，吴先生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向柏杨肯定一个基督徒有爱自己国家的权利。而他的很多朋友读到这篇文章，才知道他身在台湾而且失业。百泉切中的老师、也是百泉乡师范学校校长李振云先生，教柏杨去他担任校长的台北县立树林中学当教员，他再一次想到安定，永远安定。

可是，第二年，珞珈山“青干班”同学包遵彭，出任蒋经国成立的中国青年反共救国团文教组组长，邀柏杨参加。树林位于台北市之南，过去，他每天要徒步三十分钟，由他住处走到万华车站，搭车到树林，下车还要走十几分钟才到学校，遇到雨天，沿途泥泞不堪，而救国团总团部就在台北市中山北路。但是，最重要的原因，却是说不上口的，仍是他的证件出了问题，因为他始终没有东北大学文凭，来台湾后，一直用同学们保证的“证件遗失”证明。在树林中学，虽然通过了核薪这一关，但台北县政府曾用公文催促他补缴正式毕业证书，并且告诉他，教育部现在已经开始颁发正式毕业证书，担保证明不能再用。问题是，他当然不敢申请正式毕业文件，因为明知教育部有开除他的档案，只要申请，就等于自投罗网。仅这一点，就够柏杨欢天喜地地转向救国团。从此，大家把他归类为蒋经国的人。

很多人认为中国青年反共救国团是一个特务组织，其实，当然不是，它只不过是蒋经国培植私人势力的迷你王国。总团部设有若干组，最初以数字为顺序，以后取消数字，直接标出工作的内容，像青年活动组、青年服务组、文教组、妇女组……具有政党组织的雏型，蒋经国是主任，胡轨是副主任，李焕是主任秘书，这是一个单调的团体，被外人称为太子门下，但却绝对不是特务，因为特务是一种专业，救国团不够资格当特务，况且蒋经国另有特务系统，不需要救国团介入。柏杨到救国团不久，就在包遵彭桌上，看到蒋经国致党团高级干部的一份签名密函，大意说：

“有很多同志反对我接管情治机关，认为那是一种特务工作，不符合我的身份……”

蒋经国就这一点加以解释，然后，他说了一段重要的话，他说：

“关于情报治安工作的法律问题，我曾经和戴笠同志谈过，他说：革命就是法律，我们身负革命重任，不能处处遵守法律。国家危急存亡之秋，以此与大家共勉。”

柏杨忽然警觉到，他看到了一份他不应该看的机密文件，急忙回到自己的座位。

不久，总团部搬到峨嵋街，发生了《自由中国》事件。

《自由中国》是国民大会代表雷震先生创办，受到胡适先生支持，它传播民主自由思想，对社会弊端的直言不讳，在五十年代，成为台湾社会唯一的一座灯塔。那是撤退到台湾后，喘息舐伤的时代，大陆上的惨败，不但没有使国民党有任何醒悟，反而认为：

“共产党的成功，是我们国民党太善良的缘故！”

于是更加强党化教育和组织训练，最高统帅蒋中正先生的领袖地位更加巩固。只有《自由中国》杂志，呼吁希望国人从腐败、独裁、封建中觉悟。

柏杨到台北后，不久就跟《自由中国》的一些成员，包括社长雷震先生、编辑聂华苓女士、傅正先生，来往密切，他对《自由中国》的言论，从头到尾，由衷认同。

到救国团后，《自由中国》对国民党的抨击更加激烈。有一次，发表了《那是什么东西》一文，质问学校旗竿顶端的国旗下面，另外还有一面绿旗，它是什么？蒋经国为此大为震怒，因为那正是救国团的团旗。在每个星期三上午，由蒋经国主持的团务会报上，他严厉的对与会的干部说：

“你们一定有朋友在《自由中国》，我命令你们告诉他们，他们这样做是反动的，要自负后果。”

柏杨当然不会把这些话转告，不愿因他传话使双方面的敌意更为增加，可是心里同情《自由中国》。

团旗事件后不久，爆发了另外一个重大的《祝寿专号》事件。

蒋中正大概是世界上最喜欢庆祝生日的一位政治领袖，五十岁生日的时候，远在南京的国民政府就发动了献机运动，所献飞机排一个中文的“五十”二字，在天上飞翔，报上登出照片。到了台湾，每逢他生日那一天，都要举办一次祝寿活动，所有的媒体像从一个模子里浇出来的：刊出“普天同庆”、“薄海欢腾”标题。最有趣的是，蒋中正一面欣赏部属为自己祝寿，一面又下一个“手谕”，交给中央社送各媒体发表，手谕上说：

“听说要为我祝寿，值此国难期间，实不可行，希望转告各单位，确切遵照。”

大意是这个样子，原文已不记得。结果是祝寿场面越来越热闹，花样也越来越令人叹为观止。在台湾这个小岛上，已听不到任何追究大陆失守责任的声音，而只有众口一词地赞美民族复兴的救星，蒋中正自己也终于相信这一些都是真实的。

一九五六年十月，全岛各机关学校已经开始筹备祝领袖华诞，蒋中正忽然颁发一道命令，像古帝王“徵求宣言诏”一样，要各方面不要顾忌，尽量对政府提出批评。

一个民主国家的元首，永远不会下达这种要人民批评的命令，因为舆论每天都在批评。由这项命令，可看出蒋中正的心理状态，和当时舆论窒息的程度。

《自由中国》服从蒋中正的命令，出版了一本厚厚的“祝寿专号”惹下大祸。国民党发动四面八方全方位围剿，胡适建议蒋中正应该总揽大局，不必在每一件小事上分心，也就是提议分层负责、信任专家。国民党抨击胡适包藏祸心，目的在剥夺领袖的权柄，使领袖成为无权无能之辈。另一是《自由中国》主张推行民主政治，建立法律尊严，要求给人民一个明确的言论轨道，国民党抨击这是一种可怕的“思想走私”。

国民党自从撤退到台湾，一提起共产党就心胆俱裂。蒋经国接管情治系统后，有鉴于过去潜伏的共产地下党的泛滥，更变得歇斯底里。那时候有一部索菲亚·罗兰和马龙·白兰度合演的电影，最后，男主角拿破仑退到一个岛上，索菲亚·罗兰给他送换洗的衣服，相当轰动。而在一次团务会报上，蒋经国严肃地询问大家看过没有，大家说看过。

“那么，”蒋经国问，“说说你们对这部片子的意见。”

没有一个人敢开口，因为不知道他的意思何在。这在官场上是一个重要的法则，当你不知道顶头上司是什么意思的话，千万不要发言。当你被逼非

发言不可的时候，那就要看你的聪明了。于是，逼到最后，大家只好讲演技、景色、音效。蒋经国脸上逐渐露出厌烦，他说“你们完全没有深度，没有政治警觉。”

在大家惊愕的眼神中，他继续说：

“这明明是讽刺我们，讽刺我们退到一个小岛上，孤立无援。只剩下一个女人给我们送来破旧的衣服。”

第二天，场场爆满的电影就突然下片。这是柏杨第一次从高层那里得到启示：越是有权柄的人，他的神经崩得越紧，盲点也越多。当时，他几度想报告说：

“这部片子是我们退到台湾以前拍的，与台湾毫无关联。”但柏杨已经感觉到，蒋经国对任何逆耳之言，都听不进去。

在救国团期间，柏杨也有两件一生中难得遇到的顺心事。第一件是，他终于拿到东北大学毕业的合法证件。在这件事上，他深深感谢共产党。他得到消息，载运教育部所有档案的那艘军舰，从南京开往台湾，一出长江口，就改变航道，向北行驶，投共去了。换句话说，教育部现在根本没有开除他的档案，而只有一九四六年一本毕业生的名册，所有申请颁发毕业证书的同学，一律得到一份下列样式的证件：

“经查东北大学一九四六年毕业生名册中，确有某某某，特此证明。”

这真是上帝创造世界以来最大的喜讯，可是柏杨仍不敢亲自去教育部申请，因为被开除的那件事，一度轰动天下，尤其高等教育司，他不敢面对那种尴尬而且足以坏事的场面。于是他用“信海”战术，每月写一封信到高等教育司，高等教育司那些官员虽然每个人都知道他这个学生是被开除学籍的，可是他们苦于没有证据（证据在可爱的共产党那里，高等教育司总不能找两个同学证明他被开除吧）！

连续写了五个月的信，并扬言要向监察院和法院告状，高等教育司才不得不发给他一张教育部证明的大学毕业证件。不过，等他有了这个证件之后，才发现没有这个证件也行，因为忽然之间，他又收到国立政治大学发给的另一份毕业证书。讲起来真是传奇，因为蒋经国的当权，中央干部学校毕业的学历，也被政治大学接受，而“青干班”又是中央干校的第一期，就像拖油瓶似的拖到政治大学，成为他们的毕业生。

其次一件顺心的事，就是他被聘到成功大学教书。柏杨在沈阳时，曾在辽东文法学院当过副教授，当时不觉得什么，现在却是一个有利的经历，使他跃跃欲试，心想，能再到大学教书该多好！

当时成功大学校长阎振兴先生是柏杨的前辈，看他是救国团高级职员——副组长的份上，要他去教“三民主义”，他没听清楚教什么，就一口答应，听清楚了后，虽然想不教三民主义都不可能了。在那个以工科为主的大学中，他总不能去教平面几何吧！可是，他对外又不好意思说教三民主义，当有人问他教什么时，他总是支支吾吾说教《诗经》。一位朋友曾因此预言说：

“老郭，你的前途，就到此为止。”

“为什么？”

“你明明说谎，又没有说谎的本领——一说谎就结结巴巴的人，没有前途！”

不过，他确实教过《诗经》，不过只有两个小时，是代同事上课。事后，他非常佩服自己的胆大，什么都敢教，说不定那一天回到百泉初中教算术！

## （24）莫须有的『共匪俘虏』

柏杨在救国团有他的天地，除了上班时间以外，都在写他的小说。长篇小说集《蝗虫东南飞》，中篇小说集《莎罗冷》，短篇小说集《秘密》、《怒航》、《凶手》、《挣扎》，都在五十年代出版。也就在这个时候，开始有了小小的名声，受到文坛重视。那个时代，因为出版的困难，出名反而比较容易。

当时全国本来只有一个文艺团体——中国文艺协会，可是它一开始就被少数几个人把持，不肯放手，于是引起了窝里反，以冯放民、刘心皇、王临泰三位先生为首的一群作家，宣告脱离，在中国青年反共救国团支持下，成立了“中国青年写作协会”。真正领导人是救国团文教组组长包遵彭和副组长杨群奋，柏杨则是负实际工作责任的总干事。担任总干事最大的好处是，使他认识了五十年代大多数作家。

当总干事还有好处，当时台湾不但对外封闭得像一个铁桶，对内也很少旅游，只有中国青年写作协会会员不断组团作环岛访问，这在当时是一个石破天惊的行动。而更石破天惊的是，远组团分别访问金门和马祖两个军事重地，每一次都由救国团出面向海军总部申请一艘登陆艇，由海总在坦克舱搭起床铺，这不是一个普通民间团体所可以办得到的。

另一个好处是，每年暑假救国团都举办暑期学生战斗训练，在各式各样的战斗训练营中，特别成立一个战斗文艺营，这个营就交由青年写作协会主办，柏杨自然是主角。文艺营普通分为四组：小说、诗歌、戏剧、文艺理论。

——后来，柏杨离开救国团，尤其是入狱以后，所有该会的历史文献，对他都一字不提，手法干净利落，态度严峻，即令是图书目录上，遇到作者是柏杨时，“郭衣洞”也会被删去“郭”字，成为“衣洞”。

救国团的工作虽然使柏杨有所收获，但有时候也受到歧视。有一次，《自由中国》雷震先生邀请几位朋友到他家后院喝下午茶，来宾中一位是台湾大学教授殷海光先生。殷海光是谁，柏杨那时还不清楚，殷海光当然更不知道柏杨，但他一听到救国团几个字，立刻露出下屑的面孔，态度傲慢。柏杨总认为教授气质应该有相当涵养，春风化人才对；直到很久以后，他才知道殷海光所以有那样的态度，是他把柏杨归了“异类”的缘故。

救国团上自蒋经国，下到每一位职员，都把《自由中国》视为寇仇。有人警告柏杨，不要再和雷震他们来往，但他不能接受，因为内心里喜欢并且尊敬雷震先生，从不觉得和《自由中国》来往，是一种背叛团体的行为。当救国团发动四面八方围剿《自由中国》时，他没有写一个批评的字。不过他却在《自由中国》写过一篇短篇小说《幸运的石头》，描述一个人一辈子靠运气，而不是靠能力，步步爬上高位。

这篇小说写得并不好，但是却被认为讽刺某些人物，就有人打小报告说：柏杨在东北陷入解放军之手时，曾被俘虏，而且被关到集中营受过训。当时流传着这么一个故事说，蒋中正在总统府召见重要将领，张飞进见，警卫说，你是行伍出身，没有学历，不行。诸葛亮进见，警卫说，你有民主思想，不行。马超进见，警卫说，你是地方军阀，不行。关公进见，警卫说，你被俘过，不行。袁世凯进见，警卫不认识他，问他说：“你是谁？”袁世凯回答说：“我是袁大头。”警卫惊喜说：“袁大头？走后门！”

被俘这项流言的诬陷，是柏杨中年以后的巫蛊。他无法证明他没有被俘



过，而且，主要的是，没有人要他证明，即令他可以提出证明，也不知道向谁提出。巫蛊是看不见摸不着，但却是无所不在的病毒，被咬过的人，才知道它的厉害。假证件的事，那是自己真正的作为，不是别人诬陷，赖上帝的保佑，终于过关；可是“被俘”突然现身，紧紧地抓住柏杨，他不知道怎么摆脱。

有一天，文教组长包遵彭先生把柏杨叫到房间，锁上房门，严肃地问说：

“我们是老同学、老朋友，东北撤退时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发生了什么事？”

“有人检举你在东北被共匪俘虏过，还在集中营受过训。”

柏杨跳起来，大声说：

“我没有被俘过，也没有受过训。这消息是哪里来的？”

“消息来源当然不能告诉你，反正有人检举。”

“我要面见主任（蒋经国）解释，这是从没有的事。”

包遵彭立刻紧张，用力握着柏杨的手，说：

“天老爷，你千万不能向主任作任何反应。懂吗？我们是老同学、老朋友，我才这么坦率地告诉你。本来只教我暗中调查，并没要我通风报信。主任如果问你怎么知道有人检举你，你怎么回答？”

他目瞪口呆。

“千万不能对任何人讲，”包遵彭说，“不但害了你，也害了我。如果你说是我告诉你的，我会当场否认。”

“那我应该怎么办？”

“我也不知道，一切谨慎就是，不要得罪人。”

不久之后，主往秘书李焕先生也把柏杨叫去，谈一些公事后，轻描淡写的问了一句：

“怎么有人说你在东北被俘过？”

柏杨重复一遍向包遵彭说过的话，李焕也用包遵彭同样的话，嘱咐他谨言慎行。

这种千钧压力，每隔一段时日，当他心情正要恢复平静之际，总要重演一次，然后原样结束。最无奈的是，他还被严厉地告诫，不准向任何人提起。

后来他才知道，“被俘”是一个严重的罪行，最高可以判无期徒刑。他陷在五里愁雾中，日夜忐忑不安。

五十年代末期，国际上流行一种称为“年会”的学术会议（不是年度性质的会，而是专题性质的会，像国际物理年会、国际地球年会）。救国团在一九五八年冬天，在风景明媚的日月潭，举办“中国青年文史年会”，其实就是一个以大专学生为主的冬令营。就在年会上，柏杨认识了静宜英语专科学校（后来改为静宜大学）的学生倪明华，这是他一生中，又一次被切成两段，一切归零。爱情足以使年轻人着迷，但对中年以上的人来说，只不过一句虚话；尤其是男人，事业居于无可动摇的第一位，爱情不过逢场作戏。可是，对柏杨不然，这一场爱情，使他跟永培脱离，和整个社会作对。

对这件事反应最强烈的是明华的父亲——中兴大学教授倪渭卿先生。他那时正在阳明山革命实践研究院受训，和成功大学校长阎振兴先生同住一个寝室，他警告阎先生，成功大学如果再继续聘柏杨教书，他们夫妇将去闹个天翻地覆，阎先生遂立刻把柏杨解聘。倪先生又发电报给蒋经国，指控他的部下利用职权勾引他的女儿，要求严办。蒋经国并没有立刻下令把柏杨撤职，

而只是要副主任胡轨先生警告他说：

“拿得起，放得下，才是大丈夫。前途重要，怎么可以这样胡闹！”

他不是胡闹，而是认真，他仍继续和明华来往，她父亲的反应越发强硬。那时的报纸虽然对这件事没有有一个字的报导，但在整个救国团和它所属的各县市支部，已成为轰轰烈烈的话题。柏杨平常本树立了不少敌人，现在，更成为流言四射的箭靶，想不到的一些丑闻，和足以致他于死的跟共产党有关的一些传言，越来越严重。他完全孤立，没有一个人和他说话，也有一些朋友前来劝解，站在事业和前途的立场上，指出半生辛苦的成果，将为一个小女人而毁于一旦，不但不实际，也不聪明。

然而，柏杨完全听不进去，他把爱情置于第一位，把事业前途置于第二位，不在乎任何批评和阻碍，正是他的盲点。“青干班”同学张忠渠感慨地说：

“你已经着迷了。”

“是的。”

迷，是柏杨的致命伤。

蒋经国叫李焕转达他最后的一次警告。

“主任说：郭衣洞不是被俘过吗？如果他再继续惹事，我就叫调查局调查他这件事。”

“调查就调查，”柏杨说，“我根本没有被俘过！”

李焕不说话，沉默了一会，说：

“好吧！你辞职吧！”

多少年后，回想起来这一段对话，忽然惊出一身冷汗。那年柏杨已四十岁了，虽然经过那么多灾难坎坷，可是，仍不知道“调查”的恐怖含意。直到十年之后他被逮捕，才发现一旦“调查”，即令以皇太子之尊，也会被“调查”出叛国的罪行。不过，虽然当时蒋经国已十分不耐，但他却不为已甚，并没有真要“调查”。而李焕先生，以他当时的影响力，如果不包容担当柏杨的荒唐的话，蒋经国可能会激怒，采取行动。而发生在十年之后的被捕事件，将提前十年发生，那才是他最大的悲惨。

辞职后，又恢复了当年的孤独，接着，深怀内疚地和永培分开，孑然一身在临江街找了一间房子暂住，没有薪资，没有工作，身上只有一点点零用的钱。而明华却如石沉大海，她被父母软禁在家，不准上学，也不准出门，根本不知道柏杨的去向，二人无法联络。感情在沸腾了以后，又归平静，好像根本没有发生过什么事情。

这里，朋友们开始讥笑说：

“你被一个小女子耍了，这么大的男人，就这么轻易地断送自己一生。”

他并不后悔，但事实硬是使人不得不相信，有朋友甚至建议他写信给蒋经国，承认错误，要求再被录用。使他懊恼的是，他们怎么会想出这种主意。

不久，《自立晚报》总编辑李子弋先生邀柏杨到报社工作，使他在饥饿边缘，有一个饭碗。《自立晚报》在长安东路，每天来往临江街之间。那时报社经济十分拮据，几个月发不出薪俸，所有的职员们又无他处可以投奔，只好在毫无收入的情况下，一天一天地苦撑。那时的公共汽车票价是一块钱，很多次他因为没有那一块钱，而步行一个小时上班，再步行一个小时回家。生活是那样地艰苦，但仍一直有信心，怀着盼望。

忽然有一天，正在报馆上班，倪明华在她的同学汪道霞陪伴下，悄悄地

在面前出现，这像是一场梦境，而梦境也确实从这个时候开始。柏杨感激明华为他所作的牺牲，她履行她的承诺，他付出后半生的全部代价，包括难以挽救的跟城城，垣垣二儿的父子之情。

明华父母最后接纳了他们，不过，二老的接纳，并不表示二老的学生也接纳。前面提到的《自由中国》编辑傅正先生，是倪老先生在武汉大学任教时的学生，傅正这一辈子都不原谅柏杨娶他的师妹。大概是结婚之后的第二个月，他冲到临江街的家，柏杨刚把茶奉上，他就开始辱骂。

辱骂了足足一个多小时后，他站起来呼唤说：

“明华，你现在跟我走！”

明华劝他坐下来，柏杨则索性下逐客令，叫他自己走。傅正果然走出大门，走到对街，等候明华的答覆。明华过去劝他回家来坐，他当然不肯，把倪明华的手摔开，怒冲冲而去。

一年以后，傅正因《自由中国》案被捕，囚禁台北县土城的“生教所监狱”——生产教育所，倪明华还炖过好几次红烧肉给他送去。柏杨鼓励她这样做，从买肉到雇车，都是他出马。

不久，台湾中部横贯公路通车，公路局局长林则彬先生约柏杨作一次通车前的访问，为通车典礼写一本小册子。他和明华由台北飞到花莲，由公路局总工程师胡美璜先生陪同，乘一辆吉普车，从太鲁阁直到东势。路面大部份还没有铺上柏油，车子过处，黄土漫天。他曾为此行写下《宝岛长虹》，并为沿途名胜取下了十二景，十二景在《中央日报》上刊载过，也常被人们引用。然而，柏杨入狱之后，就没有人（包括他自己）再提了。

最怀念的一件事是：“柏杨”这个笔名，就来自这趟横贯公路之旅。全线当时除了一两处坍方外，其他全部通车，只有最后的一个隧道，鹰架还没有拿开，他们的车子到了隧道的东口停下，徒步从鹰架间穿过，走到隧道西口，再坐另一部接驳的专车西上。就在等候西口专车的时间，招待人员把他们引到隧道附近高地的原住民村落里喝茶。这个村落原住民的马来语发音叫“古柏杨”，他非常喜欢这三个字的发音，回到台北开始写杂文时，最初本来想用“古柏杨”作笔名，但看起来好像是武侠小说的作者，就索性改用“柏杨”。至于那个地方现在名叫什么？位置又在那里？若干年后，他重游横贯公路时，好像《桃花源记》里的男主角刘子骥，已经无法寻觅。

## (25) 十年杂文似匕首

专车游横贯公路的光彩，对柏杨的贫穷没有裨益，那时候还不流行付给演讲费、撰稿费。台湾公路局认为他既是局长的贵宾，地位崇高，岂可以现金论价，所以并未支付分文，真是连煮字疗饥的机会都没有。这时，报社命几位编辑分别撰写专栏，专栏的稿费虽然很低，但不无少补，且很少拖欠。柏杨就把分到的专栏定名为“倚梦闲话”，每天写一千余字。这不是十分体面的开始，但是却把他悄悄地带进另一个新的写作广场。

最早写杂文的目的，显而易见，不过只为了免于饥寒，并没有什么崇高的理念，向专制暴政挑战，所以最初只谈一些女人、婚姻之类的话题。可是，到了后来，每天在报社里听到记者们采访回来，尤其是采访警察局回来，常带一些使人发指的社会新闻，而报社碍于人情或畏惧后果，往往不敢发表，柏杨就忍不住在专栏里，提出抨击。有一次，一家主人指控他的女佣偷了钱，刑警队就把那女孩带回警察局，双臂张开作“大”字状，铐在栏杆上，这是一种连军阀时代都不会发生的暴行（即令是帝王时代，为了防止强暴或戏弄，女囚犯不戴枷、不反绑）。

社会的黑暗，反映这个社会的品质，传统社会最大的特点是，不把人当人，尤其不把女人当人。柏杨见到这一类的恶行，多半来自警方，这使警察先生在他的杂文中，占了一个非常突出的地位。当时全岛所有的警察局和派出所墙上，都有九个字的斗大标语：“作之师，作之君，作之亲。”这简直是只有发高烧的人才想出来的荒谬念头，一个警察居然自命是人民的教师，已够自大，还要当人民的君王，他认为其心可憎，最后还要当人民的爸爸，就更不可宽恕。所以他给警察先生取了一个绰号，叫“三作牌”，引起很大的回响，以致后来记者写稿写到警察时，往往用“三作牌”来代替。这个绰号造成两个后果，第一是在提出这个绰号后一年半左右，警察局墙上的标语全部涂消，第二是全体警察的怒火，集中在柏杨一个人身上。这就是十年后他被捕时，政府组织了三人专案小组负责侦讯，警务处也指派代表的原因。

杂文富于社会批判功能，像一把匕首或一条鞭子，它虽不是鲁迅先生所创的文体，但却是由他发扬光大，它更是对抗暴政的利器，因为它每一次出击，都直接击中要害。在那个威权至上而肃杀之气很重的年代，文化像一片沙漠，社会如一潭死水。国民党蒋家王朝战败之余，撤退到台湾，满身伤痛，后来在美国强大武力的保护下，才休养喘息过来。然而由于对共产党深怀恐惧，所以把共产党视为天神，认为它既无所不在，又无所不能。同时，国民党也发现，有个像共产党这样的敌人真好，对具有自由、民主思想的文化人，只要把共产党帽子往他头上一扣，就可以名正言顺地立即铲除。这套手法柏杨并不是不了解，可是他控制不住自己，一遇到不公平的事，就像听到号角的战马，忍不住奋蹄长嘶。

杂文固然是打击专制暴政的利器，但也是一种两头尖的利器，会同时伤害到自己。柏杨心想：幸好当时有一个《自由中国》作第一道防线。然而，一九六〇年的某一天，蒋经国和他的家人去碧潭游泳，从他温暖的笑容上，可看出他心情的愉快，似乎天下一切平安无事，就像他的笑脸一样浮漾着和煦。然而，如今回想起来，当初斯大林下令逮捕托洛斯基时，他也会黑海游泳，露出同样笑容，那是满意自己成就的笑容。因为就在当天，蒋经国下令逮捕雷震和傅正。雷震被捕时，还交代他的助理要继续出版《自由中国》；

他实在应该知道蒋经国逮捕他的目的，正是不允许他继续出版《自由中国》。

逮捕雷震，查封《自由中国》，是五十年代一件大事，而比这个更大的事，像软禁孙立人将军，以及肃清孙将军在军中的势力，都没有引起反弹，因为那都是在秘密之下进行。国民党特务认为对付像雷震这样手上没有任何兵器的人物，根本不需要秘密进行，所以毫不避讳。当时和雷震、聂华苓非常接近的作家群中，公孙嬿和他们最为亲密。可是，雷震被捕后，公孙嬿立刻在《中央日报》上发表一篇长文，对雷震痛加斥责。一时间，讨伐雷震和《自由中国》的声音，充斥所有报章杂志。

《自由中国》这道墙崩塌之后，柏杨的咽喉完全暴露在情治单位的利剑之下，当时他听到的第一个讯息，就是出自同事口中的警告：

“警备司令部的人说，柏杨以后该乖了吧！”

偏偏，他不但没有变乖，反而从内心激发出一种使命感，觉得应该接下《自由中国》交出来的棒子。这种信念，在他的杂文中，不断出现。在气氛一天比一天肃杀的那段日子里，读者把它十分看重。

那些年，很多事情使柏杨如鱼刺在喉，不吐不快。靠着胆大包天和一时的运气，发挥了蚩子不怕雷的精神，不断写下去。为了减少阻力，他用最不严肃的方式，讨论最严肃的问题，幽默最容易凝聚读者群，也最容易引发更多人关注社会的病态。

渐渐的，他走出了最初以女人和婚姻等风花雪月的题材，走进眼睛看得到的社会和政治的底部，最后，再走进传统文化的深层结构。所看到的和感觉到的，使他震撼，他把它譬作“酱缸”，但一开始并没有想到，这个酱缸竟有那么大的腐蚀力。

有一年，台北警察局在召开了无数次的会议以后，决定自某月某日开始，禁止随地吐痰，对违犯的人处以罚款。市民都欢呼这是一个新的时代到来时，蒋中正却突然下令阻止，他说：要以德服人，只可以劝告，不可以罚钱。结果一个可以改变人民气质、提高环境卫生水准的机会，就告破灭，大家空欢喜一场。而当时的报纸和电台却异口同声跟着宣传：德治比法治好，因为动不动就罚钱，只会招来民怨。中国不能够革新进步，第一因就在于这种“德治比法治好”的酱缸产物。

阻挠传统文化革新的两项措施，全由蒋中正主导。一是中国驻印度第一任大使罗家伦先生，曾大力提倡简体字，并写了一个小册子，用蒋中正的一句话作为书名：“这样的文字，非简化不可。”结果这句话不过使罗家伦免于被捕，文化界大小打手，纷纷指控：凡是主张简体字的人，都是“与共匪隔海唱和”之辈。那个时代，一旦被这七个字咬上一口，非死即伤，柏杨曾为此写过一篇短篇小说《魔匪》，因而也被再一次烙上印记。

二是，中文横写时，应该从左到右，或从右到左的纯文化问题，警备司令部也磨刀霍霍。中文横写，天经地义的，应该从左到右，因为汉文单字，就是从左到右写的，从来没有人从右到左。当汉字堆积成文章时，当然也应该从左向右。如果从右到左，不但无法控制字与字间的距离，而且，手腕也会把你右边写的字，擦成一团。不幸的是，共产党在大陆不但实行简体字，还从左到右横排、于是，凡是主张从左到右横排的人，都是共产党的同路人。

柏杨终于发现政治上改革之所以困难，全由于文化上的恶质发酵。因此他不断呼喊，企图使酱缸稀释，才能解除中国人心灵上滞塞的困顿之情。后来，他才知道，他这份盼望社会进步的沉重心态，正是把他自己绑赴刑场的

铁链。

十年杂文期间，除了在《自立晚报》“倚梦闲话”专栏外，稍后也在《公报》辟“西窗随笔”专栏。这两个专栏的内容和形式一模一样，虽然这两份报纸的发行量不大，但在白色恐怖时代，影响却立竿见影。

除了执笔为文外，柏杨还被邀到国立台湾艺术专科学校兼任教授，教“文学概论”，使他不得不阅读一些文学理论方面的书籍。当时他已经出版了十本小说，却直到教文学概论的时候，才知道什么是小说，和小说应该怎么写。但他也发现，理论对创作并没有太大帮助，而只对欣赏有帮助。这时他对杂文的运用，已较熟练，渐渐创造出属于自己的文体。当然也受到过挫折，例如，用第一人称的时候，除了“我”以外，还不时地自称“柏杨先生”和“柏杨先生暨夫人”，以及“我老人家”等等，有一次，编辑会议上，有位记者廖素雯女士要求报社用行政力量，制止这种不伦不类，自高自大的写法。

十年杂文，是柏杨有生以来，从没有过的、这么长期的安定日子，因为倪明华和他逐渐建立起一个平静的家。婚后第二年，明华生了一个女孩，命名佳佳。在这之前，所有的孩子早和他疏远，现在女儿成了他唯一的亲情慰藉，从她呱呱坠地那一天起，每一声哭啼，都牵动他的心肝。从她身上，他看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小女孩，还看到另外两个女儿和两个儿子，这些是终生无法挽回的椎心之痛，也是任何一个婚变后，不能抚养子女、身为父母的哀情。作父母的可以暂时忘记儿女，但不能永远忘记；不能无时无刻的思念女儿，但会终生不断思念。只有一个方法可以使自己获得小小的平安，那就是把所有孩子的爱，全部倾泻到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现有孩子身上。八岁前的佳佳，眼中也只有爸爸，平日爸爸陪她玩，陪她闹，被她当马骑。终于，等到佳佳要上幼稚园的前一天，她背上给她新买来的小书包，兴奋的在客厅里走来走去。可是，当幼稚园报名的时候，却因为出生日只差几天，而被学校拒收。柏杨跑到学校去找那位女老师理论，所谓理论，是他事后叙述时的文明语言，实际上是去吵架。吵架当然没有效果，差几天就是差几天，所以只好拜托担任家长会长的任显群先生从中关说，才报得上名。报名那一天，正好遇到那位吵架的老师，她冷笑着说：

“这么美丽的小姑娘，怎么有这种凶恶的老爸，真是奇怪！”

既然夸女儿漂亮，所以虽然咬定自己凶恶，柏杨也乐于接受。考试那一天，他比当初考大学时还要紧张，坐立不安，像只猴子般走来走去，一直等到佳佳大大方方走出来，表情上一点都不畏缩，他迎上去，抱起她问：

“考得怎么样？”

五岁的女儿回答说。

“一百分！”

柏杨高兴得手舞足蹈，一百分是一个满分，一定可以考取。想不到听来听去，似乎所有的孩子都考一百分，这才觉得有点不妙，赶紧再去找那位吵过架的女老师，陪笑问她：

“我女儿考得怎么样？”

她大概看出他的迫切和恐慌，直接告诉他说：

“考取了！”

接着又把前面说过的话，颠倒过来重复一遍：

“这么凶恶的老爸，怎么会生那么美丽的女儿？”

第二天，柏杨送佳佳上学，看她进到小小教室，临窗坐下。刹那间，坐

在那里的，似乎就是城城，当年，送他上国语实验小学，城城比较胆小，他的眼睛一直望着守在窗外的爸爸，等他一转身离开时，就在教室里大哭，柏杨只好折回来陪他，这样多少天之后，城城才能够适应。而垣垣上幼稚园时，他却不在一旁。现在，从佳佳小脸蛋上，看到她两位哥哥的笑容，感觉到这世界是那么的难以两全。

佳佳不仅仅喜欢听柏杨为她说故事，还喜欢父亲身上的烟味。每天下班回来，她就要攀着膝盖爬到身上，从前胸嗅到后背，从后背嗅到头顶，说：“爸爸身上烟味真好闻！”

这也成了他拒绝戒烟的最大理由。

倪明华因他的关系，学业中断，他不愿她为此抱憾终生，千方百计，甚至半强迫的，在佳佳三岁那一年，终于把明华送到中国文化大学就读。每天晚上，明华去学校上课，家中只剩下一对父女，大书桌旁就放着一张特制的小书桌，供佳佳坐在那里做功课，当小学一年级开始写字的时候，看她把那复杂艰深的汉字一个个塞入小小的方格子里，柏杨深为难过。不久，佳佳跟孙观汉先生的小女儿孙世钟——与佳佳同岁，书信来往。看到孙世钟用英文写的信，感觉出来汉字给中国孩子的沉重压力，他当时就想，如果中国文字不改革，单单汉字的学习压力，就会使人筋疲力竭。

杂文十年所以成为美好的十年，另一个原因是，这十年中，柏杨结下了很多人生中最难得的几桩友谊。有一天，忽然接到寄自美国匹兹堡大学的一封信，这是跟孙观汉先生生死相交的开始。孙先生是物理学博士，曾出任国立清华大学原子科学研究所所长，建立中国第一座教学用的原子反应炉，因此，后来被尊为“中国原子科学之父”。他对柏杨的称赞和期许，使柏杨虚荣心大增，好像自己真的有他所说那么伟大。幸好，虚荣心大增了一阵子之后，柏杨开始警觉到，如果再继续大增，他会毁灭。

孙先生二十四岁即到美国，娶了一个碧眼黄发的美国女子为妻，生下二男一女，但当他有一天在那温暖的家庭中，发现包括他自己，以及儿女在内，都在用英语思考、用英语交谈的时候，油然生出故国之思。他要再一次看看中国字、听听中国话（不过，孙先生浓厚的绍兴腔国语，常成为周围女性朋友嘲笑的对象）。恰好，梅贻琦先生出任清华大学校长，他偕夫人随梅贻琦回台。当他写信给柏杨时，他已返美，他们通信频繁，却一直没有见过面。

又有一天，柏杨接到一封笔迹秀丽的信，结下第二桩永不磨灭的友情，那就是当时还没有结婚的陈丽真，台湾彰化人，高中毕业就考上铁路局的列车小姐。她的国语和孙先生的国语成尖锐对比，清澈悦耳，字正腔圆，她和当时的男朋友商量后，决定写信给柏杨，并来家中拜访从此成为通家之好。

陈丽真是一个深情的女孩，她的爱情生活对她而言是一场恶梦，柏杨入狱前就不断地调停她和男友之间的争执吵闹，不是男友悲悲凄凄来找他，就是丽真哭哭啼啼来找他，柏杨成了他们诉苦的对象。柏杨入狱后，他们终于结了婚，却成为文学家笔下那种典型的怨偶，在他们生下一个男孩之后，终于仳离。丽真也写了不少短文，可是那种奇特的不安宁家庭生活，根本不是一个创作的好环境。

柏杨后半生的朋友，几乎全来自他的读者，结交过程相差不多，先是通信，再见面聚会，最后往往成为互相扶持的知己。

十年杂文，表面上看起来沉静得像一个没有涟漪的湖面，其实湖面下，恶浪滚滚，漩涡翻腾，柏杨有相当数量的读者，也有读者带给他的物质生活

的水准和精神层面的鼓舞，每一篇文章在《自立晚报》刊登时，对无所不在的国民党特务而言，几乎都是一记强力震撼。明华也出了一本书《叮咛》，就读中国文化大学夜间部时，因住家离学校有相当距离，特为她买了一辆汽车，这使她成为台湾女作家拥有汽车的第一人，却不知道，也因此招来大忌。有一天，小说家林适存到柏杨家做客，临走的时候，在楼梯上忽然转身对他说：

“你整天骂政府，反政府，日子过得这么好，而我们这些拥护政府的作家，生活却过得这么困难。”

柏杨再也料不到，最要好的朋友竟会讲出这种杀伤力极大的话，他以为人们应该为朋友们的好运感到喜悦！一位军中作家公孙嬿就比较聪明，他在国防部情报局工作，担任过驻伊朗、驻美国大使馆的武官，他告诉柏杨说：

“我从不接待同事到家里来，一旦他们发现你活得比较舒适，他们就会陷害你。”

嫉妒，也就是“红眼病”，是酱缸文化中最可怕的病毒。白色恐怖时代，每一个新闻记者、每一个作家，心里都有一个小型警备司令部，落笔的时候，会自动提出质疑：

“警备司令部会有什么看法？”

那时候，各报社都是用铅字排版，因为字盘位置的关系，“中共”很容易误成“中央”，“中央”也很容易变成“中共”。这时晚报的作者、编辑、捡字，和校对人员，是一种梦魇，每天都要等到下午四点半钟之后，还没有接到电话，编辑台和工厂才能放下惊恐的一颗心。

《自立晚报》前任发行人姜子匡先生就栽在下午四点半的电话上。他曾经开除了一位职员，这位职员后来到了警备司令部书刊检查小组做事。有一天，《自立晚报》登出一则报导，其中有“草山一衰翁”（草山即今日的阳明山）。姜子匡接到电话，那位职员在那一端得意地说：

“这下子抓到你了，你死定了。”

姜子匡是一个民俗学家，不坐牢已属幸运，但也只好把报社交出，转让给李玉阶。

就在写杂文的第三年，一位从大陆流亡到台湾、曾当过“全国学生联合会”会长，在阎锡山当行政院长时代经常出入院长室的张化民，写了一篇短文，讨论蒋中正的功过时，文章中有八个字：“自以为是民族救星”，结果一个字判一年，八个字判八年，恐怕是世界上最昂贵稿酬，这正是当年文化人的处境。

已晋升为救国团副主任的李焕先生，对柏杨仍有旧情，他警告柏杨说：

“每一次开宣传汇报，很多单位都对你提出严厉攻击，主任（蒋经国）从不讲一句话。看情形，你最好不要再制造麻烦。”

“可是我看到太多使人落泪的疾苦，不能不写。”

“你不是在艺专当兼任教授吗？有位朋友最近可能接任校长，如果你同意的话，我可以拜托他请你专任。”

柏杨表示愿意离开报社，专心教书，因为内心也实在恐惧下午“四点半”的日子。可是上帝的意思不是这样安排，李焕那位朋友后来没有接成校长，他也没有再看到李焕。

这个时候，他的一部报导文学《异域》开始在《自立晚报》连载。故事背景是根据驻板桥记者马俊良先生每天访问一二位从泰国北部撤退到台湾的



孤军，他把资料交给柏杨，由他撰写。很多当初在大陆誓言与某城共存亡的将领，结果不但城亡人不亡，抛弃了愿为他们战死的部下，甚至卷款潜逃到台北，藉着关系，竟先后到国防部坐上高位。柏杨委婉地把真相报导出来，使那些一脸忠贞的家伙大为愤怒，因此引起国防部对报社的强大压力。有一天，宪兵司令部政战主任萧政之到报社，他们是“战干团”同学，他把柏杨带到爱国东路宪兵司令部，警告他一句话：

“你麻烦可大了，我们不能明目张胆的查封报纸，但可以查封你。”

柏杨狼狈地走出大门，对这一次没有被扣押，十分心悸，对宪兵司令部竟介入文化圈，更感到危机四伏，也因此发现自己的孤独，一支笔无法对抗庞大的国家机器。他决定停笔，可是当另一个不公义的事情出现的时候，却又无法压制自己的良知。

明华进入中国文化大学后，读行政管理系，系主任是当时《中华日报》社长楚崧秋先生，给了她一个位置，主编《中华日报》的妇女版，这是一个令人称羡的差事。到这时为止，明华是柏杨婚姻生活中，唯一向他说过“我爱你”的妻子，这句话虽然常在小说里出现，可是五十年代以前现实生活中，却很少人能够听到，当日月潭柏杨第一次听到她说出这三个字时，心中起了很大的冲击。一生中从没有听过一个女性向他这样倾诉，他最大的变化从这三个字开始，温柔的力量使他逐渐跃出野生的莽原。

明华白天在中国广播公司上班，晚上到中国文化大学上课，剩下的时间则编《中华日报》妇女版，她成了一个非常忙碌的少妇，柏杨暗中庆幸生活日趋改善。他在《自立晚报》上的班，是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其他时间全用来读书和撰写杂文，成了一个女主外男主内的家庭。正因为这个缘故，他和佳佳有一种父女相依为命的特别感情。佳佳读复兴小学，放学时，柏杨总去接她，她晚上参加一个舞蹈训练班，放学时已经深夜，舞蹈班派车子送每位小朋友回家，当车子的喇叭声响时，他就从三楼飞奔下来，佳佳在学校或在舞蹈班所见所闻，总要一桩桩一件件向做父亲的他报告。

有一次，幼稚园园长家庭访问，夸奖佳佳美丽，成绩又很好，问有没有什么事情需要老师帮助的？柏杨脱口而出说：

“她不肯吃饭！”

结果，等园长告辞，佳佳小小身躯冲到客厅，一面跳，一面气得声音颤抖，她喊叫说：

“我这一辈子都是你害的！”

佳佳不肯吃饭，真是一大头痛，每天晚饭，明华都要端一个碗，跟在她背后追来追去喂她。而每次佳佳都要爬到巷口一辆三轮车上坐着才肯下咽。那时，他们养了一条小狗，佳佳却悄悄地去把狗食吃掉，不一会儿功夫，就大泻肚子，而且发高烧，于是把她送到新生南路儿童医院，医师认为事态严重，立刻给张病床，吊起点滴。入夜后，柏杨睡在床前地下，只铺了一个军毯。佳佳从昏睡中醒来，拉着不能入睡的柏杨的右手，亲着说：

“爸爸，你将来害病，佳佳也守着你！”

一句话已经够了，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听到最贴心的一句话。他噙着要流下的眼泪，安慰她，把手轻抚着她的眼皮，使她入睡。这些遥远而模糊的父女亲情，如今只剩下做父亲的一人记得而已。

不肯吃饭的风波，他们从建国南路搬到敦化南路后，又发生了一次。佳佳躲在房里玩玩具，菜饭摆到饭桌上半小时，怎么叫都不肯出来，怕杨十分

生气，就用一种使她可以听到的声音对明华说：

“佳佳不吃饭，已经不是我们的女儿，巷口有个张伯伯和我讲好价钱，一百块把她卖掉。一会儿人家就来领，快把她的衣服收拾好。”

话刚刚说完，佳佳从房间冲出来，泪流满面，嘶喊说：

“你这个臭爸爸、坏爸爸、死爸爸，你把我卖掉，你凭什么卖我？……”

他这一次真正的吓住了，看佳佳眼中流下来的滴滴泪水，知道已深刻的伤害了她稚嫩的心，他急忙把她抱起，承认爸爸犯了错，说：

“儿啊！爸爸宁愿死也不会卖你！”

他用舌头舔她的眼泪，从那时候起，他再也不对孩子说出她不能承受的话。

他的个性是一个典型的粗线条，只有在对女儿时，才变得纤细。佳佳还穿尿布的时候，有时坐在他怀里忽然撒尿，他从不肯出声，要一直等她撒完，才抱起来为她换洗。深怕一慌张会惊吓孩子把尿憋住，可能产生后遗症。

十年之中，佳佳给了他八年之久的温馨父女之情，恶运的魔爪在他认为已经远离而去时，却悄悄逼近，突然间从天而降，使他承受更凄惨的打击，接着是十年牢狱，家破人亡，他再被撕成碎片。

## (26) 笔惹大祸，山崩地裂

倪明华主编《中华日报》的妇女版，当然是一个好工作，可是，她身兼三职，早上出门后，晚上回家，总在十一点左右，疲惫不堪，但仍勉强支持。

一九六七年夏天，《中华日报》向美国金氏社订购“大力水手”连环漫画，交给家庭版每星期刊出五天。明华要柏杨翻译，以他的英文程度，根本没有这个能力，但他却接下这份工作，因为漫画书上的对话十分简短，更重要的是，又多了一份稿费。

“大力水手”漫画是连续性的，金氏社每次直接寄下两个月的稿件。大概十二月初，一天晚上，倪明华刚进家门，就接到《中华日报》的电话说，《大力水手》已没有存稿，明天一早，会派专人来取。明华这时候才紧张起来，一面坐下来赶工，一面催促柏杨，一定要快点赶出译文。

“译稿完成后，请放到送稿袋里，我不再看了。”

“大力水手”是一个全球发行的漫画，没有政治色彩。可是，那一次的稿件，画的却是波派和他的儿子，流浪到一个小岛上，父子竞选总统，发表演说，在开场称呼时，波派说：“Fellows就是这个Fellows，引爆使柏杨毁灭的炸弹，柏杨如果译成“伙伴们”大难降临的时候或许延后，可是，他却把它们译成“全国军民同胞们”，心中并没有丝毫恶意，只是信手拈来而已。译完后，蹑手蹑脚走进卧房，把它轻轻地塞进送稿袋，舒了一口气，上床就寝，没有一点恶兆。历史上说大人物灾难发生之前，总会有点不祥的预感，这也恰恰证明，他不是一个大人物，只不过一个倒霉的平凡作家而已。

一九六八年元月二日，《中华日报》刊出这帧漫画，没有人注意它，连柏杨和明华也没有注意它，它只不过是一个例行刊出的连环漫画罢了。可是，虎视眈眈的特务们像发现新星球一样，奔走相告；假如他的耳朵敏锐的话，会听到他们的哂哂笑。就在那年阴历年前后（二月初），救国团请各报记者登合欢山。柏杨接受邀请，和倪明华像贵宾一样被招待先乘火车到丰原，换成巴士到东势，进入横贯公路，不久就看到了雪景，对一个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北方人来说，冬天没有雪是不可思议的，然而，台湾平原是一个无雪地带，二十年来从没有见过雪，现在眼前白茫茫一片，每一片雪花和每一阵刺骨的冷风，都使人回忆到手背被冰烂的儿时。天快黄昏的时候，大雪使车子不能前进，在救国团陪同人员的引导下，住进冬令营小屋，既饥饿又疲惫，幸好屋内有熊熊火炉，温暖如春，他们和当时在《微信新闻》供职的常胜君夫妇，一起挤在一个大炕上。

第二天、踏上没膝的积雪，找到昨天乘坐的吉普车，重新折回东势，这是一次有边的休假，充满了新鲜。还不知道大祸逼在眉睫，他们一回来，《中华日报》就叫倪明华到报社去，告诉她说，调查局认定“大力水手”漫画挑拨政府与人民之间的感情，打击最高领导中心，在精密计划下，安排在元月二日刊出，更说明用心毒辣。尤其出自柏杨之手，重要性不可化解。

柏杨被这项可怕的罪名吓住，一时间，头昏目眩。他从来没有认真想过特务会对他下此毒手，只模糊感到莫大的压力而已。现在，焦急而茫然，所认识的朋友没有一个人实质上有所帮助，尤其使人心都撕裂的是：佳佳天真无邪的继续她的顽皮，他对她更百依百顺。

大约第三天，明华到《中华日报》，突然被调查局人员带走，那真是冰天雪地的一天。柏杨虽然仍到《自立晚报》上班，但同事们用奇异眼光望着他，

显示出来他们什么都已经知道了。整个下午，在佳佳不断问“妈妈哪里去了？”声中度过，晚上，佳佳好容易入睡。他跪在床头，大声向上帝祷告，祈求基督使明华能被释放，他自己是祸首、一切应由他担当。午夜之后，明华回来，他们离别虽只有一天，但心情却仿如隔世，她第一句话就说：

“事情很严重，明天会约谈你！”

等到明华入睡，他心乱如麻，坐在书桌前，写下一信：

赛：几件事交代，分述于下：

· 报馆请祖先商请吴三连先生，可否留职停薪，万一短期内可以昭雪，有吃饭之处，以吴先生长者，当获允，如不获允，必有困难，不可怨尤。

· 人生危难，朋友自必少，若干朋友，必有嘴脸者，万勿悲愤，要忍才是第一等人，蒋总统在奉化，借钱还要担保，你我岂可幸免。

· 除银行支票外，我不欠人。

毕业后，可携佳佳赴美，如不能出境，可找李焕先生或迳找蒋主任哀诉，必可获助，不必记挂我。

· 如传出我与事实不符的口供，则是受到苦刑，万勿相信。

出国后，如有合适对象，即可与我离婚（图章在你处），另行改嫁，不必指望我，佳佳长大，告诉父亲文字狱之苦，终身不可走写作之路，如我昭雪，她可回来依我。

· 到美可访孙观汉先生，一叙我受的栽赃及迫害，但仍请他千万继续为国人写文章，继续唤醒国人灵性，在文化本质及气质上改革。

· 你的方形图章是办过印鉴登记的，房子可卖掉，用做路费，房价有四万余元未付，查看钱盒中帐单。

为我之事，不可找任何人求救，这是有计划的泄恨诬陷，无人能为力，亦无人有此担当，找人徒惹人笑。切记。

· 告佳佳勿哭，爸爸已先去美国等她（你们如到美，可云我已回国）。

· 你也不要哭，更不可到处控诉，更不可云军法不公，免你再受打击。

· 有读者来信，可代复，告以柏杨先生病故，可免其再来信（邮局信箱钥匙在汽车驾驶台烟灰罐中，图章亦在，每隔两天，取信一次）。

· 蒋主任是热情忠厚之人，李焕先生一向对我关爱，出国事不妨先求见，免申请受阻，再叮咛。

· 想办法见城垣二儿，出国钱若有多时，付给他们，代我吻他们，致我日夜悬心的爱。

· 可请妈妈来伴，但不可打电报，免老人家受惊。

· 努力补习英文，用钱宜省，少做衣服。

· 出国时家具可赠体康。

· 如银行头寸不能周转，只有退票，我们别无收入，以后应还，一文不可少。

· 本要交代若干业务，免得你临时手足无措，不免又写若干感情之事，类似遗嘱，幸勿为此而悲，心情不宁，不能细嘱，体念我心。

· 记住，坚强起来。

赛：仍有未了之事，趁你上班，佳佳在玩，再分别叮咛。

· 如生活困难，可试向何关根先生求援，可告以柏杨病故，临终相托。

· 你上午痛哭，使我心碎，文字狱虽出意外，人情冷暖则在意中，必经

此你才可以成熟。

- 蒋经国主任是一代英雄，是非必明，但因有志之士提供资料，故无法细察，不过要求出国，英雄必热情，当无问题，不可畏而不行。
- 到美可投奔你大哥，因大嫂敦厚，谋一差事，能读书更好，此事孙先生必可成全。

- 我如昭雪，当会给你联系，不必给我来信，我在狱中。

- 黎世芬必迫你辞职，可找一教员（反正只几个月就毕业）否则坐吃山空。

- 只加强补习英文，不可对任何人透露出国事，在我们只是避难、避势利眼、避你触目伤情，但他们可能诬你叛逃，诬你包藏祸心。

- 对凡来安慰你的人，不可表悲表愤，切记。

- 圣母像你要带走，教佳佳早晚祈祷。

就在三月四日，吃过晚饭，柏杨在灯下交代后事，心神不宁，佳佳和她的小朋友华昌言在刚买的大型电视机前，坐在地板上看电视。调查局调查员高义儒先生和刘展华先生，按铃进来，要柏杨随他们前往调查局谈话，向明华保证说，天亮以前一定把他送回来。全家人都不说话，只有在走过佳佳背后出门的时候，她回头向刘展华噘一下嘴，发出一个单字的声音：

“嘘！”

明华靠着窗子，面无表情地盯住柏杨的背影，陈丽真一直尾随下楼，扶他登上调查局黑色的厢型车。这是重要一刻，此次一去，就是十年。等他出狱后，房子已经不归他有，妻子已是别人的妻子，女儿虽然仍然是他女儿，但已变成另外一位少女。

到了三张犁调查局招待所，被带进一间六个榻榻米大的审讯室，主审员是刘展华。第一件事就是叫柏杨撰写自传，从出生之时，写到被捕之日。而另一个房间，科长刘昭祥先生为主的研判小组，听取刘展华侦查的摘要、联合判断案情。

刘展华一开始就问整整二十年前（一九四八年），沈阳在内战中陷入共产党之手的经过。七八句话以后，他单刀直入说：

“你被俘是哪一天？”

“被俘”这两个字，自从离开救国团，十年之久都没有再听到过，今天忽然被提起，使柏杨看见面前的陷阱，除了挣扎着不被推下去之外，没有方法保护自己。

“我从没被俘过。”

刘展华撩起嘴角一笑，使柏杨想起他的继母，他重复说：

“你是几月几日被俘的？”

“我从没被俘过。”

“是吗？你没有被俘过吗？在那个大势已去的时代，国军为了保存自己的实力，多少高级将领假装跟共匪妥协，这有什么关系？重点是他最后效忠不效忠国家。”

直到那个时候，柏杨还不知道惩治叛乱条例有明确的规定：凡是被俘过的人，不论军官或士兵，一律判处重刑——从五年到无期。

“我没有被俘过。”柏杨说。

“你是哪一天被俘的？”

“我从没有被俘过。”

刘展华的声音渐渐的凌厉。

“你是哪月哪日被俘的？”

“我从没有被俘过。”

“好硬嘴，”刘展华大声说，“你是哪一天被俘的？”

柏杨拒绝承认被俘过，并不是他聪明地知道一旦承认被俘，就全盘瓦解，只是因为确实没有被俘过。可是，刘展华用一种得意的眼神盯住他，脸上露出不耐烦的表情，不断地翻转着拿在手上的米达尺，问说：

“好吧，那你逃出沈阳的路线是哪里来的？”

“我们自己写，自己刻印。”

“怎么刻印的？”

“用肥皂。”

“是谁刻印？”

“孙建章！”

苍天在上，柏杨的供辞牵连出来孙建章，因为图章确实是他刻的，而且他可以为柏杨挺身作证。这时候，孙建章在苗栗警察局当督察长，再想不到，柏杨请他作证，不但救不了自己，反而把他也托进火坑。孙建章立刻被免职，逮捕归案。调查局正发愁缺少人证，是柏杨亲自把一个活证人送到他们的手中，因为法律上规定，同案被告的口供，可以作为证据。

后来，审问官又多了一位年纪较长的李尊贤先生，集中焦点盘问柏杨被俘的经过。刘展华对柏杨不肯承认被俘，十分震怒，可以从他脸上看出来他即将爆炸。这时，柏杨被安排睡在监时摆在角落的一张行军床上。他还不知道就在这间审讯室里，三四个月前的一个夜晚，调查局把《新生报》的一位女记者，连当时副总统严家淦先生都称呼她为“沈大姐”的沈元璋女士，全身剥光，在房子对角拉上一根粗大的麻绳，架着她骑在上面，走来走去。沈元璋哀号和求救，连厨房的厨子都落下眼泪。那是一个自有报业史以来，女记者受到最大的羞辱和痛苦，当她走到第三趟，鲜血顺着大腿直流的时候，唯一剩下来的声音，就是：

“我说实话，我招供，我说实话，我招供……”

她要求调查员们把她放下来，暂时离开，允许她自己穿上衣服。调查员离开后，沈元璋知道更苦的刑罚还在后面，她招供不出她从没有做过的事，于是迅速拴上房门，解下绳子，就在墙角上吊身亡。这个六十年代的著名记者，除了留下若干有价值的探访文稿外，最后留下来的是一双几乎爆出来的眼睛，和半突出的舌头。

她后来被宣布的罪名是“畏罪自杀”，调查局仁慈地为她修筑一个矮坟。

## (22) 文质彬彬的恶魔

柏杨的口供无法使特务们满意，也就是报上所常看到的字汇“坚不吐实”。就这样，他在审讯室里住了一个多月，刘昭祥和刘展华逐渐撕下文明面具，朝阳大学法律系毕业的调查员高义儒也参加审讯。他声称是一向和柏杨交往很密的《自立晚报》总编辑罗祖光的朋友，把柏杨带到另外一间审讯室，诚恳地说：

“柏杨先生，你知道你是什么人？”

“一个作家。”

“不，你是一个名人。既然扣押了你这么久，如果不查出一点毛病，社会一定哗然。我们也知道你没有被俘过，你以为我们调查局都是酒囊饭袋！可是我们如果不咬定你被俘过，这件案子怎么交代？你一定要给我们下台阶。如果你非坚持不可，我们下不了台，怎么能够结案？”

“那我怎么办？”柏杨说。

“被俘是一件小事，当年，千千万万官兵被俘，如果统统判罪的话，全国军人岂不都坐牢去了？你只要承认确实被俘过，在俘虏营关三天就放你出来，表示我们的情报确实没有错误，就足够了。”

“被俘会不会判刑？”

高义儒哑然失笑，说：

“被俘三天，竟然要判刑，你怎么会有这种想法？你把国民党看成一个没有理性的疯狗党了。我保证，你上午承认，下午就可以出去。我这一生从没有骗过朋友，也绝不骗你。”

柏杨沉吟了很久，望着那设备简单的审讯室，终于屈服。长叹了一口气说：

“好吧！就这样吧！”

过了几天，刘展华把柏杨提到第一次的问话室，十分礼貌地请他坐下，盯着他的手指甲，像发现一个稀奇怪物似的，问道：

“你自进来就没有剪过指甲吗？”

“是的。”

刘展华说：

“两个月不准剪指甲，他们怎么这样没有人道？”

于是把身边的指甲刀掏出来送给柏杨，在孤独的灯光下，他为自己修剪指甲，心里盘算着，两个多月，原来已被捕这么久了，他没有能力支配自己的命运。就在这时候，外边送来晚餐，刘展华让柏杨进食，他的消化系统早已经停止功能，当然吃不下，刘展华把它包起来，放在墙上一个空坎里，坐下来，轻松地说：“柏老，开始吧！”柏杨坐在他的对面。“好吧，说说你被俘的经过。”“我从没有被俘过。”这时候轮到刘展华吃惊了。“你没有被俘过。”“是的。”“你不是告诉高义儒，你被俘过吗？今天怎么翻供了？你是想把调查局像孩子一样的玩弄在股掌之上？你太自命不凡！”柏杨毫无意识地回答说：“是的，我被俘过。”“被俘后关在什么地方？”“在沈阳北大营。”“关了多久？”“三天”“三天之内你做些什么？”“都是共产党军官向我们解释八大政策，要我们回乡生产。”“有没有吸收你加入组织？”“没有。”刘展华的脸像帘子一样，刷的一声拉下来。“你没有被吸收加入组织，这是天大的笑话，凡是被俘的官兵，都会参加组织的，你一个人不会

例外。”“我确实没有参加组织。”“只有说实话，才可以救你，纸包不住火。”“我确实没有参加任何组织。”

“又来了，前些时你还发誓没有被俘过，你想骗谁？”

柏杨哑口无言，才发现承认被俘不是灾难的结束，而是灾难的开始，他承认自己被俘过，本来希望逃出虎口，想不到却是自己把脖子伸到断头台下，真正是聪明一时，糊涂一世。两个多月的折磨，他已十分沮丧，现在又从沮丧转成绝望，放弃了挣扎，叹口气说：

“他们吸收我加入共产党。”

刘展华惊喜地抬起头，拿着柏杨的口供，飞奔到隔壁向刘昭祥及调查小组报告，大约二十分钟，他转回来，一脸怒容。

“你确实加入了共产党吗？”

“是。”柏杨细声地说。

刘展华大声叫起来：

“你也配？你顶多是一个外围的混混、无行的文人。我们从不冤枉人，你老老实实告诉我，你被俘后，到底参加什么组织？”

柏杨悲哀地说：

“其实我什么组织部没有参加。”

“现在的问题，不是你参不参加的问题，而是你参加共党哪个组织的问题。”

柏杨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不准他参加共产党，却知道如果一定要说参加共产党的话，闯不过这道关口，可是他对共产党的组织实在十分陌生，刘展华发现问题又回到零点，十分愤怒，正要发作，一件事情救了他，那就是午夜供给调查员和囚犯的点心（两块蛋糕和两瓶牛奶）送来了。刘展华把点心收拾起，连同放在窗坎里柏杨的那份晚餐，用报纸包起来，准备带回家去，然后命差役把柏杨送回押房。

但该来的还是要来，调查局不能再继续拖延，刘展华急于交差，所以决定用刑。

在那约有六个榻榻米的侦讯室里，靠墙是一张简陋的办公桌，刘展华坐在桌子一边，柏杨坐在他对面，那是初夜，一分钟前柏杨依稀能辨认的挂在他脸上的温文祥和的笑容，突然消失，他吩咐柏杨说。

“把手压起来！”

刘展华示意柏杨把手压在屁股底下，他把双手压在大腿下面，刘的眼睛射出凶光，柏杨急忙把手移到臀部下面，他凝视着柏杨，问他到底参加过什么叛乱组织？这是昨天审问的继续。柏杨的双手开始发麻。

“柏老，”他说，“逮捕你不逮捕你，权在我们。能不能打开大门走出去，权在你手。你只要白，就立刻可走。像你这样的匪谍，永不会了解我们三民主义信徒的高贵情操，我们以诚待人，只要你肯合作，我人格保证，像刘科长说的那样，你就跟洗个澡一样，从今以后，永没有人敢碰你！”

柏杨双手发胀，说愿意坦白合作，但实在没有参加任何叛乱团体。

“昨天你还承认加入共产党，今天连昨天的话都推翻了！”

刘展华放下原子笔，拿起米达尺，上下摇动，好几次，几乎戳到柏杨的眼珠，柏杨双手发烫，突然间，纵是闪电都没有那么快，米达尺嗖的一声抽打到柏杨右脸颊上，一道火辣的灼痛使柏杨觉得他用的是烧红的铁条，柏杨叫了一声，左颊上又被反抽一下，他大叫说：“你打人……”于是右颊又受



更重的一击，那是他的拳头，柏杨的眼镜像投掷出去的飞镖一样，跌到行军床上，柏杨失去重心，连同椅子跌倒在地，而刘展华突然踢出的皮鞋尖端正踢中柏杨的左膝，他正要爬起来，更猛烈的一脚又踢中他的右膝，他似乎听到骨折的声音，两膝剧烈的痛使他哀号，他在地上滚动，又是凶猛一脚，踢中他的心口，柏杨号叫着爬到墙角，像一条就要死在乱棒之下的丧家之狗，尽量弯曲膝盖，抱到胸前，但又一脚正踢中柏杨的右耳，他急抱住头，忍不住大声哀号。

“听清楚，”刘展华说，“你被拷打死，我们只要说你畏罪自杀，就一了百了，你高估了自己！”

突然，刘展华抓住柏杨的头发，拳头像暴雨一样的猛击他的脸部和前胸，他挣扎着，用双手回挡，但刘展华的皮鞋接连的踢中他暴露出来的小腹，他把前头撞到地上，他还不愿死，死也阻止不了刘展华，特务如果在乎犯人死活，就不是特务了，而柏杨怕他把自己踢成脑震荡，踢成残疾，便哭号说：

“我招供，我招供，不要打了。”

“好吧，坐回你的位置。”

柏杨用了足足三四分钟，才从墙角爬到桌边，浑身湿透，怎么也站不起来，抖得像大风里贴到墙上已快脱落的一片枯叶，汗珠、鲜血，和眼泪流满一脸，柏杨拼命喘气，用手去抹，才知道脸上满是泥土。这时刘展华好心地扶住柏杨，把柏杨扶到椅子上落座。

“说吧！”刘展华再拿起笔录和原子笔，那米达尺已不知扔到哪里。

“我，我，”柏杨思索，真渴望知道：承认参加哪个叛乱组织，才能使他满意。柏杨揣摩他的意思，在案头看到“民盟”两个字，似乎捕捉到一点暗示，于是，柏杨呜咽的说：

“我参加中国民主同盟。”

“你看，”刘展华向柏杨友善地笑着，“柏老，你要是早说，怎么会有刚才那种误会，其实你的资料我们全都掌握在手，但我们要你自己承认。”

柏杨认为既承认被俘过，又承认加入中国民主同盟，事情就可结束，料不到这仍是一个开始。特务是嗜血的，一旦动手，不会停止，雷马克在他的《光明之路》书上，描写一个德国民兵，在集中营兽性大发时，叫一个瘦小的犹太人趴在地上，他用脚乱踩乱踢，满口愤怒的咒骂，一直等到犹太人咽下最后一口气，他才悻悻而去。回到城市里，这个小商店老板的杀人凶手，立刻变得文质彬彬，从内心到外表都是一个典型的小市民，任何人都看不出他会施暴。

刘展华、刘昭祥、高义儒、李尊贤，是一系列典型的例证。柏杨相信他们在社会上，一定会是一个温柔敦厚的朋友，可是无限权力和潜在的兽性，使他们变形。

不久，柏杨被另外一件事再度摧折，刘昭祥把同案被告的孙建章承认加入中国民主同盟的口供，拿给柏杨看，同一时间，再把他加入民主同盟的口供，拿给孙建章看，两个人黯然神伤。

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在法律上，已完成判决死刑的要件，只是柏杨还不知道。当口供问到逃亡北京的时候，又是一番拷打，刘展华坚持柏杨在北京一定跟共产地下党有所接触，而且一定奉有到台湾做地下工作的指示。柏杨每一次否认，都会使他怒不可遏。当李尊贤询问口供时，他有一定的模式，首先，他打开十行簿，套上复写纸，定上时间、地点，然后再单起一行写上

“问”，接着再写两个字“请问”，然后把笔放下，燃上一支有滤嘴的烟，深深吸一口气，再拿起笔来，慢条斯理地开始。这一点并没有什么稀奇，稀奇的是他手中的米达尺，他会用牙齿咬住滤嘴，然后像鞭击一样抽打你的面颊，再慢条斯理地在口供簿“请问”二字下，写下他的问话，而且用语十分谦卑，任何人都无法从这谦卑的用法上，联想到他的凶暴。

有一天，柏杨忽然想起来北京旃坛寺，他和徐天祥同被第一军官训练班羞辱的往事，于是乎柏杨承认，共产党在北京的总指挥所设在旃坛寺，他曾经前往旃坛寺报到，然后由北京人民政府发给路费，前来台湾。

接下来是审问上海那一段，这时候柏杨所想到的只是怎么样避免拷打，一直抱着自己的头去，相信只要不被打成脑震荡，只要神志清醒，不被枪决，总有一天会离开监狱。只要活着出去，一定要把蒋家父子特务的黑幕，一桩桩一件件，详细写出。

最初，柏杨考虑到连累孙建章的程度，后来当柏杨说一到了北京就跟孙建章分手，刘展华相信，所以他也就放开了胆，捏造自己从没有做过的故事。

柏杨到上海以后的口供，更是离谱。会在四川三台东北大学当过教务长的许逢熙先生，柏杨在做口供时，供称他是复旦大学校长，兼任中国民主同盟上海支盟秘书长，柏杨晋见了，而且须了一笔活动费，就直接来到台湾，隐藏在地下，然后，竭尽所能地发表文章，与共匪隔海唱和，打击最高领导中心，挑拨政府与人民之间的感情。

当柏杨的全部供词写毕，已是他被捕的四个月之后。依照规定，羁押不可以超过四个月，于是就在七月六日的夜晚，刘展华把柏杨提到审讯室，满面和蔼的笑容，安慰他，认为凡事都应该往好处想。柏杨忽然兴起悲情，流下眼泪，他说：

“古人有言，宁愿一家哭，不愿一路哭！”

## (28) 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来时各自飞

一九六八年七月七日，正是芦沟桥抗战八年的纪念日，柏杨被戴上手铐，押上一部铁栏杆警车。在步履艰难的走出押房大门的时候，李尊贤恰巧擦身而过，忽然停住脚，指着柏杨说：

“我第一眼就看出你是匪谍，现在有什么话说？”

柏杨木然地望着他，一直走过去。

“死不认错！”他在后面生气说。

柏杨很想回头唾他一脸，当然，他没有这么做。上车后，发现孙建章也在里面，他们相对苦笑，押解他们的两个特务，在旁警告说：

“不准讲话！”

柏杨透过铁栏杆窗子，浏览沿途街景，想到分别四个月的妻子倪明华，每当警车遇到红灯停住时，他都幻想，会不会发生一种巧合：明华开着车子也因红灯而停下来，两车并肩，他们可能对一个照面，不能想像两个怎么反应？向她微微一笑？或者擂窗大吼：“冤啊！”那将给她多大的负担！他惆怅地重睹睽违四个月的台北和平东路、罗斯福路，直到景美，进入台湾警备司令部军法处，在一个法庭前下车，军事检察官郭政熙下令收押，柏杨和孙建章被分别带到两个押房。和十年前青岛东路保安司令部军法处看守所大不相同，警备司令部军法处看守所全是新建筑，而且厕所是蹲式的抽水马桶，不过奇特的是：距地面约一公尺，也就是约到腰部的地方，有一块横置的木板，囚犯如果直着身子，根本走不进去，只能爬着进去，无论大小便，都无法蹲下，只能趴在那里，像狗一样的拉屎撒尿。不知道当初的设计人，为什么会生出这种邪恶主意？天正盛暑，没有自来水，抽水马桶只不过是一个粪坑。押房有十个榻榻米那么大，挤满了赤身露体、只穿短裤的难友。当大家知道他是柏杨的时候，发出一阵惊呼，有人说：

“全国只有你一个人敢讲真话，还以为政府给你特别任务，做榜样给外国人看。”

直到这时候为止，柏杨还弄不清犯了什么罪，和犯了什么法条，所以难友向他查问案情的时候，无法回答。就在火烧似的押房里，开始难以形容的煎熬。

一天早上，门缝里塞进来起诉书。

难友们看到柏杨起诉书上“惩治叛乱条例第二条第一款”时，脸色苍白，不说一句话。柏杨急着问：

“我的罪可能判几年？”

一位难友把一本《六法全书》塞给柏杨，他查到惩治叛乱条例第二条第一款，那是唯一死刑，唯一死刑就是说：

“除非不判罪，一旦判罪，就是枪决。”

柏杨脸色跟其他难友同样苍白，霎时间，童年往事，涌到眼前，继母的咒骂：“叫炮头”，如今果真无情地应验在自己身上！他虽然想不通自己何以如此下场，但是，这时候终于明白：蒋经国要杀他。

柏杨不甘心地自问：

“我难道真的伤他那么重？”

一位好心的难友爬过来坐在柏杨身边，悄悄地问：

“起诉书上的事情是真的吗？”

“全是编出来的。”

“你真是小说家，”他说，“你这篇小说的稿酬太高了，恐怕要付出生命。”

另外一位难友递来一杯开水，柏杨爬着去接，右膝盖发出一种强烈的剧痛，他呻吟着，坐在地上不能动弹，右膝红肿，柏杨发现已成残疾。这时难友们各自回到铺位上，他用手抚摸着右膝，心中凄凉。不知道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才发作，不然他会在送到军法处的时候，要求军事检察官验伤。但是难友们告诉一些类似的故事：一个人在调查局被拷打得遍身流血，送到台大医院医治，那人的女儿（真是世界上最好的女儿）千方百计探听出爸爸的下落，并设法把病历表影印一份，当面呈堂。军法官和检察官都哑口无语，逼问她这些资料的来源，要判她泄露国家机密的重罪。最后虽然没有让她坐牢，但法官对她父亲被拷打，却做了明确的解释说：

“检验单固可证明他在调查局受过殴打，却不能证明被调查员殴打，可能人犯互殴，亦可能自行撞伤，所提证据，不足采信。”

更因为他女儿居心险恶，企图诬蔑政府，陷治安人员于罪，对她父亲判得更重。

“检调是一体的，法律在他们手上，”一位难友说，“我们束手无策。”

大家提出的具体意见是：

“开庭的时候，千万不要提及你受过刑求，那反而激起他们的报复，也不要说犯的罪都是你编的，军法官会认为你狡猾无赖。唯一的办法是假装信任军法官公正清明，只请求调查沈阳沦陷后，共产党有没有设立民主建设学院，有没有中国民主同盟；北京沦陷后，旃坛寺有没有共产党训练机构；上海那时候的复旦大学校长是不是许逢熙。法庭只要就这四点澄清的话，你就有活命的机会，千万不要指责他们的革命同志。”

大概一个月后，正式开庭，审判长是上校聂开国，主任审判官是少校方培然。柏杨站在台下，请求庭上就上述四点施予调查。庭上的军法官似乎还没有遇到过这种方式，一时不知所措，犹疑了一会功夫，方培然悻悻地说：

“本庭就着手调查，叫你死而无怨。”

他走出法庭的时候，蓦然间看到明华拉着佳佳的小手站在路边，向他凝视，佳佳眼睛瞪得那么大。差不多半年不见了，孩子似乎长高了不少，相距只有五六步，做爸爸的却不能上去拥抱自己的女儿。

监狱生涯就是艰辛，在那闷热拥挤的押房里，囚犯们的生命被片片撕碎。看守所接见日是星期三，最初，明华每星期三都来探望，携带一点小菜，有时候也带佳佳来。看到佳佳，他的心都滴血。他要求明华以后不要再带她来，一看到孩子，父女俱伤。

长期羁押下来，渐渐的，和明华见面时，几乎已经无话可谈。“唯一死刑”这个条款，明华已在律师那里完全了解它的意义——这不是一个短时间之内就可解决的挫折，而是一个要长期耐心承受的灾难。明华是个受人侍奉的小妇人，她面对的是她完全不了解，而又充满恐怖的压力，她完全慌乱，真难为她支持了七、八个月之久。后来，接见的的时间由一周一次，减到每两周一次，再减到每一个月一次，更变成两三个月一次。柏杨每次接见，都有心理准备，认为一定会发生，却一直没发生的事，终于发生了。最后一次接见，隔着玻璃窗，明华毫无表情的在电话的那一端说：

“我们的离婚手续，应该要办一办了！”

“我临走时，写好离婚协议书，亲笔签名，又亲自盖章，放在你那里，拿出来就可以用。”

就这样，结束十年婚姻。柏杨想起一句话：“夫妻本是同林1鸟，大难来时各自飞。”接见完毕后，他站起来，浑身像煮在滚水锅里，踉跄回到押房，心里一片茫然。他告诉自己：现在什么都没有了，过去四十年，只是一场漫长的梦。难友们怕他跌倒，扶着他坐下，他自己爬到铺位上，身体靠着墙，有人问：

“太太接见了么？”

他点点头。

“是不是向你提出离婚？”

他又点点头。

“太太来接见，而没有带东西，一定是分手！”

从此，他吃不下任何食物。他再一次想到：死才是最好的解脱。当绝食到第十天的时候，军法处开庭，两个法警把他扶到庭上，方培然只问了一句话：

“你为什么不吃？”

“我不想。”

这一次开庭，只不过在法律上做一个纪录，所以问一句话即行结束。想不到，大概因为肠胃放空了的关系，神志反而特别清醒，对死亡反而没有什么感觉。家破也好，人亡也好，大学毕业也好，大学不毕业也好，一切都成了过去，现在就是静静地躺在那里，并不等待什么发生，而只什么都不等待。

看守所官员对他似乎十分注意，他们把押房里其他囚犯全部调走，另外派一个官方的御用难友，进来睡在他身边，名义上是照顾他，实际上是暗中监视，防他自杀，不断用香喷喷的饮食引诱劝勉柏杨进餐。

有一天，那位御用难友特别把柏杨扶到另外一个房间去洗热水澡，他身上已经没有肌肉，瘦枯的骨骼，被失去水分的焦黄皮肤包住。他向自己叹息，这正是一个叛乱犯的下场，他竟这样倒毙在监狱里，回想二十年前万里逃亡，并不后悔，反而有一种终于安静下来的感觉。

有一天，那个可以自由出入押房的御用难友，忽然进来告诉柏杨说：

“你太太来接见你，”而且告诉柏杨其中原因，“你太想不开，所长特别请你太太来劝劝你。你不要以为我是他们的走狗，活着，你才能报仇！”

就在所长办公室，倪明华冷若冰霜地坐在那里，柏杨则坐在茶几的另一边，茶几上放着一个旧式的旋转盘录音机，用来录下囚犯和家属的谈话。所长在一旁说：

“你们有什么话尽管谈谈，不要糟蹋自己。郭太太，有话尽管告诉你先生。”

然而，没有人开口，明华那种充满了厌烦和不耐的表情，带一种万箭俱发的杀伤力。柏杨连正眼都不敢看她，她已不是他第一次看到的她，也不是最后一次看到的她，他眼前坐着的是另外一个心肠铁铸的女人。经过四五分钟之久的无声无息，柏杨只好首先开口说：

“事情已经如此，我完全靠你了。”

“你不要靠我，我管不了。”

“我知道你很能干，你……”

“我不能干。”

柏杨哑口无言，幻想着她可能会讲几句安慰鼓励的话，即令是假的也好，可是没有，她眼中充满了厌恶。他再无法开口，只听录音带旋转的声音，所长再一次地提醒倪明华有什么话尽管说，她没有任何反应，连在旁边监视的警卫们，也在那里叹息。最后，所长无可奈何地说：

“既然没有话说，那你请回去吧！”

声音还没有落地，明华倏的站起来就走，没有跟任何人打一声招呼，经过柏杨面前也没有多看一眼。他急忙尾随着她，几乎是同时冲出房门，她好像逃避瘟疫似的，走得飞快，他紧靠着她身旁，希望听她说出一句话，假定这时候她能够告诉他：

“你放心，我还会继续营救你！”

这世界该多么不同啊！然而，什么话都没有，走廊上唯一听得见的，就是警卫们快步跟着他们走的声音。下了楼梯，明华直奔大门而去，两个警卫抓住柏杨发抖的肩膀，把他押回囚房。这是他们最后一次见面，从此之后，天各一方。不过，后来倒是接到她一封信，一个月后，明华一封简单的信从门缝塞进来，信上说：

“离婚手续已办妥，法院已登记，请问：你的东西，我怎么处理？”

他不知道怎么答复，晚上睡觉的时候，还拿着这封信，不停地呻吟，终于镇定下来，提笔回信说：

“我在台湾无亲无友，无依无靠，在此授权给你，把你认为属于我的东西，全部抛弃到大街之上，随人拣取，立此为据。”

奇怪的是，这封信使柏杨的心情豁然开朗，觉得自己的绝食行为有点好笑，当初有一百个、一千个理由绝食，这时也有一百个、一千个理由，觉得荒谬，其中一个最最主要的不成理由的理由是：

“我要活下去，好记下我的遭遇！”

这时绝食已二十一天，他恢复进餐。

时代到底不同，二十年前，他第一次坐牢时，不但没有律师，也没有起诉书和判决书。现在不但有起诉书，还准许被告请律师查卷。柏杨请的律师，在查卷以后告诉他说，请求法庭调查，法庭确实都调查了，而且有了答案：

第一、沈阳沦陷后，根本没有什么民主建设学院。第二、共产党从不在他的训练机关里，为友党吸收成员，所以柏杨不可能参加中国民主同盟，即令他参加中国民主同盟，中国民主同盟当时是国民党的友党，也不违法，第三、共产党并没有在北京旗坛寺设立任何训练机构。第四、许逢熙自抗战胜利后从没有到过上海，也从没有在复旦大学任职。

一连串的正面消息使柏杨转忧为喜，柏杨向一位看守班长报告这种情形，半自嘲半征询的说：

“法官不可能判我刑！”

“二条一”唯一死刑，只要有下列两个条件就可以构成：一是参加叛乱组织，二是有叛乱行为。隔壁押房里台北市挑挽业公会理事长八九岁的时候，曾参加过儿童团；五十年后，他告诉朋友说，共产党在长江上建了一座大桥；前者是参加叛乱组织，后者是为匪宣传，属于叛乱行为，结果被判处死刑。

——自从罗马法颁布以来，再野蛮国家的法律都有一个基本原则：“不溯及既往”。也就是今年公布的法律，效力不能追溯到去年，可是，蒋家班大法官为了使特务的杀戮合法化，第六十五次会议上作成决议，认定法律可以溯及既往，即令在这项条例颁布前五十年加入过共产党，也等于现在加入。

那位班长听出柏杨的话充满自信，忍不住笑说：

“你放心吧！我还从来没有听说过叛乱犯被判无罪的，如果没有犯罪证据就不判刑的话，军法官靠什么吃？”

班长的话使柏杨心中一凉，百思不得其解，军法官根据什么判罪？不过，不久，他就明白了，特务有特务的行为模式。他被带到法庭，审判长聂开国起立宣布：

“郭衣洞被判有期徒刑十二年，褫夺公权八年。孙建章被判感化三年。”

柏杨最初认为会被枪决，继而又认为会被判无罪，脑筋简单得和白痴没有分别。宣判完结，他被押回囚房，当难友知道只判十二年时，都为他死里逃生，向他道贺。孙建章由柏杨的证人变成他的共同被告，在审讯途中，刘展华一再向他警告说：“我们的对象是柏杨，不是你孙建章。你不过是陪绑罢了，死不承认，将来会把你一起卷进去。”事实上，他们对孙建章也确实特别优待，只判感化三年。所谓感化，就是不送入军人监狱，而送入台北县土城乡一个名叫“生产教育所”的集中营式监狱，实施思想教育，名义上感化若干年，实际上是看特务的高兴或不高兴，可以无限期延长。倪明华的师兄傅正先生，就延长了两个三年，甚至当中还有一段时间被囚禁火烧岛。孙建章总算是不幸中的大幸，他三年期满出狱，虽然家破，幸好没有人亡。柏杨出狱之后，跟张香华——那时，他们刚认识不久，在台北衡阳街和他蓦然相遇，柏杨拉住他，向他致歉说：

“建章，对不起你！”

“谁又对得起你？”他说。

这句话简单朴实，使柏杨无限内疚，终生铭感。

## (29) 未把他遗忘的女孩子

自柏杨被判有期徒刑十二年，就从一个“被告”身份，变成正式“人犯”，不过仍暂时羁押军法处看守所，并没有解送到监狱服刑。忽然有一天，他被调出押房，充当“外役”。“外役”的意义，就是可以在院子里自由走动，接受监狱官或班长指定的工作，晚上则仍然关入押房，这是一般人犯所盼望的差事。现在，他被调到看守所图书室工作，更是外役们所期望的福地，所以心情很快就获得不少纾解。他把行李搬到外役区押房，从此可以自由自在地从押房走到图书室，有一种前所未有的轻松感觉。图书室还有一位外役丘延亮，原是台湾大学人类考古学系的高材生，他的姐姐是蒋中正的儿媳、国防大学校长蒋纬国将军的妻子。丘延亮在学校组织了一个读书会，暗中传阅从日本驻华大使馆利用外交邮件进口的左倾书刊。他是被逮捕学生群中判得最轻的一位，只判五年。事实上，他坐了两年半，也就是在柏杨被调到图书室的次年，就被保释出狱。

柏杨在图书室当外役，前后有一年多的时间，这是监狱生涯中最愉快的一段日子。从被囚禁的人挤人的狭窄囚房，突然转移到可以兴之所至的在院子里走动的另一个世界，那种情境简直像梦幻一样。外役人犯和押房人犯有天壤之别，外役区除图书室之外，还有洗衣工厂和缝衣工厂。现在他和丘延亮坐拥一两千本图书，而其中有一套就是《资治通鉴》，使他开始着手写狱中第一部著作——《中国历史年表》。

囚犯在牢房中的地位，决定于有没有外来接济，每星期三的接见日，丘延亮在中央信托局任处长的父亲，都派司机送来菜饭，所以情绪愉快。柏杨被收押初期，每星期同样也都有特别烹制的饮食送来，办完离婚手续后，就再也没有了。这时，只剩下陈丽真一个女孩子未把他遗忘，每星期都提着菜篮饭盒，从台北到景美军法处探监。

然而，有一次，当丽真接见过之后，转身要回家时，两个警备司令部的武装人员把她拦住，押解到军法处。她不知道犯了什么罪，被吓得路都走不稳，结果一位军官问她：

“柏杨是叛乱犯、国家的敌人，你为什么给他送饭？”

丽真回答说：

“他是我老师，现在孤苦无依，只有我照顾！”“他跟你什么关系？你说他是你老师，你读什么学校时的老师？”

丽真突然之间怔住，军官用一种洞烛其奸的眼神盯着她。“说呀！”

“其实，我是柏杨的读者！”

“那么师生是作掩护的外衣了，柏杨吸收你加入什么组织？只要你从实招供，我们可以免除你的罪刑。”

丽真这时候除了哭啼外，不知道说什么话好。军官说：

“你们的关系不简单，如果不是组织上的关系，他到这步田地，你不可能还藉着送饭的名义和他取得联系！”

丽真回答不出一句话，军官忽然换了一种缓和的口气：

“如果真的没有组织上的关系，你最好以后少来！”

丽真带着汗淋漓的身子，快步离开军法处大门。回到家后，当天晚上，她的夫婿陈体康先生从铁路局下班回来，带来消息说：管区警员特别去找他，警告他管管老婆，不要再乱闯是非之地。



从此，丽真很久不再来看柏杨，他认为这原是人情冷暖，对一个叛乱犯而言并不足惊奇，除了心里有一点点惆怅外，也就迅速地自行化解。可是，那一年的除夕，看守所播音室在播出感训教材之余，忽然播出一首祝福春节的歌：

“大年初一头一天，家家户户过新年！”

歌声之前，有一句道白说：

“各位听众好，我是“丽真”，向你们大家拜个新年！”

这是一首六十年代最流行的庆贺春节唱片，当然，道白里的“丽真”是一位歌星，不是他的学生“丽真”，不过这两个同音字，倒使他又一次涌出眼泪。

看守所图书室这段时日，是平生最宁静的日子之一，假设坐牢可以这样坐下去的话，十二年也无所谓。可是，在他调到图书室后不久，难友中就流传一项耳语说：政府在火烧岛上正兴建一座新式的政治犯监狱，囚禁日渐增多的政治犯。耳语又说，美军预备把储存在日本冲绳的毒气，运到台湾储存。国防部官员曾经陪同美军官员到山区视察，勘查储存场所，因而对获得美国支持的信心大增，认为美国的友谊牢不可破，永不会抛弃他们，把毒气迁储台湾，就是显明的保证。这使蒋家父子精神焕发，决心整顿“复兴基地革命阵营”中日渐自由化、也就是日渐失控的大众传播工具，以迎接新的战斗形势的来临。

于是，一九六八年，蒋家班发动了“文化消毒”运动，开始明目张胆地逮捕文化界的败类，柏杨恰恰首当其冲，成为被消毒的第一名。接着就是在火烧岛建造政治监狱，使这项消毒行动得以毫无限制地扩大范围。

当这个耳语开始流传时，政治监狱才刚刚破土，而火烧岛既远在天边，落成也不知在何年何月何日，难友们认为对这种“外岛管训”的恶运、不必忧虑。

然而，“快乐”的日子总是过得飞快，第二年，耳语传来，政治监狱已经盖好，政治犯集中管理，势在必行，唯一的希望是，名单上最好没有自己。有一天，看守所所长跟政战官突然来到大操场，集合全体外役政治犯，说是有要事宣布。当大家集合后，所长说：

“点到名字的，到前边集合。”

五分之四都被点到名字，柏杨也在其中之列，留在台北继续当外役的美梦破灭了。所长叫他们回去拿行李，然后被鱼贯地送回原来被告区的押房，而且立刻锁上房门。一会功夫，宪兵队逐个房间点名，每人上了五花大绑，两个人绑在一起。这对享受一年有余自由生活的外役来说，简直是当头一棒，平常笑脸相待的看守所班长，一个个变成另一付神情。尤其一个叫杨蔚的少尉监狱官，冈山中学毕业，考上军法学校，被派到看守所工作，他长得相当清秀，而且对外役也和颜悦色。有一次，他到图书室，很有礼貌的问：

“我是不是可以借一张椅子到外面，我喜欢树下看书。”

柏杨对这个年轻军官留下十分良好的印象，但是，三几个月后，当他发现他对外役有绝大的处分权力时，态度开始转变，最初不过气势傲慢，后来行动逐渐凶暴。这时候，他到押房视察，用手试探五花大绑的结实程度。他们坐在地上，他则不断故意用膝盖碰撞他们的面颊。就在当晚，几架探照灯的巨光投射到院子，他们被带出押房，两人一双的走上警备司令部的镇暴车，车队浩浩荡荡在黑暗中向北奔驰，天亮的时候，抵达基隆码头，被赶鸭子似

的赶到登陆艇的甲板上。登陆艇重新装备过，新的铁栏杆，新的链条。荷枪实弹的宪兵在四周戒备，他们被重重包围，坐在甲板上，什么都看不见，只看见蓝天。虽然没有谁告诉他们驶往那里，但是，人人心里明白，目的地是火烧岛。仿佛为了防备北京派出军舰或潜艇营救这一批重刑的政治犯，天上有飞机巡逻，海上有驱逐舰护航，柏杨从没有想到，他们的身价竟如此重要。

中途，忽然一阵大雨，宪兵中一个姓年的指挥官准许他们到官舱前布棚下躲雨。曾经当过台北市议员的难友林水泉先生，躲雨时拖着他的行李，那位正在蜕变自己的监狱官杨蔚，这时候跳起来，在他脸上猛摔一个耳光，大喝说：

“教你人避雨，没教你行李避雨！”林水泉一直拥有的豪放笑容收了回去，连那些年轻宪兵的眼光，都被这一声响亮的耳光吸引，而迅速流露出同情。当雨势停住，大家又被驱回甲板，宪兵们分别上来检查捆绑的绳索。一个年轻宪兵塞一支烟到柏杨口袋里，低声说：

“听说你是柏杨，刚才那个打人的王八蛋，他不过是个少尉。你想抽烟时，就喊报告说捆绑太紧，我会下来检查，就把烟带给你。”

前排右前方的一个宪兵也正在检查一个政治犯的绳索，低声告诉递给柏杨烟的他的同伴说：

“我舅舅也在里面！”

不久，大家都感觉出来，一种耳语正在宪兵队中轻轻的传递，有些年轻宪兵更低低的咒骂。显然的，宪兵与押解他们的警备部队，正迅速增高敌意，反而使柏杨担心他们会发生冲突。幸好这个航程时间不长，第二天下午，登陆艇驶进火烧岛港口。

## (30) 绿岛悲歌

火烧岛，这个使人毛骨悚然的名字，位于台湾东南海域。世界许多国家好像都有一个毛病，恐怖时期的政府，总是在它的领海上找一个孤岛，囚禁重要人犯，法国就有一个魔鬼岛，南非也有一个罗本岛。日本占领台湾时，就把火烧岛当作囚禁反日分子的天然监狱，台湾回归祖国以后，国民政府把火烧岛改名为绿岛，但它的任务并没有改，五十、六十年代，岛上的政治犯有万名之多，那时候的火烧岛，只有稀疏的不到十个村落。政治犯被送到岛上后，自己动手先筑起围墙，然后，再在中间筑起铁丝网，挂起“新生训练总队”招牌，男政治犯和女政治犯被铁丝网遥遥隔开，他们各自搭盖自己的草屋宿舍。就在那四周全是惊涛骇浪的孤岛上，一到夏夜，鱼腥扑鼻，但每当有月光的夜晚，一抹朦胧，有浓厚凄怆的浪漫情调。据说曾经有男女政治犯遥遥相望，不能对话。一位出身音乐教师的政治犯和一位音乐系女学生的政治犯，隔着铁丝网，一有机会，就站在那里痴痴凝望，后来教师为她写下曲谱，借着歌声，向她唱出凄怆的心情，这首歌曲曾经流行全岛，那就是有名的《绿岛小夜曲》：

这绿岛像一只船在月夜里摇呀摇  
姑娘哟你也在我的心海里飘呀飘  
让我的歌声随那微风吹开了你的窗帘  
让我的衷情随那流水不断地向你倾诉  
椰子树的长影掩不住我的情意  
明媚的月光更照亮了我的心  
这绿岛的夜已经那样沉寂  
姑娘哟你为什么还是默默无语

在那个白色恐怖的时代，作者是谁，赠与的对象又是谁，自不敢露面，也都无法查考。不过每当这首歌声响起的时候，就使人想起那个不平凡的故事，和台湾经历过的悲情命运。

当他们这群政治犯在火烧岛上岸的时候，火烧岛已不再那么荒凉，车队穿过山间小径，向监狱进发，连绵不断的丘陵上，满布着全副武装的岗哨。最后，他们在一个全新建筑“国防部绿岛感训监狱”门前停下，然后分批被驱入押房。

国防部绿岛感训监狱的囚房，是一个二层楼建筑的小型五角形大厦，共分为十个区，每区有十个、八个押房不等。就在这里，柏杨度过整整五年。

他们被带入押房里，监狱官下令政治犯交出身上所有的香烟。在外设工作区的人，无论图书室、洗衣工厂，或缝纫工厂，都准许吸烟，后来在登陆艇上，透过宪兵充满了同情的手，大家身上多少都有几支香烟。这时候，监狱长宣布说：

“不管你们过去受到什么优待，本监狱绝对不许囚犯吸烟。”

不准吸烟，对不吸烟的人没有丝毫影响，但对有烟瘾的人来说，简直是一个严重打击。十五年后，蒋家班威权政治崩盘，所有监狱才解除了这个无聊的禁令，并没有听说哪一个囚犯利用打火机或火柴自杀或杀人放火。官员们所以禁止囚犯吸烟，只是展示他威权的一种手段，目的是国民党青年守则外加的第十三条：“整人为快乐之本。”事实上，绿岛感训监狱从开始那一天，一直到结束，政治犯没有一天断过香烟。

第二天，押房门忽然打开，一个水电班长，大踏脚步走进来，用他的手扳头敲了两下厕所龙头，等开门的戒护班长离开后，他转头过来，低低问一声：

“那位是柏杨先生？”

柏杨应声答应，那班长从口袋里掏出一封他入狱前回给读者们的贺年卡，说：

“我是你的读者，名叫郭鹰，我这里先给你一包烟，吸完以后，就报告看守说：‘抽水马桶坏了。’我就会带烟来。”

柏杨入狱前一直保持每天四包烟的习惯，郭鹰当然无法供应，可是，一下子竟然有香烟的来源，使他在监狱里的地位大为提高。

政治犯监狱，是出懦夫的地方，也是出勇士的地方；是出呆子的地方，也是出智者的地方；是出疯子的地方，也是出英雄的地方；是出废铁的地方，也是出金钢的地方。一个人的内在品质和基本教养，坐牢的时候，会毫无遮拦地呈现出来。

柏杨在牢房里结识的朋友有几十个之多，最传奇的就是台北（大华晚报）董事长兼中国广播公司副总经理李荊荪先生。当柏杨锒铛入狱的时候，李荊荪主张立刻开除正在中广公司当职员倪明华，一年后，李荊荪也锒铛入狱。他当初画清界线的行动，反而被指为“伪装忠贞，以便使自己挤入领导中心的伎俩”，他的案子是件一手遮天、明目张胆的冤狱。当时，周至柔和蒋经国激烈的争夺行政院长高位，李荊荪是周至柔的智囊之一，迅速发展出一种不可抵挡的形势。蒋经国最后只好釜底抽薪，使用雷震模式，先教一个人自认是共产党，然后再一口咬定李荊荪是他的同志，就万事妥当。雷震被控以知情不报，判处徒刑十年，李荊荪则以加入叛乱组织，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蒋经国不久跃上行政院长宝座，周至柔从此噤若寒蝉，抑郁以终。李荊荪是一位智慧型高级知识分子，在牢房中受所有政治犯的尊敬，他们不久就成为最契合的伙伴。十年后，李荊荪被送到台北土城“生教所”集中营监狱，度过残余的刑期时，蒋经国准备对他特赦，条件是要他写一封悔过书，他微笑地拒绝。他说：

“判十五年，就坐十五年！”

李荊荪整整坐满十五年，不差一天。出狱后，《中国时报》约他执笔写短评，就在写字台上，突然心肌梗塞，溘然去世。出殡的时候，一批难友齐集善导寺灵堂，向司仪要求一个公祭的时间，治丧委员会总干事一口拒绝，不知道从那里来的冲动，柏杨在吊客群中一跳而起，大喝一声：

“火烧岛的难友，到前面来！”

在大家愕然中，徐瑛、卢修一等十几个人挤到前面，柏杨高声朗诵出临时想到的祭文：

“荊荪大哥，你这个国民党的忠贞分子，竟被国民党迫害得家破人亡，好容易拨云雾见青天，想不到又死于心脏病发。当我们希望你能领导我们反抗暴政的时候，你舍我们而去，但我们相信国民党反动的暴政必然灭亡，你在九泉之下会看得见的，我们也会看得见的。”

有人开始啜泣，荊荪夫人终于哭出声音，那是灵堂的第一声哭声，荊荪的女儿也下跪致谢。那时仍是白色恐怖时代，蒋家班的威权仍在颠峰，柏杨公开用暴政必亡回敬国民党。当他们离开灵堂的时候，灵堂寂静得像一个坟墓。

另一位政治犯徐瑛先生，从任何角度来看，他都是模里西斯共和国的公民。在他曾祖父那一代，移民非洲东南、印度洋中的模里西斯岛。当模里西斯是英国属地的时候，徐瑛是英国公民；后来模里西斯独立，徐瑛是模里西斯公民，出任模里西斯《华文中央日报》总编辑。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他这个英国公民留学北京，就读北京大学。一九六七年，他代表报社前往东京购买新型印刷机，因为不知道中国人内斗的残酷性，竟然路过台湾。当时恰巧世界各国其他华文报纸负责人正云集台湾，于是大家一齐受到蒋中正召见，十分嘉勉他们的贡献。就在第二天，当蒋中正握手的余温仍在徐瑛掌中的时候，他的双手已被警备司令部的铁铐锁住，随后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徐瑛在十五年牢狱之中，没有一分钱接济，连买卫生纸钱都没有，更不要说牙膏牙刷。中国有句俗话说：“烈妇易，贞妇难。”刑场上高呼万岁容易，监狱里十五年不屈难。徐瑛是柏杨所看到的政治犯中最沉稳的一位，无论遇到多大的困难，都面不改色，甚至连放风的时候，脚下一步都不错乱。国民党政府要求徐瑛放弃英籍护照，徐瑛拒绝，天下没有一个人愿意选择一个坐牢易如反掌的国家。可是，坐牢期满后，面对十五年不准通信、远在万里之外的故乡，他发现他和中国籍的其他政治犯遭遇一样，早已家破人亡，妻子和孩子们对于失踪十五年之久的丈夫和父亲突然出现，无法接受，以致徐瑛有家难归，有国难投。就在这时候，他认识台湾宝岛女子陈玉曦，结为夫妇，他终于主动地改换护照，一直到柏杨写回忆录的时候，他们仍快快乐乐地过着新生的日子。

卢修一先生，这位法国巴黎大学博士，那时候正在台北东吴大学当政治系主任，他如果依附国民党的话，可以预测到他的前程既平坦而又光明。可是，他却于柏杨出狱后不久被捕，特别优待，只判感化三年。卢修一后来当选立法委员，他的妻子陈郁秀是师范大学的音乐教授。

另外一位绰号叫“兄弟”的林震廷先生，他是一个沉冤海底的人物，现在已经很少人记得刘自然案件了。韩战发生后，美军根据中美协防条约，进驻台湾，使国民党政权死里逃生，获得强大的支持力量，然而，任何国家的士兵都有坏胚。一九五七年，住在阳明山的美国军事顾问团军士雷诺，把当地居民刘自然两枪击毙，宣称刘自然偷看他太太洗澡，甚至在他开了一枪把刘自然击中倒地后，刘自然仍爬起来，后拿木棒，企图进屋行凶。这个离奇的故事，激起民族情绪的反弹，爆发反美运动。在大家还没有弄清事情真相以前，就包围美国驻华大使馆，殴打美国官员和践踏美国国旗。第二天，国民政府开始逮捕群众，一一判罪，刑期最高的只有六个月，而且宣布全案就这几个人被捕。当时著名的专栏作家凤兮还特别写文章赞扬政府明智，柏杨也深信在这件涉外案中，当局绝不至于说谎。想不到，被囚火烧岛后，却发现了“兄弟”。他被捕时是《联合报》的记者，特务们在包围美国驻华大使馆人群的照片中，查出了他，判他无期徒刑。任何媒体都没有透露片纸只字，在他整个的服刑期间，一直担任外役，上自监狱长，下至政战干事的升等考试、升官考试、年终考试，以及读训心得（读蒋中正的训词），都请“兄弟”代为执笔，而且全部奏效，他们也会买一点卫生纸或牙膏作为回报。很多忠贞官员竟然是政治犯一手造就的，是一个有趣的现象。

在难友中，有两位黄姓好友，一黄是黄恒正先生，他有极度严重的神经衰弱症，翻动纸张的声音，都使他惊醒和彻夜不能入眠。他和柏杨被囚在一个押房，相邻而卧。黄恒正的罪名是藏有反动书籍，被判有期徒刑十二年。

他思想纤细，柏杨惯于枕上看书，否则就睡不着觉，但是翻书的声音，却使他难以合眼，他要求柏杨不要看书，柏杨接受了，于是他为柏杨做了项庞大工程作为回报，就是用了一年半的时间，把柏杨写的《中国人史纲》原稿重抄到练习簿上，以备将来出狱时，正本被查抄撕碎，囚室里还留有一份。黄恒正获得自由后，不久结婚，大家为他得来不易的幸福日子，充满祝贺，却发现他得了癌症，住进马偕医院，柏杨曾去看他，他已骨瘦如柴，逝世后，他的妻子黄照美女士，被远流出版公司董事长王荣文聘作职员，同事都称她“黄姐”，在那个白色恐怖时代，这义举有相当危险性。

另外一黄，是位人道主义者，宜兰县罗东镇的黄英武先生，台湾大学毕业后，在罗东中学任教，对资本主义所造成的各种不可原谅的罪恶深为痛恨，自然而然的倾向社会主义。终于一件可怕的事发生在他身上，那时候，蒋中正署名的反共书籍《苏俄在中国》一书，正被各级学校奉为经典。可是，有一天，黄英武在台北牯岭街旧书摊上闲逛，发现一本一九二七年蒋中正著的小册子，宣扬国民党的三大政策之一——联俄容共，对苏共和中共赞扬得无以复加。这使黄英武大为震惊，于是买了回来，在学校公开传阅，学校师生也大为震惊。结果可想而知，黄英武被捕，判刑十二年。他是一个非常坚强而有理念的高级知识分子，从不动摇，也不悲观，狱中曾写了数十封以上的家书，教导他的侄弟辈如何立身持家。他出狱后，跟沈月桃女士结婚，经营油漆生意，不改诚恳敦厚的书生气质，使他的经营倍感艰难。

施明德先生，最初被囚禁在第六区——重犯区的政治犯之一，他的身体一直不好，有时被送到病房，有时又被送还押房。原配妻子陈丽珠女士是一位传奇的女性，父亲经商，施明德当时在炮兵学校读书，因主张台湾独立而被捕，并被判刑。他的妻子曾用巨额金钱，把他保释在外，还生了一个女儿。本来这件案子可以不了了之，但施明德的坚强性格，使他无法放弃他的理念，于是，重新被捕。就在六区押房，一天晚上，他腹痛如绞，大声号叫，第二天一早，就被送到台东八四野战医院，诊察出是急性胃出血，稍迟即行穿孔，于是立即开刀。这次救施明德一命的，是当时的监狱长郑显亚，郑显亚派车把施明德送到飞机场，强行拉下两位乘客，当时大家对军人还有点畏惧，没有人敢表示异议。施明德开刀后，身怀重伤，特务人员却把他一只手铐在病床上。陈丽珠去看他，发信到各机关各媒体请愿，声称她要到总统府前面自焚，以致八四医院的医师们都深深感动，对施明德说：

“你的行为我们不能苟同，但你妻子对你这番十年如一日的营救，有情有义，世间少有。”

然而，人生的变数太多，今天的盟誓，不能保证明天履行。一九七五年，国民党政府特赦囚犯，施明德和他最要好的朋友庄宽裕先生，一同由无期徒刑减为十五年有期徒刑，因为庄宽裕先施明德被捕，所以，庄宽裕也先施明德释放，生死不渝的情谊，使施明德向他托妻付女，于是事情急转直下，即令想像力再丰富的小说家，也写不出稍后使人不能想像的情节，施太太竟然抛弃了已经为他付出十四年的牺牲，再等半年就要被她营救出来的丈夫，而爱上了丈夫最要好的朋友。等到施明德出狱，所预期的妻子奔向丈夫相拥而泣，幼女抱着父母大腿也痛哭失声的感人场面没有发生，迎接施明德的却是令人错愕的消息，这是一个严峻的考验，脆弱的人真可能刹那间神经错乱。幸而，施明德十分坚强，他不久和充满政治理想而敢于行动的美籍爱尔兰裔的爱玲达结婚。

陈映真先生，政治犯中少数的小说家之一，他以《将军族》一书闻名文坛，军法处判他有期徒刑十二年。这十二年对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年轻人来说，不但不足以使他气馁，反而促使他更为献身。陈映真是中国共产党最热烈的崇拜者，既激情而又浪漫。一九七八年，台北《读书人杂志》社长陈铭璜先生设宴招待陈映真夫妇和柏杨夫妇，想听一下政治犯监狱生活情形。陈映真首先发言，他说：

“我们坐牢的朋友，一个个都有高水准政治素养，相亲相爱，互相扶持，沮丧时，大家唱歌鼓舞士气，都是亲密的伙伴。”

这段话引起在座年轻朋友们钦敬的眼光，只有香华大为惊愕，因为她从柏杨这里听到的是，难友们往往各有各的政治信仰，壁垒分明，甚至互不交谈，互相敌视。而有的所谓政治犯，更根本和政治无关。一位难友原关在流氓职训队，受不了那里的折磨，听说政治犯监狱比较自由，就喊了一句“共产党万岁”，被判五年徒刑，送到火烧岛政治监狱后，吃饭时都怒目插腰，立刻成为一霸。这一切跟陈映真所讲的完全两码子事，但陈映真讲诗，却是那样的诚恳温馨，仿佛一篇动人的革命小说。九十年代，陈映真一批朋友代表设于台北的“中国统一联盟”前往大陆访问，北京曾隆重地把他们招待到国家元首级贵宾行馆的钓鱼台，受到最高礼遇。

### (31) 八载铁窗苦著书

台湾政治犯的制造经过，大致上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侦讯期，普通都在调查局或在台湾警备司令部保安处，最为艰难。社会上受到普遍尊重又有充分自由的绅士，突然间被捕，推入四周都是铁栏杆的小房间里，被侮辱，被殴打，精神会霎时崩溃。货真价实的“判徒”，反而比较轻松，因为只要决定招出什么，或不招出什么就够了。只有那些欲招却无供可招的人，苦难最多，因为他必须揣摩问官所引导的方向，假设当初预定你是参加民主同盟的话，如果你忽然参加了共产党，他们就无法接受，假定你的猜测始终不能符合他们给你的暗示，苦难就更大。有人在严刑下，悲愤地叫：

“我是匪谍，我是匪谍，你们教我招什么，我就招什么！”

这种绝望的哀求，只会更激起审问官的愤怒，因为你冒犯了他职业的尊严，审问官会抓住政治犯的头发，教他跪在算盘上：

“我们从不教人招什么，你自己做了什么，就招什么。”

不是每个政治犯都跪过算盘，也不是每个政治犯都摇过电话（把电话线的电流通到手指上，然后摇动把手，电流会使一个人浑身发抖，屎尿齐出），但是，最后都会照着特务们的预期，招出答案。只要你第一件事自诬，就一泻千里，每件事都会自诬，直到法律把你完全严密的绑住。如果只看笔录，只看口供，每句话都是囚犯说的，事实上，每句话都是特务说的，真是：他白即自白，一一服上刑。

这段时间大约四个月（法律规定侦讯期间不能超过四个月，特务非常守法、四个月内足可以完工，即令超过四个月，也会捏造没有超过四个月），这是最苦的阶段，很多人就在这个时候被逼死或逼疯。一九六八年国立政治大学学生代联会主席许席图，在学校组织了一个学生社团——统一社，结果被捕，不到三个月，神智完全错乱。柏杨在警备司令部看守所囚禁时，每天都听到他从一个单独囚禁的幽暗房间里，发出凄厉的哀号：

“我要出去！”

“我要出去！”

“我要出去！”

“我要出去！”

四个单音节的字不断重复，从他那僵硬的、带着哭声的嘴中喊出，二十四小时，从不停止。监狱官在那寒冷的冬天，把他剥光，教他手淫。一间仅可容身的单独禁闭室，堆满了屎尿，他就在屎尿堆中，一声声呼唤：

“我要出去！”

“我要出去！”

“我要出去！”

“我要出去！”

每一声都像鞭子一样，把人的心抽碎，每遇有大官前来视察，监狱官就把许席图捆绑起来，用布条塞住嘴巴。军法处一度决定准许他保外就医，可是许席图出身贫寒，父母双亡，只剩姐弟二人相依为命，姐姐省吃俭用，供弟弟读上大学，她拒绝把弟弟领回，在法庭上哭诉说：

“我弟弟进来的时候，是一个好好的大学生，现在成了这个样子，我怎么养他？而且养好后又要再交给你们，还能再受得了吗？万一养病期间，他逃掉或失踪了，这么严重的罪名，我怎么承担得起？”



柏杨不久被调做外役，再不知道他的下落。转眼二十年，九十年代初期，白色恐怖已成为过去，《中国时报》忽然有一条消息，报导说台东玉里疯人院，有一位来路不明的病人许席图，希望能查出他的来历，许席图这三个字的同名度很低，柏杨打电话给报馆，说明原委，愿挺身作证。他心中十分感慨，就在许席图稍前，外交部长钱复在国立台湾大学读书，也是学生代联会主席，人生际遇，如此悬殊。

第二阶段是军法审判，除非像许席图那样，侦讯期间被苦刑逼疯，否则，大多数政治犯的移送书，就等于军事检察官的起诉书，而军事检察官的起诉书，也等于军事法庭的判决书。好像黑社会的洗钱一样，军事法庭只是把屈打成招的黑箱作业，使它合法而已，军法官假定判决某一个政治犯无罪，他的下场就是自己成了下一个政治犯。至于公设辩护人更是可怜角色，唯一的功能就是替政治犯认罪，祈求庭上法外施恩。大多数政治犯都知道官司的结果是什么，所以比起在调查局或保安处，心情要平静得多。只有一种人是惊恐的，那就是被判决死刑的囚犯，立刻被戴上脚镣，准备随时枪决。

看守所执行枪决的时间，总在凌晨五时左右，天色初呈朦胧，囚门卡啦一声，门锁打开，传唤的声音早已经惊醒了从地铺上坐起来的死囚。

“某人，开庭！”

大家当然知道怎么回事，然后，再听到脚镣的声音，一步一步，走向大门。有时候，一次执行六七个人，脚镣声更像钢锯一样，锯碎囚犯们滴血的心头。有时候，有人高喊：

“毛主席万岁！”

有时候，也有人高喊：

“蒋总统万岁！”

往事如烟，忠贞与判徒同样伏尸墙下，同样埋葬一个乱冈荒丘，现在全部化成尘土，无一点踪迹可寻，苍苍者天，曷其罔极。

一位年纪最轻的政治犯庄信男先生，是马来血缘的原住民，被判有期徒刑十五年，很知道上进，也喜欢读书。柏杨和他之所以成为好友，因为他在军法处看守所时，有一场传奇的演出，几乎丧生。原来，另一位政治犯林美海先生，在台湾糖业公司人事室当股长，思念留在大陆上的母亲，托他女儿的一位南非同学，带美金五百元给他的母亲。南非同学把钱带到了，而且和他母亲拍了一张合照，加上收据，从南非寄给林美海，以慰游子的孝思。这封信落在特务之手，通匪资匪，证据确凿，被判死刑。

事情就在这时候发生，庄信男和林美海铺位相邻，那天晚上，不知道什么原因，庄信男跟林美海互相调换铺位，监狱官和看守都不知道。第二天拂晓，押房门突然打开，两个班长冲进来，扑向庄信男，用一块毛巾把他的口塞住，然后双手反绑，一直带到法庭。桌上摆了一盘肉、一碗酒，和两个馒头，庄信男嘴被塞住，有口难言。最后，军法官叫他在一张纸上签字，对有些不识字的难友，按手印就可以了，庄信男幸而受过教育，他写下自己的名字，书记官才发现不对劲，报告军法官说：“他不是林美海！”庄信男这才被送回押房，法警另把林美海绑赴刑场枪决。

这是大时代的一个小插曲，大官场里的一件小丑闻。写到这里，充满了当一个中国人的悲情。

使人最伤感的一件事是，一件牵涉到八个人的“苏北匪谍”案中，有三个政治犯被判死刑，五个政治犯被判十二年。死刑政治犯正在上诉，而十二

年徒刑政治犯，依照法律规定，超过十天后，刑罚即行确定，任何情形下都不能再提起上诉。两个月后，五个人都以“受刑人”的身份调作外役，在洗衣工厂工作。又过了半年，远在美国的一声枪响，改变了五个人的命运。台独份子邓自才向访问美国的当时国防部长蒋经国开枪，一击不中，邓自才逃亡。蒋经国回到台北，当外国记者向他询问这场虚惊时，他微笑说，他已经忘记了。当然，他并没有，而是把对台独的愤怒，发泄在红帽子上，下令八个人全部枪决。那天凌晨，一个恐怕是政治犯中身材最高的苏北老乡，正蹲厕所，班长扑上去，把他双臂反铐，拖出押房，裤子都来不及提上来，沿途全是屎尿。为了防止他们呼号和诟骂，嘴巴都用布条塞住。后来，才知道军法处大费周章，先代那原来被判十二年徒刑的五个人，暗中提出非常上诉，然后再由国防部军法局（那时候局长就是后来被擢升为副总统的李元簇先生）发还再审，再审的目的是改判死刑。

第三阶段就是火烧岛，政治犯到了火烧岛就到了终站。无期徒刑囚犯只有死亡才能出去，有期徒刑囚犯虽然出狱的日子总在十年、二十年之后，但总算有一个盼望。

大脑是一个最难控制的东西，越是不愿去想的事，越会更强烈地去想。

在看守所时，难友蒋海容先生有一天警告柏杨说：

“对不起，我要告诉你，你快要疯了。”

“你怎么知道？”

“因为，”蒋海容说，“你坐在那里，一直喃喃自语，到最后嘴角还吐出白沫，根据我的经验，这是精神错乱的前兆。如果你不能够自我克制，你的喃喃自语将变成无缘无故的喊叫，那时候就无药可救！”

柏杨否认喃喃自语。

“你问问别的朋友！”蒋海容说。

柏杨用一种探询眼光，看着其他难友，他们逐一点头。这是他最害怕的事，并且对自己竟然陷于疯狂的边缘，感到难以为情，但他接受这个事实，向蒋海容恳求说：

“拜托你救救我，以后再遇到喃喃自语时，请给我一拳。”

蒋海容承诺。于是不久，蒋海容的一拳击中柏杨的右肘。

“有什么事？”

“你刚才又自言自语。”

“我没有。”

一个难友在旁说：

“你刚才确实说了一连串无聊的话。”

就这样的，蒋海容把他从疯狂边缘拉回，然而，他却无以为报。蒋海容是当时政治犯中身价最显赫的一位。官拜调查局调查处长，多少“匪谍”丧生在他的手下，最后擢升为调查局主任秘书。蒋经国介入特务机关，主持情报改制后，国防部情报局负责大陆情报，法务部调查局主管岛内情报，爆发特务人员之间的内斗。普通行政机关内斗，最多不过走人，特务机关内斗，就非见血不可。蒋海容和调查处当时的副处长李世杰，以及情报局当时的一位副处长等十几个人，先后被捕下狱，受尽自己人的折磨。有一天，蒋海容忽然梦见自己是蒋经国派到监狱调查冤案、错案的密探，柏杨趁势问他：

“你自己回想，过去所办的案子，有没有动用过苦刑拷打？有没有冤狱？”

“我从没有下过命令叫调查员动手，所办的案子都有真凭实据。”

不过，他也长叹一声说：

“落得今天这个下场，或许我冤枉过人！”

他被三次判处死刑，终于以无期徒刑定案，也被送到火烧岛。一年后的一天，忽然又被调查局押回台北，大家都认为他可能提前释放，多年后才知道，他在调查局监狱被特务用绳子绞死。调查局对蒋海容之死的说词，跟对沈元璋之死的说词，如同一个模子浇出来的，四个大字：“畏罪自杀”。

闯过喃喃自语一关后，逐渐适应监狱生活，柏杨还发明一项守则：铁窗外面的事不去想！他把整个监狱岁月投入写作，完成了三部史书：《中国历史年表》、《中国帝王皇后亲王公主世系录》，以及《中国人史纲》。他用早上吃剩的稀饭涂在报纸上，一张一张的粘成一个纸板，凝干之后就像钢板一样坚硬。每天背靠墙壁坐在地下，把纸板放在双膝上，在那狭小的天地中构思。柏杨建立他自己最基本的史观，就是为小民写史，而不是为帝王将相写家谱、写嘉言懿行；他想突破两千年以来被视为正统的、以朝代为单元的体裁。像钱穆先生的《国史大纲》，虽然用一种看起来极其深厚、充满新鲜刺激的辞句做为标题，可是内容却仍是古老的考据手段，和保护既得利益阶段的既得利益，他最大的毛病是传统性的：说不清楚。柏杨在脑海中不停酝酿，想彻底取消朝代的框框，改用世纪（一百年）为单位，使历史事件发生的时间，得以更明确的显示出来，还想把历史上那些令人头昏脑胀的官名，一律现代化。问题是，这样作，不但尖锐的违反传统，简直是在另立传统，一定会招来老传统的反击，可能体无完肤，犹豫踌躇不敢下笔。有一天，和同押房一位难友黄华先生谈起来，他说：

“管什么传统？应该只管创新，能不能够站得住脚，由读者决定。”

一语提醒梦中人，茅塞顿开，决定不顾一切，作全面的突破。反正每天放风时，一定搜查押房的监狱官即使翻看原稿，上面全是历史往事，和眼前当权者毫不相关，也不会干涉，所以柏杨写作途中，没有受到干扰。

另外，他也写了些诗。监狱实在不是创作抒情文学的地方，人在坐牢三五年之后，因为生活简单，不但谈话内容会越来越简单，连梦也会越来越简单，到了后来，索性连一个梦也没有了。俗话说：“日有所见，夜有所梦。”日无所见的时候，储备不出来做梦的素材，自然无梦。长期坐牢的政治犯心灵，好像压干了的果实，失去原有的润泽和滋味。然而，政治犯也有政治犯的幽默，柏杨就常常嘉许勉励一些同窗难友说：

“你坐牢的表现很好，加你三年刑期，以资鼓励。”

然而，每个人的幽默度并不相等，这句仿效加薪的灵感，有时也会引起反弹：“你怎么咒人！”

出狱的时候，有些人就在监狱门口，把穿过的囚衣和盥洗用具全部用火焚烧，不希望把霉气带回家。柏杨却是把每一样有监狱标帜，或监狱编号的东西，都当作珍贵的纪念品，小心翼翼的装进行李袋，这使有些难友大为惊奇。平常，他总是想尽办法使生活多一点情趣，监狱官在每个押房，会随便指定一囚犯担任室长，他就自封为室长助理，后来觉得这个官衔还不够过瘾，就再自动加官为“特别助理”。二十五年后，当行政院新闻局制作《中华民国名人录》时，要柏杨校正经历，他就填上“国防部感训监狱第四区第八室室长特别助理。”

## ( 32 ) 终获自由

传统有一句话：“天下无不散的筵席！”指任何欢乐都有结束的时候，团圆也都有缺失的时候，原是一种人生无可奈何的结局。然而，如果改写为“天下没有不结束的暴政”，同样也是一种定律。一九七五年，一连好多任的总统蒋中正先生逝世，当监狱官率领大家观看电视、聆听这项宣布时，确实有一种不敢相信自己耳朵之感。有些人自出生以来，蒋中正三个字就像金箍咒一样，紧套在自己头上，拉也拉不掉，撕也撕不下。对柏杨来说，更有一种若有所失的感觉，从一九三八年在武昌左旗营房当仪队开始，到现在身为囚犯，前后三十七年，半生岁月，由当年极端崇拜，到逐渐对他质疑，信心动摇，以致完全崩溃，其中最令人不解的是，这位全国武装部队最高统帅，自己落荒而逃，逃到大海一角，竟没有丝毫责任，责任反而都是别人的，也不受任何法律审判，反而要审判别人，狼狈的失败，反而证明他更英明，实在令人作呕。

第二天，监狱官分别到各区集合囚犯，宣布蒋中正死讯，下令大家一律静默三分钟哀悼。有个该死的难友，突然笑了一声，激起监狱官的大怒，诟骂笑的人丧尽天良，几乎为大家惹来大祸，事后虽然扬言要深入调查，也就不了了之。

蒋中正之死，带来皇家效应，历史上，老王死后，新王登基，总要大赦天下，表示薄海感恩。蒋中正逝世后，他的儿子蒋经国当时任行政院长，虽然还没有登基（登基的是副总统严家淦），但当局已下令刑事犯减刑二分之一，政治犯减刑三分之一，无期徒刑减刑为二十五年，唯一的但书是：凡参加共产党的政治犯，一天也不减。柏杨判刑十二年，减掉四年之后，只有八年。这时候他忽然发现刘展华先生真是可爱，如果不是他在审讯过程中那一声断喝“你也配！”此时，柏杨就不可能减刑四年。

蒋中正之死是火烧岛腥云消散的前兆，十三年后，蒋经国逝世，蒋家班瓦解，火烧岛政治犯监狱终告撤销。

虽然减刑，但柏杨的刑期仍要到次年（一九七六）才满，倪明华依照离婚契约，每月都寄给他五百元赡养费，虽然没有片纸只字，佳佳倒是常有信来，可是他看不到孩子对家庭生活的描绘也看不到其他政治犯儿女们常写的一句话：

“爸爸，盼望你早日回家！”

佳佳从小小的年纪，就与父亲之间只能谈些官话，柏杨已预感到最恐惧的疏离气息，正笼罩自己头上。

所幸的是，就在景美军法处看守所，政治犯倾巢南下的前几天，陈丽真冒险又送来了一次日用的盥洗用具，使举目无亲的他，被囚入火烧岛政治监狱的那天，在亲友调查表中，得以写下陈丽真的名字，台湾两千万人中，她是柏杨唯一的亲人。

一九七六年——他入狱已整整八年，从元旦那天开始，就在墙上画下倒数日历，直到三月七日。每天早上划去一格，还剩六十六天，第二天早上再画去一格，还剩六十五天，以后除了早上画去一格，减少一天外，到了晚上，也把明天的画去。原以为铁窗外的事绝不会去想，这些年来一直严守这项铁则，可是，现在变得万念俱发。这不是急躁，而是动心。八年监牢，似乎最后这两个月最长，也最难度过。

出狱前几天，柏杨把所有的行李、衣服和图画，打包寄给陈丽真，她事先还为柏杨定下旅馆，约好当天她从台北赶到高雄，到长途巴士站接柏杨。一切都安排好了，只等三月七日到。然而，就在屈指计算着见面日期的时候，一个可怕的阴谋，上至蒋经国，下到台湾警备司令部，在秘密实施，他们决定“不释放柏杨，继续囚禁”，这就是蒋家父子特创的一种使政治犯绝望生畏、不可思议的“隔壁手段”。

“隔壁手段”关键在于“隔壁”，火烧岛政治监狱的隔壁，是警备司令部所属绿岛指挥部，指挥部有一个新生大队，所谓新生大队，就是黑社会重量级流氓集中营，凡是其他流氓管理所（正式稿“职业训练所”）管训的流氓，不服从管训，或殴打长官，或屡次逃亡，被列为恶性重大的，都送到火烧岛新生大队，接受更严厉的折磨。大队直辖四个队，其中三个队管训流氓，一个队（第六队）则是管训从“隔壁”（政治监狱）刑期虽然已经届满，但有关单位认为他的思想仍未改造，或者找不到保人的政治犯；就在出狱当天走出大门时，重新逮捕，囚入第六队，管训期限是三年，可以一次又一次地延长。有人甚至在第六队囚禁二十余年，外面世界没有一个人知道。所以，班长们经常警告囚犯：“我没有办法教你出狱，但我有办法教你坐牢坐到死！”

有一位难友在他出狱六个月前，依照规定写“感训心得”。普通情形下都会依照官方盼望，把自己写成一个痛心自责、永远拥护英明领袖的悔过之徒。想不到那位难友在写感训心得时，不但没有认错，反而把在调查局所受的苦刑，以及全案冤屈内情，写了二十几张纸。政战官平常对他的印象不错，这次特地前来押房，向他分析利害，要他重写。这位难友认为现在要出狱了，党国要人不是都在勉励诚实无欺吗？他要让上峰知道事实的真相。政战官怎么劝他都不听，政战官大怒，砰的一声，关门而去，同房间难友告诉他说：

“你这样坚持，恐怕会被送到隔壁！”

他这才开始惊慌，立即写报告要求更换感训心得，政战官叫班长传话说：

“感训心得已报到国防部去了，无法收回！”

结果，那位难友被送到隔壁，六年之后，才被释放。

但柏杨仍无法想像，“隔壁手段”会落到他身上！刑期届满的前一天下午，被看守班长唤出，带到监狱会客室，在座的有监狱长、政战主任，还有绿岛指挥部指挥官王道洪将军，以及警备司令部保安处副处长吴鸿昌。在座有七八个人，只吴鸿昌一个人戴着墨镜。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传统，凡是干不可告人工作的人，总喜欢墨镜，大概是怕被人辨识真实面目吧。不过。由于他发言最多，立刻可感觉出来，是他主控全局。不等柏杨坐下，他就开始说：

“你不是写了一份报告，要求政府帮你介绍工作？”

“是的，是班长叫我写的。”

“政府曾经向全国各机关各单位，调查有没有位置可以安置你。可是，凡是看到你大名的人，嘿、嘿、嘿，他们没有一个不摇头，政府并不气馁，仍然为你继续调查，要知道，你虽然不爱政府，可是，政府却是爱你的，最后总算是为你找到一个教官的缺，那就是在绿岛指挥部。”

“是不是把我送到第六队管训？”柏杨的头轰的一声胀起。

“绝对不是管训，你是真正的教官，和指挥官平起平坐。”

“那么我是不是可以先回台北一趟，”柏杨勉强镇定说，“看看我的女儿，然后，再回到差？”

“不可以，但你可以叫你女儿前来看你。”

“请问，我什么时候才可以离开绿岛？”

“你这个问题，我们在座任何一个人都没有资格回答。”

“那么，”柏杨说，“这岂不仍是管训？”

“告诉你，这不是管训，就不是管训。”

“如果不是管训，我不接受这份工作，可不可以？”

“你知道你为什么坐牢吗？”吴鸿昌开始翻脸。

“我知道，我是匪谍。”

“什么匪谍？就是因为你不听话，才教训教训你。你看，你到现在仍然不听话，竟想回绝上级的安排。你以为我们不敢管训你是不是？如果你非以感训队员自居不可，不想当教官，我一个电话，管训令就会下来。你信不信我们有这种力量？”

“我信。”

“那么，”吴鸿昌如释重负说，“回牢房写一份自愿接受这份工作的感谢状。”

直到今天，事隔二十年，他仍想不通，八年监狱，他没有违犯过狱规，也没有受到过处罚。只被呵责过一天，在景美看守所外役区时，电视天天播出“自从总统（蒋中正）来台湾，风调雨顺甘露降”一歌。一天，他一面扫地一面唱，一位班长说：“你唱什么？”听了他的说明，厉声说：“你唱就不一样，不准唱！”这一段插曲，难道竟被列入记录？但有些难友天天诟骂，有位难友还跳河逃亡过，照样按时出狱。不管什么原因吧，很明显的，蒋经国在军事审判中杀他不成，现在有点懊悔，改用隔壁手段，教他苦死孤岛，不知道什么仇恨，使蒋经国如此的难以释怀！

当柏杨把噩耗带回囚房，第四区难友霎时间噤若寒蝉，大家原以为这项隔壁手段，已被特赦令取代，现在才发现，以特务为主干的政权，绝不会放弃每一个整人的机会。第二天，柏杨被提到大礼堂，面向蒋中正的遗像，宣誓永远脱离叛乱组织，永远信仰三民主义。然后，被带出监狱大门，天正降着毛毛细雨。大门前马路的另一边，是一排嶙峋岩石，从太平洋深处涌起的巨浪，发出空洞的响声，化作一片白色泡沫，像雪崩一样，粉碎溃裂。他想停下来享受一分钟出狱的自由，然而，两个卫兵分立两旁，台阶下一辆军用吉普车在那里等候，他黯然跨进车厢，五分钟后，就到了政治犯最恐惧的“隔壁”——绿岛指挥部。

指挥官王道洪在客厅等柏杨，态度谦和，不像是对一个囚犯，而像是对一个宾客，他也是昨天监狱客厅那场官囚见面的座上群贵之一，也是火烧岛上官阶最高的一位官员。他直入核心地问说：

“郭先生，到底怎么回事？”

“我怎么知道，指挥部这里应该有我的资料。”

“什么资料？什么资料都没有，我奉到的命令是：不准你离开绿岛，但在营房之内，你的行动绝对自由。”

这就是软禁，柏杨每天除了吃饭以外，没有任何事可做。软禁最可怕的地方，是它没有刑期，名册上，他的职位是“看管雇员”。凡是判刑的囚犯，即令是二十五年的最高刑期，也有期满的一天，即令是无期徒刑，也有大赦、特赦，或减刑的可能。只有软禁犯，可能被囚禁三十年、四十年，永无尽期，任何大赦、特赦、减刑，都轮不到头上，因为他已非罪犯，没有判刑，只不

过由于一纸行政命令，等奉办人更换几次之后，会逐渐把这个案子遗忘，那也等于全世界把这个人遗忘。柏杨一直等到成了软禁犯以后，才发现蒋家父子更黑暗、更恶毒、更滥权的一面。

软禁，使即令一生中所受的打击像大雨倾盆的柏杨，也承受不住。所以希望都被无情的摧毁，连申诉的机会都没有。一连几晚，他都无法安枕，哀伤、愤怒，心悸不正，最焦急的是，他无法告知丽真详情。后来，丽真在《柏杨·美国·酱缸》书中，有一文描述出她当时的遭遇，抄在下面：

三月一日，小昱气喘，住进了铁路医院。三月二日，一粟（丽真夫婿）被警总请去谈话，每次被传讯都是胆战心惊，但每次都因为信心，因为问心无愧，因为一份友爱之心，而博得传讯官员的谅解和同情，他们并且善意地劝一粟不要到绿岛接了，风高浪急，交通又不便，孩子身体也不好……我们接受了他们的好意。三月三日，我给老师一封限时信，告诉他我们四个人——祖光、一粟、小昱同我，决定三月七日下午二时起便在高雄火车站正对面的一家大饭店等他。三月四日又寄了一封限时信，怕万一三日的信遗失了联络不上。三月五日，小昱出院，六日这天，像蚂蚁在热锅上似的。三月七日，我们一家三口（祖光早一天先到高雄了），乘上了台北八时南下的观光号特别快车，可怜小昱还在轻微的气喘！祖光同一粟计算了半天，认为老师最快也要在下午五时之后才能到达高雄，我们就把那份吊在半空中的心放在五时之后。我实在急不过了，就请他二位到旅馆里陪伴躺在床上的昱儿，我独自跑到公路局东站去等，想想这么多年不见，老师驼背了？发白了？苍老不堪了？心里把老师想成最不忍卒睹的惨状，眼睛不敢转动地盯着从台东开来的每一班公路车。六点、七点都失望的过去了，老师还不出现。“一定是老师爱美本色，先去理发、染发了。”一面安慰自己，一面又要耐下性子来等。”糟了，说不定坐在刚才到的停在前面的那班车上！”心里想着，就往饭店狂奔——三副沮丧的脸孔默默的相对着，我又回到公路局车站。八点、九点……每一班车的旅客都被我毫不放松地盯得牢牢的。十点，又到了一班车，在一阵蠕动的人潮中，我似乎看到了老师的影子。

感谢上苍，我没有高血压，否则不堪设想——我站在车子门边，盼着、盼着、来了很像，但不是老师，也许就是老师，追过去，站在他面前，两人互望了一眼，是有点像，但绝不是老师。没有泪了，只有失望，对方一定说我神经病，管它呢！徘徊、等待、心焦、失望，身上的细胞真不知道要报销多少亿个。好心的站长走过来问：

“等人？”

“是的。”

“很重要的人？”

“很重要。”

“半夜十二点了，由台东开来的最后一班车早已到了，今天晚上再没有台东来的车子，小姐，你脸色不好，送你回去吧！”

“谢谢，不用了。”

脚上像绑上了千斤重担似的提不起来。

“吃晚饭去吧！”祖光说，他二位向高雄夜市走去，我陪着儿子在旅馆里，仰望夜色的穹苍，那疏落的闪烁的繁星，显得无比的苍凉与虚弱。

三月八日，我们一家赶到台中公园赴约，这是平凡生活中的一个小小的高潮。下午五时，我们落落寡欢的搭上北上的快车。三月九日，收到老师出狱前夕（三月六日）寄给我的一首诗。

三月十日，收到老师还是从绿岛寄来的限时信：“丽真：我已经准备好，以为就

可以回来了，长官却把我找了去，告诉我仍要留在绿岛，继续囚禁，看样子我们此生见不到面了，请原谅，使你们四位辛苦的白跑了一趟，心绪空前伤感震荡，不多写。”喔，事情已经大白，老师虽然终于出狱，但却永不会回来了。

指挥部保防官准许柏杨写信给丽真，可是却不准许提到任何软禁字样，只可告诉她，他现在担任教官，生活十分快乐。迄今为止，柏杨仍不知道蒋经国为什么恨他到这种地步？先是要他伏尸刑场，在他成了漏网之鱼后，又要使他葬身孤岛。他在营区内虽然可以自由走动。也可以站在高网上遥望巴士海峡，但是，他没有朋友，所有官兵都把软禁犯当作一个麻疯病患，不敢接近。他虽然走出有期徒刑，却一脚踩空，栽入无期徒刑。这时候他全部希望，是能看到佳佳一面。他知道，见城城、垣垣、丽真，是不可能的。指挥官已经批准他的申请，可是，最大的困难，是在写给佳佳的信上，无法告诉她爸爸在那里，和到什么地方才可以找到爸爸，因为凡是军事单位对外通信，只有一个邮箱号码。所以他不能说他在绿岛指挥部，也不能告诉佳佳到绿岛指挥部，如果违反，那就又犯了泄露军机的重罪，可能加判无期徒刑或十二年以上有期徒刑。

再一次天无绝人之路，柏杨在软禁期间的顶头上司，感训组长汪迺效先生同情他的遭遇，日后他们成为好友，他正巧到台北度假，才把地址及约好的时间，带给罗祖光，这时，祖光是《自立晚报》副社长，比较有空闲，祖光答应带佳佳前来绿岛，使分别八年的父女得以重见

佳佳走后，柏杨已没有第二个希望，假设这时候突然死去，也了无遗憾。几个月后的一天，忽然全营警戒，一架直升机在草坪中心降落，军号齐鸣，一位高级将领走下来，官员们低声传告，警备司令部政战部主任韩守迺将军前来视察，指挥部人员除非有特殊任务，不可以离开各人所在的房间。大概一个半小时后，一位组长跑步进来，呼喊柏杨的名字，一面说：

“主任召见你，快换像样一点的衣服！”

八年的囚犯，又那里来像样一点的衣服？八年前随身穿来的西装，早已寄给陈丽真了，组长只好叹气说：

“好吧！好吧！就穿这身衣服吧！”

走在路上，他忽然惊觉起来，问柏杨说：

“主任为什么召见你！”

“我怎么知道？”

“你是不是写过申诉信给主任？”

“这里的每一封信，都经过保防官检查，我如果写这封信，他会让我发出去吗？”

他狐疑地说：

“那主任怎么知道你在这里？你认识他？”

“是的，我跟主任是高中同学。”

他生气地责备：

“那你来的时候为什么不早说？”

“组长，你想想，我是一个软禁犯，一进门就说：跟你们总司令部政战主任是朋友，你不认为我三八吗？”

他对刚才的态度有点懊恼，脸上立刻堆下笑容：

“柏杨先生，你来这里几个月，我们并没有亏待你，主任如果问你什么，



你可要凭良心回话。”

“那当然，请你放心，何况，你们对我确实很好。”

其实，柏杨和韩守湜自从离开学校，一直没有见过面，假定他没有道义担当，绝不敢承认跟一个政治犯有这种关系。所以，一见面，柏杨除了向他致谢外，就直接了当地问：

“我还有没有希望出去？”

他谨慎地说：

“我不知道，如果你是受管训的流氓，我今天就可以带你走。”

“警备司令部难道还管不到我的案子？什么机关管到我的案子？”

“你应该往上面想。”

“国防部？”

“更要向上。”

“那么……”

“不要谈了，我只能向你保证，你在指挥部期间，我们对你绝对优待。不过，我建议你，每个月写一份读训心得，实际上这对你没有一点帮助，但是，一旦有人帮助你的话，可供给他一个很好的台阶。”

在指挥部的午宴上，韩守湜让柏杨坐在他的右边，然后站起来向指挥官以下全体官员说：

“柏杨是我的老同学，拜托大家多照顾他。”

这是一项雪中送炭的友情。两个月后，另一架直升机隆重降落，军号照样响起，原来是更大之官，国防部总政战部主任王升先生、副主任萧政之先生，连袂前来视察。根据韩守湜的经验，柏杨心里想，他们可能也会相见。可是，飞机走了，汪效惊奇地说：

“我知道你们是同学，向他报告说，柏杨也被关在这里，他们一面点头，一面笑笑说：‘柏杨，噫呀！名人！名人！’一步也没有停留，登机而去。”

这真是一个有趣的人生浮世绘，在患难中，可以看到人的形形色色。

当时指挥部有一个图画馆，管理图书馆的也是一位软禁犯，他是当年名震一时的陆军总司令孙立人将军的左右手。孙立人是美国维琴尼亚军校的毕业生，曾任印度战区中国远东军指挥官，能力和战功闻名国际，但是，他的竞争对手是皇太子。中国官场上斗争，最可怕的秘密武器，就是“诬以谋反”，蒋经国祭出这项武器，孙立人立刻瓦解。被软禁在自己家里，他无论到什么地方，都有特务寸步不离地“保护”。所有与他有关系的军官，都被清除（你即令誓死信仰三民主义、服从最高领袖也没有用），而他的左右手郭廷亮当时官阶上校，是一员战将，国军正准备一旦接到联合国的命令，即行参加韩战，郭廷亮担任最艰巨的突击团团团长，准备全团战死在韩国的滩头阵地。就在联合国决定拒绝台北出军的当天晚上，郭廷亮被警备司令部逮捕，把他装到特制的囚笼里，拷打审讯，最后被判无期徒刑。蒋中正逝世时，他已坐牢二十八年，可是他并没有被释放，反而先柏杨两个月送到绿岛指挥部。就命他管理图书，单独有一个住宿的小房。柏杨真是有点懊恼，如果早出狱三个月，说不定可以占上那个馆长的“肥缺”，也有个小房。

白色恐怖结束后，郭廷亮也被解除软禁，那时孙立人将军仍在人世，谋反的真相大白，可是，对郭廷亮而言，他无处投降，只好继续留在火烧岛，养梅花鹿为生，一面为自己的清白，控告分辩。一天从台北回绿岛，在中坜，车还没有停妥，被人从车子上推上来，栽倒月台，一代战将，死于暗下的毒

手，留下无限诡异。

柏杨在软禁期间，全神贯注坐牢，没有任何事分心，监狱所写的历史书稿，于出狱时全被送往警备司令部审查，每天只不过陪指挥官王道洪下下围棋。他们围棋的功力相差无几，全岛地位最高的巨官和全岛地位最卑微的囚犯，成为棋友。

柏杨的棋艺起初似乎略占上风，有时真想下下政治棋输他两盘，可是，这话说来容易，真正当你棋下得稍高一着时，想求输都难。王道洪是一位锲而不舍的挑战者，他端详棋盘会长达二三十分钟之久，当柏杨离开绿岛时，棋艺已开始落后，招架不住。

漫长的软禁期间，来自各方面的援助和拯救，也一天比一天激烈，问题是，柏杨并不知道。所知道的是，柏杨已经被世界抛弃了，而这正是暴君的盼望。就在这时候，美国总统卡特先生推动人权外交，柏杨是一粒沙子，但人权外交的浪潮却卷起这粒沙子，把他从黑暗的深海卷上来，投掷到阳光下的海滩上。八年前被捕的时候，孙观汉先生曾在美国发动大规模的请愿行动，美国国务院回答说，这是中国的内政。可是，在人权外交的呼声下，国务院立即训令当时驻华大使安克志，调查柏杨的下落。而国际特赦组织，这个他从没听说过的国际性专门营救政治犯的人道团体，也发动世界性的援救攻势，信函雪片似的飞到台湾。没有一个机关会采取反应，但它却使感训组长汪效留下深刻印象，问题是，他不能直接告诉柏杨这回事。于是有一天，在有很多人的场面下，汪效对柏杨说：

“一个叫国际特赦组织的，从各国写了很多的信给我们政府，想用压力使你释放。那一点用也没有，靠写信能救得了人吗？”

从这些话中，听出讯息，那就是，柏杨的入狱和软禁，已引起国际关怀，柏杨感觉到他要更好地活下去。对政治犯而言，坐牢是和暴君生命的一种比赛，看谁活得更久，看谁活得更健康。于是他拿出所有的财富，买了些奶粉、维他命之类，决心参加这个比赛。

结束这场软禁的，是美国众议院议长伍尔夫先生，他来台北访问，质问政府官员：柏杨那里去了？政府官员回答说：

“柏杨自己愿意留在绿岛指挥部当教官，如果不信，我们有他亲笔写的申请工作的报告。”

一个稍有智商的人无法了解特务分子怎么会编出这么幼稚的童话，伍尔夫表示他要亲自去绿岛当面问个清楚，官员们这时才开始惊慌，蒋经国的态度也立刻转变。于是，有一天，柏杨正在图书馆，汪效走进来，把他拉到院子里，说：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然后拿出一份警备司令部的公文，上面写着：

“柏杨一员，本部另委工作，即日派员前往陪伴返台。希转知。”

就是这封电报，使柏杨成为时间最短和最幸运的软禁犯。于是他立刻去理发染发，然后全心盼望警备司令部派的专人驾到。可是，隔了一星期之久，仍不见动静。一个一生中不断接到坏消息的人，有权怀疑任何好消息，他怀疑事情发生变化。幸好，终于有一天，警备司令部保安处上校组长萧桃庵先生抵达指挥部。当柏杨随着他登上火烧岛前往台东的班机时，回想来时情景，对葬送在这个孤岛上六年余的生命年华，只换得一声长长叹息。

当晚，住在台东一家旅馆，晚饭以后，柏杨试探着问：

“我想买一双鞋子，是不是可以到街上走走？”

“当然可以，”萧桃庵爽朗说，“从现在开始，你已经自由了，想到那里，就到那里。”

只有一个被长期监禁的囚犯，才能体会他那时的心情，没有喜悦，也没有欢愉，只有一份恍惚的哀伤。在暮色逐渐沉重中，沿着山城街道，信步徘徊。他真的是想买一双鞋，可是走到鞋店门口，却忽然有点胆怯，不敢进去，在橱窗外面看了很久，再踏着自己狭长的身影，摸索着回到旅馆，洗了一个热水澡，躺在雪白被单的床上，心里想：

“我又要从赤贫开始！”

第二天，他们乘班机从台东飞往台北。在松山机场下机时，除了一个警备司令部的军官以外，见到罗祖光、梁上元，以及陈丽真，真正的恍如隔世。抄一段梁上元《柏杨和我》一文中描述这场重逢：

一九七七年的三月，我们又得到柏杨即将获释回台北的消息，经过了上次的波折，尽管柏杨自己也来信说，这次“绝对是真的”，我们都半信半疑，不敢高兴得太早。“还是等真正接到他之后再通知观汉吧！”中午的时候，我这样对丽真说。但是熬了一个下午，在吃晚饭之前，我终于忍不住拨了个长途电话到美国去。

从知道这个消息到柏杨回到台北，大约有半个月的时间，这真是人世上最长的半个月，我和丽真，丽真和祖光，几乎每天都要通好几次电话，互相地打听：“有没有进一步的消息？”“这次一定会回来吧！”“到底那一天启程呢？”“该不会又有什么变化吧？”观汉也沉不住气，不断地从美国打越洋电话来，问来问去，讲来讲去，都是同样的问题。人的心理就是这么奇怪，九年都等了，这最后几天却等不了，到了三月底，我们几乎又要动摇。

四月一日下午六点十分，我们终于在台北松山机场等到了柏杨——警备司令部一位萧上校去接他，陪他回来。

失去自由九年又二十六天，柏杨并没有我们想像中的苍老和狼狈，相反的，他染了头发，穿一件深色的夹克，虽然略显清瘦，反而比我九年前在景美军法处看守所探望他时，年轻清朗得多。他和我们每个人紧紧的握手，坚定而有力，而且马上谈笑风生。尽管在眉宇之间，似乎仍隐隐的流露出一份紧张和一股怨怒之气，但也正因为如此，整个人显得目光炯炯，虎虎有生气。那天的晚餐是在祖光家吃的，餐桌上菜肴丰美，友情洋溢，觥筹交错间，我看到他的表情开始慢慢的松弛，当我们谈到观汉时，他禁不住流泪，在泪光中，他的眼神已变得十分的柔和。

当时，罗祖光邀请大家到他家晚餐，一个警备司令部派来接机的小军官拔腿也要上车，萧桃庵喝止他：

“你去干什么？我们的任务到此为止，也该回家吃饭了。”

那一天是一九七七年四月一日，距一九六八年三月七日，共被囚禁九年零二十六天。其中，有判决书地坐牢八年，没有判决书的软禁一年零二十六天，人生，有几个九年零二十六天？

祖光家两个小时的餐桌上，从大家口中，柏杨已大略了解十年来身在牢房里的时候，外面所发生的事，话题几乎全部集中孙观汉先生海外营救行动的细节。他在香港出版了一部厚达六百多页的《柏杨和他的冤狱》一书，上面刊载柏杨的起诉书、答辩书和判决书，以及从世界各地写给孙先生援救柏杨的信件。每一个小故事，都使他饮泣。和观汉热肠对比的，也有更多的世

态炎凉和落井下石的故事，每一件也都使他震惊。然而，“人不炎凉不世情”，一个充满了势利眼的社会，固然使人心寒，但一个完全没有势利眼的社会，也会平淡枯燥。历史上没有奸邪，那能显出忠贞？没有势利眼，又怎么显现出道义美德？在人生道路上，每一次挫折，都是一次友情筛检，经过风浪而仍保持友情的朋友，才是真正的朋友。世界上从没有发生过，当一个人受到挫折时，朋友阵容能够原封不动。“一贫一富，乃见交情；一贵一贱，交情乃见。”是千古定律，所以他立刻全部消化。

九年多的别离，赢得了这场团聚，夜已渐渐的深了，他们把柏杨送到怀宁街太阳饭店，一方面等找房子（他们不敢相信柏杨这次真的能离开火烧岛，所以不敢像上次那样，预先准备住处），一方面陈丽真服务的运通公司就在隔邻，可以就近照顾。这是他到台北的第一个自由之夜，就在灯下，写给孙观汉一诗：

今日踉跄回台北	人物都非两渺茫
去时家园如完瓿	于兹覆巢鸣寒
念我身老童心在	仍将丹忱酬热肠
先把无穷感恩意	第一修书报孙郎

## 走过死荫幽谷

· 王莹采访整理

柏杨常说，他是一只皮球，越拍跳得越高。我倒觉得，他像一条发自高山深谷间的急流，充满自信的生命力，一路上穿石破土，冲击它的水流、暴雨反而给了它更大的力量，终成汪洋大海。问：您的回忆录中可说是泪痕斑斑、血迹处处，您在口述回忆录时有着什么样的心情？又希望您这比常人艰苦、但却也比常人大有成就的一生对读者有些什么启示？对看这本回忆录、和您同时代的朋友，以及年轻一代，甚至今天的新新人类，您有没有什么不同的话想对他们说？答：事件发生的当时，和事件发生之后的回顾，心情迥然不同。杜甫有诗说：“入门闻号啕，幼子饥已卒。”他从远方流浪回来，踏进家门，迎接他的不是欢迎的笑脸，也不是热烈的拥抱，而是在寂无一人的破烂茅屋面前，听到里面传出哭声，他三步并作两步奔进去，发现他最小的儿子，已被活活饿死，就死在那个没有褥子的木板床上，围绕着小尸体的是衣服褴褛、枯瘦如柴，比他那已死的孩子还要饥饿的家人。杜甫会不会从行囊中掏出馒头和大家分享？会不会拿出一些银子，叫家人快去买点东西裹腹？会不会呆在那里，张口结舌，只因为他在穷困中跋涉千里，路费用尽，连自己也两天没进饮食，希望挣扎到自己家门，吃一口热腾腾的团圆饭！我们不知道事情的细节，但我们知道真相，杜甫在若干时日后，写下这简单的十个字，作为他当时悲痛的回忆。十个字，寥寥无几，包含了人生最凄惨的，发生在一个父亲身上的悲情。然而，这不过是大社会洪流里的一个小小微弱的声音。杜甫在他进家门的当时，写不出这样的诗句，当他写出这样诗句的时候，他已经完全平静，他可能仍流下眼泪，但是他已可以完全控制感情。

当我口述回忆时，周碧瑟博士坐在我的对面，很多时候，我听到她在叹息，但她不多说话，在我停频的时候，她就喝茶。我的心情和杜甫写这两句诗时的心情一样，我缓缓地叙述，好像叙述发生在别人身上的故事。上帝赐给我比有些人更多的灾难，也赐给我比别人更强的对灾难的承受力和消化力。每一件往事，都成一缕云烟，在云烟的下面，看到当时的场景、人物以外，几乎还能听到声音，我心情平静，有一种成就感，周博士无论年龄及心路历程，都和我相差这么大，可是她却都懂。

问：您的一生，几乎与中国自传统迈入现代同步，您对于中国固有文化与西方文明的想法如何？中国文化的黑暗面似乎与您一生所遭受的苦难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这是否对您最脍炙人口的《丑陋的中国人》中观察中国文化和人性的黑暗面有着某些影响？

答：某个诗人曾经说过：“东方是东方，西方是西方！”强调东方和西方，有很大的差距，我最初不以为然，因为中国有一句成语说：“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这几乎成为我前半生观察事物的一个基点，但在以后的日子里，我逐渐修正我的看法，固然是

人同此心，但同心不一定就一定同理，因为文化的不同，在同心的基础上，会发展出不同的理。我最初觉得，中国文化的黑暗面，来自于政治制度和政治思想，但更深入地检讨之后，发现我们文化的黑暗面，在于缺少人权观念，使得中国人只知道面子，不知道尊严。一个要面子的人，往往用伤害别人面子的手段，维持自己的面子：一个有尊严的人，他必须尊敬别人的尊严，才能建立自己的尊严。“君尊臣卑”的基本思想，就产生帝王有面子，

官僚有面子，男人有面子，小民、女人没面子的文化。这种文化，一定堕落腐败，在这个基础上建立的任何政治制度，都会变形。

还是“丑陋的中国人”？

然而，一个更严重的问题是：我们文化中，不仅仅缺少人权观念，更缺少审美基因。一直到二十世纪止，我怀疑中国文化中，“美”所占的份量。换句话说，使我们文化变成丑陋的，是因为我们不知道什么是美。女人缠足，不但摧折女人的骨骼，而且还会发出一种令人难以忍受的恶臭，而长达千年之久，中国人竟然认为那是一种美，天足反而是一种丑。因为我们没有审美能力，所以我们不知道什么是美，既不敢也无法去追求美，既不敢也无法去表达美、赞扬美。一直到现在，小学男生还会发出攻击的言辞说：“女生爱漂亮！”爱漂亮应该是一种正面的赞扬，在小心灵里反而成为一种负数。

事实上，指责别人的人，他心里也在强烈地喜爱美女，但他却不敢向整个文化挑战，所以他不敢承认，更不敢讲出来，这就是我们的酱缸文化，我从小所受的苦难，当然对我有很大的影响，但对我也有很大的帮助，使我不断地思考这些苦难发生的第一因，发现其中有一种思想是有流弊的，那就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这是一种婆媳文化，而婆媳文化是一种罪恶循环的文化，你缠我的足，我把你推翻后，不但仍缠下一代的足，而且缠的更凶。漩涡式的堕落力量，需要西方文化里的自由、平等、人权，前来拯救，才能使我们跳出漩涡。

问：“您书中的许多看来十分缺乏人性的“坏”人，有的还在世，您作书时有无顾忌？揭发这些人您希望有些什么样的结果？有些人仍然担当高官重任，您有什么感想？”

答：雷马克在《人性的光辉》中，提到一件发生在集中营里的故事，一个小商店老板的民兵，到集中营里，随便踩死一个犹太囚犯，雷马克说：“他走出集中营，回到他的家里，仍是一个温和可亲的小店店主，对人谦恭有礼。”曾加害我的那些人，包括我继母在内，似乎都是集中营里的产物，当然，有一些人特别恶劣的素质，使他的为害更为强烈，不过，大多数人都像雷马克笔下的那位民兵一样，在另外一种场合，他们都可能是可爱的人。

不做“基度山伯爵”

我从前曾强烈地想到报复，报复是一件痛快淋漓的英雄事业，但和我以后的理念冲突，这使我克制自己，最后我的原始性格屈服。而且，站在纯利害的立场，一个报复心强烈的社会，会使一个有权势的人，宁死也不肯交出权势，那就必须使用更大的暴力，才能把它摧毁，中国五千年历史就是这样。我并不是毫无所惧（上帝赐给我肾上腺，就是教我恐惧），我只是对权势的炙热度，反应比较迟钝，所以，我虽然害怕，但一想到无论是被暗杀、无论是被再逮捕、无论是黑巷飞砖，对我都不是威胁。我还能再活几年？“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任何伤害，都可能成全我的心愿。我死不悔改地相信：社会有正义，人心有公道，而且，我不怕它来的太迟。在我残余的岁月中，真话都说不完，哪有时间去说假话？我只是说出我所亲身经历事件的真相，不作任何评论，评论留待后人。我一直有一种罗曼蒂克情怀，被亲人讥笑为“老天真！”最重要的是，任何特务组织和任何恐怖行动，都必须有一个暴君支持。在没有暴君的时代里，特务无力肆虐，即令窃弄权威，也可以用舆论来阻止。

问：您出生于相当恶劣的环境，如何自我突破，求得如此精湛的学问？

有无个人较独特的治学方法可以给青少年时错过念书环境的人作参考？您做人的哲学为何，碰到逆境时如何能把持自我，不被击垮？而挣出逆境后，又该如何看待世事？

答：千万不要误会我是在谦虚，事实上，我是一个平凡的人，并没有“少怀大志”，少年时最大盼望是进篮球校队。但是有一个故事说：一只青蛙，掉到一个很深的车辙里，同伴们闻声跑来，伸出援手，可是无论怎么拉，都没有办法把它拉出来，最后它们终于放弃。第二天一早，当他们再回到原处，打算收殓朋友的尸体时，发现它在草地上跳来跳去，还唱着欢乐的歌，不禁问它：“你是怎么跳出来的？”它回答说：“我不得不跳出来，因为一辆大车辙过来了。”我也是一样，命运和性格，像两条鞭子一样，一直对我抽打，我并不是为了表演跳出车辙的特技，而自己投入车辙，而是被推到车辙里之后，不得不跳出来。

什么书都读

从我成长的过程中可以看出，我的学识有限，第一：我没有良好的家庭教育，只有一个不常在家的父亲，和一个仇视孩子的继母，生命中充满了惶恐和哀苦。第二：我从没有较长的时间在学校里静下来读书，既不喜欢在课堂上听讲，又没有恩师耳提面命，而且日夜都孤独的等待假证件的暴露，心神无法安宁。只是喜欢读书，凡是我看得懂的书，甚至看不懂的书，我都喜欢读，没有目的（除了考试时候那两篇英文作文），也没有企图，读书对我来说是最大的满足，我不但能蹲在厕所里读，有时候厕所已经上完了，仍不肯起来，继续蹲在那里读，只因为不愿中断。而且我还可以一面走路一面读，当《自立晚报》设在台北长安东路时，我每天上班经过那时还没有加盖的留公圳旁、狭窄的新生南路上，就曾经撞到电线杆上过。

对书的内容，我会感动也会怀疑，但不管怎么样，我认为书中的每一个字都已经化成我的营养，使我成长。可惜的是，我读这些书，都不是专家十年寒窗苦读的书，所以，在谋生方面，我没有一技之长。我真羡慕很多人一帆风顺，他们并不是没有烦恼，也不是没有灾难，不过是灾难的程度和认知上有差异而已。罗素曾讲过：“坐牢的人，都不是聪明的人，由坐牢这件事上，就可证明。”所以我并不认为，我有资格向青年朋友提出做人做事的正确忠告，因为如果照着我的忠告去做，将来可能也去坐牢。一定要回答的话，我认为必须不断地提高自己的素质，不断地成长，具体他说：要不断地读书，吸收，吃菜也吃草，吃荤也吃素，要使它们都转化成为营养。

我有一种毛病，从不提“想当年”，除非有人跟我提起，或像写回忆录之时。对于过去光荣的事，有些人念念不忘，而我过去根本没有什么光荣的事，对过去受屈辱的事，谈起来往往仍有余恨。则我比较自私，不愿意被这种恨支配我的感情，把我搞出胃溃疡，所以我都把它化成一缕轻烟，对美丽的友情和这个有情的世界，爱还爱不完，已没有多余的精力去恨。

爱人一箩筐

问：您一生最大的快乐是什么？遗憾有哪些？最爱的人是谁？有无最恨的人和事？作品当中，最满意的是哪些，或是哪一部？

答：人生最大的快乐，对我而言，几乎每天都会发生。换句话说：我们家每天都有一件最大的快乐，尤其是要出门的时候，总是发现丢了东西，于是乎找皮夹、找皮包、找钱包、找眼镜，找门钥匙、找车钥匙、找身份证、健保卡、提款卡等，成为最大的灾难，全家每一个人都急得发晕，并且百思

不得其解，它们为什么会不见？尤其是我猫（它的学名叫熊熊），更是飘忽不定，它很少出房门，却经常不知去向，于是翻箱倒筐，到处呼唤，好像出了天大的祸事，每一次的结果都铁定会找到，于是我们就享受一次每天最大的快乐。我最爱的人是谁，我想你一定有一个预设的答案，那就是我的妻子张香华，但我还要告诉你一些对我有恩的人的名字，像北京赠我路费的徐天祥先生，以及把我带到台湾来的吴文义先生，营救我十年之久的孙观汉先生，和陈丽真女士，照顾我的梁上元女士、罗祖光先生，以及在晚年全力扶持我的周碧瑟女士。他们的情和爱，使我重获生命。还有一些我有意无意冒犯过或伤害过的朋友，他们对我的原谅和包容，我都一一心存感激。

我并没有恨的人，更没有最恨的人，前已说过，我非常自私，我不会浪费我生命中最后残余无几的宝贵时间去恨。我只有瞧不起的人，还有被我认为可怜的人，但我一直学习用朋友对我的态度，同样的原谅包容这些人。

至于对自己最满意的作品，你必须承诺不讥笑我大言不惭，我才能告诉你。第一部是《中国人史纲》。在汗牛充栋的史书中，似乎只有这部书把中国五千年历史，说得明明白白、清清楚楚。其他所有版本，包管你看了比不看还要糊涂。第二部是《柏杨版资治通鉴》。这当然是分享司马光先生的荣耀，但我有两点贡献：一是我把深奥生涩的古文，不仅译得明明白白，而且整理得整整齐齐。二是，这是一部宝藏，一个中国人，或希望知道中国精致历史的外国人，这部书供给他全部营养，没有第二部书可以代替。



## 看，这个丑陋的中国人

张香华

柏杨是一个既浪漫又实际的男人，只是，他常把浪漫和实际的时间、地点颠倒而已。

作为柏杨的妻子，观察柏杨，把焦距拉得太近，跟拉得太远一样，恐怕和真相都不相符。认识柏杨之前，听到他的名字，就心惊肉跳，想象中他是一位坐过九年多政治牢，手持钢刀，吞吐利剑的人物，和他交往，就像鸡蛋碰石头，不可能有共同语言。可是，认识之后，他给我的印象和想象中完全不一样。他谈吐温婉有礼、身体健康、性情爽朗，我甚至觉得他聪明敏捷、机智幽默，几乎囊括我所有赞美的形容词。所以，有一天当我嗫嚅着说：“我不知道能给你什么，你才从牢狱里出来，不能再受任何打击……”柏杨的反应像闪电一样快，他说：“我从不怕任何打击！”这句话使我一振，几乎就在同时，我已决定要嫁给他。也从他这句话的反应，使我以为他的语言精彩，生动感人。

可是，结婚后这十几年，最令我紧张的，却正是他的语言表达力——尤其在讲台上时。每次，听他把一个生动的主题，叙述得冗长拖沓，恹恹欲死；或将一个可以深入的命题，唏哩呼噜，轻松带过，我都急得两眼干瞪，恨不得跳上台去替他讲。有一次，柏杨应邀在台北金石堂演讲，又犯了松散的毛病，好不容易挨到终场，热情的听众仍不断地举手发问，我也拚命举手，陪我同去的朋友诧异的问：“你也要提问题？”我答：“我不是要提问题，我是要他快点下台！”从此，我尽量避免他的演讲，连一九八四年在美国爱荷华大学，他那场后来轰动海峡两岸，造成无比震撼文化反思的《丑陋的中国人》讲演。当时，我就不在场，原因是我对他的演讲，一直抱着一种态度：一个人丢人，比全家丢人好。

自从他着手翻译《资治通鉴》这部巨著，一天之中，柏杨除了吃饭睡眠，几乎全部时间都埋首伏案，他那性急的脾气，全部反应在他日常生活的言语上，常常把句子的文法结构打散，只使用象征性的几个词，有点像电报。例如，他对他的助理小姐说：“明天，书好，校好对，没问题，早打电话。”我就得替他翻译，柏杨说的话全文应该是：明天早上，先把散放在地上的书，收拾回书架上，然后开始校对工作，校对完，尽快打电话告诉出版社来拿稿。”诸如此类，有时连我也不得要领，只好懊恼地大叫：“你怎么话都说不通？”这时，他无奈地看着我，暂时歇笔长叹：“笨哪，‘怎一个笨字了得’！”做为一个丈夫，柏杨这个男人心胸真是够开阔大方的。他曾对我说：“你如果想和别人跳舞，就去跳舞。”因为我对跳舞的兴趣不高，所以，并没有放在心上。有一年，新加坡《联合早报》发行人黄锦西先生邀请我们到新加坡访问，到达的当晚，有盛大宴会，宴会中途，不知何故，柏杨灵机一动，忽然公开征问有没有人愿意带他的太太去夜总会跳舞。一时全场哑然，没有一个人反应。不过，令我更生气的事还在后头。下一站在吉隆坡，接受记者访问时，有人问他婚姻中最重要的条件是什么？他的答案竟是奇特的两个字：“金钱”。事后，他向我解释他之所以这样答，因为，爱情当然重要，跟空气一样重要，没有空气，人就活不了，但，谁会说空气是婚姻中最重要的条件？而人心中都知道金钱重要，却没有人肯这么直率地谈这个问题。可是，

他向我解释没有用，因为记者已替他在报上解释了，认为是柏杨自己的婚姻经验。我的结论是：柏杨是一个既浪漫而又实际的男人，只是，他常把浪漫和实际的时间、地点颠倒而已。

柏杨每次被我奚落，就自我解嘲他说：“仆人的眼中没有英雄。”我马上提醒他，这话只适用于柏杨与熊熊——我们家的宠物，是一只灰溜溜的暹罗猫。它从出生一周，就入籍我们家，原是柏杨送给我结婚纪念的礼物。由于它特立独行的性格，谁的帐也不买。常常在柏杨埋头写作之际，“笃”的一声，跳到稿纸上，无论怎么赶，它都不走，好像是抗议说：司马光比得上我熊熊重要吗？再看熊熊心目中的“英雄”柏杨是怎样的？每当熊熊盘踞书桌，柏杨只好委屈的把稿纸挪到老早因堆满书籍，而狭窄得可怜的书桌一角，偷偷摸摸的继续奋笔直书，直到熊熊厌烦了这种沉闷单调的游戏，才一耸身，悻悻然走开。

在日常生活中，柏杨的记忆力几乎等于零，不久之前还发生了一件事，我趁假日离家南下两天，柏杨一人留守家中，结果因为遗失了钥匙，请来锁匠，偏偏我们家用的是顽固的耶鲁锁，最后不得要领，只好破门而入，却发现钥匙并不在家，还是社区餐厅的服务生，拾到一件客人遗留下的夹克，发现口袋中有一串钥匙，辗转追寻，终于想起是柏杨一个人去餐厅吃饭时遗落的，一场长达四小时的总动员闹剧才算收场。

尽管柏杨的记忆力不佳，但他却记得英国幽默大师萧伯纳的一个笑话，那就是，只有萧伯纳太太一个人对萧伯纳的笑话，不觉得好笑。柏杨充满同情地说：“可怜，萧伯纳的太太对萧伯纳说的每一个笑话，都听过一百次以上。”我告诉他，我可没有萧太太的好耐性，你的笑话，我听第二遍就嫌多了。

有一次，不晓得为了什么事，我大发脾气，恶狠狠地凶了柏杨一顿，过了一会我自己忘了，到柏杨书房去巡视，看见他垂头丧气坐在椅子上，一动也不动，我问他怎么了？他说：“你一生我气，我觉得做人都没有意思了。”霎时间，我眼前这个男人——柏杨，变成了一个孩子，我的心完全被软化了，我悄悄俯身下去，告诉他，我刚才的视觉有毛病，调整一下焦距就会好。其实，我还没有把藏在心中的话说出来，那埋藏在内心底处的一句话——柏杨，我爱你。

一九八九年七月

## 炉边漫谈（关于柏杨的作品）

柏杨 张香华 聂华苓

时间：一九八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地点：爱荷华聂华苓家

人物：柏杨，张香华，聂华苓

（寒夜。炉火。风铃。一壶台湾乌龙茶。）

聂：衣洞，谈谈你的小说吧！你的小说都是在五十年代写的吗？

柏：都是五十年代写的。

聂：那时候我正在台湾。你小说里所写的那个时代，我看起来很亲切。那时候，我们生活真苦啊！

柏：我比你还要苦！那时候，就是彭歌，他在《新生报》当副刊编辑，他也相当苦的。

聂：我在《自由中国》发表你的小说是……

柏：《幸运的石头》。聂：不止那一篇吧？柏：还有好几篇。

聂：你的小说在那时候就很突出，因为有很强烈的讽刺性。柏（不服气地指着诗人妻子张香华）：她们一直说我小说写得不好！聂、张大笑。张：并不是说讽刺性的小说就不好……

柏：除了讽刺性以外，我觉得我的杂文比鲁迅——比鲁迅

聂：写得好！对吗？

柏（点点头）：我觉得。

聂：这个我承认。前几天我对你讲过这句话。记不记得？

柏：记得。

聂（忍不住笑了一声）：恭维你的话，你一定记得。你的杂文比鲁迅的杂文好。为什么呢？我讲讲，看你觉得怎么样？鲁迅的杂文是知识份子的杂文……

柏：而且还是高级知识份子的杂文……

聂：你的杂文是三教九流，什么人都可看的杂文，但你触及的问题是很尖锐的，意义是深刻的，你嘻嘻哈哈开玩笑，其实眼泪往肚子里流，心里在呐喊。鲁迅的杂文，火药气很大。你觉得呢？

柏：我的小说倒是学鲁迅的……

聂：小说学鲁迅？

柏：我认为。人家都说不是……

张、聂大笑。

柏（毫无笑意）：人家认为那是对鲁迅不敬。

张：那是我说的，你那样讲，对鲁迅是诬蔑……

聂：你是不是受了鲁迅的影响呢？

柏：我小说是真的受了鲁迅的影响。我的杂文没有，因为过去在大陆很少看到鲁迅的杂文，看了几篇而已。他的小说，我看了不少，呐喊，彷徨，我都看过……

聂：其实，鲁迅的小说也不多……

柏：就是那几篇小说，就使我有个感觉：自从白话运动以来，鲁迅的小说还是最好的。

聂：鲁迅有篇小说《肥皂》。

柏：啊？

聂：非常好，非常好！

柏：我看过鲁迅的《阿Q正传》，《酒楼》，《故乡》……

聂：这都是在大陆时候看的吗？

柏：是。

聂：鲁迅小说，我是在台湾偷着看的……

柏：鲁迅小说，你看过之后，给你精神压力，你要思考，不会很愉快。有人问我，为什么你的小说都有这么悲惨的结局？我说，你应该想呀。现在因为时代不同，所以我的小说更不吃香

聂：你的小说在台湾销得怎么样？

柏：有些人还是看。我现在小说的销路，除了三毛——还有谁呀？……

聂：琼瑶！

柏：对，琼瑶。除了她们之外，我的小说销得最多。人家说，沾柏杨的光！

聂：谁沾你的光？张：人家说：他自己的小说沾柏杨的光！

柏：人家说，因为是柏杨的小说，人才买！张、柏、聂一起大笑。张（望着丈夫，微笑）：我可不可以讲我的意见？柏（声音低了一个音阶）讲嘛。（弹弹烟灰）

张：我觉得他是个使命感很强的人。他对鲁迅的小说之所以那么喜欢，因为他和鲁迅一样，出发点是对社会、对人的关怀；对中国人的可怜，可悯、厌恶——恨铁不成钢。那种心情，我相信他们两人很相像。他五十年代小说所写的主题，当然和我们这个时代是有点区别的。但是他有一颗这么灼热的心，除了反映当时的时代之外，还能把人性的黑暗面挖掘出来。所以，如果他的小说只是局限在五十年代的话，那就没有永恒性了。正因为他太灼热，太关怀，所以，尽管他的小说技巧还没发展到最圆熟，但是，因为他的爱心，他的期望，使他在作品里面保存了一些永恒的东西……

柏（劲儿上来了）：现在我的小说有这么大的销路，证明我有读者……

张：笨蛋！（笑个不停）

柏杨愣愣望着妻子。

张（仍然笑着）：销路！销路有什么值得提……

柏（兴奋起来了，嗓门提高了）——销路！就是有人看呀！不是强迫市场，是自由市场呀！现在，（声音低了，委屈似的）人一提就提我杂文、历史，从来没人提我小说……

张：现在我发现，真正欣赏他小说的人，是从生活里面熬炼出来的人。譬如说，有一个雕塑家，最近在台崛起，也是高信疆极力用大众传播把他介绍出来的。叫侯金水。《柏杨 65》那本书封面上的塑像，就是侯金水设计送给柏杨的，他们本来完全不认的。侯金水就是小说的读者。为什么侯金水这么受他感动呢？说起来非常的传奇。在他还没成名以前，他一直是柏杨的读者，也想写信给他，但是不得其门而入。后来，他的雕塑被人肯定了，他才问高信疆，可不可以把他介绍给柏杨。高信疆说，那有什么问题？很熟的朋友嘛！然后他们才见到了。侯金水是个乡土气息很重的人。他在那种场合，就默默坐在那里；然后他讲了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呀，一听很熟。我好像似曾相识，可是我说不出来，是哪儿来的故事呢！用他的语调来讲，非常动人！简单地说，就是一个捕蛇的人，他很穷，他必须冒生命的危险去捕蛇，结果

被毒蛇咬了；临死的时候，有一个陌生人来搭救他。这个陌生人失了业。捕蛇的人临死之前叫那人把遗物送回家去给他妻子，但是，不要告诉她丈夫到底是什么下场。那个不相干的陌生人处理了捕蛇人的后事。他也是穷得要死，他把自己仅有一点点借来的钱，给了捕蛇人的遗孀，编了一个谎，说她丈夫出海了……这一类的话。他回到自己家，妻子问他：“工作有没有着落呀？”他说：“有，有，有！明天有工作！”他第二天就是要去捕蛇。雕塑家讲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就说，奇怪，这个故事我在哪儿看过的？原来就是他——（指柏杨）的作品！我拿这个案来讲，就是说……

聂：这篇小说是什么题目？

张：啊，我一下说不出来。你看，我都不是他的忠实读者。真糟糕！（望着柏杨不住地笑）

柏：她根本不看！

张：我看了啦！可是我没有那么深刻的印象。这是一个例子：真正从生活折磨里熬炼过来的人，对柏杨的小说才有很深的共鸣。现在台湾的社会，一下子变得太快了，一般人的生活没有困难。这对柏杨这样的主题，就有相当的隔阂。他的小说很多建立在生存的困难上，还不是那种现代的：内心的挣扎啦，面对科技啦，西方文明啦，污染啦。他那个年代，最严重的压迫，是生存的问题。

聂：这个我很了解：五十年代，许多人为生存而挣扎。

柏：我在《自立晚报》工作，在长安东路口；我家住在通化街。那时候公共汽车票一块钱。我就没有那一块钱！走两个小时走回去。我站在公共汽车站，等呀等，希望等到一个熟人来，借我一块钱买一张票。

聂：那是你离开救国团以后吧？

柏：嗯。我受过的苦太多了。

聂：你以前在大陆也吃了很多苦。

柏：在大陆挨饿……

聂：怎么挨饿呢？你家里还有人在大陆吗？

柏：有姐姐、弟弟。我从小没有母亲。我继母曾经把我拴在床腿上来打！我的父亲在外地做事……

聂：你家在开封。是吗？

柏：在开封。我父亲一回来，就是我的春天。父亲回来几个月，继母待我好——好得不得了！她是个旗人，能说善道。父亲刚刚一出门，她立刻就翻脸！我从小就受这种虐待。我现在手上还有疤，几岁时候，一到冬天，我的手全冻烂了。我从小就受苦，一直到大学毕业，跑到东北去……

聂：我记得你是东北大学的……

柏：是呀！我在四川三台念书。那时候穷学生哪有钱？幸亏有个学生公社，你记不记得？

聂：哪有公社？

柏：你那时候还小……

聂：哪里小？我也是抗战流亡学生呀！我比你只小几岁。人家偏偏要叫你柏老、柏老。

柏（笑笑）：学生公社是基督教办的。冬天每个人可以借一件棉大衣；学生有贷金。贷金不够吃……

聂：我们都是这样。

柏：花生米也吃不起呀！抽烟，几天买一支（他珍惜地看看手指间的香烟，猛抽一口，在烟盘里捻熄）

聂：你那时候就抽烟啦？

柏（歉然笑笑）：那时候就抽烟了。

聂（笑着）：受罪！活该！

柏：连碗猪肝面也吃不起！根本不可能！

聂：那时候吃碗牛肉面，就是打牙祭呀！

柏：牛肉面！那还得了？那是富豪之家呀！

聂（笑）：四川牛肉面，很辣很辣，现在在爱荷华也吃不到！

柏：胜利以后，我在东北大学已经毕业了。同学们说，到沈阳去玩玩吧！我冒险精神也蛮大的，到沈阳去吧！我在沈阳办《东北青年日报》，在辽东学院教书。后来，我就跑到北平。

聂：一九四八年吗？

柏：一九四八年。饿得发昏——北平路旁有茶汤摊子。我和一个朋友在街上走，饿得口水都流出来了，没有钱吃一碗茶汤；我特别喜欢吃的。我一面走一面骂：“什么东西？挨饿！活该！你没有本领！”朋友问我：“你骂谁？”我说：“我骂我。”我没有能力，我吃不起茶汤，我就应该骂自己，谁也不能怪！

聂：你什么时候离开北平？

柏：四九年。

聂：我和你同时在北平！

柏：解放军二月进城，我四月离开的。

聂：我跟你同时离开！

柏：我到青岛……

聂：经过潍县，对不对？

柏：对！

聂，我们走的一条路线！

柏：我们五六个人走到青岛，住在一个学校里，穷得干净利落！我到菜市场，身上只有一条裤子。一块钱？人家说，好！要！我就当场脱下裤子给他。那时候也二十八岁了，大学毕业生，在辽东学院当副教授，居然饿得当场脱裤子！后来到上海，住在临时搭的难民收容所；从上海就到了台湾，上海还在打仗

聂：那怎么能说共产党把你俘虏过去了？

柏：我从来没有被俘过，但调查局说我被俘虏三天！思想是累积成熟的，三天就变了吗？但三天却是“加入叛乱团体”——就挂上了钩！挂上了钩就是死刑。我到了台湾简直没办法呀！我的脾气又不好，老犯上。我是老国民党呀！我十八岁，抗战刚开始，三八年，我在武汉左旗受训，加入三民主义青年团……

聂：你的这些生活经历对你写作都有影响。

柏：是。我对“苦”很敏感。现在有人觉得我花钱花得太厉害……

聂：是报复心情。

柏：不是报复心情。我说，第一，我受过这么多的苦，我知道钱的重要，但是，我不吝啬……

张：这和他性格有关，大来大去。我们约会时候，他穷得要死，上街要

坐计程车！我说，算了吧，别坐计程车了。他偏要坐计程车！（苦笑）

柏杨（喝喝，望着妻子笑。转向聂）：但是，我本身没有享受，我吃个炸酱面就满足了。我也不讲究穿。我唯一的消耗就是抽烟。我帮助人，我的方式是通过工作来帮助，譬如编个文学年鉴，我花钱；假若我没有钱，我可以做吗？我写《异域》，写到苦的时候，写到小孩的时候，那时候，我的小女儿才两岁，书桌就摆在床前，孩子睡在床上，听她呼吸，看她小脸蛋，我就忍不住会哭。我写过一篇母亲生产的小说。那时候，我女儿就要出生了。暴风雨，我身上带的钱不够。心里真难过，恐怕要难产；如果难产输血，马上就要缴钱！我想，万一要输血的话，往哪里去借钱？我一个人在走廊上走来走去。万一有问题的话，真是只有死路一条！后来我就写了一篇那样的小说。恐惧，贫穷，困难，走投无路。人在困难的时候，“恶”的一面会发挥出来，同时，“美”的一面也会发挥出来。可惜的是，人到了绝境的时候，他发挥善的这一面时，别人已经看不到了。

张：为什么看不到呢？

柏：人临死的时候，讲的话，做的事，谁看得到？

聂：或者是你正在倒霉的时候，谁理你呀！

柏：是呀。我写的主要是社会的不公平。我只希望读者读了以后想：为什么主角这么受苦？可能我的表达方式不对。人家说看了我的小说觉得很难过——得了这个结论，我觉得怪悲伤的。

聂：看了难过，你就会想：人为什么会这样？你就要思索。

柏：但是，人不喜欢思索！我写了一篇关于离婚的小说。（转向妻子）你看了，你不赞成。

张：我不赞成，不是情节问题，是你处理的技巧。

聂（笑。抓住机会）：处理的技巧，是什么问题呢？你不赞成。

张望着丈夫笑笑，没作声。

柏：我还写了一篇小说。一个小职员，商人行贿时，他拒不接受。他祷告上帝：“我的孩子病了，发高烧，我没有钱，怎么办？”商人拿来钱，他接受不接受？商人告诉他：“我送你钱，是可怜你，是同情你。我要帮助你，拿钱给你，救你的孩子。我不需要你签字，我不需要你负任何责任，而且，我告诉你，我可以告诉你长官，可以撤你的职，说你贪污！你不要以为我整不了你！”小职员就祷告：“上帝啊，我现在应该怎么办？”

为什么孩子有病？为什么没钱看病？父亲最可怜的是：孩子有病，没钱看病。孩子不知道呀，抱在怀里。

还有一篇小说，一个女的，到一个人家里去，换了一套很漂亮的衣服，到街上去勾搭男人。一个男人来了，问：“你要多少钱？”她说：“六十块。”男人说：“我给你一百二。”他们在一起。她再一看，原来是大学时候的一个男同学，追她追不到手的一个男同学。“啊！”她一惊，后来心一横，说：“当初你追我追不到手。现在你随便好了。我现在这个时间是你的。”……

聂：她不要钱吗？

柏：嗯。男人说：“我没有这个意思。我只有用这个办法可以见到你。你把衣服穿起来。我告诉你，我知道你现在很穷。我没有办法见到你。一些朋友想出这个主意，把你引到这里来。他们恨你！我永远不会再找你，你放心。我现在所有的钱都给你。”他走了。她回家，轻轻打开门。丈夫问她：“借钱借回来没有？”她说：“借到了。”丈夫不知道她卖淫。孩子睡了。

她走过去看孩子。

聂：你怎么想到写这样一篇小说？这样的情节？

柏：人有善良的一面。我想，我若追不上这个小姐，她落魄了，我决不会报复。一个人被迫去卖淫，而且是受过高等教育的良家妇女，她为什么走这条路？这是社会的责任。她没有其他的路！

我还写了一篇小说。一个人很穷，找工作也找不到，看见一个小孩子丢了五毛钱在地上，他马上用脚踩在上面。小孩子嚷着找五毛钱。他说：“我没看见。”孩子哭：“回家妈要打我！”孩子哭着回家了。他捡起五毛钱，买了一包花生米；一回到家，打开门，孩子问：“爸爸，你买了吃的没有？”他说：“爸爸给你买了一包花生米。”孩子说：“爸爸，你先吃。”他说：“爸爸已经吃饱了。”孩子吃了，说：“爸爸，我还饿！”这篇小说，大家都不满意。我可能没写好。

张：他的小说很多都是写的生存的困境。这是他小说里面很重要的一个主题。

聂：你刚才说到他技巧的问题，是什么技巧问题？

张：技巧的问题……

柏：我觉得，中国小说上的技巧，你们习惯的，我都用了

张：我觉得我不能同意。（手向丈夫一招，笑着）别吵了

柏：为什么我喜欢鲁迅的小说呢？简洁。我不喜欢日本作品。我喜欢美国作品。日本作品拖泥带水……

聂：这个我同意。

柏：美国是商业社会。从这个地方到那个地方，两小时，读完一本小说，所以必须简洁。

聂：对！

柏：而且，第一句话就必须把你抓住！因为他没时间看。我的小说就是用简洁的手法。

张：他小说的结构，和他悬岩的气氛，我认为他掌握得蛮好的。在技巧上，这一点是不错的。他的故事，都有奇峰突出，没想到是这样的一个结局！我认为这是他技巧上的一个优点。（顿了一下，挑衅似的望着丈夫笑）可不可以讲缺点？

柏（声音委屈地）：当然可以讲。不讲也不行，到处写。

张、聂大笑。

张：我哪有到处写？（顿了一下）我觉得他这个人，使命感强，控诉性强，很浓烈的情感反映出来的力量，这都是正面的，不必说了。但是，他这个人，缺乏一种细腻；他对于某种观察不深入。譬如说，他描写一个女性的时候，他不能掌握到最能够表现她性格的那种特色。他形容她的外形。他常常犯了一个毛病，用大家都用的语言，譬如说：柳腰呀，修长的腿呀，……还有，我现在不记得了。我觉得这种形容，是没有性格的……

聂：我了解。

张：也许是他不屑于在这上面花时间。但是，我觉得，艺术的成功，就是要透过感性去感染人家，而不是全部集中在使命感的发挥上。我认为这个很重要。

聂：你觉得他的人物是比较粗线条的，是不是？

张：嗯——粗线条，是不是？（沉思状）可以说是筋骨分明；可能在肌



理的组织上，我觉得……

柏（沉沉地）：我觉得不错…… 张、聂大笑。

聂：你的杂文和小说，你自己比较喜欢哪一种？

张（微笑对丈夫轻声地）：说实话。

柏：我觉得我小说也蛮好。

聂（一直在笑）：你总会有个比较吧！

柏：因为两种性质完全不同。

张（微笑着逼问丈夫）：哪个写得成熟一点？

柏：我觉得都很成熟。张（向丈夫手一招）：你这人真护短呀！真没法子。张、聂又笑了一阵。柏杨抽烟，无可奈何陪着笑。聂（对张）：你呢？你觉得呢？张：当然我喜欢他的杂文！无论是形式，是语言。写杂文，一定要对社会关怀，有使命感。这种形式，我觉得，可以说是他独创的体裁，而且他运用得真是——真是没话可讲，运用得那么样熟练，那么样的挥洒自如……

聂：对，对，对！挥洒自如！张：就是要学他的喜笑怒骂，也没人可以超过他。很多读者读了他的杂文，学他的口气来写。我一看呀，唉！没有一个学得像。只有一个女孩子学他学得像，就是梁上元。但是学得像，也不过是学得像而已。文学就是要创造嘛！他的性格，在写杂文的时候，形式和内容，是个很好的结合……

聂：对，对！你说得很对！

张（望着丈夫笑）：有一天，他要是和一个如花似玉的女人，出点什么花样的时候，他的理由并不是我的太太不了解我，而是我的太太太了解我了。

张、聂又大笑。柏微笑抽烟。

聂：你承不承认呀？衣洞！承不承认呀？香华真是了解你！

柏：她对小说的欣赏水准不够。

张、聂笑得更厉害了。聂笑出了眼泪。张笑得一头乌黑的头发甩来甩去。阳台上的风铃也“笑”起来了。

聂（终于停住笑声）：香华是诗人，感性很强的人，为什么对小说的欣赏水准不够？

柏不语，笑笑，抽烟。

聂——香华，你觉得他的小说是不是有点像欧·亨利的小说？情节重于人物的刻画……

张：对，我认为这样……

柏：我还重亲情……

张：他的感情之浓啊！譬如，他对孩子的心，在他作品里也有很大的份量。疼孩子的心，跟现实生活的困难结合在一起……

聂：只是疼孩子的心吗？是他对“人”的爱心……

张：对，对。孩子也是他爱的对象。对社会来说，就变成控诉了。对贫穷人的爱，变成怜悯；对知识份子的爱，就变成一种无奈——你读了那么多书，有什么用嘛！你除了坚守你那些死的信仰，你对人、对己，都不能发挥出一点点光和热。结果，你自己整个萎缩，整个消灭。有什么意义呢？他就感觉痛惜，感觉到一种无奈。还有，他对爱情的观念，我觉得是蛮不健康的……

聂：怎么不健康？

张：他的小说，常常是，因为贫穷，就把爱情破坏了——这也是他一个

很强烈的主题。因为贫穷、灾难，结果爱情就毁了。我觉得他有一种幻灭感。我自己倒是喜欢他写的一对夫妻，很穷，太太生孩子失血，丈夫到处借钱，怎么样也借不到，最后太太死了。丈夫正在路上，狂风暴雨，被雷打死了。家里还有两个嗷嗷待哺的孩子，等待父母回来。最后的结笔是：他们的灵魂，在闪电雷击的那一刻，会不会在天上相遇？我觉得这是他所有爱情幻灭小说里面，写爱情最悲惨、但也是正面肯定的。

聂：你觉得他幻灭吗？我觉得他幻灭不了的。

张：在现实人生里不是；在小说里，他对爱情是幻灭的……

聂：那是因为他的小说是五十年代写的；那个时期他也许是对爱情幻灭的。我觉得他现在不是那种心情了。对不对？

张（偏着头沉吟）：现在呀……

聂：我觉得他的爱心非常重。他吃过很多苦。这一点，他和安格尔有些像。安格尔小时候也吃过很多苦，他家里穷得不用上税。他所爱的人：妻子、女儿、孙子……他有各种不同的爱法，但是他对物质的反应特别快。譬如，你看见什么东西说好，他立刻反应：去买，去买！我买给你！

张：非常像！非常像！

聂：刚才那条好看的披肩，你喜欢，他就说，你去买！毫不犹豫。这是他爱心的一种反应。

张：对，对！那年我到欧洲旅行。他还不能出国，留在台湾。我在意大利好想他，打电话回家。你猜他第一句话说什么？

聂摇头笑笑。

张：“你要钱吗？”（半嗔半笑）气死我了！好像我打电话给他，就是为了要钱！

柏：我对她讲：不要舍不得钱，爱买什么，就买什么……

张（笑指丈夫）：他没有其他的话，就是钱！我们在新加坡，有人问他：“婚姻最重要的先决条件是什么？”你猜他说什么？只说了一个字：“钱”，我也是气昏了！

柏：本来就是嘛！我没说错！贫贱夫妻百事哀。

聂：你还写不写小说？

柏：没有时间写了。

聂：你的历史感、社会使命感都很强烈。你在牢里看了很多历史方面的书，也写了很多历史方面的书。你一向就有很重的历史感，是不是？

柏：我想每个人都会有历史感。所谓历史，就是故事嘛！

聂：你还写杂文吗？去年还看到你杂文。

张：自从他译资治通鉴之后，就没时间写了。

聂：你怎么想到译资治通鉴的？

柏：我坐牢的时候就想到的。坐牢时候看资治通鉴，看不懂，真是看不懂。出来之后，一直想译成现代语文，但是件很困难的事。谁肯拿一笔钱出来，给你五年来译资治通鉴？所以拖了好几年。结果，畅销！

聂：你以前写杂文，经常要和社会接触，挖掘问题，而且每天写。那种压力很大啊！

柏：是呀！没有压力，没有刺激，你就没反应了。

聂：你怎么找材料呢？

柏：社会上各种现象，没有一种不是材料，每天一千字。其实，很简单。

有时候，我女儿佳佳趴在我头上，骑在我脖子上，我仍然能一面写。马克吐温说：“人除了在讲台上以外，任何时间都在用脑筋。”我是：除了写杂文期间，随时都在用脑筋。

聂：每天都有材料可写吗？

柏：有时候，一个问题，可以连续写，写一个月。有时需要资料，请记者去跑嘛。譬如，谈到节育的问题，他们主张要生孩子；我批评他们。正好一个记者跑回来说：“给你个好消息！”他说在大同中学有个工人生了十几个孩子，送给人几个，孩子还是养不起，家里很穷困。我说，好，再去访问，把整个资料给我！你说反对节育！在这种情况下，生下十三个孩子，工人一个月多少钱？几个孩子卖掉了，几个孩子生病，女人得了肠病，住医院没钱！请问，这种情况之下，生两个好，还是生十三个好？有人在报纸上骂我，说“跟共匪隔海唱和”。其实，那时候，“共匪”还没有推行节育。他们说：我们反共需要人，你现在要节育。阻碍反共大业！反对国策！

聂：简直就是超现实！

（谈话在笑声中结束）

（写于一九八五年四月，爱荷华）

## 陪柏杨重走七十五年

周碧瑟

半年前，五月时候，偶然的，在柏杨先生作东的餐会上，闲聊时，我问他：“柏老，什么时候可以拜读您的自传？”“恐怕教你失望，我的眼睛内出血，视力不行，恐怕不能再写长篇。”“视力不行，大脑并没有坏，依然可以回忆，这样吧！您口述，我帮您笔录、整理。”看着柏杨沮丧的神情，唯恐他心脏开刀后恢复期的忧郁症再度复发，所以，我未经思索，就顺口回应。不料柏杨一听，很兴奋的伸出右手，举起小指与我的小指打勾说：“好，一言为定，不可后悔！”当时，五月，是我最忙的时候，我指导的硕士班研究生正要毕业论文口试，再加上筹备六月十日国立阳明大学的首届毕业典礼，忙得不可开交，那来余暇？也就在这个时候，阳明大学教务长张仲明教授起意邀请柏杨出席首届毕业典礼作贵宾致词，校长韩韶华教授完全同意。这是阳明医学院改制大学第一届的毕业典礼，能请到一位不具任何官衔，而这么有爱心，这么有器度的人文大师来演讲，对阳明大学而言，意义重大。但是，这时柏杨正生活在恐惧之中，每天醒来第一件事就是看眼睛出血情况是否好转，心情跟着起起落落，活得小心谨慎，不敢大声讲话，更不敢打喷嚏，他自称活得像个“公主”，心情坏透，拒绝任何演讲。于是，我跟他谈判，他来阳明演讲，我就一定替他执笔写回忆录，达成协议。

六月十日，阳明大学首届毕业典礼，在校长的扶持下，柏杨站上讲台，作三十分精彩而生动的演讲：《专业与人文》。一个很严肃的题目，被他讲得台下听众笑得前俯后仰，但却寓意深远，令人玩味。

接下来，该是我履行承诺了。我一生从未作过生涯规划，一切随缘随兴，也因为如此，才有柏杨回忆录这个浩大的工程，不期然的在我生命中冒出来。以我工作的时间表，无论如何，都无法匀出这一段时间。可是，写本文的时候，这项庞大的访谈工程已告完工，连我自己都不敢相信这竟会成为事实。

五个月来，支持着我做这件事的动机就是“承诺”。苦，是真苦！想想，也是报应！目前在健保局当企划处经理的李丞华教授多年前曾说过：

“周老师的饭很难吃，吃她一顿饭，害我忙了两个月！”

“不吃白不吃，该做的还是逃不掉，吃了再说！”这是另一位学生高翔医师的答话。

我于一九七七年起开始任教阳明，一九七八年暑假，创组“阳明十字军”，每年寒暑假自费下乡服务，迄今十九载，未曾中断，已成阳明的传统，也是数以千计的阳明人共同的回忆。这一切，都是和学生们“吃饭”吃出来的。而今，当老师的我，吃了柏杨一顿饭，竟使我忙了五个月！

六月十三日下午，我到环保署开会，会后，打电话给柏杨：

“柏老，您晚上在家吗？”

“在！”

“那我现在过来。”

我叫车直驶花园新城，就这样，在毫无计划的情况下，开始第一个字。以后，只要有空，就去花园新城，到了第十次，我问柏杨：

“柏老，您现在还耽不耽心我不写呢？”

“不了，现在倒是耽心我不写了！碧瑟，还好我不是你的伙计，否则，你是一个很严苛的老板。”

倒是张香华很得意，她说，柏杨一辈子催人，终于也有被人催的时候。

五个月间，共计访谈八十五次，大部份是在晚上，从八点多到十一点多。每次工作二到三个小时，总共约两百个小时，其中有一半是在花园新城柏杨的家里，另一半是在荣总的病房（包括眼睛与脊椎两次开刀，共住院两个多月）完成的。无论是眼睛或脊推开刀，都是在开刀的第二天晚上就开始工作。柏杨这两次开刀后，都没有出现忧郁症状，可能因为没有时间让他忧郁吧！这期间，我的助理去看他，他向我的助理告状：

“你们这个老师太严苛，是个不好的老板。”

脊椎开刀后不久，一个星期天下午，病房要打扫，柏杨躺在病床上被推到外面走廊，我们就在走廊上工作，柏杨忽有所感说：

“这好像又回到当年在调查局被逼供的情景。”

在花园新城工作，几乎都在暑假期间，我每天下班，搭阳明一号校车到终点站景美，再转计程车上山。工作结束时都已近午夜，电话叫车，柏杨或香华送我上车，回家再去电话报告平安。花园新城揽翠大厦夜班的管理员有一次问柏杨：

“你们每天晚上补习，都要补得这么晚啊？真辛苦！”

电话叫的计程车，坐起来较有安全感，可是有一次，在半路上，司机忽然叫我换车，令我一凉。三更半夜，在荒郊野外，确实害怕，大概司机也看出我的惊恐，补充说道，他的车子有毛病，特意把引擎熄火再启动，向我显示汽车确有问题，于是，我在半路换了车，虽也平安抵家，但确是受了惊。另一次是司机在半路上停车，说他的车是向车行租来的，冷气出问题，必须打电话向车行报告，要我在车上等候。在车上等候的期间，脑子里也不免会东想西想，最后证实，汽车的冷气确实坏了，但细胞在紧张时死了不少。整个工作期间，对我而言，最大的压力是半夜回家的安全问题。而偏偏柏杨的文思却是越晚越好，每次，都有一番挣扎，总在工作效率最高的时候收摊。

学校一开学，我实在无法在下班时间离校，每天总得忙到晚上七八点，才能把桌上的工作清理掉。柏杨却不幸在荣总住院，从我办公室走到他病房，只需要五分钟，从病房走回我的宿舍，大约只要十五分钟，节省了我许多交通时间与精力。

十月廿五日晚上，正在工作，一位医院看护捧着《中国人史纲》上下两册书走进柏杨的病房说：

“我照顾的病人，才廿六岁，在工地被钢梁打倒，双腿受伤，可能难以复原。他对您非常敬佩，听说您也住院，今天是他的生日，他很希望先生能在他买的书上签名。”

柏杨在书上写下：

宗翰小弟：我们是同命，相信灾难会成为跳板。

柏杨

十月廿六日，柏杨教家人送来两本书《柏杨小说选集》和《路，要你自己走》，送给江宗翰。

十月廿七日晚上，柏杨出院的前夕，江宗翰坐轮椅进了柏杨病房，他根据柏杨书上的签名，为柏杨刻了一个石头印章，送给柏杨。

一连三天，三个场景，我都有幸在场。读者的崇拜，柏杨的温馨，使人

感叹！

整个访谈笔录过程中，常常遇到的困难是柏杨的国语实在太烂了，乡音又重。像“使”“是”“自”，他永远讲不清楚，总得等全句字意了解之后，再回头去分辨该是哪一个字。有一次他很费劲一个字一个字的说：学生的“生”，台独的“台”。我就写下了“生台”，可是全句一念，完全不通，幸亏我不耻“上”问，自承学问不够，才水落石出，原来是“生态”，“态度”的“态”而非“台独”的“台”，两人不禁哈哈大笑。更有一次，他讲T—TU，我问他怎么写，他一时之间也说不上来，这时两个人的沟通触了礁，柏杨直怪汉字的缺点，如果用罗马拼音就无此困扰。最后，根据前后文句的意思，几经猜测揣摩，终于写出了他要的“觊觎”两个字。

比较危险的一次错误，他说读者对《通鉴》的“怀疑”……我好奇地问：“怀疑什么？”搞清楚，原来是“欢迎”，意思竟完全相反。另一个问题是他念“直律”，令我很难下笔，再细问，原来是“直率”，“率”在这里音“帅”。难怪了，这时我才了解，柏杨为什么对中国文字那么生气，文字本身已够复杂，再来个破音，真是火上加油，雪上加霜。

至于一般人常犯的错，柏杨更是常犯，有边读边，没边读上下，以及“方”和“黄”永远念不清。于是笔录时，还必须留一部份大脑的功能去解读这些难题。

柏杨最大的福气是随时随地都可以睡觉，在荣总病榻畔的访谈中，有一次，谈到一半，忽然冒出：

“碧瑟，对不起，我要睡一下。”

一个转身，立刻听到他打鼾的声音，入睡之快，令人惊讶羡慕。更妙的一次，写到一半，毫无预警，他已睡着了；等护士拿药进来，把他吵醒，他在没有提示之下，立刻接着下一句，衔接之顺，也令人佩服，他睡前与睡后，脑筋是连线的。

我不是一个写文章的人，而竟替一位大文豪执笔，朋友都替我捏一把冷汗。柏杨一生从事写作，他用字如神、而我却是个门外汉。读者们希望读到的不只是柏杨本人的第一手资料，更希望能享受他绝妙的文句与字里行间洋溢的感情。因此，我尽可能的保留柏杨文字的原味，这本书，我唯一的贡献只在于“逼供”。在柏杨眼睛开刀以及接踵而来的脊椎开刀，这五个月不能看、不能坐的岁月里，我抢救了他这段时间，写成此书。这是柏杨的朋友（包括我）和读者期盼多年，催问多年的一本书。

柏杨的一生充满传奇，知道他成长的环境与过程之后，较能了解他对中华文化的批判。我在五个月间，陪他重走一遍七十五年的岁月，收获之丰难以言喻，感谢上苍，给了我一个这么难得的机缘。

一九九五年十一月九日写于国立阳明大学  
（此文系《柏杨回忆录》代序）

## 一个父亲的呼唤

——一九八八·二·五·台北《自由时报》

吴淡如

我想你必然不知道，柏杨，这个一语道破酱缸文化，只笔对抗官僚政治黑暗面，铁铮铮的汉子，谈起如今远在天涯的女儿，谈起二十年来父女之间的心结纠葛时，却是一个涕泪纵横的父亲，娓娓叙述这一段因黑狱隔阻的亲情……

故事，要从二十多年前说起。

当时柏杨的小女儿佳佳，是个受尽宠爱的小公主，妈妈在中国广播公司上班，爸爸在《自立晚报》做事。因为爸爸在家的时间比较长，所以她大半的生活琐事都由爸爸料理。佳佳从小依赖性大，到了八岁，还要人家喂饭才肯吃。

爸爸有多爱佳佳呢？

在佳佳很小的时候，女佣有一次粗心地让佳佳坐在石板地上，爸爸看见了，就生气地辞退女佣。

爸爸学会开车时，兴冲冲地带佳佳出去兜风，自己却流了一身冷汗：因为佳佳就坐在旁边，他害怕因为一时疏忽，碰伤了宝贝女儿的一根头发。

不管佳佳做了什么事，他从来没有大声责备过，不要佳佳受到任何惊吓。

他担心她吃不吃得下饭，睡觉睡得好不好，每天接她放学，只要有一个小时不知道孩子的动静都会提心吊胆，是个非常神经质的爸爸。

从佳佳生下来以后，他全部的爱都倾注在她身上，发誓永远不离开她，要亲手抚养她长大成人。佳佳也一直缠着爸爸，离不开爸爸。

可是，这样亲亲密密的日子并不长。一九六八年三月七日晚上，佳佳跟几个小朋友在家里看新买的电视机，调查局人员到家里逮捕柏杨。有一个人跟佳佳说“再见！”佳佳还对着他“嘻——”了一声。

那是柏杨在自由世界里最后听到的儿童声音。他钟爱的小女儿并不懂得，爸爸此后不能在她身旁呵护她。爸爸被送到黑狱里去，迢隔关山，连捎封信都很困难。

一夕之间，佳佳被迫要懂事，要面对没有父亲的沉重成长过程。

“入冬后雨不停，刑伤又发，骨节痛楚。”

“……用不着这么栽赃，把人捆起来之后，再施痛打。……囚室沉冤，呼天无力。”

这是柏杨写给梁上元的信，透露他被刑求，屈打成招的情形，这些并没有在信中告诉佳佳。尽管法律上对侦查期间有严格的限制，柏杨被囚禁了一年半后，才开始开庭审判。

“坐牢以后才知道，执法者本身不守法，纵有千言万语，也无处投诉。”柏杨说。

开庭时，他才又看见了佳佳。佳佳长高了、长胖了，变得完全不一样了。父女在法庭相遇，真是惊心而怆然。

“以后不要带她来看我。”入了黑牢的柏杨这样吩咐着。一个心情懊丧、枯坐在暗无天日的牢房的父亲，怎么会不想见见自己的乖女儿，听她甜甜蜜蜜地唤一声“爸爸”？可是，他这个被当成“匪谍”处理的父亲，却怕女儿幼

小的心灵受到伤害，也怕女儿看见父亲这狼狈的样子，他只想到要保护她，让她尽量不受影响，健康地成长。

然而这一入狱，便是近十年的光阴。佳佳最需要父亲的时候没有父亲，柏杨最需要心灵安慰的时候，没有了妻子。不到一年的时间，另外一位男主人踏进了佳佳和妈妈的家园，佳佳多了一个 uncle。

“我坐牢两年，便和前妻办妥离婚，她提出要求，我便从牢房里寄出离婚协议书给她。记得有一次她来看我，接见时，却一语不发。其实那时候的我多么期待一句温暖的话，即使是假的也好，可是我们俩人却默默坐着，好像两个敌人在那里互相对抗。后来监狱官说：‘既然不说话，你回去好了。’她站起来转身就走。我说：‘我知道你很能干，我的事情都靠你了。’她马上回我一句话：‘我不能干，你的事情我没办法。’

“第二天，我就接到她的信，信上说：‘离婚手续我办了，你的东西要交给谁？’我回信道：‘我在台湾无亲无友，授权给你，把东西统统丢到马路上。’以后，我们就没有再通信。”

柏杨至今仍有无限感慨，但也无限宽容：

“其实，我想她也是不得已的。当时我以‘匪谍’的名义被捕，她又在中广那样和国民党相关的公司做事，不和我划清界线，恐怕会被迫辞职，生活就没有着落，处理十分困难。”

父亲受诬入狱，父母离婚，一位男主人走进家庭，又不是自己的父亲，佳佳的成长环境变得十分尴尬，给爸爸的信中绝少提及妈妈的近况。这样的生活，覆盖了难以解脱的阴影。她当时的年纪实在太小了，没有法子用平衡的心理，处理这种纠葛的感情。加上母亲似乎为了在孩子面前维护形象，造成她与父亲间的鸿沟。也使佳佳用否定的眼光仇视周遭的人，她变得敏感而倔强、矛盾而早熟。一直到一九七七年四月，柏杨出狱后，他才真正体会到：一场莫名的牢狱之灾不只影响自己，也影响了下一代的成长与未来！

九年前还在爸爸身上爬来爬去的佳佳，已经不是天天跟爸爸撒娇的小女孩，她甚至不知道怎么去爱自己的父亲……

柏杨一九六八年三月七日入狱，原判刑十二年，一九七六年获减刑，改刑期为八年。当时，柏杨心想自己不久后就可以出狱了。团聚在即，既悲又喜，写信给佳佳，附了一首<寄女>诗，回忆入狱前父母共同生活的点滴，写出“儿啼父心碎，儿笑父心喜”的心情。他记忆中的佳佳似乎还逗留在“一路攀父臂，仍作秋千战”的稚女，结语真能令天下人神伤：

一去即八载，一思一心戚。  
梦中仍呼儿，醒后频频起。  
而今父将还，儿业亭亭立。  
何堪吾家破，孤雏尚存息。  
儿已不识父，怜儿泪如雨。

父女八年不见，柏杨惟恐女儿认不出自己，禁不住泪如雨下。然而，就在这个原可以父女重逢之际，噩运的魔掌仍不放过柏杨。柏杨并未如期出狱，反被强制囚禁绿岛，软禁军营。长年来的等待霎时落空，他面对了一个更不明确的险恶刑期。

直到一九七七年四月一日，柏杨才结束了监禁八年和软禁一年二十六天



的苦难日子。长夜度尽，天明在即，柏杨在获释前夕，却还不敢在信中将消息透露给女儿，惟恐仍是一场空欢喜。

梦想成为真实，黑夜结束了，但梦魇仍然徘徊不去，父女之间，从隔离演成对峙，心中的距离更加遥远。

“出狱后，我发现佳佳的性格全变了，脾气特别坏。最教我伤心的是，出牢后不久，我和她走在衡阳街上，她吵着要买表，我说我刚出牢没有钱，她却坚持要买，一气之下自己甩头走了，把我留在衡阳街的黑夜里徘徊。我那时真觉得活着没有意义。”

佳佳仿佛要把多年来欠缺的父爱马上弥补回来。遭逢这样的变故，她一直对久别的父亲有敌意，不能释怀，不肯坐下来跟父亲谈心，竟告诉他：“你只养我到八岁！”“不准任何人说我妈妈坏话！”台大法律系剩下一年就毕业了，却执意到澳洲去读书、结婚，任凭父亲怎样劝阻都没有用。

“有人写信给我，称我‘郭教授’，佳佳看见了，当着我的面嗤之以鼻，哼了一声：什么‘教授’？她是有意伤我的心。”

父女两人偏偏一个脾气，平白多许多纷争。柏杨提起出狱后女儿的转变，竟不禁涕泪纵横。如今，她远在澳洲，又是关山远隔，多年不见。

“这才是我一生中最大的遗憾，最纯真的爱都给了孩子，可是……”

是的，即使在黑狱中，他仍将最纯真的爱涓涓不绝地输给孩子了。

写了一半的《小棉花历险记》（柏杨说故事）近日才由汉艺色研出版，记载了一个父亲平实的爱。

这个故事，叙述一只焦急寻求女儿“小棉花”的兔爸爸的历险过程。它除了要寻找失踪的小棉花，还要突破二十个难关去德赛山求仙杖，解救被大坏蛋（双头蛇）关在庙里慢慢吃掉的和尚们，应付无恶不作的双尾狼。兔爸爸自己受难，还不忘助人的态度，就是柏杨要告诉小女儿的：永远不要失去信心，不要失去对这个世界的关怀，不要失去心中的爱。一切险阻，用勇气、用真心的爱，都可以化险为夷，否极泰来。

动人的故事，便在柏杨给女儿的信中源源写出。不料不久之后，柏杨写童话给女儿这件事被监狱当局禁止，他只好黯然停笔。于是《小棉花历险记》不得不有一个“开放式”的结局，留给后来的小朋友或大朋友们发挥想像力。停笔时一九六九年七月二十日，佳佳九岁。

直到佳佳十二岁，才开始和爸爸通信。此后六年间这对父女的书信来往，也收进了《柏杨在火烧岛——写给女儿的信》里。

现实生活中再次面对的女儿，和儿时依偎撒娇的样子不同，和通信时那分款款安慰爸爸，叙述生活点滴和升学压力的女儿也不一样。事隔多年，这两本书才出版，看了当时书信的柏杨感觉如何呢？

柏杨说：“人到老年，感慨无限；重看这些书信，还会记得孩子当年的模样。”

柏杨现在的妻子张香华说，柏杨只要在街上见了八九岁的小女孩，心里便会起很大的震动，想起当年佳佳的纯真可爱。

想不想把故事继续说完呢？

“将来有了孙女以后，也许会把故事讲完，总要有个孩子当对象。”柏杨说。

尽管《小棉花历险记》是个尚未完成的童话，但是我们可以从中深深体会一个父亲的爱和一个作家对人类的关怀。写这个故事时，柏杨怕女儿不了

解它的蕴义，不忘叮咛她：

佳儿，你不是一直为爸爸和我们全家的苦难，祈求祷告圣母玛丽亚吗？爸爸再在这里教你念一段《圣经》：“你要尽心尽意爱主，爱你的神，你要爱人如己。”这一段《圣经》上的话，请妈妈讲给你听，要做到这一步是不容易的，但我们只要有这种爱，就会慢慢做到，尤其是当别人，无论他是朋友也好，陌生人也好，当他需要我们帮助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帮助他。

在漫长的刑期中，在家庭变故的摧折下，柏杨并没有忘记爱，没有忘记要“助人”，没有诅咒这个世界的黑暗与冰冷。他是个真正的强者。

几天前，佳佳从澳洲捎信来，简单一句：“我做女儿的，从未为爸爸尽一分心力，一分心是在的。”让柏杨大感震惊；似乎从许久以来，佳佳就没有说过一句让爸爸窝心的话。

柏杨将两册《柏杨说故事——写给女儿的小棉花历险记》，和《柏杨在火烧岛——写给女儿的信》用平邮慢慢寄给女儿，隔海遥寄一个父亲的心意。

“当初我看到他们父女冲突时，觉得柏杨是个无能的父亲，后来我看到了这些书信，才了解他在文字中对女儿的教诲远胜于现实。其中的道理，不是一般父母说得出的。他自己有难，还处处强调要爱别人、帮助别人，还汲汲于培养孩子的爱心，着实不容易。”张香华说。

这就是柏杨情操的高贵之处。

我想，这两本书之所以出版，虽然是公诸于世，但是柏杨心中最期待的读者，应该还是远在澳洲的佳佳。

希望她能接受这一份不平凡的父亲的心。人间情爱纵然复杂多变，但是一个父亲对女儿的关怀，必然温韧不渝，历久而弥新。

### 三更有梦书当枕

——一九八八·九·台北《风尚杂志》第二十一期

李小玲

小学，柏杨的家里没有书民，倒是班上成立了小小图书室，下课钟响，他即跑到教室后面的书架上取书看，什么《七侠五义》《小五义》《三国演义》《水浒传》……伴他度过并不快乐的童年。

同学家有书房，总令他又羡慕又嫉妒，常常忘了玩伴，索性站在书架前看书，几达忘我之境；在重庆当流亡学生时，常赖在书店里看几个小时书也不肯走，不是买不买的问题，而是根本没钱买，书店老板倒很有人情味，从未下逐客令。

柏杨的家坐落在台北花园新城的揽翠大厦里，远离尘嚣，在这清新空灵的环境里，深居简出地过笔耕生活。

传统中国北方人的性格，豪爽、大方，正如柏杨的人。他的家，书房也具备同样的风格，看腻了过度装饰的室内设计，我们可以在这里呼吸到一点自然的、人性的感觉。

五坪左右的书房，书架占满了三面墙，保留了一面开窗，窗外景色绝佳，柏杨即在这个小天地里，埋首于《资治通鉴》的翻译工作，他自嘲此处是“手工艺制造厂”，纵使有助理的协助，但基本上还是得靠自己将《资治通鉴》这本古典名作以现代语文的方式，平易近人地展现于坊间。

日常除了写作之外，柏杨很少外出，书房成为工作及小憩的地方，累了，就在座椅上休息，窗外的绿意氤氲，何等悠闲！真是羡煞了城市里的上班族。

“我整个生命都在书房里，”生活是既规律又单调，柏杨一点也不以为意，因为：“坐在这里，感到内心的宁静，相当舒适……这才真正是属于我自己的位子。”

“一个人有个好书房是最大的享受，外面的世界总是苍苍茫茫的；即使你有一个很大的办公室，但终究你办的还是别人的事！”

尤其对一个从事写作的人而言，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空间，心绪可以天马行空，振翼翱翔，何等快意！虽然“写作”极其单调，但写作的整个过程却非一成不变。翻译历史书籍，每天都有不同的主题，发展的结构也不尽相同，每天都有新的场面、新的变局……

“写作可以把自己的心声写出来，把感情、盼望，把爱与恨抒发出来……”

这是其中的乐趣，翻译古典书籍则有另一层次的收获，《资治通鉴》最近几年来并不是排行榜上热门的书，柏杨深入其中，为读者掘出人们难得接触的宝藏。

多年来，柏杨坚守的信和爱不变，但其观念、心性，随年龄的增长而愈显得亲切近人，或许真正熬过人生各种困境的人，才有如此的表现。对我们国家，柏杨仍有着壮年时的期许。

所以书房的功能，提供读书写作的快意空间之外，书房有其潜藏的效应，好比读书能养性一样。

然而，现代人往往在富裕之后就忘了“知书达理”，柏杨说：“仓廩足而后知荣辱，或许现代人生活太过紧张，没有时间进入书房，但是书房在家

庭的重要性，扮演了提升心灵的重要角色。现代知识来源太杂，以往只有一种——书（包括印刷品在内），但是现代人知识层面广而多数品质不精，这是很自然的现象。”

想要现代每个知识份子都埋头书房，已不可期，但知识份子不应放弃也不能放弃书房，这就是书房的功能。

如何引起人们重回书房的兴趣呢？

柏杨认为该深思的是：书房提供的是什么东西？如何能引人入胜？如何教导？如何辅助？都必须有一套符合现代人的内容设计。

现代年轻人，资讯的来源比以前复杂，视觉的传递，有声出版物的大行其道，书房势必要现代化。比如架上的书籍，不论在编排、撰写、印刷、包装上，都得精心制作，尤其要注意阅读便利性。

家长在购屋时，应该腾出房间当作书房，营造出一个书香天地，让孩子浸濡其中，受益无穷。

书房装潢的好坏与藏书量无关，因为个人对书的要求不同，“贵在能从好书中吸取精华”，柏杨表示：“但要多方面涉猎，就和一般人吃东西不能偏食一样，必须吸取各种营养。”

命运坎坷的他，二十七岁才读完大学，因为年轻时失去了太多，所以极其珍惜每一刻可以阅读的时间，连走路、坐巴士、等车、吃饭时都不例外，甚至过去每天从所住的台北通化街，走到长安东路《自立晚报》上班的这段时间，也不放过。

此外看电影、看电视时，他也有作笔记的习惯，看到或听到感人的句子必忙不迭地记录下来。如今甚至用收录音机将这些话口述下来，一直保持锲而不舍的求知欲，“因为知识是从各方面累积而成的！”

想要广博地吸取知识，柏杨的方法是：“随时随地，发现目标就立即行动，不要迟疑！”

没有其他的嗜好，除了看书还是看书，从书中能得到无穷的乐趣，情绪低落时唯一的纾解方法还是看书，柏杨是个典型的“爱书人”。

爱看书也爱惜书的柏杨认为：“如果你连最喜爱的东西都不珍惜，那你还珍惜什么？”以往还特地刻一个图章盖在藏书上，提醒那些借书的朋友：“戈戈稿费，买书自娱，且以之维生，辱蒙借阅，务请早日赐还，实万分感谢！”

出狱后，他作了修正，现在买书都不再盖印，柏杨说：“人生很多事情都是过眼云烟，当年突遭家变，许多藏书不保，流落到街头书摊，看到那些盖印，只有徒增伤感而已。”

如今，对书的保存抱着“顺其自然”的态度。即使朋友借阅忘了还，也不再追究。一本好书遗失，第一个反应自然相当懊悔！“但我一生中丢掉的东西太多了！必须割舍的感情也太多了，因此把书视为财产的感觉，也愈来愈淡。”

远居市郊，遗世而独立，有着强烈“自我放逐”的意味，柏杨如今驰骋于山林、心灵不被束缚，或许迫于现实，而不断作笔耕的工作，但却不失书生本色，一天看五份报纸，对国事、时事依然关切，虽然他说：“知识份子对国家的影响并不大，以往太过高估知识份子的力量，实则整个社会结构的变化潮流，才是根本的主宰者。”

经过人生的阅历，历史的教训，柏杨对人事的观察已不仅是表象，而是

深入了文化本质的探讨，这都是在书房中领略出的心得。

## 柏老，不老

——一九八九·——·台北《妇女杂志》

杨玟瑗

柏杨认为生命不能够挥霍，除了工作的享受，他不追求其他。

他的生活哲学就是：工作即生活，生活维生命。

跟柏杨这种澎湃铿锵的人，作“生活”这种软调子的接触，好像拿蓬蓬的棉花团给大象玩，真不知结局会怎样？

来到他和诗人张香华的家，只觉得这儿好像很忙碌，而且人口众多，走来忙去的，香华姐坐在地毯上接电话，一位朋友在餐桌上专注写稿，两名工作助理忙着打电脑和文书处理，帮做家务的管家林太太在厨房工作，却不见柏杨。

等待的片刻，我习惯地四下浏览：坐着的沙发是米白色的，茶几是乳白色的，落地窗帘是带点黄色的白，整间屋子的墙壁也是白色的。由于质料的关系，这白，有点含蓄质朴，因此整个客厅沉沉缓缓地透着精致而温润、朴实的气氛，令人精神舒坦，不像很多人家的白色，白得凛冽，白得很现代、很科技感，令人神经末梢发紧。

眼光打个转，回到正前方，客厅外是个小阳台，一串风铃，逆着光，有剪影的效果，造形美好。我起身，临窗眺望，远处是台北盆地，白天看，灰褪褪的、密密麻麻，一点也没有香格里拉的联想。但是到了夜里，夜幕下垂，黑暗融蚀掉所有的色与形，包括杂乱和丑陋，代之而起的是一盏一盏跳起的万家灯火，柏杨曾经说那是“台北那个巨大的星湖——灯火犹如渔火，黑暗就是海洋”，而在“清风轻轻拂着面颊”时，回想着大陆行的诸多动人心魄的奇情，而说：

“大陆可恋，台湾可爱，有自由的地方，就是家园！”

台湾可爱么？

柏杨出来了，从书房出来。那是他翻译《资治通鉴》这项浩大工程的阵地。穿着旧旧的衬衫，戴副眼镜，寻常老头儿一个。他透露，他日常生活唯一的休闲，是抱猫，替猫抓痒，他说：“嘿！抓不舒服，猫儿还咬人哪！”除此，他天天工作，日夜不断，吃饱饭，打个嗝，再上工；唯一的运动，是清晨五六点的散步和偶尔游泳。

柏杨是全无休闲生活的人，甚至连生活都没有细节，他说：“好多年了，想带香华到阳明山住一晚，都没办法成行，”他说：“出国旅游、记者会、座谈会、演讲、访问、聚会，忙得不敢出去玩，我的工作量太大，但是有意义，该做就做。”

结论是，除了工作的享受，他不追求其他。可以说，他的生活哲学就是工作，这话，开始标示七十岁老人的不寻常了。

柏杨说：“我的新生命，在工作里成长。”

目前他的工作重点，是写《柏杨版资治通鉴》，计划出版七十二本，现已完成五十二本。跟着历代的轨迹走，让他在书房里改朝换代，虽然同样是写稿，却很有新鲜感。

他说：“翻译文言文，经常得查字典，有时为了一个不认识的字，要打

好几通电话，甚至打到国外向朋友追查，因此每天都有新的刺激。”

柏杨很少停留在生活面，而是腾越在生命的层次来思考。不是不屑，也不是不知情趣，只是在经历了大风大浪，坎坎坷坷之后，无论怎样的生活境遇，他都觉得是很好的。有什么比以前更糟？

“生命有限”“犹恐不及”是柏杨的心情。他说：“生命不能挥霍！人过三十岁就应如此，何况，我过了七十岁的人，更不能挥霍。”

对于现代人的挥霍，柏杨深切慨叹：“生命不能挥霍，金钱也不能挥霍；现代人挥霍，是因为不知道生命的意义。”

生命的意义是在追求事相的真实本质，人却往往行为本末倒置。柏杨开始慷慨激昂起来了，他说：“XO不是喂牛的，全世界只有中国人才像牛一样大量灌XO来炫耀有钱。而且勉强对方喝酒，以示自己的诡计得逞，你越痛苦，他越叫你喝。我有一个朋友，就是因为闹酒闹翻的。

“我一向不能喝酒，他却冠冕堂皇地坚持‘我是在敬酒，你不能不喝’，理由竟是‘你不喝就是不给我面子’，你看，为了自己莫名其妙的面子，就叫别人喝酒。这种人不爱自己，也不爱别人，朋友怎么可以使朋友痛苦？”

“提及生活品质的问题”，柏杨言辞渐露犀利，这是七十“老翁”罕见的。他直指：“有钱能使鬼推磨，但不能使鬼升天。暴发户常以为钱能解决一切问题，一句‘我有钱，我请得起’，所以台湾的婚丧喜宴有了色情表演。一句‘我有钱，我买得起’，所以才有金马桶。再一句‘我有钱，我付得起’，因此旧金山在公布用水超度数的名单时，‘中国大使馆’名列榜首，真是失落了礼义的礼义之邦！”

柏杨认为有钱没罪，但看对钱的使用方式；他也认为名利无伤，但看对名与利的消化方式。

只看他的方式，就可以看出他的品质。

人常说：“衣食足而后知荣辱。”也说：“富过三代，才懂得穿衣吃饭。”这是很现实的问题。

柏杨还记得十一年前和张香华结婚时，吴三连先生要送他一幅画当礼物，他回说：“我不要画，我要两把椅子。”而今想来也是无奈，“还能怎样呢？我那时候就缺少两把椅子，没地方坐呀。人要有了吃饱的肚子，才能追求艺术。但是没有钱仍在追求艺术，才是喜爱艺术！”

目前柏杨的生活已经相当稳定，不过他觉得自己的生活品质不够。他说，在意大利曾认识一个地砖工人，虽然不是知识份子，却很有水准地经营自己的生活，建设步骤是这样的，房子自己动手盖好后，首先买厨具，其次就是买画，有余钱才买沙发，睡觉将就着，直到存够另一笔钱，才添购床，这么下来已历经了七八年。

柏杨的感动有二：其一是这位意大利工人竟这么注重艺术，其二是他这种点滴累积的态度，很踏实，一点也不急功求派头、铺场面，以便向人报价说：“这幅画几十几百万！”发人深省。

柏杨深以为当前台湾的生活心态，好比乘惯独木舟的人，即令上了大船，也改不了“独木舟心态”。他说这是心灵适应问题。但愿三代之后，社会会顺利地转型到富而好礼的境界。

张香华得空了，也加入我们的话阵，话不多，但可以感受到她的全心参与。她参与柏杨的一切，是柏杨的妻子、经理，和好朋友。他们两人相差二十岁，可以这么想像：柏杨二十岁的时候，她才刚出生呢！这种忘年交，真

是难得。

香华姐是个喜爱美的人，收集了二十来件水晶动物，件件玲珑剔透，玉洁冰清，很能与她的气质相呼应，得此美眷，柏杨当无憾矣。

怪不得柏杨说台湾可爱，怪不得柏杨深切诚挚地说：“我有爱情、友情、亲情，儿子也有儿子了，一般人认为我的晚景很好。我的内心充满了感谢，也觉得一切都在巅峰状态，而且还在增加。”

祝福柏老与香华姐！



惜福·惜缘

——一九九一·二·台北《家庭月刊》

柏杨夫妇相差了几乎二十岁。当年，一个是甫出狱、贫苦而又寂寞的民主斗士，一个则是充满文采才情的清秀佳人。两人力排众议，坚定信守地走入憧憬的婚姻世界。十五年来，他们不仅证明了自己的选择，也证明了彼此是自己的朋友。

十五年前，柏杨五十七岁，刚刚出狱，一身孤风傲骨，颇有“世人皆醉我独醒”的清寂之感；当时张香华三十八岁，气韵脱俗，在文坛上迭有佳作，仰慕者自不在少数。

年纪相差悬殊的两个人，在一席由史紫忱教授作东的餐会上相遇，进而相知、相恋。半年后，张香华不顾所有亲友的反对，信心坚定、满怀喜悦地和柏杨携手迈向两个人生命中的第二个春天。

十五年后的今年，柏杨和张香华都已分别迈入七十和五十之龄。十五年的婚姻生活，对柏杨来说，只需以“夕阳无限美好”几个字，来做最简单而明白的诠释。

尽管张香华对丈夫的生活照顾有加，她个人在文坛上的空间或其他社交场合、公益活动的参与，也自有一方天地。如此适度地保有独立性，使两人不仅能拥有合而为一的世界，同时亦能保有自己的空间；在个体上做到完整的协调，生活节奏因而有轻重缓急皆有致的美感。

柏杨认为自己的性格较粗犷，并且容易发脾气；大声一吼时，“香华总是沉默不说话，耐心等我气消了之后，再和我做理智的沟通，她是一个冷静又有包容的女人。”他说十几年来，妻子对他的意义，除了是亲密的伴侣外，同时还是一位沉稳内敛的朋友。

谈起两人这段属于彼此的二次婚姻。那时结识之初，柏杨已与前妻因入狱的原因而化离，张香华亦与前任丈夫离婚多时，两人也各有子女。

结婚后，他们是如何看待彼此的儿女呢？“我们视如己出！”柏杨说即使现在，子女们都已各自独立、成家，但是“全家人”的感情仍是融洽而和谐，子女也尊父母的另一半为自己最亲的长辈，不分彼此。

柏杨强调说，婚姻对老年人来说，比对年轻人更为重要，“少年夫妻老来伴”，年轻时婚姻糟了可以重头来过，老年人必须珍惜目前的幸福时光。他说，老人最可悲的不是死亡或衰老，而是不懂得吸收新的事物、不知道欣赏临老的夕阳之美。他则以珍惜的心情来要求自己、来爱自己的妻子，以及自己的家与生活。

每年到了岁末，只要是柏杨、张香华的朋友，总会收到他们诚心寄来的贺卡，上面是一篇简短的平安信息，告诉朋友们，这一年来他和妻子做了那些事、有过那些旅游经验，或是那些生活上的小情趣。十四年来，他们如此相伴走过，而今而后，亦复如此，甚至他们的手将握得更密更紧！

他在争议中保持自我

——一九九一·四·二七·北京《团结报》

我喜欢思考尚存争议的问题，也乐意结识一些有争议的人物。因为一些机遇，我最近三次会见了深居简出的柏杨。在台湾，他有坐牢九年零二十六天的传奇经历，他的小说、杂文、历史著作，一直畅销不衰。在中国大陆，有人认为他剖析民族性弱点的著作，是为了催促国民反省，有人却认为他的思想偏激，以偏概全；有人认为他作品的语言诙谐幽默，尖锐泼辣，有人却认为他率尔出言，文风粗俗。特别在前些年，有人将柏杨的作品跟鲁迅的作品进行比较研究，又引发下一场柏杨的杂文是否超越了鲁迅杂文的很动感情的争议，这更引起了我对柏杨的兴趣。我不想就那些众说纷坛的问题匆忙发表己见，只希望能够多听柏杨谈谈自己，谈谈他对上述问题的看法。即使他的谈话再度引起争议，我认为对于研究柏杨这个台湾文学史上的客观存在，也是会有裨益的。

一九九一年十二月十三日中午，我第一次见到了柏杨。那是在远流出版社老板王荣文先生举行的一次午宴上，地点是中国大饭店中餐厅。我记得同席的有被誉为台湾核子工业之父的孙观汉博士——柏杨被捕期间，跟他素昧平生的孙博士不顾个人安危，奔走营救，并编了一本《柏杨和他的冤狱》进行抗议。还有《中国时报》“人间”副刊主笔季季女士、《传记文学》出版社社长刘绍唐先生、新近出版长篇巨著《浪淘沙》的作者东方白先生等。席间柏杨妙语连珠，不时引发阵阵笑声。只是我当时的注意力集中在美酒佳肴上，他当时的妙语，事后一句都记不清了。

吸取这次教训，一九九一年一月五日上午，我驱车来到台北县新店市花园新城的柏杨寓所，进行了长时间的专访。不仅作了笔录，而且录了音。在场者有柏杨太太、诗人张香华女士，台湾著名史料专家秦贤次先生。

我首先问起了导致柏杨入狱的“大力水手”事件。这件事发生在一九六八年，当时柏杨在他的前妻倪明华主编的《中华日报》家庭版上，开辟了一个<大力水手漫画>专栏。其中有一幅漫画，内容是父子二人合购了一个小岛，在岛上建立了王国，并由父子二人竞选总统。这幅漫画触怒了台湾当局。他们以“侮辱元首”“通匪”的罪名，于同年三月七日，将柏杨关进了监狱。柏杨从小丧母，不知自己的生日，后来他入狱的日子就成了他的生日。

我请柏杨坦诚回答：他刊登这幅漫画究竟是否有意讽刺蒋家父子？柏杨说：“我当时并没有想搞什么影射，但在潜意识中却有不满蒋家父子的东西。刚到台湾时，官方提倡反共小说，我也写过反共小说。但我跟别人不完全一样。四十年来，我从来没有称共产党为‘匪’。我觉得应该尊重人家。我从来不认为共产党奸淫烧杀，反而认为共产党军队的军容风纪，超过了当时国民党的部队。我在蒋经国领导的‘中国青年反共救国团’服务过，切身感到蒋经国神经过敏得很。那时有一部西方影片，描写拿破仑被囚于一个海岛，他的情人去探监。男演员好像是马龙·白兰度，女演员是索菲娅·罗兰。蒋经国征询我们对影片的意见，我们说看不出有什么问题。蒋经国说：‘这是在讽刺我们退居海岛呀！’这部影片于是就被禁演了。离开‘救国团’以后，我去了《自立晚报》。报社经费支绌，发不出薪水。报社在长安东路口，我家住在通化街。乘公共汽车要花一块钱买票，我就穷得掏不出这一块钱，只好花两小时步行回去。为了生活，我开始写杂文，因为报社可以不发工资，但不能不发稿费——不发稿费就没有人写东西了。那时台湾警察局门旁都挂

着一块牌，上面写着‘作之师，作之君，作之亲’。你一个警察要作老百姓的师长，你有多大学问呢？‘作之君’，你想当皇帝吗？‘作之亲’，你还要当老百姓的爸爸？我用杂文讽刺这种畸形社会现象，引起了广泛共鸣，以致‘三作牌’成了警察的代名词，所以警察对我恨之入骨。久而久之，官方对我产生了一种印象：这个人有反政府的倾向。我整天生活在风声鹤唳之中，所以‘大力水手’事件不是偶然发生的。官方一直在找我的毛病，这幅漫画成了他们的一个把柄。”

为了不致长久沉浸在对梦幻般岁月的回忆之中，我把话题引入对鲁迅和鲁迅作品的讨论。柏杨说：“我自少年时代，便尊敬鲁迅。我认为鲁迅是中国近代（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到八十年代）最伟大的作家，即令不是唯一，也是之一。我佩服他对恶势力的战斗精神，和对社会问题的坦率检讨精神，以及‘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赤子精神，就是在台湾警备司令部军事法庭上，我也没有掩饰这份尊敬之情。有人将我置于鲁迅的敌对面，这是不符合事实的。”

有人将柏杨在台湾的生活概括为“十年小说，十年杂文，十年铁窗，十年历史”。他在五十年代多写小说，反映在台湾的中国人因战乱和贫穷而演出的悲剧，表现出社会上存在的种种不公平现象。除三毛、琼瑶的作品外，柏杨的小说在台湾是销售得最多的。去年我路经香港时，就正值根据柏杨小说《异域》改编的同名电影上演。柏杨说他的小说是学鲁迅的，但有人认为这样讲“是对鲁迅不敬”。

柏杨说：“我的小说真的受了鲁迅的影响。在高中时代，我就读过鲁迅的小说，如《阿Q正传》《故乡》《祝福》《药》《孔乙己》《狂人日记》。鲁迅的小说数量不多，但就是那几十篇小说，使我有个感觉：自从白话文运动以来，鲁迅的小说还是最好的。鲁迅的小说内容沉重，表现手法朴拙，每一篇含义都很深刻。现在的人看小说是为了消遣，不爱读沉重的东西，但看过鲁迅的小说之后，你会感受到一种精神压力。你要思考，不会很愉快。受鲁迅影响，我创作小说，也是出于一种爱心和使命感，不考虑有没有世俗利益。就技巧而言，鲁迅的小说没有说教的味道，是通过艺术形象在潜移默化中改变读者；不像有的作家，用一种强硬架势把自己的信念灌输给读者。其次，鲁迅的小说用字简洁，常常第一句话就能把读者抓住。我不喜欢日本小说，因为日本作品拖泥带水。我的小说就是用简洁的手法。总之，跟前代作家相比，跟同代作家相比，鲁迅的小说都是非常杰出的。我对鲁迅小说的唯一褒贬，是他用词有时稍嫌僵硬，其它地方我都很喜欢。不过，影响我小说创作的东西很多，如传统小说，西方小说。西方小说中对我影响最大的是《基督山恩仇记》。大仲马那种运用巧合的技巧对我有很大启发。”

柏杨是因六十年代创作杂文而名噪一时的。他揭露了中国几千年“酱缸文化”所造成的人性弱点，触及了一些很尖锐的社会问题。虽然他自认为他的小说和杂文“都很成熟”，但一般读者多偏爱他的杂文。一般评论家很少提及柏杨的小说，甚至在一部六百二十五页篇幅的《台湾现代小说史》中，也找不到柏杨的名字。我问柏杨：“论者都把你的杂文和鲁迅杂文进行比较，而你却似乎否认鲁迅杂文对你的影响，你对鲁迅杂文究竟如何评价？”

柏杨说：“就文化发展的规律而言，后人都会受到前人的影响，或接受，或反对，或接受一部分，不可能完全不受影响。我的杂文当然会受鲁迅影响。但比较而言，我喜欢鲁迅的小说。鲁迅的杂文蛮贵族文化的，也可以说是高

级知识分子的杂文，不是三教九流什么人都可以读懂。上高中时，我也接触过鲁迅杂文，但读起来感到很艰难。待到我能读懂的时候，我已经看不到鲁迅的书了。台湾查禁书刊禁得非常彻底，鲁迅著作不是轻易可以找到的。就鲁迅而言，他的小说对我影响很大，杂文对我影响较小。我现在看到三十年代鲁迅那些人批判社会上的恶劣现象、批判国民党的文章之后，感到非常痛心，不是觉得批评过分，而是说那时批评过的东西，有些现象还存在，有的甚至变本加厉。我读这种文章，常替我们的文化人难过。这种痛苦体现着文化人的一种失落感。”

我好奇地问：“既然鲁迅杂文对你影响不大，那又如何看待？”你的杂文跟鲁迅杂文的诸多一致性？比如内容的批判性，语言的反讽，妙喻、文白夹杂……”柏杨说：“一九八一年我去美国。有些朋友也问过类似问题：‘你以前没有到过美国，为什么会有民主观念？’我那时想，亚里士多德、孟德斯鸠等人，他们也没有到过美国，为什么也有这种想法？鲁迅的想法不是纯属他个人的，只不过他有机会讲出来，有胆量讲出来，有胆识讲出来。讲出来后，一般人可以沟通，可以为人接受。文学作品反映问题都存在于社会，很多人都想到了。如果除作家本人之外没有其他人想到，那文章就不可能引起共鸣。”

我接着又把谈话拉回到柏杨杂文跟鲁迅杂文的具体比较问题。柏杨只字不谈他的杂文是否超越了鲁迅，仅就后人能否超越前人的问题，发表了他的看法。他说：“有人一直质问我，你配跟鲁迅相比吗？我想，如果我崇拜的鲁迅还存在的话，他会责备这种说法。怎么不能比较呢？后人永远应该超过前人。我认为鲁迅是可以批评的。如果变得不能批评，鲁迅也就丧失了生命。鲁迅的价值如果不许批评来维护，那就会变得没有价值。我们应该从批评中发掘出一个真正的鲁迅，有价值的鲁迅！”

由鲁迅可不可以超越的问题，又引发出柏杨对中国文明的一番议论。柏杨说，中国是一个充满圣人崇拜的国度，而“圣人”只许有一个，不许超越，不许冒犯，武侠小说里的人物，本领永远不如他的祖师爷。“这种不能超越前人的思想，害了我们这个民族，所以我们这个社会里，很难出现‘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的人物。我认为下一代一定要比上一代好，否则社会就是个堕落的社会，民族就是个堕落的民族。”我告诉柏杨，鲁迅本人就是反对神化任何历史人物的。当年新月派人士把泰戈尔说成活神仙一样，鲁迅就很不以为然。鲁迅一贯把自己和他的作品看成进化链条上的中间物，他又把自己比做梯子、垫脚石，说明他认为后人可以超过前人，希望后人跨越前人。至于现在是否有其他作家在总体成就上可以跟鲁迅比肩，那当然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我说这番话的时候，柏杨注意地听着，不时点点头。谈完鲁迅，我又问及在前代思想家中，有没有对他影响较大的人。柏杨说：“我觉得影响我的人挺多，比如郁达夫的颓废思想对我就有影响。不过，我是一个广收博采型的人，就像吃饭一样，什么都吃，这是我的优点。缺点是我没有师承，没有师承，可以不受束缚，但困难之处是什么问题都要自己解决。有一次，我去旧金山参加一个讲习会，谈到我对儒家的看法。大会主席马上宣布退离主席的座位。我很吃惊，他解释说，按西方的规矩，主席如果跟讲演者的意见相反，必须先退出主持地位才能发言，接着就有几个女孩子陆续站出来反驳我的观点。后来我才知道，这些女孩子全都是这位主席的研究生。这是我生平第一次感到师承方面的压力。这次我去新加坡，他们送我一份简报，上

面印有一个大标题：一个柏杨成不了势，这是因为东海大学前任校长说过，柏杨反儒家，理都不要理他，他一个人成不了势。所以我感到师承的压力。我认为师承这个东西可能造成学阀，造成思想禁锢。”

不知不觉，谈话持续了一个多小时，到吃午饭的时候了。柏杨夫妇请我们在家吃火锅：在电磁炉上涮虾、鱼片、肉片，以及粉丝、豆腐、青菜。席间充满了家庭似的亲切气氛。柏杨不是吝啬人，但他不讲究吃穿，平日吃份炸酱面就满足了；原来唯一的消耗就是抽烟，有一天忽然烟也不想抽了。

吃完饭，我们又聊了近一个小时，我问：“如果以入狱前、狱中和出狱后为界限，将你的著作分为三个时期，这三个时期中你作品的内容和形式有什么变化？”柏杨说：“我想应该是没有什么变化。至少抗议性是一贯的。我有一位朋友说过，柏杨永远跟别人不一样。我也觉得或许和别人不一样。因为跟别人看法不同，所以总和人家抬杠。但从另一个角度看，人本来就应该有自己的想法。”我问：“您的作品中除开历史题材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以外，妇女题材也很多。您是不是认为在当今社会中妇女问题占有一个很突出的地位？”柏杨回答：“人类社会过去以家族为单位，现在以家庭为单位。在这种情况下，妇女的地位当然很重要。当代妇女有两个特点，第一是大多受过教育，第二相当多的妇女很能干，有的比男人还能干，所以男人需要了解现实状况，了解社会结构，如果不能面对现实，除了会给自己带来苦恼，还会给对方带来苦恼。”

告别之前，我还问了一个柏杨的读者们普遍关心的问题，就是他目前在做什么？今后计划做什么？他回答道：“从一九八三年到现在，我一直在用白话文翻译《资治通鉴》，工作持续了八年，现在已经写到黄巢起义了。原计划写三十六册，后决定增加到七十二册，目前写了六十一册，还差十一册，计划两年内完成。这样，编写白话《资治通鉴》，前后要花我十年时间。现实题材我不写，现实政治问题我也不过问，除开朋友聚会，其它活动我都不参加。目前除开吃饭、睡觉，就是写作，每天写四千至六千字。过去一个月出一本书，自己校对两遍。现在有两个助手，一个帮助处理杂务，一个协助翻译《资治通鉴》。我追问：“你说你对现实问题不写也不问，那你改写《资治通鉴》是不是也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呢？”柏杨说：“我想是有的。首先《资治通鉴》本是用文言文写的，在司马光的时代就已经没有几个人能看得下去。我坐牢时读过这部书，真是看不懂。看不懂就等于死亡。我现在把这部书的文字变成白话文，又使它生龙活虎，重新注入生命。这就打破了思想界、史学界对这部书的贵族的垄断，读者从中可以破解很多东西。其次，我想借助这部《资治通鉴》，把中国传统文化的弊病，一个一个揭示出来。我想这是为我们国家做了一件很大很大的事情。听说毛泽东就读了几遍《资治通鉴》！”我说：“是的。毛泽东说《资治通鉴》这部书写得好，叙事有法，可以从书中的历史事件中，吸取经验教训。鲁迅也读过这部书，从中领悟到中国人乃是食人民族，于是写了《狂人日记》。鲁迅把读古书比喻为刨祖坟的工作，刨那些坏种的祖坟。”

临别时，柏杨和他太太各自送了我一些书，一一签上了名。他太太又亲自驾车送我下山。他的太太早年毕业于台湾师大中文系，后来教过书，编过刊物，现在专门写诗，出过《不眠的青青草》《爱荷华诗抄》《千般是情》等诗集，都印得很精美，他太太告诉我，大陆最近出了她一部诗选，印数相当可观，诗集能有如此发行量，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可见大陆不仅拥有

广大的商业市场，也有一个远远超出于台湾的文化市场。我问他太太，柏杨原名郭衣洞，他为什么会用树名作为自己的笔名？他太太说，大概是有一次郊游，他看到路边的柏杨，心情为之一振，后来就取了这样一个笔名。

我第三次见到柏杨是在一月二十八日，我离开台湾的前夕。柏杨带了一位小姐在来来大饭店的翠园餐厅跟我相见，托我带一些贺年卡、圆珠笔之类的小礼物给他在大陆的友人。柏杨曾于一九八八年十月重返睽别达四十年的祖国大陆，在祥和的气氛中会见了他的亲友。我打听这位小姐是谁。原来是他跟前妻生的女儿佳佳。柏杨当年在狱中经常跟佳佳通信。一九七四年十月四日，柏杨在《青年战士报》第七版看到一张照片：屏东县六岁女孩林月华患血管瘤，露出可怕的病腿在哭。他也忍不住哭了，立即要佳佳送给这位小女孩能力所及的帮助。信中说：“这小女孩就是我心中的小女儿，我能看到她得救，死也瞑目。”一九七六年十一月十六日，柏杨在报上又看到竹东镇大同路七一 巷七号有一个十二岁的小女孩徐佳银，右腿红肿得跟腰一样粗，家产已经用尽。他又写信给佳佳，要她速送徐小妹五百元，作为捐款。”此钱固杯水车薪，但是表示人情温暖和对她的关心，盼能提高她的求生意志”。见到柏杨，又见到了佳佳，我不禁想起了鲁迅在《而已集·小杂感》中的两句话：

创作总根于爱，  
杨朱无书。



## 柏杨和孙观汉

丘惠中

柏杨身陷囹圄，据说在火炉般的斗室，或蹲墙角，或坐地下，膝盖上放着糊成的纸板、渗和汗珠，穷九年狱中生涯，终于逐字完成了三部书稿，即《中国人史纲》、《中国帝王皇后亲王公主世系录》、《中国历史年表》。

出狱后，他曾经用沉重的语气表示：“这三本书，如果付梓出版，第一部我要献给孙观汉先生，中外古今，亘古以来，只此一人。历史上只有一个左拉可以与他相比，但是我觉得他比左拉更伟大更艰苦，他十年如一日，为我付出了眼泪、时间、金钱和尊严。”

柏杨进一步解释：“中国五千年历史中找不出一个可以和孙观汉先生相比的人。左伯桃、羊角哀庙亭血食。管仲、鲍叔牙标榜史册。刘关张的结合成为流传后人最久的佳话。吴汉搓、顾贞观的乌头马角，写下感人肺腑的诗篇。不过，他们原来已都是亲密的朋友。只有在西洋历史上记载一件，那就是法国的左拉。当屈里佛斯被诬以谋反，囚入监狱后，跟他素不相识，在行径上也风马牛不相干的文学家左拉，他发表千古不朽的《我控诉》一文，最后在权势的迫害下，逃亡海外，但他奋斗不懈。跟观汉先生一样，他们不是为了某一个具体的人，而是为了正义、真理、公道、人权。”

柏杨何以如此感恩于孙观汉？而孙观汉又是何许人呢？

原来孙观汉博士是一位旅美的科学教授和研究学者，一九五九年曾受聘回台湾帮助清华大学复校，首任原子研究所所长，并装设第一座原子加速器及原子炉。他曾先后三次回清华大学任客座教授，不是受国际原子署，就是受美国原子委员会聘请。孙博士在美国拥有四十多种专利权，其中超过二十种得到世界专利。他是用闪烁计数测定中子的第一人，也是用陨石粒子测出月球自行发光的第一人。他目前负责西屋公司的原子研究工作，在国际上享有崇高的科学地位。

他与柏杨的友谊始于神交。他最初在美国获得一本柏杨的《怪马集》，马上被他深刻的分析力所吸引。他在给柏杨的第一封信中如此表示其阅读感受：“你的观察、见解和阅世之深刻，你的世界知识之丰富，分析之透彻，思想之大胆勇敢，青年的血性，壮年的成熟，老年少有之精力，真令人佩服。多次阅读你的大作，常不禁拍床拍厕拍沙发而笑，笑而后思，思而后叹，深叹后有时还眼湿！”

他在一九六五年十月即表示若有机会回台，一定要到柏府外徘徊，看看“为什么在这样简陋的破屋内，能产生这样伟大的作者？”而他的确于该年十一月间受公司派往港台一行，可惜却未有机会与柏杨先生见面。

后来，柏杨先生因文字狱被囚绿岛，九年零二十六天，妻离子散，他却日夜为营救柏杨而奔走不懈，这种难得的情怀与精神，使柏杨深深感动。而他如此为一个素未谋面的人伸冤，一方面是对柏杨个人的赏识与爱护，另一方面也是出自一片爱国的热诚。因为他视柏杨为难得的问题分析家，在其锐利眼光的透视下，一切民族劣根性与社会弊病皆无所遁形。他认为国家有这种人材，才能知道改进，整个民族才有前途。可惜当局却并不这么想。这也许就是孙观汉为柏杨一案，对当局颇不谅解的缘故吧。据说，他于柏杨获释后，曾专程回台探问，许多要员想见他，他均避而不见。

柏杨是一九七七年四月一日脱险的，孙观汉则于一九七八年七月二十三日抵达台湾，八月八日返美，前后十七天，天天相聚。而他之所以在柏杨出

狱后一年多才回台，乃是因为他曾要求柏杨到美国相会，但柏杨却无法赴美之故。

孙观汉对柏杨的爱惜与关心是无微不至的。当他听到柏杨在绿岛捡烟屁股的事，他哭了。

一九八二年四月七日吉隆坡《南洋商报》

## 观汉先生旧去来

柏杨

一九七八年七月二十三日。

台北国际机场入口处的门敞开了，一个瘦小的身躯，蹒跚的走出来，迎接他的朋友中，从没有一个人见过他。然而，只凭着照片上的印象，我们飞奔上去，拥抱在一起，悲喜交集的呼唤和热泪，在肩头倾泻，我们不敢相信这不是梦寐。

三年的信件往还，九年零二十六天对我的苦苦营救，他——孙观汉先生，第一句话虽然是含笑说的，但也含着咽噎：“想不到我们今生还能相见。”

他是想不到，过去的日子里，每隔一段时间，海外报纸都刊出我被枪决的消息。每次消息，都使他心如刀割，打越洋电话向台北的梁上元、陈丽真，探询真相。当传言最厉害的时候，他甚至疑心她们在骗他。我更是想不到，因为我虽然幸逃一死，却已被决定葬身绿岛。

然而，一切都不是梦寐。我是去年（一九七七）四月一日突然被释的，又是一年，在他发现我终于无法出国后，他决心自己从美国来台北，看看我和我的一些传奇性的朋友。在他动身前，曾一再嘱咐：“因为时间太短，不要打扰任何人，包括我的阿哥。”所以，没有一个过去相识的老朋友知道他的归来。——名和利，那些芸芸众生所追求的，观汉先生早已视如浮云（这种情操，有人无法理解）。在台北期间，观汉先生只跟行政院院长孙连见了一次面，再跟行政院原子能委员会秘书长郑振华见了两次面。那是因为下飞机时，郑振华恰恰也在飞机场接人，和观汉先生蓦然相遇。

我们把观汉先生安排在中美招待所，后来因冷气不够冷，难耐台北的炎热，我们再把搬到华华饭店。在他逗留台北的十七天中，他的房间一直是我们的聚会所。我们这些人包围着他，无所不谈。从匹兹堡天气太冷，谈到台北交通紊乱。从小说创作，谈到身在德国的虞和芳，跟她正在排印中的选集。从我自称有美妙的歌喉，谈到身在美国的薛俊枝，看她的剧照，听她在加州演唱武家坡的录音带。

分别时，观汉先生跟包围着他的每一个人——跟梁上元谈她以后应不应继续写作，跟刘秀一、张香华，谈她们的诗，结论是任凭她们怎么解释，他仍是故意表示不懂。跟寒爵谈他的杂文。跟罗祖光谈他如何带我的女儿到绿岛看我。跟陈丽真谈她十年来为我所受到的惊恐。跟姚安莉谈她的果蝇，她是病虫害专家。跟杨秀治谈她的梅花绣，又跟她去淡水海滨。又跟谈开元去看了一场京戏。

此外，观汉先生到梁寒操夫人家，吃一顿在国内外都属罕见的烤乳猪。又到吴觉真家吃她亲自烧的菜。又到医院探望卧病在床的史紫忱，史紫忱握住他的手，重复的只说一句：“你是我们心目中的神，你是我们心目中的神。”

我们像一群顽童，有一种无法控制的骄傲。在这世界上，每一个时刻，每一个群众的地方，都有千万人怀盘交错，互相以知己自许。更有千万人若兄若弟，互相誓言是道义之交。然而，有谁能像我们这群男女老幼，孩子般的无猜，孩子般的热情，孩子般的傻气。

大家跟观汉先生之间，辩论、争执、大声吵闹、大声喧哗，也低声的啜泣，互相的慰藉，说些孩子们的话。女孩子为他唱歌，录了好几匣录音带。又为他去市场和电台，搜集古者的歌曲唱片。

我和观汉先生，更有太多的回顾，太多的千言万语，但他却闭口不谈他对我十年如一日，锲而不舍的帮助。当我忍不住辞不达意地表示我的感激，和朋友们忍不住对他的义薄云天流露敬慕时，他只是淡淡地说。

“如果值得纪念的话，那就是，我为柏杨流过太多的眼泪。”

有一次，我向大家轻松地报告我如何在绿岛监狱“放风场”上捺烟屁股时，大家都笑着听，观汉先生却哭了。从此我不再多说那些已不能挽回的往事，包括我残废的右膝——薛俊枝托观汉先生带给我一个小电毯，供阴冷天气酸痛时之用。我把小电毯收起，告诉他已经渐痊。

中国五千年历史中找不出一个可以和观汉先生相比的人。左伯桃，羊角哀庙享血食。管仲、鲍叔牙标榜史册。刘关张的结合成为留传后人最久的佳话。吴汉搓、顾贞观的乌头马角，写下感人肺腑的诗篇。不过，他们原来已都是亲密的朋友。只有在西洋历史上记载一件，那就是法国的左拉。当屈里佛斯被“诬以谋反”，囚入监狱后，跟他素不相识，在行业上也风马牛不相干的文学家左拉，他发表千古不朽的“我控拆”一文，最后在权势的迫害下，逃亡海外，但他奋斗不懈。跟观汉先生一样，他们不是为了某一个具体的人，而是为了正义、真理、公道、人权。

中国人大概因为酱在酱缸里时间太久的缘故，因而很多人缺少明辨是非的实践能力——也就是，我们的社会缺少道德勇气。以致好话说得太多，好文章写得太多，而做得却太少。结果我们的国家和人民，受到长期痛苦的报应。凡是认真追求是非，认真实践理想的人，得到的往往不是鼓励，而是劝告：“不要多管闲事。”甚至还有更大的伤害。观汉先生以一个这么有成就的核子物理学家，却没有被酱缸污染。他孩子般的纯真，择善而固执。固执，是的，九年零二十六天，是一个漫长的日子，他受尽了打击，而热情更高，奋斗更昂。

然而，九年零二十六天悲痛的和愤怒的，以及绝望的心情，观汉先生显出老态。郑振华送他一张他们十年前在维也纳开会时的合影，那时，观汉先生英姿焕发。我愿用我的生命为观汉先生换取青春，但上天无言。面对着照片，我们有无限唏嘘。

不过，我们和左拉、屈里佛斯最大的不同是，屈里佛斯始终无缘跟他的恩人左拉见面，而我却能和观汉先生相晤。观汉先生仍有他的叹息、在一次谈话中，他忽然说了一句英文：

You may be right, but you may be dead right!

这是美国交通部门对驾车人的劝告，我同意这句话，但我不同意前一个 may be，观汉先生懂得我的意思。他说：

You are right, but you may be dead right!

接着又严肃的说。

You are right, but you could be dead right!

是这样的结局吗？我不知道。

观汉先生在台北最后一天，朋友们全体再聚在一起，我为他唱“老黑爵”，那是在监狱中，午饭后或晚饭后，我和同囚的难友们，在火烧般斗室所唱的，当我唱到听见一种声音在呼唤时，我又回到过去悲惨的岁月，泣不成声。

但，无论将来如何，我死而无恨。

十七天，在逐渐增加的离愁中消失。

一九七八年八月八日。

我们送观汉先生返美，仍是十七天前的国际机场、不过换到二楼。直到服务台小姐第三遍催促乘客登机时，我们才放他跨进出境处那个门。女孩子们流泪，男朋友们忍着泪，强露笑容。当他瘦弱的背影完全消失在深处之后，我们沉默的走下楼梯。人潮汹涌，人声嘈杂，而我们这些朋友却感到那么寂寞。忽然间，我有一个冲动，我要呐喊：

“我希望我不是柏杨，我希望我是一个旁观的人。我要哭着唱出赞美他的歌——勇者的画像，道德勇气的化身。”

我们盼望观汉先生明年能再回来，再一次回到他所爱的祖国的国土，再一次看一眼他所爱的朋友——我们只不过是一群小孩

一九七八年九月十日台北《时报周刊》

## 穿山甲人

柏杨

谁都没有想到，恶运的毒手，再伸向人间。四妹！我们——在台湾的你的血族兄弟姐妹关心你，哭着关心你，但我们无能为力。

凡是看过《象人》的读者，对那个可怕的怪物，一定还留下难以消灭的沉重心情。我曾向一位少妇询问她有没有看过这部电影？她说她没有看过，因为她不忍心看。而看过该电影的一些朋友，大多数都失神的表示，如果他们事先知道内容，他们也不会去看，他们唏嘘说：“我们随受不了那种压力——被恶运毒手抓住，无法摆脱的压力。”

《象人》是一个发生在中世纪英国的真实故事，一个男孩一生下来就是畸形，那是一种远超过我们想像力的畸形，面部丑陋得像一只象，嘴唇几乎是以九十度的角度竖立着，右手和双足活像野兽的蹄爪，最使人毛骨耸然的是他身上密布着突起的肉瘤。他被送到马戏团，马戏团团主像对待野兽一样，咒骂他，鞭打他，使他在二十一岁那一年，还不会说话，还没有洗过澡，他被无情的虐待和羞辱毁灭，一生中不知道什么是友情，什么是爱情，只知道恐惧、战栗，只知道阴暗潮湿的囚宠就是他唯一可以暂时喘息的洞穴。直到有一天，好心肠的塔里斯夫医生发现他，肯定他跟你我一样，是一个有血有肉，一切都正常的人。他把这位“象人”接到医院，开始教他说话、读书，使他恢复人类的尊严。然而最后“象人”仍是死了，我们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跟电影一佯，那么安闲镇静地走向死亡。他的病使他只能坐着睡，不能躺下来，电影结尾时，他安详地整理床铺，安详地躺下，银幕上众星向辽远的外太空退去，观众的心情反而平静，仿佛看到幽冥深处，不幸的人终于挣脱恶运毒手。我们庆幸，庆幸往事已矣，再也不会发生。

然而，谁都没有想到，三百年后，恶运的毒手再伸向人间。

今年（一九八二）四月七日，马华公会邀我去吉隆坡作一次讲演，当时在中国时报连载的《金三角·边区·荒城》，还没有完，必须尽快回来赶写续稿。第二天，也就是四月八日，大马作协有个座谈会，我就决定四月九日折返，而就在这时候，《新生活报》社长周宝源先生坚持我多留一天。

“我认为你应该见一个人。”他说。

我告诉他我不得不立即返回台北的理由，但他也告诉我他坚持的理由。

“如果你先看到她照片的话，”他说，“你会为她多留一天的。”

“她是谁？”

《新生活报》总编辑吴仲达先生递给我大约十二寸大的一张照片，我察觉到周围的眼光全都注视着我，似乎等待着一种他们所预期的反应。我有一种不自然的感觉，而后，我全身汗毛倒竖起来，像一只冰凉的利爪把我提向半空。当塔里斯夫医生第一次看到“象人”时，他沉郁的眼睛流下眼泪，而我却如此残忍，我没有流下眼泪，只从内心发出只有我听得见的一种可怕的嘶喊，我把照片慌张地丢到桌上，只感到想吐。不久我就为我这种卑劣的根性羞愧，但我当时却只是想吐。

一个比“象人”更可怖的人呈现在面前。

“女孩吗？”我问。

“是的。”周宝源先生答。

“华人吗？”

“是的。”

“最近才发现的吗？”

“是的。”

“也叫‘象人’吗？”

“不，她叫‘穿山甲人’。”

“象人”的母亲怀孕四个月时，在非洲受到大象的踏踩。“穿山甲人”的母亲彭仙女士，也是怀孕四个月的时候，有同样的遭遇。那是一九四八年的一天，马来西亚联邦森洲淡边村，贫苦的丈夫张秋潭先生正在他那小小的果园耕种，看到了一只穿山甲，他去捉它，它却跑了，跑到山洞里去了，三个男孩闻声赶来，叫闹着，却无计可施。而这时，年才三十九岁的彭仙女士，正挺着大肚子，也来参与这场追捕。于是，就在洞口架起木柴燃烧，希望用烟把它“熏”出来，这样忙了半天，却再也没有看到穿山甲的影子，一家人大失所望地黯然而归。

据熟悉穿山甲习性的猎人说，穿山甲被熏死在山洞里的可能性很小，它们不是笨蛋，绝大多数不是被“熏”出来，就是从洞穴的另一端出口溜掉了。五个月后，彭仙女士分娩，一个可怕的“穿山甲”女孩——就是我所叙述的女主角，呱呱诞生。作母亲的被产婆的骇叫声惊动，等她第一眼看到孩子时，立刻晕厥在产床上，等她苏醒后，抱着孩子，眼泪像雨一样地冲洗着婴儿浑身的鲜甲。她知道她生下的不是一个女孩，而是一个怪物。

怪物的降临，使荒村的中华人和马来人大起骚动，他们认为这是一项不祥的兆头，有些自以为有特别见解的人，一口咬定她就是那个枉死的穿山甲投胎，（他们已肯定它是熏死在洞穴中了），至少是那个枉死的穿山甲的鬼魂，附在胎儿身上。有一半真实事实的谣言是最恶毒的，全村被穿山甲丑陋的形象攫住。“它是为复仇而来！”大家立刻陷入惊恐，复仇的对象第一个是张家夫妇，第二个可能祸延全村。他们中了魔一样，要求张家把怪物交出来，声称他们并没有恶意，而仅是希望开开眼界罢啦。张秋潭夫妇当然明白一旦交出孩子的后果，于是“穿山甲人”失踪了，死了，作父母的把她藏匿在家里一个斗室中，那是一个跟“象人”居住同样小的房间，孩子——父母为她命名张四妹，从呱呱坠地那天开始，便这样被囚禁。跟“象人”唯一不同的是，“象人”遭受的是马戏团团主凶狠的鞭打，而“穿山甲人”，她仍是哭尽了眼泪的爹娘保护之下的骨肉。然而，不管基于什么原因，一种现象是相同的，她和人世隔绝，张家是一个穷苦的农人。啊，为什么悲惨的事，总是发生在穷苦人身上？父母眼睁睁看着长相可怖的娇女，孤独地躲在阴暗墙角，这一生注定她永不能看到天日，而最无可奈何的是，他们不知道孩子患的是什么病，假定有钱，他们可送她到吉隆坡、甚至可送她到伦敦求医，可是，他们太穷了，连请医生来家诊断的费用都没有。更因为穷，没有保护孩子的力量，他们在村人们面前提一句都不敢。

一度，做母亲的想把孩子送到“姑娘堂”，当她把孩子的衣服穿起来，姑娘堂派的人抱在怀里，正要跨出家门时，做父亲的张秋潭先生恰好从外面回来，迎面相对，他把孩子夺回。

“女儿，”他哭说，“你满身鳞甲，为父的对不起你，我要养你到老，养你到死。”

然而，做父亲的却在女儿十岁的时候，与世长辞，据他妻子彭仙女士说，他死得十分痛苦，他望着匍匐在床前，活像一个蜷卧的穿山甲的娇女，从他

那不断增加浓痰的喉中，不停地喊叫：

“儿啊，儿啊，你跟爹一块死吧，一块死吧，留下你，我死不瞑目。”

严密的藏匿虽然使村人们不再探询，可是，死了的怪物尸体在那里？大家仍抱着疑虑。不久，一个马戏团团主光临，要用重价购买。

“重价？”我问“多少叻币？”

“当时大概折合一百两黄金。”周宝源先生答。

这是一笔足以使人丧失天良的巨款，做母亲的虽没有看见过“象人”，但她知道一旦进入马戏团，惨绝人寰的女儿，将更惨绝人寰。她一口拒绝，理由很简单，她告诉马戏团团主，怪物确实已经死了。年仅十岁的张四妹，她匍匐在小室地板上窃听，她的年龄和长久的关闭，并不知道什么是马戏团，什么是黄金，但她知道她没有被卖掉，她想哭，可是她哭不出来。她激动地用可怕的变了形的前额，撞击地板，感激亲娘。

张四妹女士，这样的关闭了三十五年。三十五年，漫长而凄凉的岁月，她比“象人”幸运，亲娘给她买了一架简陋的收音机，是她唯一跟人世交通的单行管道，她从收音机的华语广播中，吸收知识，也艰辛地学习华文。“象人”还有医生作他的教师，“穿山甲人”张四妹女士，却全靠自己苦苦自修，最后，她终于能用华文写出流畅的信。

——多么可悲的讽刺，被父母宝贝的优秀青年大学生、高中生们，看他们写信时的困难情形，张四妹女士的信使我们震动。我把她的信——写给“凤鸣”“鸣妹”（她们是一个人）——附录在本文之后。张四妹女士是这么善良、孤寂、无奈。但她对天对地、对蹂躏她的恶运毒手，没有抱怨。

三十五年日子，在隐秘中过去，村人们和全世界都把这个怪物忘了，而怪物并没有忘记自己，她除了苦苦自修华文外，还在夜深时分，当人们都入梦乡，她悄悄地走出她的囚房，悄悄的离开家，去村外为她穷苦的母亲拾柴、去她家的唯一果园，看守果树。时间一久，跟“象人”初在医院中出现的场景一样，做母亲的用布把她的头部完全包裹起来，只露出两只赤红眼睛——在阔大的草笠下，没有人会注意她那双一生都不能合起来的赤红眼睛。然后，在早上行人尚稀的时候，她到果园，直到万家灯火，黄昏来临，再躲躲闪闪地回家。

除了深知她的一二知友，像被称为“鸣妹”的女孩，这就是张四妹女士的全部世界，孤苦的世界。在信上，我们可看出她的哀伤，她说：“我是只标准的大蛇。”而事实上她却比大蛇可怖。幽闭的生涯在今年（一九八二）三月，也就是我前往吉隆坡讲演的前一个月，才被外界发现，那是三月的一天，两个华人经过张家果园时，神差鬼使，张四妹女士的面幕忽然脱落，两人同时发出被活剥头皮时那种惨叫，飞奔逃走。三十年前的旧事像噩梦一样，再回到人间。所好的是，人们心智的成长和知识的提高，已没有人再坚持她是为复仇而来的穿山甲鬼魂投胎，虽然没有人敢和张四妹女士面对，但大家已在充满同情心下，容许她存在。

这正是《新生活报》社长周宝源先生坚持我多停留一天的原因，让我看一看和我们拥有共同血缘的，可怜的龙女！

我无法形容张四妹女士的形象，一定要我形容的话，我同意森洲淡边村村民的称呼：“穿山甲人”。我们如何可以想象一只“人立”的穿山甲，便可想象“人立”的张四妹女士。《新生活报》记者仙梨先生严厉地反对使用“穿山甲”，他用张四妹女士的口吻呼喊：“我不是穿山甲，请不要嘲弄我！”



我决不是嘲弄，上天可鉴此心，但“穿山甲”是一个最好的形容，一个“人立”的穿山甲，跟“象人”一样，是一个“穿山甲人”，她头发全无，光秃的头顶，双眼几乎呈五十度角度的向上吊起，鼻子塌陷，嘴唇突出，牙齿像坟岗上凌乱残破的墓碑。而其中一个门牙，却跟大象的牙一样，冲破尖耸的嘴唇。然而，使我们发抖的还不是这些，而是她满身鳞甲。严格地说，那不像穿山甲的鳞甲，却像鱼的鳞片、鳞甲不断脱落、也不断有新鳞甲生出来、一直无穷无尽地循环。当新生鳞甲长出，旧鳞甲不能及时自动脱落时，便奇痒难支，必须立刻把旧鳞甲片片地从身上拔掉——像古时遭受剥皮酷刑的苦囚、她无法拯救自己。

据说、她现在已进入仙境，只要拔下，当淌下血来时，她还可得到片刻宁静，而在前几年，她却整天都要泡在水里，才能防止鳞甲间肌肤寸寸龟裂。

但是，最恐怖的还是她的眼睛，“象人”虽然不能躺下来睡，却能坐着睡，读者先生还能记得，当他在幕终躺下来时，他缓缓的闭下眼睑。张四妹女士会羡慕“象人”，她宁愿那样的安静而去，她这一生不知道“闭眼”是什么，因为她没有眼睑。三十五年来，她一直像一条鱼一样，两眼圆圆的瞪在那里，眼眶像一根烧红了的火炙铁圈。读者先生看美国西部片时，定还记得恶棍们的毒刑，把英雄美女，仰面绑在沙漠上，用火柴梗支开他们的眼皮，当太阳渐渐升空时，眼球中的水份也渐渐蒸发，终于干涸，只剩下两个黑洞。而张四妹女士，她已受了三十五年的这种毒刑。没有人知道张女士患的是什么病。

塔里斯夫医生给“象人”诊断的结果是，认为他害的是“神经纤维炎”。

《新生活报》曾邀请吉隆坡皮肤科专家陈胜尧医生前往淡边村给张四妹诊断，他初步判走，她患的是一种“先天性的鱼鳞癣”。诊断书上说：“这种病症是皮肤外层的一种畸形发展，由于全身皮肤毛孔组织构造殊异，以致表皮紧紧拉缩，影响到整个面部器官的正常发育。”

陈胜尧医生说：

“这种‘鱼鳞癣’使皮肤有更强烈的新陈代谢作用，每逢风沙一吹，或气候燥热时，它就发出奇痒，非常难过，接着是干裂脱落，取而代之的是另一层新的鳞甲。”

陈医生说：

“‘鱼鳞癣’并不是罕见的怪症，我国（马来西亚联邦）患这种病的人很多，只不过都限局部，当然，都比张四妹轻得多。”

可怕的严重畸形，“象人”“穿山甲人”，在医学上的病称，却是如此的平淡无奇。可能是它太平淡了，“象人”和“穿山甲人”的医生们，都有一个悲观的结论：无药可治。

张四妹女士在黑暗中看到了明灯，当陈胜尧医生为她检查时，她兴奋得浑身发抖，这是她第一次就医，鱼样的眼睛中透着自信她会得救的感激光芒。可是，当她得知无药可治时，她颓然地躺下来，无力地望着她的亲娘，自言自语说：“我是天谴，我是天谴！”使我心头滴下血来：“是天谴吗？是天谴吗？”

陈胜尧医生留下一段希望的话，他说，唯一的办法是治标，尝试着使用一些药膏，使她的皮肤能变得比较嫩滑，也用以加强鳞甲的抗热力。然而，即令这些治标的处方，也是次要的，陈胜尧医生认为，严重的是张四妹女士的眼睛。眼睛有改进的可能性，必须先使她能合住双目。如果再不抢救，会

恶化下去，等她过了四十岁，进入中年之后，生命力开始走下坡，她将双目全盲。没有一个人不断地用眼球——那在美女身上，被称为水汪汪的秋波，能和光线接触四十年之久而不休息。

到那时，张四妹女士可怖的鳞甲脸上，将出现两个黑洞。

“我不是眼科，”陈医生说，“但在上下眼睑动手术，使肌肉松懈。在理论上应该成立。”

可是，那要她去吉隆坡求医，而张家是个穷苦的华人农家，负担不起昂贵的费用，如果父母是一个有钱的人，恐怕会带着女儿，走遍世界。可是，贫贱、穷苦，父亲已逝，做母亲的彭仙女士，这位今年已七十四岁，靠着一个小小果园和拣柴为生的老寡妇，呆呆的凝望，她唯一可做的，是她思虑她离开这世界之后，她女儿更加孤苦。

我离开吉隆坡时，留下一点微不足道的钱，请《新生活报》社长周宝源先生转交给她，不要告诉她我的名字，只告诉她来自台湾的一个同为中华人的骨肉之情。然而，我内心充满了惭愧，惭愧我软弱无力。英国女王维多利亚女士，曾自伦敦医院，用诏书表达她的感谢，因为该医院“收容了一个最可怜的英国子民”。我只是一个渺小的作者，但我愿跪下来，感谢有人能：“拯救一个最可怜的中华女儿。”我们这一生中所受的苦，又算什么。

四妹、我恨我不如“象人”里的康夫人，我没有吻你的面颊，但我吻你的心——求求你，不要认为我撒谎，事实上我是像逃避刑场一样，尽快逃回台北。一回台北，决定立刻把你介绍给你在台湾的同胞，可是，每一提笔，我都感到一阵一阵的战栗。当我向朋友谈及你时，我也不能终辞。我希望忘掉你，但我不能。

四妹，我们像兄妹般，你使我挂心，也使你在台湾的血族兄弟姐妹挂心。愿吉隆坡朋友们能传来你终于住进眼科医院的消息，和终于能够合眼的消息。

附录

张四妹写给朋友凤鸣的信之一

凤鸣：

你好！来信，我于上星期二收到，是在晚饭前收到的，收到你的信，又高兴，而又意外，我以为你功课忙，要迟些时候才能收到你的信，却没想到这么快又接到你的信，你说我可以不高兴吗？你一定觉得奇怪，为什么我会在傍晚才收到你的信，你希望知道吗？你问我的近况如何，好，现在我就告诉你吧，在三月间，有段时间，我由早上去农场，却到傍晚六点多才回家，你知道为什么吗，是为了要长芒果，由于我本来每天中午都是回家吃午饭的，由于这样的缘故，因此便有些不大也不小的小鬼头去采我们的果子，被人采掉倒不要紧，不是值很多钱的果子，但半生不熟就把它采去实在觉得可惜，所以我便要每天上午八点或九点左右便收拾些菜饭去那里，到傍晚才回家，后来芒果收完了，也就暂时不用去，只是早上去中午回，下午玩到三四点钟才去呢，懒够了吧，最近农场其中有一棵榴 结了百多粒，将近要熟之时，又有人去树上采，唉！又要去看守 ，真倒霉，好啦，没法子只好去 ，所以呢，我从十四号那天开始又去，是白天去。晚上却由我三兄去守，现在又差不多将要采完了，等榴 采完之后，我就不必去了，对了，凤鸣，你是否想知道我在那儿中午做些什么吗？嘿嘿，你知道的 ，我是只标准的大蛇，懒透了，还早的时候呢，便去东跑跑西跑跑，喜欢嘛，就拿着一把锄头跑跑，

有时候就拿些塑胶袋，栽些不三不四的花草树木，就这样又将近中午了，中午的太阳好强哦，真是难顶，实在受不了，所以中午我可不敢跑出去，一直躲到下午四五点才出去，摸摸这样那样，等一会儿又太阳西斜落山了，又是收拾东西回家，冲凉，瞧瞧我种的那些宝贝花，我真糊涂，谈谈，就谈到家里来了。我忘了讲给你听，中午十点多我便开始透火（生火），我有小炭炉在那儿，可以用来蒸冷饭菜食，一边听故事一边看火，等故事讲完饭也蒸熟了，关去收音机打算食（吃）饭，饭后呢，便去榴 树附近那间屋子偷懒，有时候还有榴 好拾呢，凤鸣，可惜我与你相隔两地这么远，不然我可以送粒香榴 （给）你食（吃），我淡了这么多，你听到会烦吗，真对不起，请你原谅，同时也请原谅我到今日才回信，这封信的起稿我还是在农场起的呢，晚饭后才抄稿，因为我知识太差，因此每次写信我必定先起稿，然后才抄稿。好了，接下来谈谈你的吧，好，那票我会寄去给你，你说要稻草，往哪儿去找呢，现在我们想找一稻草都相当困难呢，因为现在很少人种稻，也许多试几次，说不定会成功，凤鸣，我很抱歉，关于你所说的生物实验，我不很明白，你能否解释一下，如果你觉得问题复杂，在信上难解释的话，那么就等到有机会晤面时再解释好了，虽然我无机会念书，但我却时常听到侄女她们说念高中课程很难，而且问题又复杂，我真佩服你们读书人，如换到我这只笨猪来的话，说不定先生部会给气跑掉呢。你们真本事，天天要应付这么多功课，而且还说要什么做生物实验，为了自己将来的前途与需要，无奈要求上进，你还需要念几年才能完成高中课程呢，修完高中以后又有何打算，能否告诉我，现又淡回淑芳之事，好的，等我见到淑芳，一定向她解释，你放心吧，你有收过她的信吗？而你又有没寄过信给她呢？我见意（建议）如果收过她的信，而你又曾经寄信给她的话，你最好再次寄信向她解释一下比较好，你说对吗？她是个过来人，绝不会误会你的，对了，凤鸣，婆婆她老人家近来好吗？请代问候一声好吗？千万别忘了告知我关于婆婆的近况啊，如果她问起我母亲回国之事，你就说还未批准。

好了，改日再谈吧。

祝

前程无限生活愉快

学业进步身体健康

张四妹写给朋友凤鸣的信之二

鸣妹：

你好，你的采信和一张美丽的写生照片，我于上月 26 号接到了，拖至今日才给你回，真抱歉，你不会见怪我。时间过得真快，不知不觉之间，一九八二年又匆匆来临了，特此顺便寄了一张小贺卡给你，望你会喜欢它。我希望这张小卡片能把幸福和快乐带给你，我会永远为你祝福，祝你新年进步、学业进步、事事如意，光阴似箭，你我相识已有两年多的时间了。你我的这段偶然建立的友情，能维持的长久，友谊永固、永不分散，你我相隔虽遥远，望你我心相连，隔别一方长相忆，好了，以下有问题问问你：你家是不是接近金河矿场或者你念书的学校是靠近金河矿场？我这样问你是有原因的，我有个堂弟在吉隆坡工作，我曾向他提起过你，他非常希望有机会认识你，他曾经问过我，你是否住在金河矿场附近，假如有机会，而你又愿意的话、他希望到府上拜访你，我堂弟是个很喜欢开玩笑的人，高高瘦瘦，他是个做家具那类工作的。鸣，你有哥哥吗？我有个建议，不知道你是否愿意接受，我

希望你认我这位堂弟为义弟，你有意见否？鸣，你问到关于澳洲电台广播的问题，我愿告诉你，不过我是个很笨的人，我怕我告诉你的，你无法了解我的意思，首先要看你的收音机是否有短波，假如有短波，便可以收听到澳洲电台的广播，澳洲电台的广播时间，是本地下午六点半开始，相信你也知道最近马来西亚的时间拨快了半小时，所以澳洲电台的广播时间，是从下午六时半开始。节目分为两组，那就是分为广东话和华语，华语节目，第一段是下午六点半开始，直到晚上八时整暂止。八点整是广东话节目第一段开始。直到晚上九点整暂止。跟着便是二段华语节目，到晚上十点半止。跟着便是最后一段广东话节目。鸣，你是否常常收听广播节目？马来西亚电台的广播你有收听吗？假如有，我可以这样告诉你，希望你听得明白，我的意思，每当你收听马来西亚的节目时，比如星期日早上的节目来讲，当你收听完早上六点半开始直到早上九点整止的这段节目之后，而跟着又能接着收听到周日听众点唱这个节目的话，那你的收音机便是有短波的波段了，这样便可以收听到澳洲电台的节目了。好了，就此停笔。

（八二年一月十一号）  
姊四妹字

褻瀆君王的柏楊

——一九八四·一·三·紐約《華語快報》

问：你在狱中的日子是怎样度过的？对你来说，最难受的事是什么？

答：开始和结束时最难受。开始时，我还以为这是一场误会，他们可能做事太积极、逮捕错了人。很久之后，我才顿然领悟，这是最高当局要重重惩罚我的思想过于独立。当时，我极怕从此烟灭，尤其审问时所用的刑求十分可怕。他们不断拷打我、折磨我，迫使我供出我不曾犯过的罪，后来我的腿被打断了，他们送我入医院，在那里，我受到不错的待遇，因此，我又开始怀着希望。我对自己说：“既然他们要医治我，那就是说明他们要保留我的性命。”当我获悉我的判决时，即大大的松了一口气。在狱中，我很快便适应生活，习惯被隔离、习惯各种的缺乏、习惯饥饿等等。

问：入狱后他们有没有继续审问你？你有没有被迫向狱吏表白你的“坏思想”，被迫经常作“自我批评”？

答：没有。在台湾，一旦刑期被宣判后，犯人便得到某种安宁。判刑后不久就移送监狱，在监狱里，原则上，他们不会再折磨你。不过，我服刑期满后，却重新体验到恐惧。虽然我从狱中被释放出来，但他们却立刻把我软禁在绿岛。在软禁期间，我一度完全放弃重获自由的希望，那时候的生活的确可怕。我甚至没有可谈话的对象，每天都在等待、焦虑中度过。最后，我还是走出来了，这得感谢美国卡特政府及他的人权政策。

问：短篇小说和讽刺性杂文，在你作品中占有重要的位置。你对这两种表现形式，是否有特别的偏好？

答：没有。但读者较喜欢后种形式的作品。我想以我感兴趣的主题而言——如嘲讽人性的愚蠢、自大和虚伪，杂文的形式可能较更适合。短篇小说以篇幅短小取胜，所以重要的意思要直截了当地写出来，不能赘述多余的细节或微妙的心理状况，这类描述可能把某个人物的复杂性格衬托得更完满，但最后却把重要的主题在次要角色的描述中淡化了。

问：最近你正在把一位十一世纪史学家司马光的作品（《资治通鉴》）译成现代中文，这是否代表你作家事业的转折点？

答：我至今仍不太清楚，可能是。可能我不会再写小说或杂文。自我入狱后，我对历史的兴趣增加了许多。我觉得历史著作并不是次要的文学类别。同时我觉得，在中国，历史该担当非常重要的角色，年轻一代正面对着文化脱离的危险，他们应重新发现文化的重要性，及经典作品中的人文精神。当然，他们也应该知道古代中国统治阶层是如何的腐败。

古代作品中、有许多是很了不起的，但是，对大部份的人来说，文言文太困难了，他们看不懂，所以，我决定把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译成现代语文。这本史书上起公元前四三年，下迄公元九五九年。翻译也是一种创作，翻译司马光的作品，乐趣绝不亚于我写自己的杂文。

问：你某些反西方主义，是否启发自这种“文化脱离”的现象？

答：我绝对不是一个反西方主义者，我只是反对那些暴发户赶时髦式的亲美。这种人在台湾十分多。那不等于说凡进入台湾的西方道德及文化价值，都应该被摒除。

台湾和其他东南亚国家从美国输入的、只是人家的“低级文化”。你们只要翻开报纸看看，现在台北戏院上映的美国片，尤其那些场场爆满的影片，便了解我的意思，这些都只是乙级电影，我们并不需要接受这种文化。

问：你目前生活状况如何？他们会不会再找你麻烦？

答：希望不会。我出狱后，就被指定到中国大陆问题研究中心当研究员。我对大陆其实一无所知，但是，他们给我这份工作，是为“补偿”过去对我不公平的待遇。我每星期只上班一天，去看看大陆报纸。其余的时间，我都躲在家中，写我喜欢的东西，他们让我安静地过活。我有国民党的朋友，也有党外的朋友，对此，别人无话可说。最近数年，台湾的风气着实变了不少，当然，我说的是往好的一面。

（原载一九八四·六·八·巴黎《Le Monde》报）

## 正视中国人的居住情结

——一九八六·六·台北《摩登家庭杂志》

丘慧薇

拜读过柏杨先生大作的人，必会为其字字珠现、掷地有声的文章拍案叫绝，我们更为其语含哲理、玄机、铿锵有力的罡气与智慧，感叹折服。这样一位从五十年代即活跃于文坛，迄今已八十年代，仍虎虎生风的“老前辈”，他悲天悯人、忧国忧民的胸怀，确实可令时下一般只重感官刺激、浮面娱乐的年轻人作为借镜，六十好几，将届七十之龄的“柏老”、如今仍热心不减，视生命为重责，视写作为使命。

新店的“花园新城”是台北南郊一处论空气、论环境，都极为舒适的住宅区，柏杨先生和多位文坛名士都居住于此，在地灵人杰、环境优雅、人文荟萃等诸多条件的配合下，可想而知，柏杨先生对“居住环境”此一关乎民众养息的问题，必有其独到精辟的见解。

上述两段所言，即是我们邀请柏杨先生从百忙中抽空接受访谈的主因。

与中国自有历史以来所记载的，有关平民居住情形相比，柏杨认为“我们现在住的是天堂”。在我们的印象里面，中国的建筑都是金碧辉煌、造型典雅，不是琉璃瓦，便是朱门深院、具有宝蓝，金黄、朱红等象征性的建筑色彩，殊不知，如果把这些概略的了解，运用到对中国平民住宅的认识上，是会有很大的偏颇。研究历史，并将其史观运用到小说杂文……，甚至手边正在着手翻译成白话的《资治通鉴》的柏杨先生告诉我们，其实像台湾的国父纪念馆等建筑宏伟、气宇轩昂的中国风味浓厚的代表性建筑物，更甚而如中国大陆北京的紫禁城等等，它们虽代表着中国五千年悠远深长的文化，象征着泱泱大国的气度和风范，但是，它们却不是中国平民所能居住的，它们和中国人民的居住形式和生活机能、习惯，相距十万八千里，如果我们要了解真正中国人的居住环境形态，必须撇开这种“官邸”人家的住宅模式。

我们知道，中国固然有其优美的传统文化，也有过盛世太平，也有过丰功伟绩，人民曾经丰衣足食，不愁吃穿，但是，曾几何时，“中国人从九、十世纪便开始衰退了，到了十七、十八世纪，欧美文化像一道洪流一般，挡也挡不住地冲将进来，很明显地，我们被欧美的强势文化征服。”柏杨分析说。“弱肉强食”是动物环境里非常自然的现象，将之比喻在文化与文化的抗衡、冲击、国与国的敌对、兼容并蓄，应该颇为恰当贴切。由于这样的冲击，再加上中国连年战乱，每更换一个朝代，就必有一次重大的烽火连天，使得人民居无定处，饥饿穷苦。在这样贫乏的生存条件下，中国的民间建筑，根本不能表现出原有的堂堂大气。柏杨说：“中国文化虽然悠远，但衰弱了，一个民族、家庭，或一个人穷苦久了，便会愚昧无知，这是很自然的现象。中国有几年没有战乱？旱灾的打击面尤其强，因此，我们的文化层面只好定位在求生存上，有钱人的生活层面只能提高到吃得好一点，但是对于穷苦的平民来讲，他们却无能无闲追求音乐、图画等精神享受，更遑论及居住空间的讲究。”

对于“阳宅风水”等论调，柏杨先生颇不以为然，他认为中国人没有安全感，愈是有钱的人愈没有安全感、没有自信、没有自尊。其言下之意，指的是中国人藉“阳宅风水论”来作自慰，求得生活、精神的保障。他说：“从



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只要你觉得住得舒服，那么就是好风水，如果你不舒服，就不是好风水。”我们的心理作祟因素，经常因此牵绊我们的生活习惯、形态，久而久之，约定俗成，变成一种习惯、信仰，其力量已经深植在大部分旧时代人们心中，它的正面意义是什么？负面的影响又是什么呢？这恐怕不是我们所能断言确定的。

柏杨举一个例子，他说明胡适先生曾经是倡导维新运动的支持者，但是到了自己的母亲仙逝，驾鹤西归，他却面对“披麻戴孝”的挑战，内心挣扎，不知该如何是好。这个例子恰可说明中国人对一些文化、旧风俗的心理根结。

如何改进我们居住问题里的缺点呢？柏杨认为我们必须接受这个时代好的、光明的一切，他说日本人对于原有文化精髓，能够保持的非常好，为什么我们不能呢？他说：“缺点就是缺点，千万不要避讳。现在只有接受西方好的东西，保留自己好的东西，才能进步。”

通鉴缘·柏杨与小读者林卓汉对谈  
——一九八六·七·二·台北《自由日报》

杨文娟

有一个不平常的聚会，在台北总督餐厅里进行，六十七岁的作家柏杨，跟年只十岁，目前就读台北市景美国小四年级的小读者林卓汉对谈。

那一天是一九八六年三月二日，林卓汉在爸妈及姐姐的陪伴下出现，他不断地以童稚的赧然一笑来掩饰他会见心目中大人物时因喜悦而产生的紧张。伶俐可爱的卓汉，是一个很容易害羞的小男生——额前覆着一片刘海，清亮的双眸闪着慧黠，大概很少人想象得到，他是目前柏杨版《资治通鉴》读者里，年纪最小的一位吧！

“叫柏爷爷呀！”卓汉的爸妈提醒孩子注意礼貌，不料，话才刚说完，柏杨却接口说：

“叫我柏杨好了！”

卓汉张着嘴，视线游移在爸妈和柏杨之间，心里暗暗地盘算着，该听谁的呢？他很想就像在家里那样，直呼柏杨。可是对一个中国孩子来说，却又觉得当面称呼长辈名字，是一件不礼貌而且十分尴尬的事。从卓汉无所适从的神情中，他的妈妈明了儿子的心事，于是出面解围，说：

“柏杨也好、柏杨先生也好、柏杨爷爷也好，你自己决定。”

“柏爷爷！”卓汉闪了闪他的眼睫毛，似乎几经考虑后，才脱口而出。

“卓汉你好！”柏杨兴奋地说，“我刚才要你直接称呼我的名字，可不是故意为难你或试探你的哟！而是我觉得中国人的称谓实在太多了。”

“怎么多呢？我不懂。”卓汉满脸疑惑，希望能听到更清楚的解释。

“像西方人，是直接称呼某某先生、某某女士，表现的是一种平等的意识。中国人就不是这样了，称呼人总不忘记把最好听的职称、官衔，加在名字上面，你看《通鉴》上是不是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卓汉点点头表示同意。而柏杨转过头对卓汉的爸妈继续说：

“一个朋友告诉我，她父母在世的时候，有客人来，父母就教她喊张伯伯、李阿姨的，后来父母过世，她从美国回来，想探望张伯伯和李阿姨，却不知张伯伯和李阿姨叫什么名字，所以她现在一定让她的孩子连名带姓的喊她的朋友，以免重蹈覆辙。她让她的孩子就叫我柏杨。”

“这倒是挺有道理的，值得学习。”林妈妈赞成这个建议，然后笑着说：“卓汉在家看书，有时看到一半，就会跑来跟我说，妈，柏杨说怎么怎么。在我们家呀，最常听见的，就是‘柏杨说’，反倒不是我们这二位‘老师’说了！”

原来卓汉的爸妈都在大学教书。妈妈赖芳伶女士更因为学校远的关系，一星期中有一半时间在台北，一半时间在台中，基于这个原因，使卓汉对姐姐有一份特别的依赖。平常妈妈不在家的时候，姐姐就像一个小母亲一样地照顾他，并且时常带他上市立图书馆的儿童阅览室借书。席间，有个有趣的现象不断重复，每当卓汉发表意见时，总会习惯性的先看看姐姐，然后再回答问题，似乎也在征询姐姐的意见。而当卓汉跟姐姐说不懂怎样使用刀叉，姐姐立刻拿起刀叉示范，逐步的教他，姐弟之情表露无遗。

在三年级要升四年级的暑假，卓汉和姐姐，在妈妈书架上，随手翻到一本《大分裂》，书前精致动人的图片，使卓汉爱不释手，由图片而文字，自

此遂与《通鉴》结缘，奠下这次老少会的基因。

通常，十岁左右的小朋友，正是活泼得像一匹小马，一刻也静不下来的年龄。除了上课，跳房子、骑马背、打弹珠、玩躲避球、一二三木头人……一长串的游戏，加上偶尔地看看连环漫画或童话故事书，便是他们生活的全貌。个性安静的卓汉独独不然，却在历史的领域里，心满意足。不论是纷乱的战国，错杂的楚汉相争，骨肉间互见血腥的八王之乱，或是肥水战役，一个个真实的故事，令他入迷。国君的号今天下，两个厮杀的莽莽大军，不断自他脑际升起。广宽的历史空间，传神的人物描绘，历代风云就像一幕幕说不完、道不尽的好戏，诱使卓汉无需爸妈的催逼，就能一册册忘我地看下去。

每读完一册，卓汉小脑袋里的疑问总有一火车，常常在脑中盘旋的是一个挥之不去的“为什么”。在家里，他的爸妈是最好的解答者，当卓汉提出“为什么”的时候，爸妈会放下手边的工作，陪他一起寻找答案。但，世上没有全能的老师，也没有全能的父母。在遍翻群书，仍觉束手无策的时候，他们往往采取将问题暂时搁置的方法，等待来日有机会请教专家，或是自己哪一天豁然解。无形中，这个高贵的家庭，比别的家庭更蕴含一份书香的温馨。不过卓汉仍感觉遗憾，因为很少有同学能与他一同分享这份追寻“为什么”的快乐。每当池跟同学提起有《通鉴》这部书时，真的是很难激起他们的兴趣。大多数同学的反应，是一副奇异的表情，有的甚至还告诉他：“老师上课没有教，考试山不考，忙不懂部没有关系的啦！”所以在学校里，尽管他是老师、同学眼中品学兼优的好班长。但是，他仍然觉得寂寞。

面对这样一位小读者，柏杨对卓汉阅读《通鉴》的情形，十分兴奋和开心，很想知道他究竟有那些与众不同的地方。于是柏杨开始像对一个大人似的，询问他的意见。

“在《通鉴》里，印象最深的是什么？”柏杨问。

卓汉回答：“战争。”

当柏杨再问对哪次战争印象最深刻时，卓汉因太紧张久久呆在那里，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才好。这时妈妈亲切地对他说：“卓汉，不要紧的，这不是考试呀！你知道什么就说什么嘛！”经妈妈提醒后，卓汉紧张的心情才慢慢舒展开来，定了定心思，娓娓的说：

“肥水之战。因为前秦苻坚率领八十万大军，却被晋国用很少的兵力打败。”柏杨听了之后点点头，笑着说：

“听你爸爸说，你有很多问题要问我啊，是不是？”

羞涩的卓汉，提起勇气，问：“是不是所有的战争，都是为了和平？”

柏杨对一个孩子在一开始便提出这么大的问题来问，感到吃惊，稍微停顿了一会儿才说：

“并不是每一个战争都是为了和平。战争的原因有很多，譬如说，为了保护自己，为了争夺权势，为了扩展自己的领土等等。等你长大了，你会发现有很多事情，就跟战争一样，发生的原因并不简单。到那时候，你就要学会判断，判断在许多的理由当中，哪一个是真正的理由！”柏杨看卓汉对他所说的话，频频点头，就更高兴了起来。

在孩子的评价里，戏中的人物是没有中立派的，非善即恶，所以，往往戏一上演，孩子们一定拉着大人问：“他是好人还是坏人？”对《通鉴》里的众多人物，卓汉也挑选出他最觉得敬佩及讨厌的人物。

“最敬佩王猛，最讨厌桓玄。”他毫不犹豫地说，“王猛是个大政治家，

一下子就把前秦治理得很好。桓玄却是个贪心不足的人，晋国已经给他那么多财产跟那么高的官了，他还不满足，一心想篡位。”

柏杨再问卓汉对项羽有什么意见。只听卓汉说：“不喜欢项羽，因为项羽常欺压人民，像一个恶霸一样，而且也不听别人的劝告，对人又骄傲得很。”

柏杨又问他对秦始皇有什么看法？而这时的卓汉却说出一个惊人的回答，他说：

“我不认为秦始皇会像书中说得那么坏，我赞成柏爷爷说的，秦始皇有统一中国的功劳。真正让我觉得印象不好的是嬴胡亥。他继位之后，一直没停止焚书坑儒的坏事，而且秦国在他手里没多久就灭亡了。”

柏杨不知怎么的，忽然问了一个很深的问题：“你觉得在魏、蜀、吴三国之中，哪一国才是正统？”

在卓汉说完“当然是蜀汉”之后，柏杨适时补充了一点：

“其实，在司马光所作的《资治通鉴》里，是以曹魏作为正统的，他之所以这么做，完全是为了方便年号的行使，使年号能够不断地延续下去……”

卓汉的妈妈怜爱地看着他的儿子说：“卓汉与常人最不同的地方，就在于别人觉得混乱、头痛的年代，他却最感兴趣。对匈奴的生活习俗尤其好奇。”这使柏杨联想到一个问题来问问卓汉：

“你有没有算一算五胡乱华的时候，总共有多少国家？”

卓汉想都不想，以肯定的语气回答，“十九国。”

柏杨得意的笑着说：“不错，不错！有不少人因为书上写五胡十六国，就误以为真的是十六国，这真是尽信书不如无书。直到现在我还不明白，为什么实际上是十九国，却会被说成十六国。难道连算都算不好吗？我本来以为只有我的数学不好，没想到还有比我更不好的！”

“柏爷爷，有一个问题我一直不明白，就是为什么每次中国的外患都来自北方？是因为北方不好吗？”卓汉仰着他的小脸问。

“北方太穷太苦，”柏杨伤感地说：“我从小就生长在北方，现在又来到南方，我能确切的了解南方经常受到骚扰的原因。这个原因就是，北方没有南方的富庶，没有南方温暖宜人的气候，也没有南方可口香甜的稻米。越往北气候越冷，冰天雪地的，生活十分艰难，所以北方民族只有南侵，因为只有南侵才有可能出现一线生机。”柏杨说着说着，兴之所至，蓦然回头和卓汉的爸爸闲聊上二句，差点遗忘坐在他身旁的卓汉，不过一经旁人提醒后，诚挚的笑意和抱歉连连，立刻堆满脸上。

柏杨继续说，“不论是北方民族或北方人，最大的威胁就是饥饿。”

“吃不饱吗？”卓汉问。

“对的，很多时候是为了吃不饱而打仗。打起仗来，因为粮食少，也打得很特别。”柏杨说。

“怎么个特别法？”卓汉又问。

“不久你就可以从《通鉴》上看到辽国的作战，他们在出征前，通常只带足够攻破一个据点的粮食。”柏杨说。

卓汉等柏杨一说完，就紧接着问：“他们为什么不肯多带呢？是不是怕行军不方便？要是他们万一觉得粮食不够，那怎么办啊？”

“一方面是不方便，一方面也是因为他们的粮草本来就不多，所以只能祈求上天保佑能够尽快地夺下据点，好趁机夺取敌人的粮草。”

卓汉接着又问：“他们抢了粮食以后，难道就不要据点了吗？”

“当然要啊！不然岂不是前面才攻下的据点，后面就紧跟着被敌人收复了？所以他们每攻下一个地方，就派人看管，然后再进行下一个目标。”

“那被打败的人都不会起来反抗啊？”卓汉问。

“傻孩子，你想有谁会甘心当亡国奴？被打败的人整天想的当然是怎么样才能把这些讨厌的人，从他们的土地上赶走。”柏杨对卓汉的一时迷糊感到好笑，但又不厌其烦地解释着。

聚餐已近尾声，但热络的气氛却如同每个人面前的那杯热咖啡，香醇的热气不断自杯口弥漫。

“你都是在什么时间看《通鉴》的？会不会影响到你的功课？”柏杨关心地询问卓汉。

“不会啦，我都是在放学后，做完学校功课才看，所以每一册都要花二、三个星期才看完。”卓汉解释地说道。

当卓汉正忙于回答，而他的爸爸林明德教授，早已从手提袋里，拿出一册的《通鉴》等着了，并且翻出卓汉在那一册的地图里面所找到的错误。林明德教授说，每次卓汉一接到寄来的新书，便很紧张的要先翻翻“通鉴广场”，看看他好不容易才找到的错字，是不是也被别人找着了？然后再看看是否有自己遗漏的错字？柏杨听了这番描述，不禁开心地笑了。对卓汉认真的态度，及从小就能养成历史与地图参照着看的习惯，感到十分欣慰。史地并看的习惯，在一般人来说，可能还是个奇异的举动，但这却是全盘理解历史所必需下的功夫，因为历史绝不可能只有时间的指标，而独缺空间的舞台。

在互道珍重的同时，卓汉的爸妈表示要带他们姐弟到附近的书店买书。随着他们脚步渐远，先前林明德教授在席间的一番话，引起无限思量：“我们对孩子教育的目标，一直是只希望他们能活活泼泼、健健康康的生活着，正正当地做人，在各方面都能平衡发展，潜能也能达到完全发挥的境地，这样我们就觉得很满足了。当然，我们做父母的，也会尽量做到，不在他们的心灵上施加压力。我一直鼓励他们在生活中要多思考、多读书。一旦他们在思考、摸索的过程中，遭遇到困难，我们也一定会给予全心的支持跟协助。”这段话无异说明了卓汉为什么在小小年纪，就超越同龄的朋友，阅读起这部连大人也要忙着说不懂的大书。而且可以很肯定地说，在卓汉的心里，爸妈就是他最好的发动动力！

人文素养与企业之间  
——一九九一·七·台北《统一企业月刊》

许裕祥

问：企业里除了需要精通行销、管理、财务、电脑、研究等人才外，重视人文素养，对企业可有何帮助？

柏：台湾目前似乎很少企业家，大多数都是暴发户和传统的生意人，在这些人的头脑里，人类行为唯一动力是赚钱、赚钱，除了赚钱，还是赚钱。所谓暴发户和传统的生意人，也就是俗话说的“有钱人”“财主”“富翁”。台湾的“有钱人”比起日本，简直是小巫，然而，报上说，即使是台湾富翁羡慕得要死要活的日本富翁，也不过是简单的富翁而已，没有国际尊敬，也没有承担国际义务的远见，终于回归到“除了钱，什么都没有”的原始位置。台湾富翁更不要提了，这不是说台湾根本没有企业家，而只是说台湾企业家不多。台湾富翁以前所理解的只限于“行销”“管理”“财务”“电脑”“研究人才”和希望创造更多的财富。我不是说这些不重要，恰恰相反，它们当然重要。不过，仅有这些并不能使企业更有前瞻，这些仅只是企业的基础。

人文主义才是企业的土壤，人文是文艺复兴时代的主题，世界上只有两种人轻视人文主义，一是有钱的人，一是有权的人，十八、十九世纪资本家就是站在“纯赚钱”立场，把人文主义压在脚下，雇用重工、剥削女工、压低工资，不把工人当人尊重。结果引起社会主义反击，马克思学说（有钱有权的人，最看不起穷书生的学说）出现，以致资本主义制度不得不彻底脱胎换骨。台湾社会生态已从对抗“有权人”的战争，逐渐转向对抗“有钱人”，现在只是开始，可能还没有人察觉到，但一旦察觉到，化解它就很难。人生，除了赚钱，还有别的目的，而且，如果深入人文领域，它还会赚更多的钱。富翁的土壤是贫瘠的，企业家的土壤才富饶，那是人文主义的土壤。然而，钱赚不完，钱多到成为帐簿上的数字之后，就必须有人文主义精神，否则就变作“赤裸的金钱”，将使生命陷于空虚、恐怖、六神无主。

在社会上更可能引起马克思、列宁式效应，一个有眼光的企业家，他会想到自己的责任。

问：你心目中的企业人文精神是什么？

柏：人类跟蟒蛇不一样，蟒蛇除了吃饭和交配外，仍是吃饭交配。人类则除了吃饭和交配外，还有别的。在财富的观念上，情况相同。有钱人（传统生意人）除了赚钱，还是赚钱，有人文主义方向的企业家则不然，他除了赚钱，还有别的。这个“还有别的”，决定这个人的价值：是尊贵或是庸俗？连西西里黑手党头目，晚上在家也阅读小说或诗，连王子都正襟危坐听交响乐，而我们台湾有钱人闲暇时干什么？大多数都限于女人和酒，这不但使“富不过三代”谚语得以应验，而且也构成社会不稳定——因为财富不能累积。我佩服卡内基先生，他知道如何赚钱，更知道如何花钱！

问：人文生活的重点何在？

柏：没有人文生活的人，跟一条蟒蛇一样，只有本能的诉求和感官的刺激，太多这样的人构成的是一个庸俗的社会和充满危险的社会。“赤裸的金钱”和“赤裸的权力”同样可怕，它会引起反击，犹如马克思思想反击旧资本主义一样，人文主义是一种营养剂，用一句中国老传统的话说明：“财润屋，德润身”，应尊重其他的人，尊重社会。而这不是每一个有钱人都可以

办到的，当然，也正因为不是每一个有钱人可以办到的，财富才会因败家的管道流回民间，使社会得以自然平衡。不过我们却希望每个有钱人都办得到，在人文主义企业家手中的财富，才是真正的财富，它是由回馈的管道流回民间，而不会变成灾难（对自己或对别人）。

问：“美是情感的表现”。“美是生活”，请问“美”该如何落实在生活或工作之中？

柏：在政治上，什么奇怪的定义和见解，都会出笼。诸如：杀人就是美，尤其当杀的是“反动份子”时就更美。一旦到了允许这种观念存在的时候，这个社会的病就已沉重，要受大苦大难才能再生。人生中，美是一种绝对值，是学习的手段，也是学习的目标。我们必须成为一个够水准的鉴赏家，生命才有意义，欣赏别人的爱心、欣赏别人的感恩心，欣赏别人的美！鉴赏心建立在美的认知上，却也需要批评恶、唾弃恶，不向恶屈服。有太多时候，恶比美更诱人，而人文主义正是要培养生命或生活中的美。一个人心里想宽恕另一个人时，他脸上流露出来的就是美，而当他要陷害一个人时，我们可从他脸上读出狰狞。我把它简单化为一件事，说出来相赠：

请你笑一笑，笑，就是美！

# 让绿岛走出政治恐怖的阴影

## 调查采访

记者 林照真

绿岛将军岩脚下太平洋的浪涛澎湃。不远处有一道布满锈斑的高耸围墙，墙内是看不见的世界，却透过作家柏杨口中慢慢道出三十年前那个“乱世”、与政治犯逐渐为人淡忘的哀伤。

三十年前因翻译“大力水手”漫画，被认为“挑拨政府与人民情感”而几乎被枪决的柏杨，日前重返白色恐怖时期遭软禁的警总绿岛指挥部，他掩不住心中的感伤，潸然泪下！他建议在绿岛设立垂泪碑，碑上将刻上所有政治犯的名字和刑期，以纪念台湾在五十年代的那一段苦难岁月。

## 恐怖象征深烙人心

绿岛是位于台湾东南方太平洋海域中一个美丽的小岛，目前更是年轻人浮潜海洋世界的观光胜地。但很多人却遗忘了本名“火烧岛”的绿岛从日据时代开始，便为日本殖民政府作为囚禁反日份子的监狱，火烧岛一直是恐怖的象征。

火烧岛虽从民国三十八年起改名为绿岛，但是自四十年代以降，直至不久之前的过去，台湾的政治异议份子仍然被当局囚禁在此，前后人数已经超过万人，绿岛仍以火烧岛的面貌成为政治恐怖的联想。

柏杨说，许多集权国家总会在他的领海找一个孤岛，用来囚禁重要人犯，法国有一个魔鬼岛，南非也有一个罗本岛，而台湾就是绿岛。绿岛百年来一直扮演屈辱的角色，也因为太多的政治异议人士在这里埋没了生命与青春，致使绿岛一直被认为是恐怖的地方。

绿岛有柏杨九年零二十六天的政治受难记忆。柏杨说，他并不是最苦的人，但却深感绿岛记录着台湾意识形态恐怖屠杀的历史，洗也洗不尽。

柏杨走过绿岛指挥部外高耸的围墙，柏杨说，当时他就是被五花大绑，从围墙深锁的大门中走进去的，那时围墙先以铁丝网团团围住，后来铁丝网又变成围墙，围墙内关着的是许多政治立场截然不同的政治犯。

## 一墙之隔两个世界

柏杨循着围墙一路走下去，乍见一个小门，过小门又是另一个高耸的围墙，墙的两边各成一个世界。柏杨称此物为“隔壁手段”。在墙的一端，当年是政治犯被监禁的囚房，共有万余名，现在囚禁的则是约二百名的明德班管训生。当时一堆堆的政治犯，被军人押解着进入统舱式的长形房间。从进入“国防部绿岛感训监狱”起，他们便是“新生训导处”的新生，民众也叫他们“新生”。

名虽为“新生”，但他们却个个有罪在身，罪名都是违反“惩治叛乱条例”等叛乱罪，刑期从十年到无期徒刑都有。

而围墙的另一面，在柏杨心中却有更深的恐怖回忆。因为押房的有限期监禁后，接下来却是无限期的软禁，这里正是警总的绿岛指挥部。



## 历史定位留给后人

柏杨说，他在感训监狱服刑期满后，还不能出狱，便被分派到绿岛指挥部来。这边连一个班长都有权“让你走不了”。在这里软禁期间，犯人可以在营房内走动，每个月还可以领一些钱，好像是个自由人，但活动却脱不出营房范围。柏杨说，失去自由，等于失去尊严。

指挥所内广大的草坪区，是直升机降落的地方，由台湾本岛来巡视的大官就乘着直升机在这里降落。柏杨穿过营区来到图书馆，指认隔壁房间即是“孙立人案”郭廷亮被禁之处。而在图书馆后，是柏杨的寝室，再走过去有一间写着“高朋满座、嘉宾云集”的餐厅，政治犯柯旗化在这里负责管帐。

太多的政治犯在这里留下他们的伤心往事。也因为如此，柏杨起意在这个地方立一个垂泪碑，以纪念这一段苦难岁月。柏杨说，其他的政治难友中，有的人觉得垂泪这个名字太弱，应该找更强的字眼：还有些人觉得光是立碑纪念并不够，必须要采取抗争手段。

柏杨在绿岛拜访了乡长，提出他的想法，也与国防部、民间各界人士商量。他说他本人并不坚持一定要用“垂泪”，当时监狱内所囚禁的多是男性政治犯，也许很少流泪，但不知受难者家属流了多少泪，应该可以洗出一条路，把过去的幸洗尽。

而且，当时少数的女性政治犯与男性政治犯隔着铁丝网，“绿岛小夜曲”被男女政治犯对口唱出，也会听到另一种歌声的悲伤。

柏杨说，他自己面对这段往事总是尽量不自怜，也不怕被讥笑，但他们真是被遗忘的一代，我们的文化好像也一直希望我们要忘掉这段历史，不要去面对它。但是这段历史令他流泪，因此他希望可以立个碑，把受难者的名字刻在碑上，至于这段历史如何定位，就由后人来决定吧！

## 建碑意在走出悲情

目前建碑工作已进入筹备阶段，主任委员阳明大学教授周碧瑟指出，建碑是要从悲情跳出来，是一个恢复尊严的行动；它着重教育性、文化性，没有政治性，现在要由没有悲情的人来做这件事。

在绿岛，柏杨从哀伤的回忆中回复平静。他以缓和而坚定的口吻说，此刻不是为求赏、不是为昭雪；“即令政府反对，我们也要把碑建起来，一代接着二代，把这段记忆传下去。”柏杨说。

## 湘版《丑陋的中国人》编后记

严秀 牧惠 弘征

我们在选编《当代杂文选粹》丛书时，深觉不能遗漏同是祖国大家庭中台湾省作家的作品，在有机会读到柏杨先生这本早已风靡海内外的杂文集后，决定打破这套丛书各本都不单独用“前言”、“后记”的成例，向读者陈述一下我们的看法。

本书作者柏杨，本名郭衣洞，一九二一年生于河南开封，现已是望七老人了。他自一九四九年去台，曾先后从事过政治活动，任过大学教授、报纸副总编，写了十年小说，因感到小说影响人是间接的，便改写杂文，又是十年。他的杂文在台湾影响甚大。一九六八年被台湾当局判处死刑，后改判有期徒刑，被监禁了近十年才出狱。

据知，他已经出版过各种著作五十余种，内有三十多本杂文，可惜我们未能都收集到。这本《丑陋的中国人》是从各杂文集里选出来的一本选集，去年在台湾和香港两地同时出版。读罢本书，深觉其议论精警，忧国忧民。继承鲁迅先生“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的正视现实的优良传统，集中力量发掘、展示和鞭挞了我们民族中的不少人两千多年来在封建文化和近一百多年来在三座大山压迫下形成的种种“丑陋”的性格或心里状态。在台湾和海外华人读者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也使他成了目前在台湾最受读者欢迎的作家，被列为一九八五年台湾“最畅销的十位作家”之冠，我们以为，对于我们今天正在为实现现阶段各族人民的共同理想而奋斗的大陆读者来说，要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是否也有必要尽速清除某些传统的封建文化遗毒所造成的丑陋的东西呢？回答应该是肯定的。近几年，祖国内地同柏杨先生看法基本一致的人不约而同地大大多起来了，海峡两岸的中国同胞，一切真正忧国忧民的文化思想界人士，在这个问题上的认识也逐渐趋于一致。这是一个很大的觉悟，很大的“反思”，它的影响必将在我国现代化的进程中起历史性的重大作用。在胡耀邦同志提出的争取实现三个“根本好转”中，其中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奋斗三年五年或者更长一些时候是完全办得到的。争取党风的根本好转就要难得多，时间也要长得多。至于争取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那就更难，时间也是最长的了。柏杨先生的这本书、对我们争取第三个根本好转将大有好处，对争取第二个根本好转也有积极意义，关键在于我们今后不要盲目的自大，全民族都应该虚心进取。每一个民族都有他自己的优点和弱点，优点是人人都能列举并津津乐道的；唯有弱点，往往不易于为众人所正视和承认，这就必须有敢于把疮疤亮出来决心改正的勇气和深刻的自省精神。良药苦口利于病。现在我们正提倡宽松，我们应该有度量吃下柏杨先生的这颗丸药。这种批评鞭挞，即使是发自外国人的，我们也应该虚心反省，鲁迅先生早已很深刻地谈过这个问题了，何况这是发自海峡对岸的一个真正的爱国主义者、一位炎黄子孙披肝沥胆的心声呢！顺便提一下，在美国和日本，都有《丑陋的美国人》《丑陋的日本人》这样的书，被当成各自自省“国民性”中的疵点的镜子。

柏杨先生的作品行文汪洋恣肆，极其辛辣尖锐。它的好处是易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但也难免为人所不乐闻，在台湾和海外华人读者中，也有人很不赞成。例如，他把中国传统文化比喻为酱缸文化，甚至把某些盲目的糊涂人比喻为酱缸里的蛆虫，看似过于尖刻。其实，只要不以词害义，看到作

者的苦心，也就不必气愤了。这个“酱缸”的比喻，其实就是鲁迅先生所说的“昏乱”一词的形象表现。可是鲁迅先生对我们民族的“劣根性”之一的这个分析和指摘，以后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试想想，我们吃昏乱的亏还少吗？柏杨先生的这一分析和形容，就是把鲁迅先生早已指出的这个毛病观察和剖析得更透彻了。凡是想去掉“昏乱”沉痾的人，都没有对柏杨先生的讽刺产生反感的必要。

又如，柏杨先生明确提出“崇洋，但不媚外”的口号。细看他的所谓“崇洋”，其实是专指以我为主，吸收西方先进文化科学和他们比较文明合理的那部分社会风习而言，也就是对鲁迅的“拿来主义”的发挥。

柏杨先生离开大陆已近四十年，他的杂文直接取材于台湾社会和对海外华人的观察，举例也甚少涉及大陆，但不能因此就认为本书对我们没有鉴戒意义。我们要加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就不要讳言我们在精神上还有哪些不文明之处。如果反其道而行之，正说明阿Q主义还附在我们身上。其结果将只是不利于激励自身的奋斗图强了。

对于柏杨先生在有些篇中的某些观点，并不是我们都能同意的，我们相信读者的判断能力。有少数几个地方我们略去了几句，有的主要是由于和另一篇中的内容重复，这是要请作者原谅的。鉴于柏杨先生的作品对大陆读者来说还颇为陌生，湖南文艺出版社决定在《当代杂文选粹·柏杨之卷》出版之前，先出版这本书的单行本。书末还附录了他的夫人张香华女士写的和一位比裔美籍神父的谈话，以及里程写的一篇介绍文章，以加深读者对柏杨先生的了解。我们隔着海岸谨向柏杨先生致以良好的祝愿！让海峡两岸的炎黄子孙，为完成统一祖国、振兴中华大业而共同努力！

一九八六年十月三日

——原载《丑陋的中国人》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版

## 护短与爱国

### ——评对《丑陋的中国人》的若干批评

严秀 牧惠 弘征

编者按：严秀等同志的文章，对批评《丑陋的中国人》一书及其后记提出反批评。作者来信要求编辑部“完全按原文发表，不再作任何修改”。这个要求并不过分，完全应当受到尊重。

有人感慨于批评之难，有人感慨于批评之令人生畏，这两种看来截然相反的意见，人们经常可以同时听到。没有批评是不行的，没有反批评也是不行的。如果批评和反批评的意见都能够畅通无阻地发表，那么，真理自然就会愈辩愈明，畏惧批评和不敢批评的心理就会逐步消失。有鉴于此，本刊非常乐意为正常的批评和反批评提供园地。

双方的争议不仅在于对《丑陋的中国人》一书的评价，也涉及到诸如怎样看待中国人的“国民性”、怎样看待民族传统文化和民族心理、怎样看待西方精神文明等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关系颇为密切的问题。当然，也涉及到批评和反批评的态度、方法、文风等问题。毫无疑问，就这些问题深入进行探讨，有助于提高我们的思想，健全批评和反批评的风气。人们对文艺领域的批评和反批评似乎还不十分习惯，慢慢就会习惯起来。批评和反批评的态度、方法、文风，也只有在两者的经常开展之中，才能逐步得到端正和提高。

—

谁也不能否认鲁迅是一贯的、彻底的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但他一生致力于揭露“国民性”的弱点其实也就是“丑陋”之处，是不遗余力，也不留余地的。他的目的完全是为了引起人们对疗治这些疾病的注意，以免“中国人”这个名词从“世界人”中消灭掉（也即是“开除球籍”）。他在文章中曾多次说及别人骂他为“汉奸”，为“卖国贼”，但他一生为疗救“国民性”中的毛病而奋斗不息，一生反对“自大的”爱国主义，从不稍懈。他死了，遗体上覆盖着“民族魂”三个字，证明大量有识之士的爱国者是完全分得清诽谤污蔑、诋疾忌医同扶正祛邪、去腐生新是根本不同的。

我们编选《当代杂文选粹》时，当然把港台杂文家的作品列在计划之中。香港的比较好办，第一辑就有曾敏之；台湾的杂文家，我们所知甚少，较多地听说过柏杨、李敖、龙应台等，想找他们的作品并不容易。以柏杨论，据我们所知，他已出版的杂文集不下二十六本，到现在为止，我们见到过的还不到一半。在这种情况下，贸然编选出版杂文选粹的《柏杨之卷》，固然不妥。而《丑陋的中国人》却是一个现成的选本。我们和我们周围的一些同志，包括老、中、青、干部、军人、老师、学生都纷纷议论，认为这是一个爱国者的心声，没有听人说过他是一个大逆不道的民族罪人。于是决定先将这本书略加技术处理（主要是想大大减少篇幅，降低定价），加上一个简单的《编后记》，予以翻印。对于书中的某些观点，读者会有不同看法以至强烈反感，我们在《编后记》中也提到；对于某些“批判”以至强烈的、毁灭性的批判我们也有充分的思想准备。而此书出版后却巧又遇到一些重大事情发生，照理与本书的内容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但依惯例总会因此而多生出一大堆麻烦，也是率由旧章，更不会令人惊惧和奇怪的。对于这些批判，我们本来不

预备作任何回答。后来一些同志或口头或书面对我们说：你们不吭一声，是不是意味着服输了？认错了？这才引起我们加以考虑。其实，有关问题我们在《编后记》已经扼要地说明过；这本书和《编后记》也不过才遭到十来家报刊的批评，而又产生在这个时期，是一点也不足为奇的，不答复也未尝不可。可惜的是，批评的罪名，有些根本不是作者的原意，有的甚至同原意相反；有的竟是移花接木，东半句西半句凑成的“目标”，然后自拉自唱地“批判”一通，自然是旗开得胜。去回答这类批判，确实有点浪费时间。但是，这种批判的方法和风气，远比批判自身提出来的问题重要得多。而且施之于在台湾以杂文得罪当局、被扣上“匪谍”罪名而以死刑起诉，终于坐了九年零二十六天牢的柏杨，我们就不能也不应对这种“批判”方法和风气始终保持缄默了。

这当中，我们收到过不少认识或不认识的读者来信。这些信都赞成我们的观点。一位青年学者在读了华夏志、王凤海的批评文章后写信给我们说：“这二位和您商榷者……既不讲逻辑，也不讲事实，又不把握作者的总体思想，截出几句话来就上纲，真不知怎么搞的”，“写这些文章的人究竟是否真的相信他们自己所写的那些话？”

对于“是否真的相信他们自己所写的那些话”这一点，我们也搞不清楚；但是，读了这些文章后，我们确有一个疑团：他们到底认真读过《丑陋的中国人》没有？要么，他们连这本书的基本倾向部真的或不一定是真的看得出来。

我们呼吁：弄明白了再批为好。大家都很熟悉那种所谓“批判”，在今天还能有多大市场吗？

在这些文章中，应当说梁超然先生的《鲁迅、柏杨异同论》（先后发表于《中国图书评论》一九八七年第二期和《文艺理论与批评》第三期）是比较严肃地商讨问题的文章。但是，即使这篇文章，也存在着未能把握柏杨这本书总体思想的问题。而如果这个问题也没有搞清楚，别的问题就很难讨论下去。

梁超然给柏杨这本书的头一个结论是：“柏杨对中华民族及其文化有一个总的看法，那就是：中华民族文化是一个‘酱缸’”、“中国传统文化应该通通抛弃”。柏杨说中国人都是丑陋的，因此，“简直是诬蔑”。在这篇文章之后发表的华夏志、王凤海的文章（见《红旗·内部文稿》一九八七年十一期，《河北学刊》一九八七年第五期署名李友滨，王凤海），也一口控告“柏杨先生全面否走中国文化”，“把少数人的丑陋硬栽在全中国十亿人民的头上，这简直是诬蔑，是一种令人不能容忍的诬蔑。”这是一切批判文章的核心论点，因为如果它能成立，自然是很有力量了。对于此点，我们也早在意料中。如果连一点都预计不到，我们还敢重印这本书吗？

我们想，用以回答梁超然和跟在后面的华夏志，王凤海等同志的，最好是引用柏杨在此书中自己的话：

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一种滤过性病毒，使我们子子孙孙受了感染，到今天都不能痊愈。

中国人比较重视友情，而外国人之间关系比较淡薄，他们习惯单独作战。中国人这点比西方好……

中国人无论自己怎么苦，怎么困难，总要让孩子上学。……这是我发现的中华民

族的一个长处。我想这一类中国人的优点，不必再提了。因为人们提得太多。“而且我们不提它，它还是存在。所以今天的报告，只谈我们中国人的缺点。专门谈优点是救不了自己的，只有认清缺点，才可以自救。（请注意：“只有认清缺点，才可以自救”在另一个地方又说“我们的丑陋，来自我们不知道自己丑陋”。这些是柏杨说的。任何一个不抱成见的人，都可以看出这是符合实际的，并不是柏杨在为自己“搽脂抹粉”。——本文作者）

今天我讲中国这么多缺点，有人听了一定很泄气，我觉得我们应该听的，正是这些，而不是优点，假如我们讲我们的美德、我们的聪明……最后，我们还是不能够受到人家尊重，我们自己也不能自尊。

旧观念中也有好的，在旧观念下产生的行为，也有和日月并明的。只有酱缸蛆观念，即令它是新的，也是堕落的、恶毒的。

中华民族有五千年传统文化，当然有优秀的一面，介绍这一面的朋友太多，说的话写的书，更排山倒海，用不着我再插嘴，即今再插嘴，也不能增加优秀的重量。

白纸黑字，在在证明，柏杨并没有认为中国文化全要不得，中国十亿人全无救药，这不是很明白的吗？

梁超然的文章题为《鲁迅、柏杨异同论》，内容做在“异”上，这当然是作文的办法之一。但是，光摘引几段鲁迅的话来证明二人的“异”（这“异”是否真异，且当别论），而不去考虑柏杨师承鲁迅的“同”，这种论战法之不足取，只要稍微读过鲁迅著作的人，恐怕一眼就会看透的。

即以对中国国民性和民族文化的劣根性而论，梁超然自己也承认鲁迅曾用过“黑色染缸”来形容中国文化传统的强大惰性，我们应当补充的是，鲁迅不只一次谈到“黑色染缸”；

可怜外国事物，一到中国，便如落在黑色染缸里似的，无不失了颜色。（〈热风，随感录四十三〉）

每一新制度，新学术，新名词，传入中国，便如落在黑色染缸，立刻乌黑一团，化为济私助焰之具，科学亦不过其一而已。（〈花边文学·偶感〉）

中国的大约太老了，社会上事无大小，都恶劣不堪，像一只黑色的染缸，无论加进什么新东西去，都变成漆黑。（〈两地书〉）

晚期的一九三三年，愤于当局的不抵抗主义，鲁迅一箭双雕地点破了旧文化的虚怯：

“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静静的等着别人的“多行不义，必自毙”，礼也。（《准风月谈·礼》）

这可已不是进化论者鲁迅讲的。其实，纵观鲁迅一生，他对封建文化的腐朽面深恶痛绝是毫无疑问的。他痛感自己“背了这些古老的鬼魂，摆脱不开”，希望办刊物的朋友“最好是无论如何总要对于中国的老病刺他几针”；而且指出，“倘不将这些（包括风俗、习惯在内的旧文化）改革，则这革命即等于无成。如沙上建塔，顷刻倒坏”（《二心集·习惯与改革》）。阿Q可能参加革命；但是，如果只革别人的命，不革掉身上的阿Q魂，革命很难

胜利，李自成、洪秀全就是前车之鉴：万一成功了又如何呢？电影《阿Q正传》似乎已部分回答了这个问题。一直到今天，阿Q阴魂不散，仍是我们的心腹大患。

因此，我们通读梁超然、华夏志、王凤海等同志的文章，始终未弄明白，为什么说“染缸”的就是圣人，说“酱缸”的就是罪人？我们上面已经摘引过的柏杨文字，足以驳倒柏杨认为“中国人都是丑陋，只是大大小小的酱缸蛆”的诬蔑。如果我们再把视野放宽一些，应当看看柏杨的其他著作。试问，把《资治通鉴》译成现代语文介绍给广大读者这个行动是一位文化虚无主义者做得出来的吗？柏杨在这本现代语文译本中（虽然，他的译文还有不少缺点，有的还可能是理解有误，加上不少批语，其中有对旧文化的批判，也有对优良传统的表扬。对廉颇同蔺相如的顾全大局，对刘邦的勇于认错，对张骞和郑和的不畏艰险的开拓……他都备加称赞。这些，同批判柏杨者加以引用的、众所周知的鲁迅那段关于“中国的脊梁”的话，难道不是一致的吗？如获至宝地引用鲁迅关于“中国的脊梁”那段话来判断柏杨著作是鲁迅的敌对面，是吓不到什么人的。

顺便说一句，鲁迅在许多地方谈到国民性的一些弱点的时候，往往根本不使用任何限制词，如：

中国人的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在这路上，就证明着国民性的怯弱，懒惰，而又巧滑。（《坟·论睁了眼看》）

……群众，——尤其是中国的，——永远是戏剧的看客！（《坟·娜拉走后怎样》）

中国人倘有权力，看见别人奈何他不得，或者有“多数”作他护符的时候，多是凶残横恣，宛然一个暴君，做事并不中庸；……一到全败，则又有“命运”来做话柄，纵为奴隶，也处之泰然，但又无往而不合于圣道。（《华盖集·通讯》）

如果不厌其烦，这类冠以“中国人”的批判话语，我们不难再抄它一，二十段。按照现在以“百分之百”罪名去判定柏杨的人的逻辑，鲁迅又该当何罪，应判入几十层地狱呢？梁超然、华夏志、王凤海等同志总不至于连鲁迅这样大量的用语和提法也全不知道吧？你们难道一点也没有考虑过，按照你们的理论，将置鲁迅于何地呢？“文革”中曾出现过在”。批判“反革命”时，把所谓“反革命分子”的未注明出处从《毛泽东选集》中摘抄的文字作为反动言论大批特批的闹剧（笔者之一就亲见这么批斗过傅东华先生，当时忝在陪斗之列）。假如把《鲁迅全集》中的这些话不注明出处加以印行或恶作剧地夹入柏杨的杂文里，会不会重演这种闹剧呢？不会吗？！

对于这种战法，柏杨也早已熟知，他在《酱缸国医生和病人》这篇代序中已经有一段形象地勾画的对话。当医生告诉病人他有三期肺病时，这位病人逐一驳斥医生提出的诊断：“你说我咳嗽，你刚才还不是咳嗽，为什么不是肺病？”“半夜发烧，我家那个电扇，用到半夜能把手烫出泡，难道它也得了三期肺病！”如此等等，然后是最拿手的一击：

你对进步爱国人士的侮辱已经够了、你一心一意恨你的同胞，说他们都得了三期肺病，你不觉得可耻？

说有些中国人得了肺病，就是说十亿同胞都得了肺病！这使人不得不回想起过去几次政治运动中的大批判模式，你只要说某地某人犯了主观主义，你就是攻击党、攻击毛主席。你只要说大跃进中有浮夸，你就是抓住一个指头否定九个指头，你就是攻其一点，不计其余！对于这类论战手法，我们只能无言以对！

二

问题的实质，恐怕还在于对柏杨指出的中国的丑陋面是否端的是中国的丑陋面。

“丑陋”这两个字，当然是作者为了引人重视而故作的惊人之语，并不足为训。它的实质则是在指出相当多的同胞在性格上有其消极的一面。我们在《编后记》就提出过，看这本书不要以词害义。我们的后记就说这些是“不文明之处”。如果认为“不文明之处”也没有，岂不是讳疾忌医？

隋缘在《要重视对读者的积极指导》（见《中国图书评论》一九八七年第二期）中批评我们不该删去附录部分。我们这样做并不是没有充分理由的：我们编的是柏杨的书，不是编辩论集，没有必要收入它们；而且，“附录”中的绝大多数是赞同柏杨的，有的还揄扬过甚以至失之扁颇，我们不大赞同。至于反对的文章呢，隋缘同志不可能不从字里行间看出，多数是出于台湾当局忠臣之口或身居海外而对新中国痛恨有加的诋毁之论，假如我们真的把它们保留下来，我们就是在公共传播反共言论，这种事情我们能做吗？我们不能作诛心之论。我们认为易地则皆然，隋缘同志来处理这件事，恐怕也不会把反共言论一视同仁地编进去吧？！隋缘还特别指出要附录铎民先生的评论，我们的第六版《丑陋的中国人》上却没有此文。也许他看到的是另一种版本？但是，这也无妨，例如我们手中的第六版中有一位王亦令的评论文章就很有助于读者通过对照去判别是非。他是从“五四”运动一直骂到柏杨的。这里请允许抄上两段：

所有这些肆意骂街的中国人，都不是等闲之辈。几十年前那些高唱“打倒”、自诩“进步”的“五四人”，都是以爱国爱民为己任的大作家。他们或废名，或废姓，或以对中国传统刻骨仇恨的《家》《春》《秋》来扬名立世，有意无意地为日后马列主义红色江山，做了思想宣传的铺路工作。中国老百姓这三十多年的祸害，实在是六十年前那批时髦文人种的根。如今又出了一位柏杨先生，也是号称非常爱民的大作家，他把五四传统发扬光大，先是大喊“酱缸文化”，继而诋毁“丑陋的中国人”。

我是中国人，我有很多缺点错误，甚至大错大误，但是我绝不丑陋，更不承认中国人一概都丑陋。

骂五四、骂巴金、骂柏杨、也骂马列，当然主要还是为了骂马列，骂建国三十几年的新中国。巴老的上述几部小说当然有颇高的历史价值，但要说这些小说为“马列主义红色江山”在中国做了“思想宣传的铺路工作”，未免太昧于中国近世的思想文化与政治发展的历史了。这种毫无价值的文章，有什么必要印出来浪费读者时间呢？这不正是柏杨所说的“酱缸文化”中的优质产品吗？谁愿意同它们酱在一起，我们管不着。我们想，隋缘等同志也未必会把此人引为同志吧？但我们确实实不愿作陪。

其实，“丑陋”这个词，柏杨不过借美国、日本有过《丑陋的美国人》、



《丑陋的日本人》而援用之，与错误、缺点又有什么本质的差别呢？作为杂文家，柏杨行文过于恣肆，每以嬉笑怒骂发为文章，我们对此点并不欣赏，并不赞成。但是，在它们相当粗野的外壳下，有没有合理的内涵呢？我们说有。看了这本书难道不是引起人们的警策而只能引起人们的暴怒吗？这恐怕是我们同这些批判者们根本的不同之点。我们希望人们不必在缺点、错误还是丑陋这个词上争论不休，这根本不是问题的实质。

柏杨的行文方法，往往故意讲得很偏激，其用心显然是要引起人们的注意。光看词句的确可以引起一些同胞愤怒。但是，他指出的究竟是不是捏造和污蔑，这才是问题的核心。我们无法一一讨论对柏杨以及对我们的这些批评，因为没有必要。这里仅把柏杨的核心理论之一“窝里斗”拿出来谈谈。这个词也很粗俗。但他个人文风如此，不必强人就己。其实，大陆近几年好些人喜欢用“内耗”这个词来沉痛地总结我们多年来造成的损失，同“窝里斗”难道不是同一意思吗？奇怪的是讲“内耗”是可以的，而讲“窝里斗”却不行的这种古怪逻辑。

柏杨不只一处指出中国人有“窝里斗”这种劣根性。讲台湾的，讲唐人街的，也讲到大陆的。柏杨指出。“所谓文化大革命，不过一场窝里斗”：

在中国广大的大陆上，“反右”之后接着又来一个“文化大革命”，天翻地覆，自人类有历史以来，还没有遇到这么大的一场人造浩劫，不仅是生命的损失，最大的损失是对人性的摧残，和对高贵品质的摧残。

他还指出，正是由于这种斗、斗、斗，“形成彼此间的疑惧，这种疑惧使中国人变成一盘散沙”。

李宗凌在《对〈丑陋的中国人〉的几点看法》（一九八七年一月二十六日《理论信息报》中认为柏杨对“文革”的指责是危言耸听：

“文化大革命”是中国的一场灾难和不幸，这毋庸置疑。但是它也毕竟是发生在中国，发生在中国共产党内的局部事件，就像美国二次大战刚结束出现的禁锢进步思想、监禁进步人士的麦卡锡主义，斯大林犯的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和其他国家发生的类似事件一样。但只有中国共产党人更敢于公开承认和揭露自己的缺点罢了。就其对人类和民族的损害而言，“文化大革命”既不能与蒋介石一九二七年“四·一二”事变以后对中国人民进行的野蛮屠杀相比、更不能同日本帝国主义对亚洲国家犯下的罪行、希特勒对人类进行的杀戮相比。作者不是缺乏历史常识的人，下如此断言是否太不严谨了。

这种批判未免太出奇了。柏杨对“文化大革命”的批评是就“窝里斗”即中国人同中国人、中国共产党同中国共产党斗得死去活来，时间延长达十年以上而言的，这同蒋介石国民党杀共产党、日本帝国主义者屠杀中国人民、希特勒对人类的屠杀等等“窝外小”怎能比较呢？我们只能用批评者的原话回赠批评者两句：“作者不是缺乏历史常识的人，下如此断言是否太不严谨了。”无他，请君入瓮而已。柏杨说：“文革”造成的首先是“对人性的摧残，和对高贵品质的摧残”，就这一点来说，难道不是空前的浩劫吗？日本帝国主义屠杀了我们数以千万计的同胞，当然比“文革”时的牺牲者要多得多；但是，八年抗战却使中国人民觉悟了，团结了，那结果是只花了三年时间我们就获得解放战争的胜利；“文革”呢？诚如孙中山先生的孙女孙穗芳

所说：“‘文革’后，中国人的道德素质低落。”这也并非诽谤，而是药石之言，我们何必反感。第二次世界大战造成的人口、经济方面的损失，经过三十年左右恢复过来了；“文革”中搞乱的思想，何时能解决得好？事情恐怕并不是柏杨缺乏历史常识，而是批评柏杨的人忘记了六中全会决议。什么“文革”不过与斯大林的肃反扩大化、美国的麦卡锡主义相当，难道这有一点符合历史事实吗？在这种认识下，“文革”又有什么了不起呢！这种护短的理论实在危险。前事已忘，怎能成为后事之师呢？在今天，改革、开放中碰到的不少困难，都可以从“文革”的动乱中找到根子。例如那种先有结论后去拼凑材料胡乱上纲的大批判作风，今天就并未绝迹。

梁超然同样忽略了柏杨讲到的这个前提而去讨论“一盘散沙”的有无。当然，推翻了旧的统治阶级以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曾经改变了“一盘散沙”的状况；但是，长时间以“阶级斗争为纲”使得人与人之间的隔膜、嫉妒、防范……增加了，由“人帮人”到“人整人”、“人防人”，这难道不是事实吗？

鲁迅关于这方面的谈话和文章，如果搜集起来，足以说明，柏杨所谈到的种种丑陋，鲁迅已早就谈到过，并非自柏杨始。试摘几段以见一斑：

中国人的官瘾实在深，汉重孝廉而有埋儿刻木，宋重理学而有高帽破靴，清重帖括而有“且夫”“然则”。总而言之；那魂灵就在做官，——行官势，摆官腔，打官话。（《华盖集续编·学界的三魂》）

救急扶伤，一不小心，向来就容易被人所诬陷；……所以，在中国，尤其是在都市里，倘使路上有暴病倒地，或翻车摔伤的人，路人围观或甚至于高兴的人尽有，肯伸手来扶助一下的人却是极少的。（《南腔北调集·经验》）

中国人要“面子”，是好的，可惜的是这“面子”是“圆机活法”，善于变化，于是就和“不要脸”混起来了。（《且介亭杂文·说“面子”》）

其实，中国人是并非“没有自知”之明的，缺点只在有些人安于“自欺”，由此并想“欺人”。譬如病人，患着浮肿，而讳疾忌医，但愿别人糊涂，误认他为肥胖，妄想既久，时而自己也觉得好像肥胖，并非浮肿；即使是浮肿，也是种特别的好浮肿，与众不同。（《且介亭杂文末编·立此存照（三）》）

可见我们在《编后记》中说，柏杨继承鲁迅“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的正视现实的优良传统的说法，乃是有根有据的判断，同信口开河的起哄并不是一回事。同样，在提到柏杨与鲁迅在这一点上的共同之处时，我们只是说柏杨对“酱缸”的分析和形容，比鲁迅对<昏乱>的剖析更透彻了。这样说，是深感“文革”这场灾难的所以终于发生，其根子之一就在于鲁迅指出的各种“昏乱”不但没有得到改进，而是更加大大发展了。柏杨现在用更尖刻的方式提出来，其实有助于我们的猛醒，何必对此恨之不已呢。华夏志、王凤海说我们认为“柏杨先生的思想比鲁迅更进步、更伟大，早已超过鲁迅”。这哪里是讨论问题的科学态度？这不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的老调重弹吗？读者认为我们应该花笔墨去辩论这些东西吗？我们可不上这个当。

华夏志、王凤海用黑体字着重地说：“柏杨先生与鲁迅先生的世界观不同，走的道路不同，怎能相比；”我们只是说“酱缸”说并不是什么洪水猛兽，“其实就是鲁迅先生所说的‘昏乱’一词的形象表现”，这个说法，我

们以为并无不对之处。从此而得出我们在把鲁迅同柏杨相比，并得出“柏杨先生的思想比鲁迅更进步、更伟大，早已超过鲁迅”的结论，这叫做无中生有，向壁虚构，危言耸听，不择手段。这里就患了“昏乱”症。“怎能相比”这句话，看原文大概还包括说柏杨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而鲁迅则是马克思主义者的意思在内。真正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人，或者作为一个整体来说，马克思主义者比非马克思主义者当然高明得不可比拟。但是，用以针对任何一个大小问题，则并不绝对如此。以对于“文革”的错误和严重后果的认识为例，一些非马克思主义者或者没有取得马克思主义者身分的局外人甚至认识得比我们更早。号称马克思主义者甚至以宣传马克思主义为职业的人，犯起主观主义，形而上学的错误来，往往有可能比那些不自称马克思主义者的人走得更远。如果说因为柏杨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就必然在任何问题上都比我们糊涂，这个见解本身恐怕就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态度。

我们在《编后记》中说到，“柏杨先生离开大陆已近四十年，他的杂文直接取材于台湾社会和对海外华人的观察，举例也甚少涉及大陆，但不能因此就认为本书对我们没有鉴戒意义。”李宗凌却说“作者本人对实行了三十多年军管统治的台湾讳莫如深”，“如果说上几句，也要再加一句‘大陆尤甚’，‘大陆尤其严重’”，认为这是出于柏杨的“政治上的偏见”，是否处处如此，读者自不难查阅，但在这一篇演讲中，柏杨确实讲到中国大陆发生的“文革”，讲到“四人帮”的罪行，当讲到说真话的难，和大话、空话、假话、谎话、毒话的流行时，指出“不只台湾如此，大陆尤其严重”而且举谶容的小说《真真假假》为例。如果不是讳疾忌医的话，应当承认柏杨讲的是实情，而不是出于“政治上的偏见”。“假、大、空”这个新词汇的出现，就不是柏杨的发明，而是我们自己早已成为口头禅的大陆土产。相反，在那许许多多柏杨以台湾或海外为例子所指出的“丑陋”而没有标明“大陆亦然”的事例中，我们倒是看到大陆也存在着同样的毛病。例如死不认错、提倡愚昧和盲从等等。我们这里不也相当严重吗？林彪的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同柏杨入木三分地讽刺的“买西瓜学”不是异曲同工吗？权势崇拜，权大真理多，我们这里不是患着这个膏肓之症吗？今天听说领导赞柏杨好，于是啧啧进行称赞；明天柏杨行情看跌，于是，还是他刷刷刷写出狠批柏杨的文章来。类似情况，“文革”中盛行，现在亦时见招摇过市，不也是并不美好的心理一种展示吗？

柏杨说：“我们的丑陋，来自我们不知道我们丑陋”，“我们能不能复兴我们的民族，要从我们能不能承认自己的缺点、承认自己的错误开始。假如连缺点、错误都不承认，又怎么改革？”任何一个不抱成见的人都可以看出，这才是柏杨写这本小册子的根本用心。他的夫人张香华说：“柏杨的意见，并不是说我们国家一点前途、一点希望都没有。关键在于我们是否能自我反省。”

我们认为，柏杨和他夫人讲的是实在话。我们接触到的一些读者，包括干部、解放军、学生，也包括一些中学生，他们读了《丑陋的中国人》后也很明确地感觉到了这点。像梁超然说的那样，被柏杨讲的丑陋“吓瘫了、崩溃了，也就根本没有信心和力量与病痛作斗争”的人，可能也会有的，但为数恐怕很微，我们坚信，前一种人是绝大多数。

三

然后就是“药方”问题了。

我们曾说，“良药苦口利于病”，现在我们正提倡宽松，我们应该有度量吃下柏杨的这颗丸药。梁超然说柏杨的书是“一点毒剂”。类似的指责，还不只梁超然一人一文。那根据就是，柏杨主张“全盘西化”云云。

我们只好又来抄书了。请看柏杨这些言论：

对于西方一些好东西，我们必须有接受的勇气。

一说起别国的长处，就有人号叫说“崇洋媚外”。事实上，美国、法国、英国、日本，他们的好的，我们就应该学。他们不好的，就不应该学。就是这么简单明了！

我们现在整个思想体系、经济思想、学术思想、民主思想、法治人权思想，都不是老祖宗传下来的。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生活方式，都是从外国来的，哪一个是传统下来的？我们的物质生活，如汽车、飞机、眼镜、理头发的方式、房子、刮胡刀，都不是中国发明家发明的，所以我觉得不是崇洋的问题，而是学习的问题。……崇洋不过学他们的优点，假如有一天美国人通通抽鸦片自杀了，我们，总不会跟进吧。

我们并不是说美国好得像一朵花，如果美国真好得像一朵花，他们就着用不着三作牌（指“作之君，作之亲，作之师”的“三作”警察——引用者）和监狱啦。

我们盼望中国的武器更精密，要求崇洋学习。我们盼望中国的工商管理更有效率，要求崇洋学习。我们盼望中国人一团祥和，要求崇洋学习说“对不起”“谢谢你”。我们盼望中国人排队，要求崇洋学习一条龙。我们盼望中国人尊重斑马线（指马路上的人行横道线——引用者），要求崇洋学习遵守交通规则。我们盼望中国人过弹簧门缓缓松手，以免后面的人脑震荡……

留华学生白安理先生，意大利米兰人也，在台湾八年，他发现他去店里买东西、讲中国话时、店员爱理不理、可是一讲英文，店员马上就变成了马屁精。以致白安理先生虽然中文呱呱叫，当买东西时，仍是用英文。呜呼，白安理先生也属少见多怪，固不仅店员如此，他如果到高层次打打转，恐怕他会发现英文更威不可当。

一口咬定柏杨主张“全盘西化”，“崇洋媚外”的人，似乎全没有注意到这些文字。我们当然可以指出柏杨主张向洋人学习的好东西（柏杨故意叫作“崇洋”，其实按他所讲，不能称为崇洋）

的这一个具体点或那一个具体点其实并不值得学；但是，怎么能说他的主张是“崇洋媚外”或者“全盘西化”呢？上引柏杨最后一段话，不明明是对崇洋媚外的殖民地意识的猛烈抨击吗？“他们有好的，我们就应该学。他们不好的，就不应该学。”这话不是我们说的，也不是抨击柏杨的批判者们说的，而是柏杨自己明确说的。这里连个风车的影子都没有，你们向谁宣战呢？

就如柏杨指出（鲁迅更是早就多次地论述过）的那样，有出息的中国人从来都是敢于向外国人的优点学习的；出于柏杨的行文习惯，他喜欢故作惊人之语，把学习说成崇拜，我们觉得这是浅显明白的谁也不会产生误会。现在的批评者是否真的不懂，我们表示怀疑。因此，我们觉得毋须多加解释。向洋人学习，中国共产党又何曾反对过？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不也是洋人吗？马克思主义不也是“洋货”吗？王明式的教条主义证明，即使是马克思主义，要“全盘西化”也行不通；对于资本主义国家的东西，也同样如此。柏杨对资本主义的议会制度、选举制度和司法独立、司法陪审等等肯定得过分，我们不赞成；但是，资本主义的这些东西也并非全无是处。就以民主政治来说，这里当然包含着虚伪的假民主，但更要看到这是欧美劳动人民和工

人阶级经过两三个世纪的不懈斗争才获得的有限的民主权利；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民主采取完全虚无主义的态度，实际上是否定了两三世纪以来工人阶级的斗争成果。柏杨说：“再浪费的选举，总比杀人如山、血流成河要好”，以此说明资本主义的民主制度至少比毫无民主法制可言的状况要强一些。这些话，很难说有多么“反动”。

为了强调要向“洋”学习，有时适当地指出美国并非好像一朵花时，更多地是谈到美国人的一些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他讲到《丑陋的美国人》这本书在美国的遭遇是国务院拿来作他们行动的参考，还说，“关于美国人的坏话，美国人自己讲得太多了，这是我非常羡慕的地方。”梁超然由此断定，这就是“媚”外。指出中国人的某些缺点便是“诬蔑”，指出美国人民的某些优点就是“媚”外，这是什么标准？外国人指出中国民族的某些优点，是不是就叫“媚华”呢？这显然仍是长期闭门锁国造成的一种不正常的心理状态的反映。假如梁超然能指出美国人对《丑陋的美国人》也同样大张讨伐，他们也禁止讲任何美国人的任何缺点，柏杨纯属不顾事实地大加吹捧，那才叫做“媚”或“拍马屁”；可是，假如事情果然如柏杨所讲的那样，又何媚之有？鲁迅早已多次说过，大陆人民现在也不断他说，现在柏杨也同样说，在中国讲真话往往要倒楣，这不又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吗？

华夏志、王凤海加给柏杨的罪状是“感谢帝国主义的侵略，因为他不以当个中国人为荣”。这句话是用黑体字排出来的，可见其重要了。如果此话成立，柏杨当然是活脱脱的一位汉奸卖国贼了。因此柏杨被指责散播（而且是“恶狠狠地”）“侵略有理、侵略有功的帝国主义及其奴才理论”，“中国的革命人民是绝对不会接受这种理论的，世界人民也不会欢迎这种理论”。端的是：

一千个不答应，一万个不答应，肺都气炸了！

但是，让我们看看作者是怎样说的吧：

鸦片战争是外来文化横的切入，对中国人来说，固然是一次“国耻纪念”，但从另一角度看，也未尝不是一次大的觉醒。日本对一些事情的观察，跟我们似乎不同。十八世纪时，美国曾经击沉了日本两条船，使日本打开门户，日本人认为这件事给他们很大的益处，他们把一种耻辱，当作一种精神的激发。

事实上，我们应该感谢鸦片战争，如果没有鸦片战争，现在会是一种什么情况？……所以我认为这个“国耻纪念”，实际上是对我们酱缸文化的强大冲击，没有这一次冲击，中国人还一直深深地酱在酱缸底层，最后可能将窒息而死。

我们说过，我们不同意柏杨对鸦片战争的看法。自从三十年代以来，以蒋廷黻为代表的一批买办性相当强的资产阶级史学家，对鸦片战争就抱有反民族的看法。他们反对林则徐，推崇琦善等投降派，此点我们知之甚稔，也坚决反对这套民族投降主义谬论。但柏杨的主张同他们并不是一回事。他讲了事情的两个方面。我们认为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里的分析才是正确的。他说：“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这才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柏杨当然不可能达到这种认识，加上他的“恨铁不成钢”的偏激心情，使他说出了“感谢鸦片战争”那种偏激的错话。华夏志、王凤海说我们“轻描淡写地表示了一点不同的意见”，

是“对柏杨估计不足”。我们认为，对于这样一个浅显的常识问题，在短短的《编后记》中只须点到即可。如果要对柏杨全书里的错话、偏激的话一一指出并加以批评，那得写一本比柏杨的书更厚的另一本书才行，殊无必要。关键是要透过柏杨著作的偏激的外衣，去理解它的基本合理内涵和苦心所在。这一点。对于一个不抱偏见的中学生来说也不难做到。在这里，我们还要提醒批判者再注意一下毛泽东讲的如下一段话：

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促进了这种（商品经济——引用者加）发展。外国资本主义对于中国的社会经济起了很大的分解作用，一方面，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基础，破坏了城市的手工业和农民的家庭手工业；另一方面，则促进了中国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

这些情形，不仅对中国封建经济的基础起解体的作用，同时又给中国资本主义生产发展造成了某些客观的条件和可能。

我们希望批判者重新学习一下这段文字，然后考虑一下自己对柏杨的判决。

柏杨还因为自己承认曾脱口而出他讲了“我不以当一个中国人为荣”而被加上了他“不爱国”的罪名。柏杨讲过“感谢鸦片战争”，这出于《中国人与酱缸》、见湖南版第27页；至于“不以当一个中国人为荣”则出于《正视自己的丑陋面》，湖南版未收此文。当然，只要是柏杨讲过的，自然也得负责。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华夏志、王凤海竟把相距十万八千里的两句话，由“因为”一词联起来，合成一句以构人罪的本领和勇气。远在台湾的柏杨不知道有没有领教过这种手法，经过“文革”的我们，却太熟悉了！它足以证明，柏杨在台湾坐九年牢是罪有应得。

柏杨是在谈到“至少，最近五百年来，真不知道中国人有什么伟大贡献”时，说他曾经“脱口而出地说：我不以当一个中国人为荣”的。我们当然不同意中国近五百年对世界没有贡献这一说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的胜利，就是对世界的极大贡献。但是，这句话怎样能证明柏杨“感谢帝国主义侵略”呢？至于柏杨究竟是一位爱国主义者还是一位卖国贼或洋奴、汉奸，应当看全书。这里又来摘录几段以见一斑。

在讲到中国人的“窝里斗”这种毛病引起不团结、外国人也批评中国人不知道团结这个问题时，柏杨说：

我只好（对外国人——引用者加）说：“你知道中国人不团结是什么意思？是上帝的意思，因为中国有十亿人口，团结起来，万众一心，你受得了？是上帝可怜你们，才教中国人不团结。”我一面讲，一面痛彻心腑。

他又说过：

中国人近两百年来，一直有个盼望，盼望我们的国家强大，盼望我们的民族成为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但是，多少年以来，我们一直衰弱，我们一直受到外人的歧视，原因在什么地方？

他这本《丑陋的中国人》，很大一个内容就是研究这个原因。老天爷有眼，请问，这会是一个对中国漠不关心甚至要出卖祖国的人说出来的话吗？上引的前一段话，又是柏杨寄忧愤于滑稽突梯的语言，他不是明明说他：一面讲，一面痛彻心腑吗？若据此而认为是侮辱中国民族，那就只有引用司马

迂的话了：“尚何言哉！尚何言哉！”

谈到印第安人由于种种原因，其中包括“他们对现代文明，拒绝吸收”而面临灭种的威胁时，柏杨还说：

每当我看到印第安人废墟，和他们文化的停滞，就感到心如刀割，不由的想到，会不会有一天，中华民族也像印第安人一样？

这种感情不能不说是爱祖国、爱民族的感情。并推己及人，把忧虑之情，寄托到了印第安民族的身上。类似意思的话，鲁迅也早已说过多次，并不是柏杨的创造。

我们还想读一读柏杨的这段话：

中国人平常爱国爱得不像话，每一件事都要爱国，结果把国爱成今天这个样子，我常想，不要再爱国了！或者，用剩下来的精力，先把自己爱好，先把自己的品质提高就够了。自爱就是爱国。

诚如朱正生所指出的那样（见《丑陋的中国人》下辑，湖南版未收入），柏杨“这个‘糟老头’的基本出发点却是‘我爱吾国，爱之切，故责之也苛’。他一方面是不满现状，而另一方面又恨铁不成钢，对自己国家的前途，深感叹惜！”柏杨这段“责之也苛”的话，有一点很可取：爱国者有两种，一种是柏杨式的爱法，批评这个，批评那个，总是觉得这个民族不够美，甚至还有点丑陋，希望它变得更美，更少丑陋。他这本《丑陋的中国人》、可以说真正的名称应当是“不要做一个丑陋的中国人”。而另一种爱国者呢，则是鲁迅《随感录三十八》中剖析过的五种“爱国的自大家”。——会不会还有第六种、第七种呢？也未必不可能。柏杨请这些人“不要再爱国”，强调“自爱就是爱国”，并不是毫无道理的。“文革”中，今天宣布“过长江”，明天宣布“超纲要”，写文章必然是“形势一派大好，不是小好，越来越好”，对揭露一点阴暗面者就要“砸烂狗头”的那种“爱国者”，可真的把我们这个国家爱得受不了啦！令人担心的是，这种爱国者很好当，随风增长，而且八面威风，不可一世。可惜的是，他们对于提高民族自尊心、自信力与虚骄、护短之间的区别似乎不大讲究。

自大的爱国不是真爱国。如果把我们的民族说成通体漂亮、不染纤尘就叫爱国，这只能是在灌输强烈的麻醉剂，不敢正视现实，于我们民族振兴的宏观毫无好处。鲁迅一生反对瞒和骗的文艺，其用意即在此。反之，如果指出我们民族还有很多毛病、缺点，就是对民族的污蔑，就是不爱国，就是“媚外”，那么我们就无话可说了。只有一点是十分明白的：浮夸、自大、虚骄、护短带给我们民族的只能是民族素质的退化和灾难，而绝不会是民族的振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六中全会之所以深得人心，就在于它重申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而且公开承认和揭露了自己的错误。这是我们党进一步成熟的标志，奋发向上的标准看不出《丑陋的中国人》的书名就是很偏激的，片面的呢，这是无需多讲的。问题是这本书的内容竟会全不见容于一些人，这倒更加证明作者写这本书的必要了。我们重印此书，看来也并不是不必要的。再说一句，良药苦口利于病。区区此心，可质天日，知我罪我，不再多言。

一九八七年十月

——原载一九八八年第一期北京《文艺理论与批评》

中国人丑陋吗？



## ——就教于柏杨先生

孙国栋

多年前，我读《汉书》，对夏侯胜和黄霸十分钦佩。后来听说柏杨先生因文字而下狱，在狱中读史、著述不辍。我觉得柏杨先生颇有胜、霸之风，对柏杨先生亦心仪不已。但一直工作忙，竟未读到柏杨先生的作品。最近有偶然机会买到林白出版社刊行的《丑陋的中国人》第九版，内收柏杨先生近年在美国各大学的演讲，并选载柏杨先生各文集中的散文。我一口气读完，觉得有些话，如骨鲠在喉，不吐不快，乃草此文，以就教柏杨先生。

—

柏杨先生把中国人今日的劣行，完全归罪于中国五千年有毒的文化，这是夸张的说法。我们先看柏杨先生的理据。

柏杨先生在美国爱荷华大学演讲时说：

“中国传统文化有一种滤过性病毒，使我们子子孙孙受了感染，到今天都不能痊愈。有人说：‘自己不争气，却怪祖先。’这话有个大漏洞。记得易卜生先生有一出名剧（《群鬼》）：有梅毒的父母，生出个有梅毒的儿子，每次儿子病发的时候都要吃药，有一次儿子愤怒地说：‘我不要这个药，我宁愿死，你看你给我一个什么样的身体？’这能怪他而不怪他的父母？”（24页）

柏杨先生根据此一推埋，于是认定今日的艰难是传统文化的罪过，认定中国五千年的文化历史充满罪恶。但是柏杨先生的推理也有一个大漏洞。《群鬼》剧中儿子所受的灾难，不错，是由他父母患了梅毒所致。但是父母身上的梅毒是否由五千年以前祖宗相传的病毒，抑或由他自己行为不端染来？如果这个家族，于五千年前已患了梅毒，则这家族一定早就灭亡了，不可能生存至今日。所以今日孩子的痛苦，可以归罪于父母的作孽，不可以归罪五千年前祖宗的作孽。中国今日的灾难，不必归罪于五千年前的祖先，近几百年来子孙的不长进应负更大的责任。

柏杨先生用这错误的推理看中国文化，于是对影响中国文化有力的儒学处处加以诬蔑，他说：

“儒家最高的理想境界似乎只有两个项目：一个项目是教小民如何藏头缩尾，国家事管他娘，而只去维护自己的身家财产。另一个项目则是求求当权派手下留情，垂怜小民无依无靠，用御脚乱踩的时候稍微轻一点。”（126页）又说：

“儒家的全部教训中，很少激发性灵，很少鼓励竞争，而只一味要他的徒子徒孙安于现状，踌躇满志，啥都可干，就是不可冒任何危险。”（126页）

这两番话，如果不是无知，就是最恶毒的诬蔑。中国古代学术，自先秦诸学派兴起以后，对人生态度有两种思潮：一是儒学，代表刚健的一面，他教人的最高标准是成仁取义；一是老子和杨朱，代表阴柔一面，他教人应顺客观的规律，以全身贵生为宗旨。这两种思潮在社会流布，都发生很大的影响。儒家的面目却是极鲜明的。孔子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见义勇为无勇也”、“三军可以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这些都是世人所熟知的儒家教训。这是教人“藏头缩尾”吗？这是毫无性灵的吗？所以历来为国家民族殉难死命的志士，大多是儒家。现《廿四史》所

载，忠愤耿耿死节之士无虑千人，大多受儒家熏陶，尤其《廿四史》中之《忠义传》、《节义传》、《诚节传》中守死不屈的人物，更多服膺儒学。至于集体对抗当权派，如东汉李膺、陈蕃等领导受经学的太学生与宦官恶势力的斗争，以至造成惨烈的党锢之祸；晚明东林党人与阉党斗争，所造成血淋淋的史实，都可以说明儒学的精神。请问这是柏杨先生所说的：“国家事管他娘”吗？这是“啥事都可干，就是不可冒任何危险”吗？柏杨先生时时拾取一些市井俗言如“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之类诬蔑儒学，这几近恶史之栽赃、学术之欺诈。

儒学重视仁义，柏杨先生说：“仁是当权派对小民的一种怜恤和同情，乃施舍的焉、赐予的焉、表示慷慨大度的焉、幼稚园教习对小孩子的焉。”（116页）仁是发自内心的内心的真情，由此实践而为各种善行。所以说“侧隐之心，仁端也”、“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巧言令色，鲜矣仁”，都从你自己内心出发，为什么一定是当权派的呢？施舍的呢？

柏杨先生又说：“孟轲先生的学说便是‘何必曰利，唯有仁义而已’的，这位不曰利的祖师爷，为千万个酱缸蛆制下了仁义的假面具，明明害了杨梅大疮，鼻子都塌啦，却把面具一戴，喊曰：‘都来看呀，俺好漂亮呀’。”（123页）

这真是最粗鄙恶俗的奇文！为什么教人轻利害、重仁义是为后代制造遮掩杨梅大疮塌了鼻子的假面具？柏杨先生前面诬蔑儒家教人“国家事管他娘，而只去维护自己的身家财产”，此处又攻击孟子重仁义，轻利害的教训。这岂非思想昏乱、前后矛盾！二柏杨先生说：“若干年前，我在洛杉矶有一次演讲，有人问我，‘你是否以当一个中国人为荣？’我脱口而出说：‘我不以当一个中国人为荣，请你告诉我，中国人的荣耀在哪里？是我们国家强？是我们文明高？是我们民族对人类整个文化有建设的贡献？是我们的音乐、绘画、文学出类拔萃？我们到底有什么？请随便讲出一个我们国家有，其他国家没有，或是我们可以和其他国家同享荣耀，举得出来吗？’”（41页）好一串声势汹汹吓人的问话！不错，近几百年来中国的社会科学、自然科学都落在西方之后。如果我举出文学、史学、艺术、哲学等来和西方比较，那一定引起大争论。最近内子研究《毛诗》，我想到三千年前的文学，其脉搏竟仍在今日的文学中跳动，在我们现在生活中仍活泼有生命。《诗经》中的句子，今日我们还常挂在口边。如“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一日不见，如三秋兮”、“有女怀春，吉士诱之”……这种至今仍葱茏有生意的句子，在《诗经》中随处都是。请想想，有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民族，她三千年前的文学仍能活泼泼地应用于今日的日常生活中的？本人粗涉史学，对于中西史学的优劣长短，因为问题太复杂，此处不能讨论，但是史学的基础在记事，只就记事一端而论，则中国史比西方史详备，可以无疑。中国周以前诸史，姑置不论，自周共和元年开始，即有编年史。秦以后自汉高帝元年（前二六年）以下的大事有各正史的本纪逐年记载。换言之，自周共和元年（前八四一年）开始，直至今日，前后二千八百余年大事，具有编年记载。请问哪一民族、哪一国家能有一部记载二千八百余年大事的编年史？从这两件事表现中国文化藏潜着一种持久性。如果我们能从此处探究，或可以找出中国民族所以能绵绵几千年的一些消息。

柏杨先生论事时时信口夸张，以至陷入自相矛盾。他在美国面对许多留美的中国人，他们在学术上事业上都有出色的表现，于是不得不承认中国人的智商不低（45页）。但跟着说：中国的文化酱缸可以消灭智商。而此文化酱缸的形成，由于定儒家于一尊，以后“时间一久，知识份子的思考能力衰退，由于没有思考能力，因之也没有想像能力，由于没有想像能力，因之没有鉴赏能力”（46页）。中国人既然已没有思考能力、没有想像能力、没有鉴赏能力，何以留美的中国学人智商不低呢？难道两千余年积弱造成的无思考能力、无想像能力、无鉴赏能力，一旦踏入美国就会变为高智商？可见说中国人丧失了思考能力、想像能力，不过夸张之词而已。

柏杨先生很赞赏鸦片战争，他说：“我们应该感谢鸦片战争，如果没有鸦片战争，现在会是什么情况？……如果鸦片战争提早三百年前发生，也许中国改变得更早些，再往前推到一千年前发生的话，整个历史就会完全不一样。”（66页）柏杨先生对鸦片战争引起中国改革这一看法，未尝不无道理，但柏杨先生知否，如果推前一千年前，则是公元九世纪，那时中国正当唐代，而欧洲都在中世纪的“黑暗时代”，中国当时的文明远超前于欧洲，东方各国正大派留学生来中国留学。欧洲到了十七、十八世纪的启蒙运动还受中国思想的影响！为什么柏杨先生会有推前一千年的说法呢？只有一种解释——因为柏杨先生心中有一个错误的观念，认为中国几千年历史一片黑暗，而西方历史却一片光明。柏杨先生说他崇洋不媚外，这样是不是一种媚外的心态？

#### 四

我上面所述的，只是因为柏杨先生对中国历史文化信口开河、肆意诬蔑所提出的质疑。柏杨先生有一句话：“反省是走向进步的开始”。很对。但是对个人的反省容易，对民族的反省很难。对民族的反省必须有几个条件：第一要对民族有爱心。无爱心决不会为此民族作出真正的反省；第二要对这个民族的历史文化有认识，不然，决反省不出真道理。尤其对一个有五千多年历史的民族，她今日的问题，与历史上政治、经济、社会、伦理、家庭、宗教、学术思想、地理环境以至与外族关系种种条件相关联，要从此错综复杂的诸因素中找出问题的症结，是一番大学问；第三要诉于理性，不能轻肆感情。一时的激情，只会蒙蔽眼睛。同时反省时所求了解的，不仅是当前各种病态的根源所在，更应了解此民族生命所寄托之点何在？此民族生存的力量何在？从《丑陋的中国人》一书所表现，柏杨先生对中国历史文化的认识太浅，而且不诉于理性，只肆意漫骂、全盘否定中国文化的价值、摧残中国人对民族的爱心，这样是真正的反省吗？能唤起中国人真正的反省吗？我想一般人读了柏杨先生这几篇文章，可能会起两种极端不同的反应——一种以当中国人为可耻，于是自外于中国人；一种是认为柏杨先生所讲的俱为夸张不实的谎言，因而根本上不承认中国人有缺点。这两方面对中国今后都是有害的。所以我认为柏杨先生此书，对中国的改进起负面作用远多于正面作用。

中国文化当然有弱点，世上未有十全十美的民族文化；中国近几百年来确实患了病，世上亦未有长久健康的民族。我们决不能因中国文化有弱点、民族有病患，而谓中国文化全盘黑暗、满身罪恶。地球上自出现高级文化以来几千年，被淘汰的民族不知多少，而中华民族屹然存在，这证明中国文化虽有弱点，必别有坚实光明的一面；中国人今日虽有丑陋处，亦必有其可爱的一面。柏杨先生如果希望中国人能改进，请不要摧残中国人对民族的爱心。同时我愿柏杨先生了解：文化生命与自然生命有相似之处——丰富的养料要

经过生命本身的消化吸收，然后可以生长强隆；杜绝了生命之根，纵然有最佳的养料，对生命已全无意义。

我只是一个教书匠，我所接触的青少年包括小学生、中学生、大学生、研究生。三十几年的教学生涯使我认识到一个道理：要青年上进，不但要非常正确地、不夸张地指出他们的错误，更要培养他们的自尊心与自信心。凡伤害了他们的自尊心与自信心，只会使他们自暴自弃。柏杨先生不顾事实，无情地打击中国人的自尊心与自信心，是要使中国人改进呢，还是要使中国人自暴自弃？

——原载 1987 年 3 月 1 日北京《光明日报》

## 《丑陋的中国人》读后

邵纯

有朋友自远方来，送给我一本以《丑陋的中国人》作书名的杂文集，里面收录了柏杨先生以书名为题的一次演讲。

全文万字有余。概括说来，有这样几个观点。

第一，中国人是丑陋的，事事不如外国人。

第二，丑陋的特征是脏、乱、吵，“窝里斗”、心胸窄、讲假话、不自尊、不直爽、不认错……

第三、丑陋的原因，是中国文化中有“滤过性病毒”（注：即没有细胞结构，但有遗传性的微生物，需用电子显微镜才能观察到）。

第四，疗救的药方是想法子把自己培养成为有“鉴赏能力”的人。

说实话，阅读这篇文章的时候，我一个劲地冒冷汗！生为中国人，被自家的同胞写得一无是处，蛆虫不如，果真如此的活，有什么颜面活下去呢？冷汗过后是冷静的思考。我感到柏杨先生差矣！此文用哈哈镜照中国人，滑稽可笑，严重失真。

所谓中国人，当包括中国大陆、台湾省、港澳地区、海外华侨的全部炎黄子孙。柏杨先生例举的丑陋思想和行为，确实有，但绝非中国人全都如此。比如“黎明即起，洒扫庭除”，中国人爱清洁的多著哩；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高风亮节者挺立如林；讲中国人互相拆台“窝里斗”也绝非尽然，柏杨先生讲到的杨振宁、李政道两位科学巨子，不正是通力合作的典型吗？

目前的中国人，生活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信念、理想、道德、伦理差别很大，怎么可以同日而语呢？比如吸毒观念，这样的丑陋行为，在中国是犯法的，解放初已绝迹，这是外国人也交口称赞的。

看中国人，看外国人，都不应以偏概全。如果一个民族的成员有这样或那样的缺点，这个民族就被斥之为“丑陋的民族”，照此推论，早该有“丑陋的人类”之说了。

柏杨先生说：“自孔丘先生之后，四千年间，没有出过一个思想家！”（注：孔子生于公元前五五二年，如活到今天，当两千四百余岁。”四千年”之说十分奇怪）他认为中国人师承儒学，造成了“中国文化的酱缸、酱缸发臭，使中国人变得丑陋。”这个观点，同样犯了以偏概全的毛病。

任何一个民族的传统文化，都有精华与糟粕之分。中国的传统文化浩瀚如海；其中优劣并存。作为当代中国人，特别是文化人，对祖先要有客观公正的态度，历史地评价他们的功过；对后代，应尽长者的责任，帮助他们从优避劣，摒弃糟粕，含英咀华，吸取精神营养。黑格尔创造了“扬弃”一词，在哲学上是一大功劳。扬者，保留、发扬合理的东西；弃者，否定、抛弃腐朽的东西。

柏杨先生痛心疾首地历数了“中国人”的种种陋习，但怎样医治这些毛病呢？很遗憾，他只在文章的结尾，以寥寥数语，开了一个无药的药方，即要求人人成为“鉴赏家”，并说这是唯一的出路。用柏杨先生的话说，就是有能力分清“美女和麻子”。“鉴赏”是一种认识活动，尽管重要，但并不等于改变现实。比如，一个身无分文的穷光蛋，即使能鉴别价值连城的出土

文物，他依旧是个穷光蛋，那文物绝不属于他。

中华民族经历了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又经历了近百年的受资本主义侵略和压迫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历史遗留下来的消极影响至今并未肃清。正因为这种原因，中国大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摆到战略地位，予以高度重视。这种精神文明建设是一项庞大的社会系统工程，其中就包括了“批判地继承人类历史上一切优良道德传统，并要同各种腐朽思想道德作斗争”的任务。在我们看来，这才是克服种种陈规陋习的唯一正确道路。

柏杨先生是台湾省作家，一九六八年被台湾当局判处死刑，后改判有期徒刑，关了十年大牢后出狱，这种遭遇是令人同情的。从他的经历出发，说些激愤之词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柏杨先生离开中国大陆已近四十年，对这里的情况没有真切、直观、理性的了解。我想，柏杨先生如果回国观光，看看十亿中国人民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上的巨大的变化，很可能会改变他的观点的。

——原载一九八七年三月十五日乌鲁木齐《新疆日报》

## 鲁迅、柏杨异同论

### ——评《丑陋的中国人》

梁超然

并不是笔者忽发妙想，要把鲁迅先生与柏杨先生相提并论，比较一番，而是《丑陋的中国人》、《编后记》（下简称《编后记》）说了柏杨“继承了鲁迅先生‘意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的正视现实的优良传统”，说了“柏杨先生（关于酱缸与 酱缸蛆）的这一分析和形容，就是把鲁迅先生指出的（昏乱）这个毛病观察和剖析得更透彻了”，说了柏杨的“崇洋”“也就是对鲁迅‘拿来主义’的发挥”这样一些话，使笔者不禁将鲁迅先生与柏杨先生进行了一番比较。比较的结果是大异而小同，深感《编后记》所论大谬不然，故只得握管为文，做此异同论，一来评一评《丑陋的中国人》，二来说一说对《编后记》的异议。

之所以要评一评《丑陋的中国人》，是因为它在青年读者中广泛流传，第一版就印了九万册；之所以要说一说对《编后记》的异议，是因为《编后记》所论关系着对一种思潮的评价，以及怎样引导青年读者的问题。“非好辩也”，实有此必要焉。

#### 脊梁与酱缸

诚如《编后记》所说，柏杨先生《丑陋的中国人》（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下引柏杨言论均出于此，不另注明）一书确实揭示了“我们民族”种种“丑陋”的性格或心理状态”。通观全书，柏杨对中华民族及其文化有一个总的看法，那就是：中华民族文化是一个“酱缸”，一个“发酸发臭”的“酱缸”，而中华民族文化的成员（即柏杨笔下的“中国人”）则“上上下下，大大小小”“大多数中国人”就是生活在这个“发酸发臭”的“酱缸”里的“酱缸蛆”。“中国人在这个酱缸里酱得太久，我们的思想和判断，以及视野，都受酱缸的污染，跳不出酱缸的范围。”“在这种长期酱在缸底的情形下，使我们中国人变得自私、猜忌。”以至“落到今天这种丑陋的地步”，故中国人概而言之曰：“丑陋的中国人”云云。在柏杨先生眼里，中国文化传统应该通通抛弃，因为“中国文化的酱缸发臭，使中国人变得丑陋。”据《编后记》说，柏杨比鲁迅先生“观察和剖析得更透彻了”。

鲁迅先生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也在探究中国的国民性，揭示民族文化的劣根性，无情地抨击旧中国的旧思想、旧道德、旧习惯、旧习俗。鲁迅先生也曾用过“黑色染缸”形容中国文化传统的强大惰性。但是，即使鲁迅先生还是一个进化论者的时候，他也没有把中国文化看成一团漆黑。他说过：他自己对于中国的进步亦毫不悲观。他认为“历史上都写着中国的灵魂，指示着将来的命运。”鲁迅在探究国民的劣根性时，始终把当权者、暴君和被统治者区分开来。对于阿Q们，鲁迅也揭示他们的弱点、劣根性，但对阿Q他是抱有希望的。鲁迅先生曾说过：“中国倘不革命，阿Q便不做（指做革命党——笔者），既然革命，就会做的。”（《鲁迅全集》三卷，《阿Q正传的成因》）而对赵太爷、假洋鬼子之类则完全不同，对他们，鲁迅先生是怀着深深的憎恶感情给予猛烈抨击的。鲁迅先生这种是非好恶分明的态度越到后来越清楚，后期的鲁迅先生曾十分明确地表白他对我们民族的坚定的信念：“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

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这是何等崇高的民族自豪感！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在我们这个民族里培育了多少这样的脊梁，他们支撑着中华民族的躯体，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天地有正气”，中华民族的正气是不容抹煞的，他们在人类文明史上熠熠生辉，光照古今，启迪后人。鲁迅先生怀着豪迈的、热烈的感情赞美中国人民的优秀品质，读之令人精神振奋，心怦怦然不能自己！它催人奋发，催人向上。

这说明鲁迅确立了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之后，他对历史对现实的分析就更深刻。早年，他从俄国革命胜利“在刀光火色衰微中，看出一种薄明的天色，便是新世纪的曙光”，这样的认识还只是一种朦胧的觉醒。在现实斗争中，他进而认识了“惟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认识了“无产者对于政治改造最意味的阶级”。鲁迅先生以响彻云霄的豪迈之声讴歌现实的革命者：“那切切实实，足踏在地上，为着中国人的生存而流血奋斗者，我得引为同志，是自以为光荣的。”他对为中国的进步解放而奋斗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尊敬、仰慕之情溢于言表。如果鲁迅先生生活在今天，在中国大陆已经进入了一个新世纪，他会以上百倍的激情讴歌在中国大地上切切实实奋斗的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讴歌一切建设新世纪的爱国仁人志士。因为鲁迅先生深深懂得，在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革命队伍身上“寄托着中国与人类的希望”。

从这里的分析中，我们看到了鲁迅先生与柏杨先生在历史观。现实观上的本质区别。在柏杨眼里，中国人都是丑陋的，只是大大小小的酱缸蛆。这是柏杨先生的观念、方法不对的缘故。如果不嫌冒昧，是不是请柏杨深刻地思考五十多年前鲁迅先生的一段话：

要论中国人，必须不被搽在表面上的自欺欺人的脂粉所诓骗，却看看他的筋骨与脊梁。自信力的有无，状元宰相的文章是不足为据的，要自己去看地底下。（《鲁迅全集》第六卷，《中国人失掉了自信力了吗？》）

这里我们再套用鲁迅先生一句话赠给柏杨先生：说中国人丑陋，用以指一部分则可，或者说中国人有丑陋的弱点则可，倘若用以加于全体，就是以偏概全，那简直是诬蔑。

柏杨先生缺乏唯物辩证观点，原不足以为奇。可怪的是我们的出版家，竟然会认为这样一些以偏概全、缺乏辩证观点的有害看法，比鲁迅先生“观察剖析得更透彻”，这究竟是何缘故呢？我们很想请教一下《编后记》的作者同志们，不知你们说这句话的根据何在？

#### 疗救与无救

《编后记》认为柏杨先生也和鲁迅先生一样，“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柏杨自己也以“医生”自居。细细分析，这又不能等量齐观。

医生治病首要是正确诊断病症。譬如说，病人只是得了胃溃疡，医生就不应夸大为胃癌，已经无法可治；甚至诊断为癌细胞早已扩散全身，马上就会身亡。确诊是疗救的基础。确诊之后还要找出病源，然后才能对症下药，使病人痊愈。如果将鲁迅先生与柏杨先生在这个方面进行对照，那么区别也是十分明显的。譬如说《一盘散沙》这个痼疾吧。柏杨先生写过《一盘散沙》这篇文章，他是怎样“诊断”这个疾病的呢？他说：



任何一个社会和任何一个人，多少都有点崇拜权势，但似乎从没有一个社会和从来没有一个民族，像中国人时权势这么痛狂，和这么融入骨髓。任何一个社会和任何一个人，也都有点自私，但同样的也从没有一个社会和一个民族，像中国人这么自私到车不可破。

大家注意了，柏杨这里说的是“融入骨髓”“牢不可破”，说的是“从来没有一个社会和一个民族”。那么，在柏杨眼下，中国人这种痼疾是先天性的、全民族的、全社会的，不仅是“世界第一”，而且是“古今第一”，这当然是无法治愈了。

鲁迅先生在《南腔北调集》里，也有一篇《沙》，也是论述《一盘散沙》的。鲁迅先生又是怎样“诊断”的呢？请看：

近来的读书人，常常叹中国人好像一盘散沙，无法可想，将倒楣的责任，归之于大家，其实这是冤枉了大部分中国人的。小民虽然不学、见事也许不明，但知道关于本身利害时，何尝不会团结。先前有跪香，民变，造反；现在也还有请愿之类。他们的像沙，是被统治者治成功的，用文言来说，就是“治绩”。

那么，中国就没有沙么？有是有的，但并非小民，而是大小统治者。

鲁迅先生以深邃的眼光，精到地分析了一盘散沙的问题。鲁迅先生深刻地指出：“沙”主要是在大小统治者那里，一盘散沙乃是统治者的治绩；说一盘散沙其实是冤枉了大部分中国人，“小民”（亦即老百姓、群众之谓也）在为自身的利益起而斗争时，是会团结起来的。在这里，谁的“诊断”正确呢？我想读者是不难辨别的。例如，在中国大陆，推翻了旧的统治阶级，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团结奋斗，还有多少散沙的影子呢？“一盘散沙”这个痼疾，在中国广阔的大地上，正在被治愈了，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正在进一步巩固发展。虽然柏杨先生不愿意谈这方面的问题，据说“这是政治问题”，但这样的现实存在，是任何一位爱国的炎黄子孙都乐于看到而且津津乐道的，连“洋人”也无法否认。这样的现实，证明了鲁迅先生诊断的正确。

大概当医生的都会知道，要治疗病痛，精神的力量是很重要的，要鼓舞起病者的信心，使病者满怀信心去和疾病作斗争（这种信心在一个社会一个民族里就叫做“民族气”、“民族精神”）。不知道这一条，就不是一个医生，至少不是一个称职的医生。夸大病的严重程度，使病者看了诊断完全泄了气，丧失了和疾病作斗争的信心，则是一个坏医生。例如，一个病人，长了一个疮，固然不能像“昏蛋”那样去“赞美”什么“红肿之处，艳若桃花；溃烂之时，美如乳酪”，但也不应说，你得了全身溃烂之症，行将就木。这样一说，病者精神吓瘫了、崩溃了，也就根本没有信心和力量与病痛作斗争。这样的医生，其用心就很值得考究了。

柏杨的“揭示”所起的作用，正有似于此。我们不必举太多的例子，他在演讲《人生文学与历史》这个题目时听众的反应就很说明问题了。听众 H 提出：“我（听后）有个印象，中华民族是有这么多缺点，自私得没有救药。”听众 M：“我们心里感触很深，觉得很痛心，很泄气，很难过。”听众 L：“今天他（指柏杨）说的话，把我们五千年的历史说到坟墓去了，不能使我们唤起民族精神，这一点我今天来听，觉得很遗憾。”这些听众的反应，正道出

了柏杨的根本问题之所在。柏杨夸大、展览中华民族的缺点，只能起毁灭我们的民族自尊心，打击民族自信心的效果。本来是可以疗救的，也变成了无可救药。

鲁迅先生批判国民劣根性，揭出病苦引起疗救注意之时，总是恰当指出，给人以希望，鼓舞起民族的自尊心与自信心，鼓舞人们前进。他总是对未来充满希望，他总是把现实的黑暗面与光明面区别开来，要人们“有正视这些黑暗面的勇猛和毅力”。“旧象愈摧破，人类便愈进步。”鲁迅先生满怀热切的心情说：“不过，中国经了许多战士的精神和血肉培养，却的确长出了一点先前所没有的幸福和花果来，也还有逐渐生长的希望。”（《鲁迅全集》第三卷，《黄花节的杂感》）读鲁迅的作品总是能够对前途充满乐观，充满希望，增强奋勇前进的勇气。

柏杨先生与鲁迅的优良传统虽不必说是南辕北辙，但至少也是差之千里了。可惜我们《编后记》的作者们竟看不到个中之质的不同，反而把柏杨与鲁迅等同起来，甚至以为超过了鲁迅，他们的眼光反而比不上住在国外的听众。这样一来给青年读者以怎样的影响，难道不值得我们深长而思之吗？

#### 革命与西化

如果说柏杨先生与鲁迅先生在诊断上差之千里，那么所开的药方则是毒剂与良药之别了——这绝不是危言耸听。

我们知道，鲁迅先生在揭出病苦之后，给人们指出一条非常正确的道路，那就是：革命、改革。鲁迅先生以为除此之外再没有别的路。鲁迅先生挖出中国国民的劣根性的目的是为了让人看清楚其弊害，“因为倘不看清就无从改革”。鲁迅先生也主张向外国学习，然而他从来反对把“洋”的一套全盘搬过来。他认为的“洋”的一套“还得加一番慎重的选择”，“只要是优点我们也应学习”。但鲁迅先生始终认为改造国民性的根本道路在于改革，在于革命。他说“除了再想法子来改革之外，也再没有别的路。”“所以我想，无论如何，总要改革才好。”鲁迅先生遵革命前驱的将令，热情讴歌革命，参与英勇的斗争。他说道：“人生现在实在苦痛，但我们总要战取光明，即使自己遇不到，也可以留给后来的。”他认为“其实革命是并不稀奇的，唯其有了它，社会才会改革，人类才会进步。”鲁迅先生这样总结自己的思想历程：

先前，旧社会的腐败，我是觉到了的，我希望着新社会的起来，但不知道这“新的”该是什么，而且也不知道“新的”起来以后，是否一定就好。待到十月革命后，我才知道这“新的”社会创造者是无产阶级，……使我确切扫除了怀疑，而且增加了许多勇气了。

鲁迅先生也以自己的笔参加了中国革命的斗争。他所开出的“药方”为中国的革命进程所证实了。革命、改革是医治国民劣根性的应验良方。

那么，柏杨给中国开了什么“药方”呢？他也认为中国人只有一条路可走，什么路呢？他说：“洋大人纷纷崛起，打也打不过，骂也骂不赢，只好往事如烟。现在唯一的办法只有学学他们那一套，而且也只有这一条路可走。”柏杨要中华民族学西洋“那一套”是《编后记》所说的“其实是专指以我为主吸收西方先进文化科学和他们比较文明合理的那一部分社会风习而言”吗？不对了！柏杨所说的“那一套”，就柏杨笔下所提到的“那一套”

至少包括“政治制度”、“民主政治”，“洋枪，洋炮，铁甲船”、“教育、艺术、礼仪、做人的道理，和处世的精神”，甚至连笑容也要搬“洋大人”的。这种全盘“洋”化的理论，我们是十分耳熟的了。

柏杨先生说“彻底崇洋”，又辩解说“绝对崇洋，但不媚外。”如他能真正恪守这样的原则倒也可说，然而，事实恐不像柏杨先生的“宣言”说的那样。在《丑陋的中国人》一书中我们看到了这样一个场面：

听众 K（美国人）：您今天演讲的题目好像是专门说中国人的坏话，我想请您也说说美国人的坏话（笑声），就您所看到的书，及您在美国所看到的事，您觉得美国有什么地方，应该向有五千年历史的中国学习？

柏杨：“关于美国人的坏话，美国人自己已讲得太多了，这是我非常羡慕的地方，因为美国有自我平衡，自我反省，自我调整的力量。自己有错的地方，都自己讲出来，自己接受，自己能鉴赏，这一点我们中国人不能。……美国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太多了。美国当然不可能十全十美，因为世界上没有十全十美，至少美国的邮政就坏，投递既慢，而又经常放假。但我们也应该庆幸美国不十全十美，假如美国是那样，他就僵化了。”

请看，这就有点“媚”了吧？是不是有点“媚”态可掬了呢？鲁迅先生曾经深刻地讽刺新月社对党国的“微词”，说这只不过是说主人老爷的衣服有点脏罢了，其实是献“媚”。那么，说美国邮政投递慢之类“微词”，大概只等于说洋大人的衣角有一点点灰尘了，“媚”中之媚了吧？在上列引文中略去之处（因为太长了）柏杨还声言要“彻底崇洋”。该又是崇也者，崇拜之谓也；崇拜而到了“彻底”，就是到了极致，那就是五体投地。到了五体投地，非“媚”而何？所以柏杨主张把“西洋文明”“那一套”搬过来，包括笑容，以为这是唯一的出路，这就没有什么奇怪了。

《编后记》又认为柏杨的“崇洋”“也就是对鲁迅的‘拿来主义’的发挥。”这更是风马牛不相及的类比了。鲁迅先生“拿来”绝对不是“崇洋”，也不是主张把西洋“那一套”全搬过来，连同笑容。众所周知，鲁迅先生提出的“拿来主义”，主张“我们要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来拿。”“占有，挑选。”区分“鱼翅”和“鸦片”，分别处置；更不能“吸剩下的鸦片”。如上所述，鲁迅先生认为根本出路在于自身的改革与革命，“拿来”仅是自身改革过程中的一个辅助手段，绝不是什么“唯一的办法”。

简而言之，以自身的革命与改革为出路的乃是千金良方；而以仿效西洋，把西洋“那一套”全搬过来作为“唯一办法”的主张乃一贴毒剂。我们切不可像《编后记》所说的，“吃下这颗丸药”。否则，乱投药石，必将贻害身心，贻害民族！这是至关重要的原则。

其他方面鲁迅先生与柏杨先生尚多有异者。例如鲁迅先生历来反对“辱骂”，他的名言是“辱骂和恐吓绝不是战斗”；可是柏杨先生左一个“他妈的”，右一个“大酱缸蛆”，无乃太缺少气度。又如柏杨先生在对比时，常常是以中之古比洋之今，跨越时间长河去类比，违反了逻辑。鲁迅先生绝不作这样的比较。当然，最主要的是鲁迅先生“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毛泽东）”对于柏杨先生，我觉得他在海峡的那一面，能勇敢地揭示政治社会的弊端，是有勇气的，值得肯定。但是他的作品缺乏辩证观点，缺乏历史唯物主义的眼光，带有极大的片面性与偏见。

由此，我想到在对外开放时，我们出版界应该向外“拿来”（包括向港

澳台湾“拿来”），但是还是要像鲁迅先生所说的，要“沉着，勇猛，有辨别，不自私”，“要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来拿”，确实给读者以有益的精神食粮。而一些沙石俱下的作品，则应本着“有辨别”的原则，以负责的态度给读者以引导，使读者免受污染。这就要求出版家有眼光，这里自然是指政治眼光和艺术眼光，而不是“一切向钱看”的眼光。不知出版界的同志们以为然否？

编者按：作者是民盟中央委员，现在西北大学中文系工作。

——原载一九八七年第三期《文艺理论与批评》并见同年第二期北京《中国图书评论》

## 再论鲁迅与柏杨

——兼答《丑陋的中国人》的编者

梁超然

关于“前论”的前记

我钻进古书堆，搞点考证，给青年学生讲几句唐宋之诗日久矣，对当今文坛情状实不了了；所以去年初，当我执笔写《鲁迅柏杨异同论》（下简称“前论”）的时候，有好心的朋友告诫我说，现在的氛围下写批评文章是要惹事的，不如不说为好。我深感惊讶，果真如此么？然而正如“前论”所云，感到实有此必要，也就写了。说实在，从朋友的告诫中，我对反批评也是有思想准备的，虽不像别人那么有先见之明。

此所谓“必要”并不是如《丑陋的中国人》的编者（下简称编者）反批评所说的“重大事情”。对于编者们所说的“重大事情”有党中央的文件在，我完全拥护。关于这个问题，插一句话，还是前不久中央一位负责同志所说的对：“总之，要记住我们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是两个基本点，不是一个基本点，丢了哪一个也不行。”我的认识还没有那么高，把我写“前论”提到“基本点”的高度。我只是在接触一些天真可爱的青年学生时，常听到他们这样一些话：甭说咧！中国人、丑陋得很！“就是的，中国人就是比人家丑陋！”说话中对中华民族鄙薄的口气，神态，令人毛骨悚然。我对这些话不免产生“杞忧”。我想，我们一些青年人把我们以之为光荣的“中国人”竟如此贬损，民族自尊心又何在呢？后来，承这些青年朋友介绍，我认真地拜读了柏杨先生的《丑陋的中国人》（湖南文艺出版社翻印），感到柏杨先生并不像《编后记》所说，他和鲁迅先生实在“大异而小同”，某些问题和鲁迅先生可说是背道而驰，而非“观察和剖析得更透彻了”。对这些，若不加以分析，对青年人是会产生消极作用的。我实在不想“听”什么人，我也没有想上什么纲，更没有权判人下地狱（因之，也就没有把人捧上天的权）。我只是想提醒青年人在读这本书时要注意分析，提请掌握衡文大权的出版家们在出版诸如此类书籍时，要对读者加以正确的引导。如此而已！

我写“前论”的出发点，其实就是我十分尊敬的一位前辈杂文家所说的：“一个民族如果不十分尊重自己优秀的文化传统，不敬仰和怀念自己民族的仁人志士和民族英雄，不发扬自己民族的一切正义、勇敢和对外敌坚强不屈的民族气概，那么，这个民族一定会衰微下去，还谈得上什么民族振兴呢？”正是这样，我和这位尊敬的前辈一样，对中华民族的脊梁被贬损，是感到痛心的。现在，据说有人要扇屈原、杜甫的耳光了；对优秀的民族文化越贬损得厉害，就越是创新的情况也实在令人担心！

以上是我写“前论”时的想法和出发点。对“前论”“一眼看透”了的同志，大概对这一点并未看得很透，所以在这里把自己的“底”先透一透。

我期待着反批评，如果反批评确实令我信服地指出我说错了，我准备改正。我怀着十分尊敬的心情拜读了编者的大作《护短与爱国》，说真的，我感到失望，怅惘、遗憾。似乎没有多少值得回答的。但是，在读这篇文章时，又有一些感触，加上“前论”只提了一点头，所以想在这里再说一说柏杨与鲁迅之异，编者对“前论”所提的一两点“批评”，也顺便回答一下。所以副标题为“兼答”。

我对柏杨先生的总认识，“前论”已经说了，这里重抄一次：“对于柏杨先生，我觉得他在海峡的那一面，能勇敢地揭示政治社会弊端，是有勇气的，值得肯定。但是他的作品缺乏辩证观点，缺乏历史唯物主义眼光，带有极大的片面性与偏见。”编者在《护短与爱国》里也承认了柏杨确有“片面”“偏激”“错话”而且也认为对这些是应该“加以批评”的。我想既然如此，为了对读者负责，对社会主义事业负责，就应该认真地指出它何者为“片面”，何者为“偏激”、何者为“错误”，错在何处。只有这样才是正确的态度，才不是“护短”。基于这样的认识，所以，我写“前论”就不是多余的了。

以上是为前记，自然，多是关于“前论”的。

再说“缸文化”

编者“批评”（从编者那里借来的用语）我“未能把握柏杨这本书总体思想”，“梁超然给柏杨这本书的头一个结论是，‘柏杨对中华民族及其文化有一个总的看法，那就是：中华民族文化是一个酱缸’”，“‘中国文化传统应该通通抛弃’”。说这个结论不能成立（原话是“如果它能成立，自然是很有力量了”）。柏杨是不是认为“中华民族文化是一个‘酱缸’”呢？请看柏杨自己的话：

中国到今天这个地步，应该在文化里找出原因。这个文化，自从孔丘先生之后，四千年间，没有出过一个思想家！所有识字的人，都在那里注解孔丘的学说，或注解孔丘门徒的学说，自己没有独立的意见，因为我们的文化不允许这样做，所以只好在这潭死水中求生存。这个潭，这个死水，就是中国文化的酱缸，酱缸发臭，使中国人变得丑陋。

他屡次提到中华民族文化就是用“酱缸文化”这个名词，说“中国人在这个酱缸里酱得太久”等等。说柏杨认为中华民族文化是一个酱缸，该不是“污蔑”他吧？！怎么又不能成立呢？编者又讥讽说，我先摘引几段鲁迅的话来证明二人之“异”，说“这种论战法之不足取，只要稍微读过鲁迅著作的人，恐怕一眼就会看透的。”我自然不像一些大学问家，鲁迅著作读得那么通透，知道“酱缸”就是鲁迅所说的“昏乱”。但自谓“稍微读过”还称得上。我在“前论”中正是从整体来对比鲁迅与柏杨，而不是从字句来比较的。鲁迅与柏杨在对待民族文化态度的区别就在于：鲁迅并没有把中华民族文化全盘否定，他的“黑色染缸”只是形容中国文化传统在接受外来文化时的强大惰性，仅指某方面而言，而不是把整个中国文化看成一个发酸发臭的酱缸。编者在文章中摘抄的几段不正是这样吗？区别是十分明显的。这一点在“前论”中说得够清楚了。别人讥讽我“如获至宝地引用鲁迅关于‘中国的脊梁’那段话”，那么，他们是不会把它看作“至宝”了的。我确是把鲁迅先生这段话当作至宝，一贯如此。鲁迅先生在脊梁之后还接着说：“这一类的人们，就是现在也何尝少呢？他们有确信，不自欺；他们在前仆后继的战斗……”鲁迅这段话之所以可宝贵，就正是他看出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光辉，充满了民族自豪感，给人以向上奋进的力量！这里有深刻的历史辩证法。在《丑陋的中国人》里可以得到这样的至宝吗？这就是区别！

鲁迅先生从总体上说，从没有把中华民族看成一团漆黑，而柏杨先生却把中国文化看成发酸发臭的酱缸。既然是坏到了发酸发臭的酱缸文化，理所当然要抛掉了。柏杨先生正是基于这样的感情感谢鸦片战争的（此点下文再

细说)。他认为酱缸文化使中国人变得丑陋，他认为传统文化使我们中国人具备了很多种可怕的特征，这种如此可恶可恨可怕的酱缸文化，按逻辑就只有通通抛弃一旁了，这不是很符合逻辑的推理吗？柏杨先生自己就正是这样看的，请看柏杨打了个多么生动的譬喻：

印第安朋友的传统文明，少得可悲，如果他们肯吸收现代化西洋文明，可以说易如反掌，盖房子里空空如也，只要新式沙发搬进来就功德圆满。中国人屋子里却塞满了长板凳、短板凳、高板凳、铁板凳、木板凳、带刺板凳、滑不溜丢的板凳，如果不动心忍性，把它们扔到化粪池里，新式沙发就永远进不了大门。

这就是柏杨先生对中国传统文明的态度。我的唯一“污蔑”之处就在于把“扔到化粪池里”“雅”化为“统统抛弃”。但我想，大体主旨不变，该不至于有罪吧！

我很感惊讶，我说柏杨认为中国人都是丑陋的，是“酱缸蛆”，竟变成了我的“污蔑”，这种论战法也真高明。其实此点不必论争，且看柏杨自己是如何解释他笔下的中国人的含义就一清二楚了。在“中国人与酱缸”一文中，柏杨虽然认为解释“什么是中国人”是“画蛇添足”，但他还是作了注释：

我们所指的中国人是广义的，并不专指某一特定地区，而只指血统。

这就说明了柏杨笔下的“中国人”，不仅是指所有的中国国籍的中国人，而且包括了所有有中国人血统的人，不管是什么地区、什么国籍。这明明是柏杨的解释，怎么又变成了“污蔑”呢？那么说柏杨把中国人看成“酱缸蛆”是“污蔑”吗？且看：

中国人同情心的贫乏，使狄仁华先生有沉重的感慨，一团沸腾的性灵被酱成一条麻木的酱缸蛆，要它活泼起来，恐怕非一时之工所可收效。

盖我们的文化本来是走在光明大道上的，却被长期的封建政体和儒家学派圣人们，群策群力，连推带打，活生生的塞到酱缸里。大家最初还叽哇乱叫、后来酱成了酱缸蛆，不要说叫啦，连哼的声音都归于沉寂。

在柏杨眼里，中国人就是被酱成了酱缸蛆，我想这也不必曲为之讳。在《丑陋的中国人》中大概只有“柏杨先生”“柏老”“吾友孙观汉先生”“吾友杨希凤先生”等少数人没有冠以酱缸蛆的美名；自然“吾友伊莉莎白二世”是外国人，那是当然不在此列的。

至于鲁迅先生是不是把中国人都说成丑陋、酱缸蛆，或“昏蛋”“昏乱”、或诸如此类的名目，我想人们倒是可以不用一眼就看穿的。且看鲁迅先生是如何说的：“中国人中，有吃燕窝鱼翅的人，有卖红丸的人，有拿回扣的人，但不能因此就说一切中国人都在吃燕窝鱼翅，卖红丸，拿回扣。”有一段话我以为是对鲁迅评价很深刻、很公正的：“如果不是对于人民的敌人，而是对于人民自己，那末，‘杂文时代’的鲁迅，也不曾嘲笑和攻击革命人民和革命政党，杂文的写法也和对于敌人完全两样。”还有一段话评价也是非常精确的：“鲁迅后期的杂文最深刻有力，并没有片面性，就是因为他学会了

辩证法。”

至于编者所指责我说诬蔑柏杨那一段话，“前论”已经说了是套用鲁迅先生的话而来。为了避免误会，我将鲁迅原话抄录如下：

说中国人失掉了自信力，用以指一部分人则可，倘加于全体，那简直是诬蔑。

我套用这段话赠给柏杨先生的是：

说中国人丑陋，用以指一部分人则可，或者说中国人有丑陋的弱点则可，倘若用以加于全体，就是以偏概全，那简直是诬蔑。

因为柏杨先生自己已经对他们所说的中国人下了明确的定义，故此套用鲁迅的话以赠之。我不知道这种“论战手法”怎么就是“大批判”，欢迎给予不是“大批判”的批判。承认中国人中有一部分确是丑陋，承认中国人有丑陋的弱点，怎么就是“护短”？难道要像柏杨先生那样，说中国人（包括所有中国血统的人）都是丑陋的，说他们在酱缸文化里酱成酱缸蛆才是不护短，才是真正的爱国？我想，这就是对中华民族的民族性格和民族文化总看法之“异”，这恐怕就是“问题的实质”。

析柏杨的民族观与鸦片战争观之关系

编者承认柏杨先生有“偏激”，我看，柏杨的民族观就颇多“偏激”。马克思主义认为世界上一切民族有大有小，但“各民族完全平等”（列宁语）。各民族之间是不应有高低等级之分的。但是，在柏杨的眼内，民族是分等级的。写到这里我得赶紧引柏杨的话了，以免涉“污蔑”之嫌：

呜呼，大家似乎忘记了一点，战败后的德国和日本固然成了三等国家，可是他们的国民却一直是一等国民，拥有深且厚的文化潜力，好像一个三头六臂的好汉，咚的一声被打晕在地，等悠悠苏醒，爬起来拍拍屁股上的灰，仍然是一条好汉。

我不知道柏杨这里是不是说德、日国民是“一等国民”？对这两个国家的民族的赞美的激情是不是溢于言表呢？比较一下柏杨先生对另外一些民族的看法，是很有意思的。且听听柏杨对印第安人的评论：

印第安人为啥排斥现代化的西洋文明，有人说他们始终怀恨白人的罪恶，有人说他们的民族天生僵固，没有接受新观念新事物的细胞。这两种原因都有点怪，因怀恨而拒绝接受敌人的制胜法宝，可谓其蠢如猪。因天生缺少力求上进的细胞，可谓其情堪怜。

连上帝都救不了他们（指印第安人，引者），除非赐给他们吸收现代文化的灵性。而迄今为止，上帝仍没有赐给。反而，却像《圣经·约画亚记》上所说的，决心使他们：没有一个留下，将凡有气息的，尽行杀灭。

我想读者在这些段落中也会一眼看透，那种对印第安人鄙视之感情，也是溢于言表的，甚至似乎可以听到了切齿之声。在别的文章段落里类似的言论还有不少，可见柏杨先生对印第安人的态度是一贯的。而对“丑陋的中国人”和对其蠢如猪的印第安人的态度颇为相似。如若不信，请再读“前论”曾摘录过的一段话，以加深印象：



任何一个社会和任何一个人，多少都有点崇拜权势，但似乎从没有一个社会和从没有一个民族，像中国人对权势这么癫狂，和这么融入骨髓。任何一个社会和任何一个人，也多少都有点自私，但同样的也从没有一个社会和一个民族像中国人这么自私到牢不可破。

这样的比较可谓彻底了，“任何一个”、“从没有”！“任何”是横向比较，从来也，是纵向比较。也就是说从古到今，五大洲四大洋，也没有一个民族像中国人那样“丑陋”了。

在别的地方，柏杨先生又认为中国人就是得了三期肺病的民族。编者曰：

说有些中国人得了肺病，就是说十亿同胞都得了肺病！这使人不得不回想起过去几次政治运动中的大批判模式，你只要说某地某人犯了主观主义，你就是攻击党攻击毛主席。你只要说大跃进中有浮夸，你就是抓注一个指头否定九个指头，你就是攻其一点不计其余！对于这类论战手法，我们只能无言以对！

不，对这一段话我们有言以对。我们对这种大批判模式都深恶痛绝。不佞所受这种大批判模式之害，恐怕不见得比编者浅。关键不在于此，而在于柏杨是说“有些中国人”还是就整体而说？还是请柏杨先生自己来回答。柏杨先生在歌颂了一番“一等国民”德、日如何英雄好汉（原文见前引）之后，说：

而我们这个三期肺病的中国，一时站在世界舞台上，不可一世，可是被冷风一吹，当场就连打三个伟大的喷嚏，流出伟大的鼻涕……

请听：不是“有些中国人”，而是“我们这个三期肺病的中国”！这就是柏杨对中国的总体看法，对中华民族的总体看法。这正是柏杨的思想核心所在。我想，何必把“大批判模式”的白粉涂向对手的脸上？要是人们问这是什么论战方法？我们又将何言以对？

从上所引述，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柏杨先生眼下，有些民族“其蠢如猪”有些民族其丑陋之处，世界没有，古今第一；有些民族（国家）；则是三期肺病患者，风吹就倒；有些民族则是一等国民，犹如演义小说中的天下第一好汉。这就是柏杨先生的民族观。

现在我们可以进而分析柏杨先生关于鸦片战争那些“错误”的根源所在了。编者说：“我们说过，我们不同意柏杨对鸦片战争的看法。”又说：“我们认为，对于这样一个浅显的常识问题，在短短的《编后记》中只须点到即可。”可是，我们在《编后记》中并没有读到编者“不同意柏杨对鸦片战争的看法”的意见，连“点到”都没有。对于《丑陋的中国人》编者只是说了：“对于柏杨先生有些篇中某些观点，并不是我们都能同意的，我们相信读者的判断力。”谁能从这几句抽象的话中悟出它的具体所指么？判断力再高的读者恐怕也猜不出来。不过，现在编者认为柏杨关于鸦片战争的言论是“偏激的错话”了，这也很好。但仅仅说是偏激的错话是不够的，仅仅对蒋廷黻的看法“知之甚稔”也是不够的，单是编者“知之甚稔”更是不够的，因为读者并不是都达到了“知之甚稔”的境界的啊！我就听到过青年读者对柏杨这个观点表示了赞赏赞同的意见。作为编者，应该分析分析柏杨先生为什么

会有这样“偏激的错误”，给一些知之不稔的读者以引导。我想，这个要求对出版家来说并不过分。

柏杨关于鸦片战争的“偏激的错话”，编者的文章已经全引了一段，有一段有省略，有一段我以为也很有代表性的编者未引。我这里把后两段全引如下，以避免东半句西半句之片面：

事实上我应该感谢鸦片战争，如果没有鸦片战争，现在会是什么情况？至少在座的各位，说不定头上还留着一根辫子，女人还缠着小脚，大家还穿着长袍马褂，陆上坐两人小轿，水上乘小舢板。如果鸦片战争提早三百年前发生，也许中国变得更早一些，再往前推到一千年前发生的话，整个历史就会完全不一样。所以我认为这个“国耻纪念”，实际上是对我们酱缸文化的强大冲击，没有这一次冲击，中国人还一直深深地酱在酱缸底层，最后可能将窒息而死。

鸦片战争是一个外来文化横的切入。西方现代化的文明，对古老的中国来说，应该是越早切入越好。这个大的冲击，无疑是对历史和文化的严厉挑战，它为我们带来了新的物质文明，也为我们带来了新的精神文明。

柏杨先生对鸦片战争的这些话，用一时偏激情绪来解释恐怕未必中肯，用编者的话来说就是未能一眼看透，或曰未能把握其总体思想。柏杨先生之所以讲出感谢鸦片战争那样的话，并非一时偏激“脱口而出”的错话。在柏杨那里是有一整套理论的，这套理论和他的民族观密切相关。

首先，柏杨先生认为鸦片战争给我们带来了新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这真是功莫大焉，应该“感谢”！鸦片战争果真给我们带来了文明吗？为了使青年同志们了解鸦片战争带来的是怎样的文明，我想到特引一段当年英国资产阶级报纸的言论。这是当年伦敦《每日电讯》的评论：

大不列颠应攻打中国沿海各地，占领京城，将皇帝逐出皇宫……我们应该用九尾鞭抽打每一个敢于侮辱我国民族象征的穿蟒袍的官吏（大概是指林则徐一类人——引者）……应该把这些人个个都当做海盗和凶手，吊在英国军舰的桅杆上。把这些浑身钮扣、满面杀气，穿着丑角服装的坏蛋（大概包括三元里的人们——引者），在桅杆上吊上十来个示众，让他们随风飘动，倒是令人开心和大有裨益的场面。无论如何应该实行恐怖手段，再不能纵容了！

听听吧，这就是鸦片战争带来的文明！这是转引自马克思的（新的对华战争）一文，至于马克思本人当时如何痛斥鸦片战争及第二次鸦片战争是“海盗战争”，我们就不必引了。鸦片战争带来的“文明”正是这样“血流成河，杀人如山”的啊！对于帝国主义还是鲁迅先生看得深刻：“我看见确凿的事实：他们（指帝国主义——引者）是在吸中国的膏血，夺中国的土地，杀中国的人民。”这种认识可说是鲁迅与柏杨之异否！

对于柏杨所说的“外来文化横的切入”，我们并不笼统反对。对这个问题首先得正名，名不正，言不顺。必须是“文化切入”，而不是像鸦片战争那样的“切入”，那么该是“武化切入”了！它充满着血腥与火光。对于外来文化的切入，还应该像鲁迅先生所说的“自己来拿”，要“拿来主义”。如若像鸦片战争那样，则是用战舰、枪炮，伴着“血流成河，杀人如山”“送来”的。对此，过去我们有一个统一的概念，叫做“侵略”。现在观念更新，

大概不会把这个概念“更新”成别的什么含义吧！

其次，在柏杨先生看来，一些低等的、其蠢如猪的，丑陋古今第一的，三期肺病的民族和国家，一定要那些一等国民们以如鸦片战争或别的什么方式的文化切入才能得救，才能有所进步。所以他说鸦片战争使我们民族免于窒息而死，真是我们民族的救命恩人！这又当然非得感谢不可了啊！不单是感谢，而且恨不得它早点来，早三百年，早一千年就更好。看来柏杨先生对于社会发展的规律并不熟悉，他不明白“一切重要历史事件的终极原因和决定动力是社会的经济发展，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改变，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之划分为阶级和这些阶级之间的斗争”（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而不是鸦片战争那样的“文化切入”。这自然也是“浅显的常识”问题。可是由于柏杨先生可怕的民族偏见，使他违反了社会发展规律的“浅显的常识”。要不是请柏杨先生确立民族平等观念，社会发展规律的观念呢？没有这样浅显的基本常识，我看柏杨先生的“错误”就总是避免不了。编者对此，当然是知之甚稔的，但一旦掉以轻心的话，也会有所闪失。

索性说一说“辱骂与恐吓绝不是战斗”之类

不佞虽浅薄，但仍能欣赏“行文汪洋恣肆，极其辛辣尖锐”的杂文，自己也曾“汪洋恣肆”过一番。“文革”开始时，反驳《评新编历史剧 海瑞罢官》时也“汪洋恣肆”了一番，由此便招来了“史无前例”的大祸临头，进了“牛棚”，成了“阶级敌人”。然而，此与既终老而不衰，出了“牛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还继续业余地“汪洋恣肆”了一阵。这些年来，虽然没有这份业余时间了，但欣赏力似未衰退，报上“花边文学”作品，甚少放过。对于柏杨先生某些杂文笔法我不能说赞赏，所以“前论”中曾点到一下。当然，柏杨先生《丑陋的中国人》中也有些较好的篇章，如《恐龙型人物》虽稍有偏颇，但应该说是一篇佳作。然而就全书而言，实在不敢说欣赏。为了使这种文风不到处吹，不使青年同志们误以为这就是“汪洋恣肆，极其辛辣尖锐”的范例，还是索性说说为好。

“辱骂”在《丑陋的中国人》中是十分突出的。他骂古人，骂今人，什么“大酱缸蛆”“头号酱缸蛆”等是普遍的。凡是不是他“吾友”的，几乎少有例外。此外，“喝尿分子”啦，“喝尿的精神”啦，“嘴里都像塞了乾屎橛”啦，如此等等。这种种骂劲，不知柏杨先生是如何思考的？辱骂并不能证明自己掌握真理，无论你骂别人什么都不能增加你掌握真理的分量，只能适得其反。柏杨先生此著，可借鲁迅先生关于《汉奸的供状》一诗的批评的话概括之：“有辱骂，有恐吓，还有无聊的攻击：其实是大可不必的。”

鲁迅先生还讽刺了另外一种战法：“人们遇到要支持自己的主张的时候，有时会用一枝粉笔去搯对手的脸，想把他弄成丑角模样，来衬托自己是正生。但那结果，却常常适得其反。”柏杨先生也常爱用此种战法，先把别人歪曲，然后给予批判。例如对儒家思想，多次采用了歪曲了再批评的手法，又例如吧，要堵住别人批评的嘴巴，就说别人是“文化大革命”的斗臭斗倒，口诛笔伐，大批判，或者将别人和台湾监狱相提并论。别人的脸本来不是花白脸，你硬要把人弄成丑角模样，总是不能成功的。你说一百回斗臭斗倒、大批判，似乎把别人的脸涂成了花脸，但读者也能看出这是被人涂上去的，也不会上你的当，反而露出了自己的丑角模样。这种战法一如辱骂、恐吓同样不足取。我们是应该以之为鉴戒的。

鲁迅先生还深刻地分析了另一种战法：“如果一味鼓噪，已是《三国演义

义》式战法，至于骂一句爹娘，扬长而去，还自以为胜利，那简直是‘阿Q’式的战法了。”我想鲁迅先生的批评，对柏杨先生是适合的。骂两句麻木的酱缸蛆，骂一声“他妈的手淫”，扬长而去，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这几点都是关于杂文笔法问题，编者是编选《杂文选粹》这样大型丛书的，对这一类问题，当然更是知之甚稔的了，对柏杨先生这些战法也是可以看得透的，就不必多说了。说这几句话，质之编者，不知以为然否？

未了，需要作一点说明，重抄一段话以结束本文。需要说明的是：我们读到的柏杨先生的作品，就是这本《丑陋的中国人》（湖南文艺出版社翻印的），所评的也只是这本《丑陋的中国人》（至于这一本《丑陋的中国人》是不是“全本”“善本”“精本”，那是出版家的事。），孤陋寡闻是难免的了。日后有机会拜读柏杨先生的作品，如有心得，再作别论。需要重抄的是我十分尊敬的一位杂文家的话：“一个民族如果不充分地尊重自己优秀的文化传统，不敬仰和怀念自己民族的仁人志士和民族英雄，不发扬自己民族的一切正义、勇敢和对外敌坚强不屈的民族气概，那么，这个民族一定会衰微下去，还谈得上什么民族振兴呢？”我觉得这段话好极了，可谓掷地有声。所以重抄一遍与编者共勉。

——原载一九八八年第二期《文艺理论与批评》

## 丑陋的风波

公刘

前些日子接连读了两本书：一本是高桥敖的《丑陋的日本人》，另一本是威廉·莱德勒和尤金·伯迪克的《丑陋的美国人》。说实话，后者似乎有点文不对题，对于认识作为既是混合型的又是开放型的文化共同体美利坚民族来说，没有多少实际意义；译者大概也觉察到这个，因此将书名改名《困惑的外交官》。当然，这也说明了，它对有志于研究 50 年代初叶东南亚地缘政治学的专业人员，价值反倒更大。正是出于这一判断，本文不打算涉及到它，之所以不涉及它而又要提到它，无非是想借以说明，即便像美国这样的头号超级大国，人家也在努力从各个方面解剖自己，而并不总是心满意足地大呼噜睡大觉的。至于前者，又的确有许多许多警策之言，值得借鉴；但我想专门写一篇文章；谈一谈自己的读后感，眼下也就只得权且搁在一边了。

笔者打算联系我们“贵国”在不满三年的时间内，连续爆发的两起“风波”，发表个人的点滴看法。不难猜想，有的人听了我的这番话，准会感到厌烦扫兴，会吐唾沫，认为是乌鸦又在聒噪了；不过，我却从来不承认自己是乌鸦，虽然我也绝对不羡慕那在金丝笼里唱着美妙歌声取悦主人的画眉。我就是我，一个普通的爱国的中国人而已。

话题是从“丑陋的……”引起的，便信手写一个标题：“丑陋的风波”。“风波”本身到底“丑陋”与否，结论得靠各人去做；尽管，我认为是丑陋的，我却无权强求大家一律举手赞成。

众所周知，我们中国也有一本类似的著作，出自台湾的著名作家柏杨之手：《丑陋的中国人》。据说，包括这本薄薄的书在内，柏杨先生得罪了当时的蒋氏当局，被关进绿岛监狱，当了近十年的政治犯。什么“自由中国”“言论自由”，仅此也得以管窥一斑了。

首先，我认为，无可置疑，《丑陋的中国人》一书，是继承和发扬了鲁迅精神的，而且那继承者和发扬者恰恰在台湾，这是一个虽然令人惊讶，令人忿忿不平同时令人惭愧，却又必须承认的客观事实。不错，这本书的某些论点，带有一定程度的片面性，其文风也有不尽令人赞赏之处。然而，值得深思的问题是，难道我们大陆上的数以千计的作家，竟没有一个人，在素质上、器识上能与柏杨先生相抗衡么？显然不是的。答案只能从我们自己的“革命觉悟”中间去寻找。长期以来，我们所热衷于宣传的无非两条：一条是夸耀“人口众多，地大物博，历史悠久”；一条是夸耀“拥有最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这两者固然都是事实，谁也无法抹煞；遗憾的是，我们很少想过，或者压很儿就不去想，凭这两条能不能自动地分娩出一个民主的文明的富裕的现代国家来。因此，其结果必然是，明明不曾“万事大吉”，偏偏以为“万事大吉”。于是，我们谁也不谈鲁迅痛切针砭的中国民族的劣根性（又曰国民性）了，也就是说，鲁迅过时了。我想，仅仅指出自审意识的丧失这一点，已足以解答为什么《丑陋的中国人》何以并非出自大陆作家手笔的原委了。

其次，时隔三十九载，海峡两岸已经由剑拔弩张逐渐转变成实际上的实行“三通”。使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柏杨先生这本书，却因为在大陆的翻印、流传而触发了一场“再批判”！这，无论如何是不光彩的，仿佛大陆倒继承了当年台湾的未竟事业。柏杨先生早已去了美国，台湾也罢，大陆也罢，都是拿他无可奈何的；因之、这个十分有趣的政治现象，除了不幸证明了大

陆上的某此人和台湾的某些人，原来共着同一种心理状态，在这方面，倒的确不愧为“龙的传人”以外，实在毫无所获。尤其荒唐的是，那曾经向全国人民贡献了无数好书的两家出版社，就因为分别推出了《丑陋的中国人》而闯下大祸。一家的负责人被训斥：“什么‘丑陋的中国人’？我是中国人，我就不丑陋嘛！”，老板唯唯检讨结案。另一家的负责人，并非共产党员，却“混入党内”当了“只限于共产党内进行”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斗争”的重点对象，受到免职处分，迄今靠边站。不错，当时还有一个由头，就是出版了真正优秀的世界文学名著、英国作家劳伦斯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据指控，内容淫秽，应予查禁，然而，究其实，犯了忌讳的、更其“危险”的还是这本《丑陋的中国人》。

无以名之，这就是我们的“爱国主义”——感情过度强烈导致神经过敏的“爱国主义”。

第三，最近，围绕着《老井》和《红高粱》两部电影，风波又起。早在《老井》于东京获奖之初，就已经响起了嘘声，《红高粱》在西柏林再次问鼎，那嘘声就愈发高涨了。有人开始祭起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法宝，令人悚然回忆起一九五七年。当然，出现不同的观点，不同评价的分歧和争论，是正常的。值得思索的毋宁是所有认为获奖不是光荣而是耻辱的人们，所持的理由并非出于艺术见解，倒是一无例外地在“维护国格”上大做文章。委婉一点的说，不应该把中国人描写得这样“愚昧”、“落后”、“丑陋”；激烈一点的干脆断然否认，山西没有这样的事情，山东没有这样的事情，中国没有这样的事情，因此，这是捏造，这是诽谤，这是“迎合洋大人的殖民地心理”，云云。

事情发展到了这一步，未免太过分了。我有幸在山西待了二十一年，其中三分之二的的时间，都在穷乡僻壤和农民面朝黄土背朝天并肩劳动，我要毫不含糊地作证：不对！你们说错了！不但有“这样的事情”而且有两倍、三倍于“这样的事情”的“事情”。类似《老井》的故事，我肚子里就装着许多。何况，影片结束时，水打出来了，整个的过程都体现了中华民族坚韧不拔、含辛茹苦、前仆后继的高尚情操与宝贵素质，有什么丢人的！至于《红高粱》，我认识小说作者莫言，我觉得，他是一位诚实的作家。他写的作品，我并不篇篇都喜欢，可是，《红高粱》中，对乡土与国家的无比热爱，对我们民族（它屡濒绝境，却始终未被同化，未被消灭，这是世界史上罕见的例子）的强旺生命力的由衷歌颂，却理当为任何一个不怀偏见的人所首肯。就拿那个引起“义愤”的“剥皮”场面为例，在抗日战争中，此等惨像，又岂仅发生于胶东一地？我愿追述一桩往事，为《红高粱》一辩。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了，我去到刚刚光复的江西南昌念大学。大学临时设在郊外二十余里的一座兵营里。四周都是农田。当时，一帮追求进步的同学更有意识地“走向人民”，因此，和作田佬接触的机会特别多。作田佬原本就老实巴脚，又觉得这些读书人不坏，便把他们一生的痛苦全部倒了出来。谈起沦陷区的亡国奴生活，他们告诉我，有一次，“大日本皇军”把附近方圆十里的男女老幼，全部驱迁进一幢大祠堂里，然后，挑出“花姑娘”来，当众奸淫不算，还强迫中国人群交……专门指令儿子配母亲，公公配媳妇，他们则在一旁狂笑取乐。此等禽兽行径，比之于“剥皮”，难道不有过之而无不及么？通过表现“剥皮”的长长的画面，令我震惊的只是日本侵略者的丑陋，为什么到了某些人眼中，事情却翻转过来，成了中国人的“丑陋”了？立场不同，视

角不同，观感也就不同，信然。但是，只要心存公道，鸡蛋里毕竟是挑不出骨头来的。

从一九八八年的“丑陋的风波”，再回想一九八六年的“丑陋的风波”，光阴在改革、开放声中又过去了三年；令人不禁悲从中来的是，我们为相当可观的一部分同胞，竟始终抱定“天朝大国什么都好”和“家丑不可外扬”相结合的自欺欺人态度，在这三年的日日夜夜，居然“自我感觉良好！”

环顾当今世界，没有一个奋发自强的国家，不是通过自己的杰出代表狠狠揭露自己的疮疤，以唤起民众的警觉，共商疗救的对策的。在经济领域的“世界大战”中，我们听到了日本人的叫喊，美国人的叫喊，苏联人的叫喊，都叫喊自己的“劣势”；他们为什么要这样？是无事生非么？是“狼来了”么？是判断有误么？都不是，其目的全在于破除他们社会上的自满情绪，突出危机感和紧迫感，从而推动新一轮竞争，保证自己立于不败之地。

如果说起文学艺术在这方面的作用，那实在应该记大功，而绝非挨板子。屠格涅夫笔下的罗亭和巴扎洛夫，冈察罗夫笔下的奥勃洛摩夫，果戈理笔下的乞乞科夫和“钦差大臣”群像，契诃夫笔下的小公务员、变色龙、宝贝儿和警察下士，非但不会丑化了俄罗斯民族，相反，倒是最终导致苏维埃革命的伟大动力的一个组成部分。同样的，鲁迅笔下的阿Q、小D、王胡、赵太爷……至今也并未绝种。鲁迅先生一再以沉痛的感情讽刺过的“咸与维新”，如今不正换上“咸与改革”的新潮服装登台表演着么！

唯愿我们的人民，首先是我们的知识界，经过这两场性质完全一致的“风波”，能较之以前更为清醒。须知，一个不敢正视并且克服自身弱点的民族，是不会有希望的，不承认“丑陋”，甚而以“丑陋”为国粹，别人碰一下都不行，那前景是异常可怕的。

一九八八年五月二十九日合肥

——原载一九八八年第十七期北京《新观察》

## 最丑陋的中国人——柏杨

——一九八五·九·一八·台北《扫荡》杂志

殷宏俊

最近，市面上出现一本名叫《丑陋的中国人》的书，著者是柏杨，内容以他在去年（一九八四）九月二十四日在美国爱阿华大学演讲稿《丑陋的中国人》为主（该演讲稿去年十二月八日《自立晚报》刊出，本刊曾撰文批判过），收录了美国几家大学与华文报纸上的中国人的文字的反应，另外收了柏杨几篇文字，末尾加上一篇张香华（柏杨现任妻子）与比利时神父谈论“丑陋的中国人”的文字，集成三百五十余页，书价一百二十元。

这里开头特别提到三百五十余页与一百二十元书价，是要指出此书出版的动机，只有一点：卖书赚钱！这与柏杨过去每一本书与目前他所编的《柏杨版资治通鉴》一样，都是为了卖钱。所有的这些书，与批评、改革、历史文化，沾不上一点关系！

在批评柏杨的《丑陋的中国人》、《柏杨版资治通鉴》之前，先谈两件有关“前提”的事。《丑陋的中国人》在出版之前，柏杨又在《自立晚报》发表了一篇“代序”名叫《酱缸国医生和病人》极尽歇斯底里丑化中国人之能事，这篇文字是今年（一九八五）九月二日登出的——这一天是我“中华民国”浴血抗战胜利参加同盟国集体接受日本投降四十周年纪念的伟大日子，柏杨用来宣传“丑陋的中国人”。仅这一天日期上的选择，已可看出这个尖酸刻薄“作家”还有多少民族良心（我们八年抗战，民族遭逢空前存亡危机，牺牲军民两千万人抵抗日寇侵略，这件事“丑陋”吗）！

第二件事是关于“丑陋的X国人”的问题。柏杨演讲时自称受过两本书的启示，一本是美国人写的《丑陋的美国人》，一本是日本人写的《丑陋的日本人》。这种“因为美国、日本有，我们也要有”的自我矮化、愚心理，若干年来一直流行于国内文化界、知识界，上焉者，美、日有机器人工业，我们也要搞机器人（按：全世界科技与工业等级排在我们前面至少有二十国不敢夸言发展机器人），下焉者，美、日有“垃圾”punk文化、同性恋、大学女生卖淫、暴力色情……我们也照样要学。柏杨的《丑陋的中国人》拾美、日余唾的伎俩，与台北市西门町混混拾日本垃圾文化，如出一辙。

柏杨演讲《丑陋的中国人》，意思是一种反省：国人应面对中国民族性中的缺点，加以改进，并且强调《丑陋的美国人》、《丑陋的日本人》两本书也是这个自我检讨的出发点。让我们先来看看这两本书。这两本书都是美、日驻外外交人员，目睹其国家在外国的错误外交政策，而痛心写出的。《丑陋的美国人》是指责美国在东南亚的帝国主义欺凌弱小、操纵小国政治的霸权作风，并未提一个字有关美国人在国内、在历史上内斗的事；《丑陋的日本人》同样并未检讨日本内在问题，也是指责日本人处理国际外交事务（现实重利，对白种人自卑，对落后国家据傲，虚伪小气……）上的次等帝国主义作风。这两国在国际上欺侮弱小的“丑陋”嘴脸，近百余年来的中国，不要说连边都沾不上，实际上近百余年来中国一直是弱国、一直被列强轮番侵略欺压（后遗症至今不息），中国何“丑陋”之有？何曾“丑陋”过？近百余年来，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只能说是“可怜的中国人”啊！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一次又一次地被帝国主义屠杀，强奸、劫掠、国不成国、人变



成非人……柏杨怎么忍心说中国人“丑陋”？我们中国人被帝国主义压迫了百余年，在最后生死关头打败了日本，柏杨却在抗战胜利四十周年纪念的日子里，大呼“丑陋的中国人”，拾外国人牙慧，学外国人语法，学到要如此自我作贱的地步吗？

如果说《丑陋的中国人》是中国人内部的自我检讨，那么这个演讲就绝对不可以到美国去讲、这本书的结论就绝对不可以由比利时人下来下断语！中国民族性中的缺点是很多，近百年来在帝国主义的压迫下，更暴露出许多不堪的面目；但是，“家丑不可外扬”，检讨民族性缺点是为了改进、重建自尊，而不是只指出病态却坚不开药方（注意柏杨这本书，没有一点指出中国人应如何改进民族性的），更不是拿到外国人面前宣扬来作贱自己！这里举两个例子：抗战之前有两个著名的学者、思想家，都严厉指责过中国民族性的缺点，都用过比柏杨更严厉的字眼（按：柏杨文字只是尖酸刻薄，绝无讽刺中寓严肃的境界）批评中国，一个是胡适，一个是林语堂。这两个洋化学者虽然在五十年后的今天看来，在学术、思想上落伍有被淘汰的可能，但是当年对中国“爱之深、责之切”的心理，值得今天每一个中国人用心沉思。胡适批评中国民族性缺点（他曾说当时四十岁以上的中国人都该死光）的原则是“关起门来骂”，绝不给外国人听，而且他到外国一定（以其渊博的中西学识）宣传中国历史文化的优美，这种到“外国一定说中国好，回国一定说外国好（要国人学外国长处）”的原则，是胡适得到许多年轻人崇拜尊敬的原因。林语堂的格局比胡适小得多，但也特别遵守“家丑不外扬”的原则：林语堂曾在国内发表的文字中，述说他看到一个六岁小孩在公园中不守秩序，就痛心“中国必亡”；但林语堂出国赴美游欧的数十年，所有的数十种外文著作一律阐扬中国文化之高之美（其名著《生活的艺术》把明朝小文人的生活小情趣，以英文写成极高的生活境界，使整个西方知识界全面倾倒叹为观止，此书在欧美数十国畅销半个世纪迄今不衰。）！从胡适、林语堂的例子，我们要严正质问柏杨一句话：如果希望中国人改进其民族性，为什么不回国来讲？为什么把家丑说给外国人听？

这个问题的答案早就有了，很简单：柏杨讲《丑陋的中国人》，绝对不是要国人自省，他唯一的目的就是要作贱中国人，他本来的企图就以作贱中国人来讨好外国人！他的现代语文《资治通鉴》，目的也在曲解中国历史、毁灭中国文化！柏杨的基本企图，是把他十年牢狱的仇恨政治权衡心理，转化为仇恨十亿中国人、仇恨五千年中国历史文化！柏杨对中国人、中国历史文化，没有一点爱，因此他也不是“爱之深，责之切”，他只想破坏，糟蹋、毁坏中国的一切《资治通鉴》翻译成白话，柏杨的理由是：许多人看不懂！然而，《资治通鉴》本来就不是给“许多人”看的！“资治”与“鉴”的意义，即表明了这书是给主政者与高级知识分子看的。《资治通鉴》并不是一部纯史学著作，它的名称就说明了是部政治哲学气味浓厚的史学；中国的“纯史学”尚有无数的著作“许多人看不懂，”何必《资治通鉴》一定要大家懂？西方从柏拉图的《理想国》到汤恩比的《历史研究》，许多史学著作一般西方人看不懂的，比中国人看不懂《资治通鉴》的多好几倍！学术与智慧遗产，有一定的层次，如果一定要每一个人看得懂《资治通鉴》，那与要求每一个人懂“量子论”、“镭射原理”、“流体力学”没有什么两样！

中国近数百年来，已有许多学者写了许多通俗演义，更有许多野史与通俗史学名著，《资治通鉴》本身也早就有《纲鉴》（通鉴的大纲）与《纲鉴

易知录》之类的浅易本；《资治通鉴》是绝对不必翻译成白话的，因为普通人根本不必读《资治通鉴》——这是站在“许多人”的通俗立场。以另一角度来看：另有一批少数人是研究历史的学术工作者、社会精英，他们本拥有高深学识与国学基础，他们可以直接读《资治通鉴》原典，而且他们不可以“图方便”去读白话本。因为原典有许多中国历史精神、政治哲学、历史文学……是白话译不出来的，这些社会精英，学术工作者的责任，本来就在传递这个只能由少数人懂的中国古典精神，如果社会精英也是读白话资治通鉴而放弃读原典，最后的结果将是：只有白话《资治通鉴》可以存在，无人能看得懂《资治通鉴》原典——谋杀《资治通鉴》的“任务”乃告完成！

柏杨这个谋杀中国文化遗产的狠毒阴谋，是一个时代文化假像造成的：一般人总以为白话文是“现代的”，文言文是古典的，民国以前无白话文，民国以后无文言文，于是对民国以前一切古典怕“看不懂”，于是对白话本趋之若惊。其实白话文学、史学，至少已有六七百年之久了，我们的文化遗产中，有大量的白话历史（如历代通俗演义）存在。此外，最近几年的传播侵蚀，造成社会人心浮躁，人人想侥幸“暴得”——从金钱的暴利，到物欲，色欲的暴纵，到名器的暴夺，至于学术、知识的暴得……是白话《资治通鉴》上市的另一时代背景：古人穷数年之力始能读通的《资治通鉴》，今人想在两三个月之内“解决”。这种侥幸，已侥幸到要强奸意淫古典文化的地步，才是真正现代中国丑陋之处，柏杨其实是利用与发扬“丑陋的中国人”来为自己赚些版税、稿费！

柏杨利用我们民族性的缺点赚钱，早在二十多年前就开始了。六十年代初期，柏杨以这个笔名开始写《倚梦闲话》杂文，大为轰动，集文成书大为畅销。这个杂文专栏表面上看似批评政治，其实是阿Q式的发泄，以尖酸刻薄（远不够格称为嬉笑怒骂）自我解嘲来满足当时一般公务员、小市民的苦闷。柏杨杂文的最大特色与今天的《丑陋的中国人》内容一样——绝不开药方子、绝不提出改革意见；结果因为政治的缺失已经被柏杨杂文发泄过了，反而更能存在下去了！这是一种“批评的虚无主义”！世上没有“纯批评”“纯揭发”这回事（所有的批评、揭发的意义都在要求改革），如果有，就是柏杨这种虚无主义。柏杨的“批评虚无主义”，与琼瑶的“虚无小说”，在二十多年前同时流行，是光复四十年之中，我们社会最大的思想浩劫！

二十年后，经济发展带来的文化成果，与新一代的知识阶层的成熟，以及当局逐步开放的言论自由、开明民主，使得言论界以数十倍的膨胀率爆炸出二十年前所未有的建设性言论，相形之下，柏杨的虚无主义的“市场”顿见萎缩，于是开始以欺骗读者方式维持他的“市场利润”——放弃知识中坚，找知识界的柔软地带下手。二十多年前读柏杨杂文的公务员、学生小市民，今天有太多高水准、建设性的文字满足他们，他们早已抛弃柏杨。柏杨企图勾搭“党外”的“哗众派”也失败，最后只好寻找“海外市场”——南洋地区的中文水准较低，中文读物也少，柏杨跑去“随书登台”大作秀（外加到泰北难民营冒险一次——回来之后只是老生常谈，金三角贩毒内幕，只字不敢提）大卖书。南洋“市场饱和”之后，再“转码头”往美国华人区。

柏杨卖书与作秀，另一本钱是：坐牢形象。世间有伪装圣人者，也有伪装大盗者，今天廿世纪则有伪装政治犯者。柏杨坐十年牢或可同情其遭遇，但这与反对立场扯不上关系——注意柏杨根本没有任何政治立场。如果柏杨也算反对派，那就真如“党外”所疯狂说的：杀人要犯林博文被枪毙是“天

妒英才”了！柏杨以尖酸刻薄杂文来鱼目混珠为“批评文字”，又以“十年牢狱”来鱼目混珠“反对者”，再以白话《资治通鉴》来鱼目混珠通俗史学，最后以《丑陋的中国人》来鱼目混珠所有的中国人。柏杨是在时代的混淆中，利用夹缝里中国人性的丑陋面，来搞他的鱼目混珠“事业”，搞他的卖书生意！

## 中国式权力游戏的教科书

——一九九二·四·二三·台北《联合晚报》

柯慈音/整理

历史学家唐德刚先生曾指出，如果有人要他拟一份“国学基本书目”，他曾“一书定天下”，只推荐《资治通鉴》。

九百多年前，宋朝的司马光先生以无比的魄力和高瞻远瞩的眼光，率领一群知识渊博的史学专家，花了十九年的功夫，着手编写这部历史巨著。由于这部书涵盖中国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历史，是中国文化、政治、经济、人物性格的总缩影，因此它不仅是一部历史巨著，也是一部经世治典、一部品人明鉴，更是一部中国式权力游戏的教科书。熟读此书，便同时获得中国历代杰出人才的总智慧，让您在人生舞台上，更能掌握机先，纵横八方。

然而，十一世纪所流通的文言文，对现代人来说，显得十分晦涩，不论是官名、地名、天干地支等等，常搞得现代人一头雾水，翻不了几章便掩卷长叹，使得这个宝库几乎尘封于书海之基于这些理由，柏杨发愿把《资治通鉴》译成现代语文，让更多的人能从中受益。《柏杨版资治通鉴》出版不及数月，就被《新书月刊》同时选为该年度（一九八三）“出版界十二大新闻”和“十大最具影响力的书”，引起广泛的回响，而《柏杨版资治通鉴》一至六册，更蝉联金石堂畅销书排行榜榜首长达半年之久。这股旋风也吹向海外，美国、香港、新加坡等地报章杂志皆有大量的报导，而大陆“中国友谊出版公司”甚至每册印制十六万九千册，都在短时间内，销售一空，《柏杨版资治通鉴》的魅力可见一斑！

到底《柏杨版资治通鉴》的魅力何在呢？且让我们瞧瞧这套书的六大特色：

一、生花妙笔的译文。柏杨本身是使用现代语文的能手，加上没有学院派的历史包袱，译文明白晓畅，引人入胜，就如同读历史故事般，轻轻松松读完，却启发无限。

二、援用现代词语注解。一般古文的白话译写工作，最令人诟病的是：年代不清、月日不明、官名不译、地名不注、文词不通，看了半天还搞不清楚“丁卯”是那一天：“仆射”是什么官位？“太子洗马”又是做什么的？柏杨为了让现代人更方便阅读，一律采用西元纪年，废除“干支”“年号”等令人搞不清楚的纪年方式；一律采用今天通行的名称，使读者望而生义，有清晰的观念；官名一律用现代人所能触类旁通的职称，直接告诉读者这官儿是做什么的。由于柏杨这些努力，扫除了古文魔障，让现代人更容易理解。

三、广采众议的《通鉴广场》。在每册书后，开辟有《通鉴广场》专栏，提供读者们发表意见的园地。有些读者来函指正排版上的讹误，有些提供考证上的意见，有些表达对历史的看法，有些更是写信来为柏杨打气。如果读者的指正是正确的，柏杨就会采纳他们的意见，让《资治通鉴》的译本更趋完美。

四、用现代眼光来评论历史。在每本书里，我们不时会看到以《柏杨曰》的形式来评论历史上的人与事，以柏杨多灾多难的生涯和丰富的人生阅历，这些评论往往一针见血、精彩无比，颇有画龙点睛之妙。

五、绘制丰富的历史地图、历史图片。为了让每次战役，每个历史事件

更鲜活、更富立体感，柏杨总是不惜花费更多心血来绘制地图，收辑图片。有了这些地图、图片的帮助，仿佛历史就在眼前，毫无隔绝感。

六、分册的概念。参考《澳洲版牛津大字典》的作法，将《资治通鉴》这部重头书分成七十二分册出版，每一分册都有精彩的历史故事，你可以任挑几册阅读，每册都能给你智慧的启发。

古人留下如此丰富的史料、历史教训，如果我们不能从中汲取智慧，那将是多么遗憾的一件事！

## 柏杨说《通鉴》

——一九九二·八·一三·台北《联合晚报》

黄靖雅

历史教训能不能教训统治者？柏杨说：不能。

柏杨版《资治通鉴》是写给谁看的？柏杨说：平民百姓。

转译工作不嫌浪费时间、心力吗？柏杨说：只要我喜欢，为人作嫁何妨！

历史到底是不是一面镜子，能不能提供统治者教训？

“不能。”柏杨说。

这位今年（一九九二）即将写完七十二本《柏杨版资治通鉴》的史学家，面对即将完成的十年《通鉴》写作计划，他以老吏断狱的洞察口气说：“人类拒绝鉴往知来，私欲会使他看不见不想看的东西。除非他不在权利中，除非他是真正的大智慧者。”老来花十年时间，写现代语文本的《资治通鉴》，柏杨并不认为这部宋朝司马光原著的编年体史书，是古来人们认定的“帝王之学”。

自十一世纪宋王朝《资治通鉴》完稿以来，中国历史上从未有任何一个统治者，从这部古人认为的“帝王之学”，得到任何教训。他说：“读通《通鉴》，怎么会不知道任何用政治权力造成的荣耀和福威都会瓦解？——但所有暴君昏君，都相信他将是唯一的例外，认为噩运不会发生在自己头上！”

没有例外。柏杨认为，中国历史上，从《通鉴》记载的三家分晋到五代十一国：“每次改朝换代都是恶质革命的重复。中国人的苦难，就在于没有权力的制衡。”

《资治通鉴》的本意是：帮助皇帝统治国家的明镜。这部记事时间长达一千余年的编年史，美国纽约市立大学历史学教授唐德刚认为，可以“一书定天下”，柏杨也认为这是“《史记》之后，最好的史书。”

由于《通鉴》向来被视为辅佐统治、提供政治智慧的“帝王之学”，不但中国自宋以来历代皇帝必学，明朝甚至每个皇帝从小都要背诵，当作“好皇帝ABC”来读。不过，这些努力读《通鉴》的皇帝，后来个个在人性盲点里，跌入历史的覆辙，类似的悲剧代代轮回。这种历史的荒谬性，在强调《资治通鉴》具有佐治功能的传统下，特别显得讽刺。

因此，柏杨说他写现代语文本的《柏杨版资治通鉴》，是为一般平民百姓而写，不是为统治者而写。他认为，《通鉴》提供的观点智慧，可以让人做个“清明的第三者”、对兴衰成败，洞烛机先，小至市井人事、大至国情世局，都可用大时空的角度冷静检查。更主要的是，柏杨认为不要用太功利，太实用的态度对待历史，历史有更高的功能，它使人们有归属感。

写现代语文本的《资治通鉴》，并非柏杨独自一人，目前问世的已有国立台湾师范大学黄锦教授所写版、名远出版社版，及大陆版三种。不过，由于柏杨在华人世界的知名度，他的老辣笔力数十年来已拥有众多读者，四个版本中仍以尚未出全的《柏杨版》较受瞩目。

将文言文《通鉴》改写成现代语文，基本上做的是“为人作嫁”的翻译工作，这对一个具有原创能力的作者，不嫌浪费时间心力吗？

“不会，”七十三岁的柏杨微笑说：“只要我喜欢，为人作嫁何妨！”

浩瀚的中国史书，是不是像一具具“僵尸”埋首翻译《资治通鉴》近十年的作家柏杨，在工作几近尾声之际感慨地说，多年来虽然不断有人反对这件事，但他毫不气馁，孜孜地做下去，如今，他说：“这部史书终于复活。”

与《资治通鉴》朝夕相处了十年的柏杨，谈起这部史书，“如人饮水”，他说，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一方面将文言文变成贵族文化，加以垄断，另一方面在少有人能懂的情况下，更作为尊严的表证；像民国初年，没有黄金二两，就别想购卖这部书，而非官宦世家出身的一般读书人，想读《资治通鉴》，还得到县立图书馆逐字抄回，“这一难得一读的学问，经过将近一千年的陈封、岂能不面临死亡危机？”他说。

柏杨深信，语言文字会随着时代而变迁、发展，他说，不论是《左传》、《尚书》、《资治通鉴》，不经过现代语文翻译，有多少人能读懂它？“有些教书先生说我不是学历史出身，说我没受过专业训练的、不过是承袭古人知识垄断的心态而已！”

为使《资治通鉴》能活在二十世纪的今天，柏杨在几位助理协助下，不顾后果译写这部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编年史书，并由远流出版公司出版发行，预计明年（一九九三）三月出齐；柏杨说，《资治通鉴》是中国最完整的一部史书，不仅知识分子读它，中国帝王自宋神宗之后，更是要读，甚至要背，因此，它又有“皇帝的教科书”之称。据说，毛泽东读了十七遍。

这部史书到底好在哪？为什么现代人要读它？柏杨说，所谓“一书定天下”，正如纽约市立大学历史系主任唐德刚所说，一辈子如只选一部史书读，他就选《资治通鉴》。他说：“中国的智慧很多来自《通鉴》，读此书可获致两大益处：一，拥有知识、智慧的财富，二，任何人不能唬你。”“如此重要的经典，却因文字的晦涩难懂，无法予现代人分享，岂不可惜？”

柏杨指出，译写原典，贵在把生命真理表达出来，而不是只把“曰”翻成“说”，“译得精致，译得传神，是一件重要的事。”

尽管学界讲究读原典，从未正面提出对《柏杨版资治通鉴》的看法，但早在柏杨着手译写工作展开一年半之际，国内即出现两种译本，及大陆北京改革出版社《资治通鉴》另一种译本，由此看来，原典新译、在现代社会中，仍扮演重要角色。

用二十世纪的语文来写十一世纪的历史，会有什么困难？

自一九八三年起着手译写《资治通鉴》的柏杨，从原书三年内完成三十六册，到延至十年出齐七十二册，除史实考证困难外，一些地名、官制、帝王任数、年号等说法，如何让现代人理解，读来通畅无碍，更花去柏杨无数光阴，甚至赔掉他部份宝贵的视力。

以“官制”来说，像《通鉴》中提到“左庶子”“东宫率”两个名词，柏杨说，从字意反复推敲，一般人无从知道这是什么官，他大胆地将古代官制与现代生活做一结合，于是，“左庶子”成为“太子宫政务署长”，“东宫率”为“太子宫侍卫队”，还有唐代“仆射”，不说是国务院执行长，怎

么也想不出这个官员的执掌。

《柏杨版》的另一突破是首创编绘地图。柏杨说，真是奇怪，他不明白中国史书为什么从来不附地图，但这部分却十分重要，举个例子：“今天早上，我从台北出发，越过黄河，就来到了新竹。”柏杨说，现在大家一听，都知道错，但一旦流传久远，又没有地图，确实难以查证。

柏杨与他的小组采取分工进行，在登录完史书中所有地名之后，再经分省、分县、分区，逐一勘正绘出，他说，绘图工作使他发现史书上的错误，像西元九二二年，唐庄宗与后梁戴思远对仗，史书载戴思远西渡“洹水”攻克成安，经地图比对，发现应是渡“漳水”才对。

除官制、地图与众不同之外，在帝王任数的处理上，柏杨的计算方法更与史学殊异，像武则天之前的帝王任数，普通史书上都说三任，柏杨说五任，他说，傀儡皇帝也是皇帝，史实不应把这些除去。他还说，像五胡乱华明明十九国，偏要说十六国；五代明明十一国，却要说十国，“难道史书上写的，就没有人敢动；无怪一些错误会以讹传讹。”

还有一些值得提出讨论的，像“菟丝子”的解释，柏杨说，这明明是一种草药，却硬说是活的兔子。史籍浩繁，以今心窥古人，确实艰难，像“ ”这个字，到现在柏杨还找不到更好的说法来解释它，任凭他翻遍所有资料，都查证不出它到底是什么东西，而其他两种白话本，根本略去不提；他说，要做，就要追根究底，他还要查下去。

《柏杨版》也统一了年份。天干地支、甲乙丙丁都改成公元，他说，整部史书将有具体可推移的确切时间观念。

译写过程均已完整纪录下来，除了柏杨的译文手稿装订成册外，有关《通鉴》中所有地名、人名、郡名、州名、部落等，在助理谭焯明的协助下，已完整存入电脑的档案中。

最近，柏杨的视力愈来愈糟，愈渐模糊，但他充满信心地说，“真理可是愈来愈清”。



## 十年磨镜

——一九九二·一二·二四·台北《联合报》

简

“虽然它自认为和被认为是帝王的镜子，事实上，却很少帝王从这面镜子中获益。明王朝皇帝每天清晨，都要研读它，但明王朝的皇帝群，却一蟹不如一蟹。盖权力固可使人发疯，权力同时也可使人愚不可及，以致看不见镜子。……所以，《资治通鉴》与其说是帝王的镜子，毋宁说是人民的镜子。透过《资治通鉴》，可看出我们所处的历史位置，和面对的祸福命运。……不细读《资治通鉴》，要想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人，了解中国政治，以及展望中国前途，根本不可能。”

十年前，一九八三年，柏杨在《柏杨版资治通鉴》第一册序文中如是说。十一世纪宋王朝，司马光与他的编辑群以十九年光阴完成二百九十四卷，内含西元前四三年至西元后九五九年间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中国历史编年史巨著，经宋神宗赵顼定名《资治通鉴》，变成专供皇帝阅读以帮助统治的统御学问。然而有趣的是，这部皇皇巨著并没有系宋于不坠，明代元，清代明，民国结束清王朝……从一人四年司马光成书后、中国战乱蜂起、革命频仍，政争角逐，政权嬗递，一直到今天二十世纪末期，中国又出现分裂。其间八百多年过去了，虽然《资治通鉴》幸运地从宫廷渐渐走入民间，来到现代人手中，它不再是帝王将相的禁商，任何一个耆宿童子，只要购买，即能人手一部。然而最大的困难是，对彼岸十四亿，和台湾二千多万人而言，除了学有专精者外，到底有多少人看得懂？

这就是柏杨决定翻译《资治通鉴》的原因。生于一九二二年，本名郭衣洞的柏杨，幼年丧母，受继母凌虐，十七岁逃离老家从军抗战，后随国府迁台，曾任教职；五十年代以小说闻名，后担任报刊主编并撰写大量具批判性的杂文，孰料因一组漫画，铛入狱，从一九六八年至一九七七年，共吃了九年又二十六天的政治牢饭。事业、家庭、亲伦，灰飞烟灭，活着等于熬着，能熬多久就多久，他的两大精神支柱是宗教与历史，狱中诗抄《卖史》一首写着：“……一读一落泪，一哭一抚胸；献身系图圉，爱国罹刀锋！”逐潜心研究历史，完成《中国人史纲》、《中国历代帝王皇后亲王公主世系录》和《中国历史年表》三部书。出狱时，柏杨已五十八岁，浩瀚史帙，积累于胸，使他以宏广的视野，观看中国人的政治，思索中国人的前途，他发愿语译《资治通鉴》，把历史的殷鉴，活生生交到每一个现代人手里，要思索未来，先以史为师。一九八三年，远流出版公司与柏杨订约，这项工程成为作者与出版者的共同使命。原本计划三年三十六册完成，詎料延展为七十二册，预定明年（一九九三）三月出齐，十年光阴，悠悠而过。

新店花园新城《揽翠楼》家中，柏杨语重心长地说：“中国人不断在重复自己的错误。”问到当权者能否认中获益时，他仿佛看到几千年来无数张帝王将相的脸从眼前掠过，他说：“权力本身的欲望使当权者对历史教训具有免疫力，他会听不进、看不到，变成瞎聋兼备的人。反而，对平民百姓启发较大，具备历史素养与胸襟后，有助于思索未来命运。民主，得靠小民。”

《柏杨版资治通鉴》的特色在于采西元纪年下系各朝年号，内文分节便于阅读，地名，官制均加以注解，另绘地图。收集图粹以利索查，书中附《柏

杨曰》评议月旦，书未设“通鉴广场”为读者论坛，汇流意见。

“将近一千万字，整整写了十年。十年来，朋友把我的书房唤作‘劳改营’，而我当然是典型的‘劳改犯’……”柏杨在最后一册《后记》中写道，抬头已届七十三岁。“感谢这十年——”他说：“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黄金时代，在十年劳改式写作生涯中，我享有充分的政治自由，心灵自由，和人的尊严，假使《柏杨版》对人群有贡献的话，这贡献来自我们终于争取到的这个民主自由时代。”

《参考小档》

现有《资治通鉴》语译本（依出版序）

- 1.《师大版》：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系黄锦（宏教授主编，王更生教授等二十六位译述。台北文化图书公司出版，一九八四，十二册精装。
- 2.《名远版》：台北名远出版社编辑部编译、出版，一九八四，十二册精装。
- 3.《改革版》：张宏儒、沈志华主编，北京改革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一，三册精装。
- 4.《柏杨版》：柏杨译，台北远流出版公司出版，一九八三至一九九三，七十二册平装与三十六册精装。

## 古典卷帙译介成白话长牍

——一九九二·九·一九·台北《民生报》

林英

中国五千年历史文化，博大精深，所累积下来的传统经史子集，的确可以称得上是卷帙浩繁，任何人要在有生之年看尽，是绝不可能的事，而现在的人又因为文言文与白话文的隔阂，如要看得懂的话，更是难上加难。

为了让现代的人能跨越这道鸿沟，有心的人就从事古籍的白话翻译工作，柏杨以十年的光阴做《资治通鉴》的白话翻译，孜孜不倦，永不懈怠，精神的支柱无非是想让现代人也可分享古人的智慧结晶，不会因文字的距离而有所差异，这一古籍译成白话的工作，也就彰显其时代的意义了。

但从典雅精炼的文言文，翻成妇孺皆晓的白话，会产生翻译过程中不可避免的断句或解释的差异，近代的白话翻译也因而见仁见智，并且由于观点的不同，以致看法也南辕北辙，几近乎水火不容。

淡江大学教授龚鹏程就持反对的意见，他认为文言译白话是毫无道理的事，因为文言文与白话是同一套文字，并不像英文或日文，与中文是不同的语文，需要透过翻译的手段，才能知道意义，而且文字本身与意义是连结一起的，换句话说，字本身就是一种表现者。至于一般人强调文言与白话的差异，他指出，这只不过是典雅与简单之分而已，因为即使通俗如白话者，书写的文字还是不能与口说的语言完全一样。

但是中央大学教授李瑞腾却认为，古籍白话的翻译，是现代化的过程，因为中国传统的古典文学，所有的文言文，与现代一般人使用的白话还是有差异，如何让更多的人透过白话的翻译，能分享古人的智慧，是这个时代的人的责任。而且翻译成白话，并不意味着传统的经典就没有了，也就是说，能够看原典的人，当然直接看原典，两者并行不悖。

但龚鹏程认为，他反对译成白话，是因为翻译的过程中，会失去原有的风格，像是传统的诗词翻成白话，味道就完全不一样了，试看看“床前明月光”如果翻成“照在床的前面的月亮的光”是什么样的感觉；而韩愈的古文，可贵之处就在他的独特风格，翻成白话除了文字的大量稀释外，其他什么都没有了。如果要普及推广，他强调可以用导读、用注释，或是指出古人用典的出处，透过这些训注，现代的人还是可享受到古人的精义。

李瑞腾则强调，文字只是一种符号，重要的是要让人了解内容，像是蔡志忠以漫画来表现《庄子》、《老子》媒介的符号更简化，表现的过程可能会误解原意，但是这种形式却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庄子》、《老子》，至于有时的误译，则有待学者专家的澄清。

## 荣耀台湾上空的双桂冠光华

——一九九三·二·一 ·台北《自由时报》

郭玉文

在一九九一及一九九二两年当中，柏杨、张香华这时文坛伉俪，分别获得诗人最高荣誉——国际桂冠诗人奖。不仅于此，在一九九二这一整年中，张香华所译的韩国诗人金素月诗集《践踏缤纷的落花》、南斯拉夫诗人亚历山大·彼德罗夫（Dr. Alexander petrOv）诗集《乘着光的梯子》、另一南斯拉夫诗人山·引（Dr. Du san Pajin）诗集《温馨的边缘》均获得出版；同时，她的个人诗集《爱荷华诗抄》、《丝和温暖的酒》，则分别被译成英文和塞尔维亚文，于海外发行。至于柏杨，自一九八年开始进行的《柏杨版资治通鉴》，历经十年光阴，总算于一九九二年终，全数译完；而他的脍炙人口之作《丑陋的中国人》英译本，则由澳洲Allen & Unwin公司出版，此外，他更编选了《就是他》一书，并受“全国预防医学学会”之聘，担任爱滋病防治执行委员。总之，过去的一年对他们而言，不仅是忙碌的，同时也是丰收的。对于这一切，且让我们作一番回顾，听听他们二位怎么说柏杨（以下简称柏）：所谓丰收，意味着“疲惫”，在这一方面，香华比我多。

张香华（以下简称张）：对于去年的成绩，我觉得很兴奋。我做事的态度向来十分“即兴”，没有任何压力，都是为了兴趣而做。我同韩国文坛一向有密切联系，有一回，偶然在杂志上看到金素月的英译诗篇，觉得相当不错，便委托朋友自韩国寄来金素月诗集，愈读愈有兴味，便这么动笔翻译起来了。非常幸运地，在翻译过程中，遇见一位中文造诣极高的韩国学者罗润基，每译至一个阶段，便请这位朋友针对气氛及风土人情的掌握，作一番指正，在配合良好的情况下，终能译完全书。至于南斯拉夫的两本译诗，则是因为我曾于一九九一年受邀前往南斯拉夫访问，结识此二位完全不同典型的优秀诗人，对他们的精彩作品，留下深刻印象，方能着手翻译。

由于诗向来是十分“冷场”的文类，翻译之初，我并未考虑到出版及其市场性，甚至在两本南斯拉夫诗集译完之后，南斯拉夫朋友赞扬道：你们中国真是一个喜欢诗的民族，是不是你们的出版界对诗集非常欢迎与重视？我仅能将台湾目前对诗集的出版态度，据实以告。在这样不利于诗的出版环境下，对这几本译诗得以出版，我感到非常幸运。

柏：我的一生仿佛都在战斗，完成了《资治通鉴》亦如是，因此并没有如释重负的感觉。当然，在翻译《资治通鉴》的过程中，每天皆有“高潮”发生；那就是遍寻不着的资料，一旦找到了，便能有十分喜悦的感觉，其余的，则是一连串的挑战，久而久之，成为生命的一部分。工作的完成与否，对我的生活没有太大改变，因为，即使不写《资治通鉴》，还是会写别的东西，更何况校对《资治通鉴》还得花费相当长的时间。十年以来，我完成了九百余万字，相当于每个月必须写作七万五千字、校对十五万字（校对两遍）、阅读原文四万字，风雨无阻，这些工作没有人能够替代。《通鉴》的初步定稿精装三十六册，可望于今年（一九九三）三月全部出齐，出版前必须全数重新校对，它并非平装的合订本，在结构上必须重新组合、增加一部分地图，目的是希望读者于看到历史人物的“演出”之时，同时看到事件发生的舞台，再加上每次再版前的校对、增订，凡此种种，都不是短时间可以完成的工作。

至于他们双双获得国际诗人桂冠殊荣，对于他们的写作生涯则分别具有如下意义：

柏：不知道多少年以前，我曾经做梦，希望这一生能获得桂冠奖，当时觉得这简直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我从来没有得过任何奖项，甚至连台湾的文学奖也没有，各种奖项都有不同的小天地，而我并不属于那个小天地。能获得桂冠奖对我而言，自然非常高兴，当时委托香华前去美国凤凰城领奖，她曾经略有微词；她写了一辈子诗，都没能得奖，我不过只写了这么一本诗集，竟然就能获奖。不料，就在颁奖典礼结束之前，她也获得当年度的桂冠奖、真的是非常高兴的一件事。

张：桂冠奖对我是一个激动，我希望不论是我个人或台湾诗坛，都能因此同国际有更多的接触，也许诗这个文类在目前的市场并不被看好，但我相信“她”将会永远存在。我们可以发现：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创作者当中，有许多是诗人，表示诗将永远不死，至于这个社会究竟何时才能“安静”下来重新欣赏诗的美感，我认为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诗，由于十分精致，不可能成为一种大众文学，只可能是小众艺术，“她”是一种很脆弱的美，一经工商业社会尔虞我诈的碰撞，便消失了，若使一个社会对美尚存有一点爱惜之心，诗便拥有希望。以我这次所翻译的三本诗集而言，在韩国和南斯拉夫，均极受重视，对于他们而言，他们的诗能被翻译并传播到中国来，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特别是对于东欧国家而言，东方是具有古老文化的地方，东方文明是非常崇高的文明，能有这样的交流，自然令人雀跃。中央图画馆希望透过我的联系，前往南斯拉夫举办书展；南斯拉夫则希望能出版一部“中国现代诗选”（包括台湾、中国大陆，及所有海外华人）。他们在饱经战乱之余，尚且如此注重心灵及文化活动，而我们还没有提升到重视文化的阶段，我们的胸襟不够开阔，经常只是在岛内制造问题纷争，我们如果真正爱我们的本土，应该让全世界了解，并接受和欣赏我们的美，这才是真正的大爱。

希望大家都能静下来，各司其位，走出台湾，走进世界。我是真正定下心来致力于《中国现代诗选》的编选工作，我们的文艺同世界各国应该有更多的交流，人们才能互相了解，并将不同世界中的不同美感发掘出来。

桂冠奖是一个国际奖项，假使我能够有机会把我们的好作品推广出去，并吸收他人的长处、美感，不论对我个人或整个中国文化，都将有所成长，无异多打开一扇窗，有了更广的视野。

柏：韩国人对于金素月诗集被翻译成中文，非常重视，甚至举办一个盛大晚会，表示庆祝，并安排香华到各大学演讲；至于台湾，假使我们任何一位诗人的作品被翻译成其他文字，我们会否这样热烈的反应？事实上，香华对文化的传播，作了许多贡献，她并不追逐名利，她在韩国、南斯拉夫所得到的荣耀，应该是民族的，而不专属于她个人。台湾是一块富有的“文化沙漠”，人们的心灵对于“美”相当冷漠，有的只是不断的排斥，因为我们不懂得欣赏他人的成就。

张香华女士对于诗的推广可谓不余遗力，除了前述积极致力于翻译、促进国际交流之外，今年（一九九三）元月开始，更于警广每周日晚间九时四十分主持“诗的小语”节目，为听众作诗的赏析，同听众分享诗的美感，这是一种文艺扎根的工作，她说：“我于介绍这些诗篇时，没有太多人际关系的束缚，我并不介绍高深的学理，仅只告诉听众如何欣赏一首诗、如何亲近一首诗，是一种十分家常的闲聊。社会的节奏太快，诗的欣

赏可以缓和紧张的步调，开始时我并不选择讲解一些冷僻的诗，而是循序渐进地引导，这样的工作必须有人来做，总之，是一个全新的开始。”

关于新的一年期许——

张：我正着手编选《中国现代诗选》，必须与南斯拉夫朋友密切联系，同时更将于四五月间前往南斯拉夫作直接沟通。对于新的一年，我期许人们能够喜欢听我的节目，并进而对诗有进一步的认识。

柏：诗集通常以文学出现，以声音表达的方式倒还不多见。诗，透过声音，以具有音调感情的方式讲解之后，可以使人得到更深的感受、理解。

对于新的一年，我还没有任何计划，最主要的仍要将《资治通鉴》的后续工作完成（如：再版之后的校对、增订），至少尚须费时一年以上，若有余力，自然仍将作些创作或评论工作，写作毕竟已成生命的一部分，连坐牢期间都不能停止写作，何况目前的环境已没有任何后顾之忧。不写是不可能的，但是必须等到我目前的负担稍微轻松一些之后。

其实，在过往的一年当中，柏杨同张香华自然也不免有些不顺心的事，例如：他们于春节期间赴南非度假时，因为十六小时的长途飞行，加上感冒，使他们双双病倒，并住进约翰内斯堡的医院中达十天之久；又如，柏杨自去年年初开始，视力便急剧衰退，不久之后甚至无法阅报写稿，究其原因，乃因为服刑期间牢狱中灯光不足导致右眼球出血，当时虽感视力稍微模糊，由于服刑期间，诸事不便，便这么延宕下来，到了去年（一九九二）年初，连左眼视力亦趋恶化，短短数周内已几乎看不清楚任何东西，方才就医，幸遇良医，在中药、西药双管齐下之下，采访之时，视力已恢复达五分之三，对喜爱柏杨作品的读者而言，不啻为一个好消息。

新的一年已经来临，柏杨、张香华夫妇的努力可以作为我们行事的借镜，在访谈中，柏杨曾不止一次提到：他感谢这个社会目前的自由、开放与富足，这是他所以能够完成《资治通鉴》的一大后盾，对于过往的牢狱及苦难，则并未心存怨恨，他的宽容大度是另一项值得大众学习的地方。且让我们期许新的一年，台湾的文艺能够更加蓬勃，并与世界产生实质的互动与交流！

### 冤气歌

天地有冤气	杂然赋流形
在下为石板	在上为石顶
门则为铁锁	窗则为铁棧
于人曰俨然	斗室织口供
他白即自白	栽脏更心证
时穷苦乃见	一一服上刑
在鲁少正卯	五罪毕其命
在宋岳武穆	三字丧其生
在元窦娥冤	六月雪打灯
为颜大夫腹	无语也词穷
为杜伯坚目	三日生蛆虫
或为韩非笔	异域陷牢笼

或为廷珑史 五族化血脓  
 或为清风诗 老幼伏刀锋  
 或为柏杨文 家破人飘零  
 此气之所向 冷血入心灵  
 当其贯日月 更带三色镜  
 私怒藉此泄 私欲藉此逞  
 私恶藉此掩 私恨藉此明  
 嗟予邁阳九 心粗气更庸  
 大力水手画 动摇国本情

专案设小组（11） 全力扑孤蓬  
 水手难相助 七番查生平（12）  
 二十年前事 当时已朦胧（13）  
 清算复锻炼 展出新内容  
 受训有学院 参加有民盟（14）  
 逃亡有路费（15） 居住有叮咛  
 上海闹恋爱（16） 北平又立功  
 好友成间谍 台湾追人踪（18）  
 但求早还家 不惜一身腥  
 初云政治决 继云怨道行  
 三云洗个澡 四云待入诚（19）  
 好话都说尽 临了变狰狞（20）  
 苍天曷有极 悠悠我自清  
 冤魂日已远 生魂怜典型  
 囚室空对壁 相看两无声

注：

少正卯，纪元前五世纪春秋时代，鲁国一位很有名望的文化人。被当时代理宰相（摄相事）孔丘逮捕处决，宣布少正卯五大罪状是：“居心阴险，处处迎合人的心意。行为邪恶，不肯接受劝告。说出的全是谎话，却坚持说的全是实话。记忆力很强，学问也很渊博，但知道的全是丑陋的事情。自己错误，却把错误润饰成一件好事。”

岳飞，谥武穆，十二世纪宋王朝名将，屡次击败北方金帝国的侵略，立志把金军逐出中国国境。被皇帝赵构及宰相秦桧猜忌，诬陷他谋反，下狱处决。另一名将韩世忠向秦桧质问谋反是不是事实时，秦桧回答说：“莫须有”，即“不见得没有”。韩世忠叹息说：“莫须有三字，怎能使天下人心服？”

窦娥，十三世纪元王朝民间故事女主角。窦娥丈夫早死，侍奉婆母，非常孝顺。恶棍张驴儿在羊肚汤里下毒，想要毒死婆母，霸占窦娥为妻。想不到张驴儿的父亲嘴馋，把羊肚汤偷吃了，毒发身死。张驴儿勾结法官，诬陷是婆母下毒。窦娥不忍婆母被苦刑拷打，只好坦承不讳是她把张老爹毒死，即被判死刑。在绑到法场斩首时，正逢六月盛暑，却忽然飘起大雪，显示上天为这场冤狱哀伤。

纪元前二世纪，西汉王朝皇帝刘彻，发行“白鹿皮币”，（一张“白鹿皮币”，值钱四十万，亲王公爵伯爵们由封地到首都长安朝觐皇帝时，都

要购买，是一种变相的勒索）。农业部长（大农令）颜异表示反对，刘彻不悦。不久，就有人指控颜异违法，刘彻指定酷吏张汤审问。最初，颜异跟朋友在一起闲谈，谈到法令扰民时，颜异没有回答，仅微微的“反唇”。张汤认为这就是“腹诽”证据，罪大恶极，处斩。从此，西汉王朝遂有“腹诽”的判例。

杜伯坚，本名杜根。二世纪东汉王朝皇帝刘祜在位，年方冲幼。皇太后邓女士听政，政府大权操在邓姓家族之手。杜伯坚上书抗议，要求将大权交还皇帝。邓太后震怒，下令把杜伯坚装在麻袋里，在金銮殿上扑杀，然后把尸体抛到城外荒郊。卫士们同情杜伯坚一腔忠贞，摔时未用全力，杜伯坚幸得悠悠苏醒。但他知道邓姓家族不肯罢休，仍躺在原地装死。三天后，邓太后果然派人察看，发现他眼角已生满蛆虫，才算安心。杜伯坚始行逃走，躲到乡下为人当仆役。直到十五年后。邓太后身故，邓姓家族瓦解，才敢出面。

韩非，纪元前三世纪战国时代韩王国贵族，是中国法家学派创始人之一，著有《孤愤》、《五蠹》等书，被当时秦王国国王嬴政看到，衷心佩服，惋惜说：“我如果能见到这些书的作者，跟他交游，死而无恨。”宰相李斯告诉他韩非仍然健在，嬴政大喜，于纪元前二三三年，用隆重礼节，把韩非迎接到秦王国首都咸阳，然而不久李斯就发现他的宰相职位受到威胁，向嬴政说：“韩非是韩王国的贵族，不是普通平民，不可能忠于秦王国。与其用他，不如送他回国。但与其送他回国后变法图强，跟我们对抗，不如杀他。”嬴政遂把韩非下狱，就在狱中毒死。

这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文字狱之一，发生于十七世纪。庄廷珑所著《明史》，对当时当权的清王朝政府，有斥责的和轻视的字句。时庄廷珑已死，清政府下令剖棺尸。庄廷珑的弟弟，跟为该书作序的人，以及出版商、经销商、刻字工人，全部处决。庄廷珑的家属，不分男女老幼，全体发配酷冷的边陲——黑龙江，给穷披甲人为奴。此案使中国文化人陷于恐怖之境。

十八世纪是中国文字狱最多的一个世纪，大狱一个接一个兴起，死人千万。诗人徐述夔早已去世，但在他的遗著中，发现有“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句，清王朝皇帝张历，认为他故意讽刺元首，以及诽谤清政府。徐述夔剖棺验尸，徐述夔的儿子儿孙几，和地方政府官员，全体斩首。

“嗟予遘阳九”，为文天祥《正气歌》原句，原注云：“遘，遇也。阳九、谓穷困之时运。说详《汉书·律历志》。”柏杨被捕，导火线是一幅美国金氏社发行的《大力水手》连环漫画，时柏杨前妻倪明华任职台北中华日报主编，采用该项漫画，柏杨负责文字方面翻译。柏杨意译文句，被指控为“以影射方式，攻讦政府，侮辱元首，动摇国本。”

(11) 侦讯柏杨，由司法行政部调查局、台湾警备总司令部、台北市警察局、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第六组，共组专案小组。侦讯之初，四单位代表均出场，稍后由调查局单独负责。

(12) 办案人员命柏杨写详细自传，从呱呱坠地到《大力水手》，一遍认为隐瞒，乃写二遍，再认为隐瞒，乃写三遍四遍五遍六遍七遍……直到招认罪行，办案人员满意为止。

(13) 指一九四九年沈阳解放时之事，距一九六八年柏杨被捕，整整二十年。

(14) 柏杨终于招认：“在沈阳民主建设学院受训三天”及参加“民主



同盟”。

(见台湾警备总司令部五十八年度书检诉字第 六号军事检察官起诉书。以下四注均同此。)

(15)柏杨招认：“共产党发给三十元金元券作为由沈阳赴北平活动费。”

(16)柏杨招认：“在上海与民主同盟负责人、国立复旦大学教务长许逢熙，取得联络，并与许逢熙的女秘书岳政芬恋爱。”

(17)柏杨招认：“在北平旃坛寺接受共产党训练三天，劝人投共，及调查军队脚踏车数目，为共产党立功。”

(18)柏杨招认：“来台湾后，曾在台北《民族报》上，刊登广告，欲与共产党地下工作人员许逢舜

(许逢熙之弟)及岳政芬取得联络，不果。”

(19)以上四句，均办案人员语，保证政治问题政治解决，并云他们国民党是讲恕道的，充分理解当时困境，绝不追究。又云经过此项自动招认，等于洗一次澡，一身清白。复强调他们三民主义信徒，一秉至诚承诺，绝不欺骗。

(20)最后将柏杨移送台湾警备总司令部军法处，由军事检察官以“战乱时期惩治叛乱条例第二条第一项”起诉，要求枪决。

邻室有女

调查局监狱，位于台北三张犁，各房间密密相连，却互相隔离，不通音讯。稍后频闻女子语声，有感。

忆君初来时	屋角正斜阳
忽听莺声啭	蓦地起 徨
翌日尚闻语	云购广柑尝
之后便寂然	唯有门锁响
初响是提讯	细步过走廊
再响是归来	泣声动心房
君似患喉疾	咳嗽日夜扬
日嗽还可忍	夜嗽最凄凉
暗室幽魂静	一嗽一断肠
我本不识君	今后亦不望
唯曾睹君背	亦曾系君裳
同病应相怜	人海两渺茫
我来因弄笔	君来缘何殃
君或未曾嫁	眼泪遗爷娘
君或已成婚	儿女哭母床
今日君黑发	来日恐变苍
欲寄祝福意	咫尺似高墙
君应多保重	第一是安康

愿君出狱日 依然旧容光

注：调查局狱囚禁后期，每天有十分钟散步。某日散步时，晒衣架上的一件女衣被风吹落地面，柏杨代为拣起，重系绳端。

儿番铁链过门前  
肠萦女儿悲离别  
天上千年如一日  
到此人生分岁月

几番哀号震铁栏  
魂凉鞭后咽寒蝉  
狱中一日似千年  
听风听雨两茫然

### 家 书

伏地修家书  
字是平安字  
人逢苦刑际  
凝目不思量

字字报平安  
执笔重如山  
方知一死难  
且信天地宽

### 小 院

小院黄昏密密灯  
男子剥衣坐冰块  
棉巾塞口索悬臂  
暂罢稍休候再讯

正是人间两死主  
女儿裸体跨麻绳  
不辨叱声与号声  
只余血泪淹孤灯

### 有 感

东方闪闪日光新  
闭眸便见娇儿女  
人主飘渺半如梦  
此情都已随风去

诏狱压压积乌云  
展眉仍自对孤门  
乍惊我梦偏沉沦  
依墙寂寞待黄昏

### 梦 回

夜半无声月色迟  
仍携妻子稚儿女  
倚墙欲写相思字  
可奈此情无处寄

睡中依旧到华池  
惊醒枕畔梦如丝  
提笔 惶意已痴  
今时不是往年时

### 除 夕

鞭炮断续逢除夕  
楚囚相对无人泣  
似醉还畏狱吏责  
怜我固然太懦弱  
未沉其境皆清醒  
人道人权一笔勾  
毒言置语能挫骨

席地举杯共进肠  
丹橘酿酒下回肠  
回头更觉意 徨  
看他岂是真刚强  
既沉其境都迷茫  
斗室恰如刀俎场  
坐冰压趾两相忘

互证相符织成线	空言狡展结文章
自动招认夷狄法	坦承不讳传统方
何患无辞肉喂虎	欲加之罪狼食羊
喜看时雨萧萧至	怒觑血斧频频扬
人生千古终须死	留取片心映日光
鼻息均匀人已睡	魂梦何曾入梦乡
此诗写罢年将尽	低眉仔细理囚裳

注：

依现行刑事诉讼法，被告之间所作不利于对方的口供，得作为对方犯罪的证据。

《伊索寓言》：狼要吃小羊，坚称小羊去年曾偷吃它门前嫩草，小羊说：“去年我还未出生呢！”狼说：“那也没有用，我不能不吃东西呀。”

### 秋 雨

一番秋雨一番凉	滴滴声声入铁窗
花下孤蜂觅残蕊	枕前穴蚁衔冬粮
屡念蛛丝千折线	一笑梦醒百回肠
遥怜贪玩小女儿	不知已未加衣裳

### 囚 房

重锁密封日夜长	朦胧四季对灯光
天低降火类炉灶	板浮积水似蒸汤
起居坐卧皆委地	呻吟宛转都骨僵
臭溢马桶堆屎尿	拥挤并肩挥汗浆
身如残尸爬黄蚁	人同蛆肉聚蟑螂
群蚊叮后掌染血	巨鼠噬罢指留伤
暮听狂徒肆苦叫	晨惊死囚号曲廊
欲求一刹展眉际	相与扶持背倚墙

注：

政治犯枪决时，总在凌晨天色将明未明时执行。

### 闻判十二年

判决书：姑念情节轻微，免死，处有期徒刑十二年。

刀笔如削气如虹	群官肃然坐公庭
昔日曾惊鹿为马	至今忽地白成红
兀 有权制冤狱	书生无力挽强弓
可怜一纸十二年	迎窗冷冷笑薰风

### 读 史

每一展史册	触目自心惊
-------	-------

所谓礼义邦	更翎最文明
有记四千载	冤狱染血腥
侠义若郭解	豪迈若李陵
精忠若岳飞	净冻若田丰
大勇若李牧	大智若文种
大识若于谦	大名若孔融
功如周亚夫	亲如司马宗
财如上孙奋	学如王阳明（11）
才如苏东坡（12）	史如庄廷玩
文如司马迁（13）	诗如薛道衡（14）

赤心伍子胥（15）	割肉杨继盛（16）
肝胆袁崇焕（17）	雄谋封常清（18）
曲端活烤死（19）	李斯贝五刑（20）
荣爱灌铅汁（21）	崔浩囚铁笼（22）
郑生剥皮（23）	杨涟耳贯钉（24）
铁铉化焦骨（25）	彭越烹肉羹（26）
一读一落泪	一哭一抚胸
献身系囹圄	爱国罹刀锋
中华好儿女	几人有善终
不如懵懂人	扶遥到公卿
此中缘何故	欲言又无从

注：郭解，纪元前一世纪轵县（河南省济源县）人，好客任侠，得到民间敬重崇拜。西汉王朝皇帝刘彻，预定他的坟墓所在地为“茂陵”（陕西省兴平县），强迫全国各地富豪移民该地，作为他将来尸体的守卫。郭解的财产并未达到规定标准，可是却被贪官污吏把他列入名单。当他动身时，民众为他设宴饯行。县政府一位杨姓官员，却不准那些人跟他见面。郭解的侄儿气愤不过，把杨某刺死。杨某的父亲去当时首都长安告状，又被人在中途暗杀。西汉政府下令逮捕郭解。法官调查结果，发现两件凶杀案跟郭解无关，因为事发当时，他正在途中，依法应判无罪。可是宰相公孙弘却说：“郭解虽没有杀人，也没有主使杀人。但竟有人自动为他杀人，他的罪比他杀人或主使杀人还要重。”郭解遂全家处斩。

李陵，纪元前一世纪名将。纪元前九九年，李陵率五千步兵，孤军深入沙漠；匈奴汗国且捐侯单于以十六倍兵力迎战、李陵大败、突围不得、箭尽刀折、力竭投降、期能在匈奴内部用奇计立功。西汉王朝皇帝刘彻大为愤怒，将他全家老幼，包括他的八十余岁母亲，一并处决。

田丰，二世纪末，东汉政府衰微，各地握有重兵的将领，纷纷以独立王国姿态，据地自雄。二 年，东汉政府宰相曹操，与冀州（河北省）州长（州牧）袁绍，在官渡（河南省中牟县）会战。战前，袁绍智囊之一的田丰，认为只有持久消耗战，方可取胜。袁绍自恃兵强将广，要速战速决，以动摇军心罪名，逮捕田丰下狱。结果袁绍大败，众人向田丰贺喜，田丰说：“袁绍是个外貌宽厚，内心忌猜的人。如果获胜，还可能恩赦。现在失败，必然杀我遮羞。”袁绍果然告左右说：“我后悔没有听田丰的建议，今后会受他轻视。”命田丰自刎。

李牧，纪元前三世纪战国时代赵王国名将，对北击败匈奴汗国，对西击败秦王国。秦王国恐慌，派遣间谍贿赂赵王国国王的亲信郭开，诬告李牧谋反。纪元前二二九年，李牧被逼死。秦王国大喜，次年（前二二八），大军攻陷赵王国首都邯郸，生擒国王赵迁。

文种，纪元前五世纪越王国宰相。纪元前四九四年，越王国与吴王国在夫椒（江苏省太湖包山岛）会战，越王国大败，国王拟勾践被掳到吴王国首都姑苏（江苏省苏州市）为奴。文种在国内主持政府，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纪元前四七三年，越王国准备成熟，大举反攻，吴王国国王吴夫差自杀，国亡。拟勾践大赏功臣，对文种说：“你有七个灭人国家的方法，我只用了三个，就消灭了强大的吴王国。还剩下的四个方法，你准备用来对付谁？”文种只好自杀。

于谦，十五世纪军事家和政治家，初任明政府国防部副部长（兵部侍郎）。一四四九年，皇帝朱祁镇，在宦官怂恿下，御驾亲征瓦拉部落。于谦竭力劝阻，朱祁镇不听，终于在土木堡兵溃，朱祁镇被俘。明政府大震，群臣主张迁都到南方，于谦认为一旦迁都，北中国即将不保，力主守卫北京，并拥立朱祁镇的弟弟朱祁钰继任皇帝，领导全国抗战。瓦拉部落毫无所获，把朱祁镇释回。一四五七年，朱祁钰卧病，朱祁镇发动政变，夺回政权，再当皇帝。逮捕于谦，诬以谋反，处决。

孔融，三世纪最著名的儒家学派学者，为全国知识分子崇拜的偶像。后来担任东汉政府财政部长（少府）。宰相曹操正在当权，二人不能相容。二八年，参谋主任官（军谘祭酒）路粹，指控孔融诽谤政府，孔融夫妇一齐处斩，一个九岁的儿子和一位七岁的儿子，正在玩棋，有人劝他们快逃，回答说：“覆巢之下，安有完卵？”也一并被杀。

周亚夫，纪元前二世纪名将。纪元前一五四年，西汉王朝七位亲王叛变，中央政府几乎瓦解。皇帝刘启擢升周亚夫当武装部队总司令（太尉），出兵削平叛乱，再擢升当宰相。因与刘启意见不合，不久即被免职，但刘启仍耿耿在心。纪元前一四三年，周亚夫的儿子为老父预寻墓地，用白纸竹片，札成兵器，作为焚烧之用。有人秉承皇帝旨意，告发周亚夫谋反，即行下狱。周亚夫向法官说明所谓兵器，只不过是死人下葬时用的冥器而已，法官说：“你固然不在地上反，但你却在地下反呀。”周亚夫这才发现无罪不能无刑，遂服毒自杀。

司马宗，晋王朝亲王。四世纪二年代，庾太后的胞兄庾亮当权，深忌司马宗守法不阿，且得众心，又跟镇守历阳（安徽省和县）名将苏峻是好友。而庾亮正欲铲除苏峻，遂于三二六年，命总监察官（御史中丞）钟雅，控告司马宗谋反。司马宗愤而拒捕，被杀。

士孙奋，二世纪东汉王朝的暴发户，当时东汉政府大权在全国最高统帅（大将军）梁冀之手，梁冀向他“借”钱五千万串，可是他只能凑出三千万串，梁冀大怒，即指控士孙奋的母亲，在梁家看管库房时，曾偷了白珠十斛、紫金千两逃走。地方政府遂逮捕士孙奋兄弟，就在狱中害死，价值一亿七千万串房地产没收。

（11）王阳明、十六世纪思想家和政治家，是儒家学派中阳明学派的创始人。一五六年，任职明王朝南京分政府的国防部科长（兵部主事），时皇帝朱厚照年幼昏暴，宠信宦官刘瑾，把宰相免职，王阳明上书抗议，乃被逮捕入狱，打五十军棍，贬到蛮荒边陲。

(12) 苏东坡，十一世纪最有名的诗人、词人、作家、画家、政论家，各种文体，无一不精。该世纪七十年代，宋王朝因变法问题，政府中内斗极烈。时苏东坡任潮州（广东省潮州市）州长（知州），曾作《槐树》诗，有句云：“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唯有潜龙知。”监察官（御史）李定、舒、何正言，联合检举他诽谤皇帝。因皇帝是龙，而龙却潜在地下，明显的是一种诅咒。于是苏东坡被捕下狱，百般锻炼。幸营救者众，得以不死。

(13) 司马迁，中国史学之父，纪元前一世纪年代，李陵兵败降匈奴，西汉王朝皇帝刘彻向他征求对李陵的意见，司马迁人为李陵必是迫不得已，定有后图。刘彻大怒，处司马迁宫刑。

(14) 薛道衡，七世纪著名诗人，隋王朝皇帝杨广深忌他的诗才、乃诬以谋反，下狱处死。死后，杨广得意说：“看你还能作‘空梁落燕泥’否？”

(15) 伍子胥，纪元前五世纪名将和政治家，时逢战国时代，他担任吴王国宰相。纪元前四九四年，与越王国决战；越兵大败，国王姒勾践被俘。姒勾践用谄媚和贿赂，使吴王国国王吴夫差动心，于囚禁二年后释放回国，伍子胥反对。吴夫差东正西讨，忘掉心腹大患，伍子胥不断谏阻，吴夫差震怒，命他自杀。不久，越王国大举反攻，吴夫差身死国亡。临死前，用布覆面说：“无颜见伍子胥于地下。”

(16) 杨继盛，十六世纪中国大黑暗时期，明王朝皇帝朱厚任用严嵩当宰相，严嵩贪赃枉法，无所不用其极。杨继盛时任国防部人事司司长

(兵部武选司)。一五五三年，上奏章弹劾严嵩五奸十大罪，朱厚大怒，逮捕杨继盛下锦衣卫狱，廷杖一百，割下烂肉三，断筋二条，日夜囚禁宠中，备诸痛苦。延至一五五五年，复被斩首。

(17) 袁崇焕，十七世纪明王朝名将，镇守宁远

(辽宁省兴城县)，曾击毙来犯的清王朝第一任皇帝努尔哈赤。一六二九年，清王朝第二任皇帝皇太极率大军由问道围北京，袁崇焕率五千名骑兵入援，士不传餐，马不再食，在北京城外，大破清军。皇太极乃施反间计，纵一宦官归，言袁崇焕与清军勾结，明王朝皇帝朱由检暴怒，逮捕袁崇焕，寸寸磔死，家属放逐三千里。

(18) 封常清与高仙芝，均为八世纪名将。七五五年，范阳（北京市）战区司令官（节度使）安禄山叛，举兵南下，唐王朝皇帝李隆基任命高仙芝担任统帅，封常清担任副统帅，在潼关布防。监军宦官边令诚屡屡向高仙芝请托和索取巨款，高仙芝不应。边令诚向李隆基密告二人谋反，李隆基下令斩高仙芝、封常清。（次年，潼关军溃，边令诚投降了安禄山，充当向导，攻陷首都长安）

(19) 曲端，十二世纪宋王朝名将，时张浚任西北军区司令官（陕西处制使），忌妒曲端盛名，恐无法控制，乃诬以谋反，逮捕下狱。命曲端私仇康随担任审判官，康随令狱吏缚住曲端，用布糊口，燃火烤炙，曲端口渴索饮，就给他醋汁、七窍流血而死。金帝国远征军闻曲端死，大喜，立即发动攻击，宋军崩溃。

(20) 李斯，纪元前三世纪，秦王朝统一中国，李斯担任宰相。纪元前二一年，第一任皇帝嬴政逝世，李斯与宦官赵高结合，拥立嬴政少子嬴胡亥继任第二任皇帝。赵高欲独揽大权，乃诬李斯谋反，于纪元前二八年，以五刑将李斯处死。五刑者：（一）先在脸上刺字，（二）再割去鼻子，（三）再砍掉左右脚，（四）再用竹条活活打死，（五）再将尸体斩首。李斯跟他

的儿子被绑赴刑场时，对他的儿子说：“我们父子再牵黄犬，出城门打猎，岂可复得乎。”父子相哭，三族均被屠杀。

(21) 荣爱，二世纪中国美女，是东汉王朝亲王刘去的一位姬妾。刘去骄暴无人性、另一宠姬阳成昭信非常狡黠，先后由她进谗，而由刘去处死的姬妾婢女和家属，已有十四人，使用针刺、剑击、屈烧、铁烙、割鼻、断舌、烹煮、支解等种种酷刑，王宫成为恐怖世界，人人自危。某天，刘去召荣爱陪酒，阳成昭信妒火中烧，即密告荣爱跟王宫医生通奸。刘去暴怒，把荣爱为他刺绣的方领烧毁。荣爱知大祸临头，万口难解，投井自杀，却被抢救出井，绑在柱上鞭打，不堪其苦、自动招认通奸是实，刘去用烧红的刀子挖去她的眼珠，片片割她的肉，又熔铅汁灌入她口中。死后，再把她支解，用荆棘裹尸埋葬。

(22) 崔浩，六世纪历史学家及政治家，南北朝时代北魏帝国宰相，被视为国宝。皇帝拓拔焘教他编写北魏帝国史，并信誓旦旦，要他“务从实录”。崔浩果根据事实，一一叙列。拓拔焘恼羞成怒，将崔浩囚入铁笼，送到首都平城（山西省大同市）城南闹市，公开展览，命守卫士兵撒尿到他头上身上，哀呼悲号，闻于行路。然后斩首，凡他故乡清河郡（河北省清河县）姓崔的人，不管是不是一族、一律捕杀。范阳（北京市）卢姓家族，太原（山西省太原市）郭姓家族，河东（山西省永济县）柳姓家族，因跟崔浩有亲戚关系，也全部屠戮

(23) 郑。十七世纪著名的文化人。因得罪明政府当权宰相温体仁。被诬陷殴打母亲，凌迟处死。

(24) 杨涟，十七世纪明政府左总监察官（左都御史），时宦官魏忠贤专政暴虐，杨涟向皇帝朱由校弹劾魏忠贤二十四罪，魏忠贤大怒，逮捕杨涟及畜牧部副部长（太仆少卿）周朝瑞，左副总监察官（左全部御史）左光斗，陕西省民政长官（陕西按察史）顾大章，河南道监察官（河南道御史）袁化中等下狱，累累跪阶前，裸体窘辱，复加拷掠，大家荷枷横卧堂下，一一诬服受贿。复行追赃，三日一限，先后拷死。而杨涟最惨，家属领尸出时，只见土囊压身，铁钉贯耳。

(25) 铁铉，十五世纪名将，明王朝内战（靖难之役）期间，亲王朱棣由北京率叛军南下，进攻首都南京，铁铉时任山东省长（山东参政），固守济南，屡败叛军。后来朱棣叛变成功，即位称帝，捕铁铉至，割掉耳鼻，炙熟纳其口中，问香不香？铁铉大声回答：“忠臣孝子的肉，怎会不香？”朱棣暴跳起来，命寸寸磔死，投入油锅，顷刻化作焦灰。全家处斩，妻子女儿发入妓院，任人嫖辱。

(26) 彭越，纪元前二世纪名将，封为王爵。前一九六年，西汉王朝皇帝刘邦北伐，彭越有病，不能随征，只派了一位将领率军作战。刘邦大怒，派人前去责备，部将劝彭越起兵叛变，他不肯，于是有人密告他谋反，逮往首都长安，撤销王爵，废为平民，贬到四川省边陲地区。中途遇到刘邦的妻子皇后吕雉，向吕雉诉说冤枉求救，吕雉满口应允，带回首都长安，却向刘邦说：“彭越是一位勇士，放逐到四川，岂不危险？”刘邦恍然大悟，命人再告彭越谋反，处斩，屠三族。把彭越尸体剁成肉酱，烹作羹汤，分给其他将领饮食，用以阻吓。

昨夜还是团圆月      今夕急风撼铁窗  
孤魂历历身在地      斗室幽幽影倚墙  
丹心全付纸和笔      离恨空余儿女肠  
但愿化为千缕线      献于人人作甲裳

### 椰子树下

人生此日不常有      且付丹青黄花手  
椰子树下数落叶      一片落叶一杯酒  
月照冷眉守白兔      千株万株动地吼  
兀 仍图留春性      二无身尽空余口  
麻帐纵横又夜半      欣欣低语人对首  
我愧保罗往昔事      举目云天望北斗注：  
保罗，耶稣十二使徒之一。

### 感      奋

龙蟠虎踞彩霞生      八方仰首望云旌  
百年睡狮终开眼      巍然众志成城  
五更海峡昏沉夜      东西分别认巨星  
星光如火穿残月      连野鸡声啼晓明  
江山如画待混一      鲸鼓动时看沸腾  
虎旗横扫兀 穴      鹰扬直入单于庭  
英雄豪杰千秋事      恭理衣冠拜上京  
乾坤洗净旧颜色      天际人间两太平

### 黄      昏

黄昏最是相思际      狱门似海更艰难  
倚枕迷茫畏入梦      攀窗惆怅羨高山  
危危纸笔沉流水      冷冷人心逼面寒  
我今且喜听啼鸟      凝眸独自对云天

### 我来绿岛

一九七二年四月，政治犯自台北解往绿岛，囚国防部感训监狱。

我来绿岛时      状如待烹狗  
胸背缝数字      一三一二九  
两人共一铐      绳索缚双肘  
满目皆兵卫      飞机压顶吼  
巨舰载千里      横卧甲板首  
烈阳似火烧      甲板烫炙手



阵雨衣尽湿 阵风百骨抖  
历尽三昼夜 仍见笑开口

### 自 咏

纷纷大雪阻春风 春风划地生青草  
茫茫黑夜困金乌 金乌破海掀天晓  
辛苦艰难雪夜时 一寸光阴一寸老  
断腕男儿不自怜 偏对无涯雪夜笑

### 重 逢

君自泰源来 我自景美至  
昔日同铁窗 今日再逢此  
承君频询问 告君别后事  
某人尚未判 某人表压趾  
某人定无期 某人已伏死  
某人妻绝据 某人母歿世  
某人女沦落 某人子乞食  
都在縲紲中 相劝莫泪湿

注：

台湾省台东县泰源乡有一监狱，亦囚政治犯，此狱于一九七一年改收普通犯，将政治犯移解绿岛。

景美，即台北县景美镇，台湾警备总司令部军法处，和军法处看守所，均在此处。柏杨囚此四年之久。

### 怀孙观汉

万籁都从耳底收 孤鸟长啼山更幽  
东风吹合离离草 残日会逢晚晚秋  
飘泊地涯惊泪眼 仃伶海外托归舟  
天生我辈人间世 一点赤心证白头

### 我在绿岛

我在绿岛时 改服黑衣裳  
编号二九七 一一剃发光  
重犯十数人 独锁六区房  
囚室仅容身 旋转苦 徨  
寒风刺肌骨 海雨透铁窗  
偶闻浪声急 百折断回肠  
寂寥日复日 日日对寨墙  
不知人世事 唯怀父母邦

注：

国防部绿岛感训监狱，为放射状二层四角大厦，一角称一区，六区在二楼，专囚重要政治犯。

### 窗 下

窗下读残书	悠悠意自如
浑忘家何在	轻风送翠姑
斗室空寂寞	海浪听酣呼
云际传笑语	人孤心不孤

### 暮 晴

暮天雷雨止	斜阳照曲池
村鸡啼声起	可惜非其时
蜻蜓掠碧草	斑鸠绕山迟
遥问家何在	低飞过北枝

### 斜 倚

梦回斜倚对西窗	一灯惨淡正昏黄
急雨不停催阵冷	怒潮彻夜打空墙
潜龙万丈吟深海	巨珠千尺初生光
孤岛浑沌将破晓	旭日冉冉看八方

### 炼

阴风习习火熊熊	发焦肤裂见性灵
尘沙一入成灰烬	断金千锤色益红
也有精钢变铁屑	更多铁屑化钢城
是非真假难预说	丹心百炼才分明

### 渺 茫

生固渺茫无以料	死更仓皇未可知
油尽灯枯余烟袅	轻风波动化相思
千古艰难唯有此	丈夫冷眼对崦嵫
不负满头苍白发	尚存一夕仍吟诗

### 春王正月

人言百分百	吾云九十九
苦听杜鹃啼	扪壁饮长吼
山色逼面来	又惧残花柳

莫非野菊开 将著红酥手

### 无 风

无风无浪海如冰  
残水似钩天半明  
花落百端随水去  
丝绕椰柳拂山青  
逐日但见平安报  
入夜还看星外星  
掩卷自知苍白脸  
泪珠一滴下芜城

### 但 愿

试问何所有 处处开黄花  
偶然无梦到 飘泊入谁家  
年余河谷幽 残月冉冉斜  
但愿从此始 一泻如流沙

### 出狱前夕寄前妻倪明华

被判十二年有期徒刑，后政治犯减刑三分之一，改为八年，八年终将届满。

明湖二月草正青 水里神前跪玉京  
龔舍传书人语起 旅程初喜金宵灯  
鹊桥霜滑长开眼 飘泊艰难物外星  
永和陡绝云天隔 惭问鸳盟与鸥盟  
石烂海枯誓言在 影伴形随叠步踪  
巨弓惊散同林鸟 鸣镝哀乐已三生  
感君还护覆巢女 魂绕故居涕棘荆  
我今归去长安道 相将一拜报君情

### 读史怀古

山雨欲来风满楼 台城王气黯然收  
初听朽家女鬼泣 继见文彩男士愁  
大树倒时声厉厉 猢猻散日气啾啾  
屈指兴衰仔细数 魑魅魍魉共一丘

### 何年何月

何年何月桃花开 地涯天外久徘徊  
也尝赋诗预志喜 无奈云深缓缓来  
艰难又是重阳到 卧听山呼下草台  
飞舞梦魂都在此 一日一番教人猜

## 出狱前夕女佳佳

吾儿初生时  
父独守长廊  
护士终相告  
此女即吾儿  
儿啼父心碎  
看儿渐长大  
曾入托儿所  
负儿逢自归  
出疹畏风光  
儿身热如焚  
自幼厌进餐  
悄悄吃狗食  
住院儿卧床  
五岁接电话  
怒时呼臭爸  
六岁考幼园  
滑梯玩不休  
上学有人送  
一路攀父臂  
爬肩闻烟味  
遇事即寻父

秋雨正浙沥  
喃喃向神祈  
告父生一女  
此情舔犊意  
儿笑父心喜  
摇摇学步举  
一别一哭涕  
为儿理发髻  
门窗日夜闭  
抱儿屡惊悸  
一餐一淘气  
吐泻几将毙  
伴儿父卧地  
口舌即伶俐  
顿脚如霹雳  
百分高第一  
万唤都不理  
下学父迎及  
仍作秋千戏  
翻腾上父膝  
搂颈絮絮语

寻伴乐不归  
急急如疯汉  
当父离家日  
坐地看电视  
一去即八载  
梦中仍呼儿  
而今父将归  
何堪吾家破  
儿已不识父

惹父沿街觅  
惶惶汗遍体  
儿已二年级  
尚对差人嘻  
一思一心戚  
醒后频频起  
儿业亭亭立  
孤雏幸存息  
怜儿泪如雨

## 出狱前夕寄陈丽真

我昔登车时  
惊恐满双目  
我家骤然破  
茫然无凭依  
曾被官传问  
君独无所惧  
名虽为师生  
君儿为我甥

君送楼梯右  
频频绞双手  
我命悬刀口  
赖君为奔走  
又被警押肘  
仍探狱中叟  
情如兄妹守  
君婿为我友

我幸留残年	已成丧家狗
接我千里外	安我北窗牖
义深难为谢	无力置杯酒
唯盼天晴日	同拂洛阳柳

注：陈丽真在家腾出一室，安顿柏杨，并函告柏杨，将亲赴绿岛狱门迎接（后经有关人员劝阻，改赴高雄迎接，失望而归）

### 软 禁

一九七六年三月七日，刑期届满出狱，当尸即再被台湾警备总司令部收押，囚于绿岛兵营。

浓云压压压残苔	独倚栏杆一眼开
我惭干钧无气力	万籁无声待雨来

### 嘱 女

千里来探父父迎乍邂逅	
茫茫两不识迟迟相视久	
父惊儿长大儿惊父白首	
相抱放声哭一哭一内疚	
父舌舔儿头儿泪染父袖	
睹儿思往事利刃刺心蕊	
旧创初结痂	新创再毒殴
痴痴望儿面父心泪中抖	
环岛踏胜迹	汗湿裳衣透
儿或挽父臂	父或牵儿手
温泉洗双掌	绝壁听海吼
高崖攀灯塔	佛洞卜神佑
缠父打乒乓	父女大交斗
笑声彻屋宇	又如旧日友
儿居招待所	窗外萌椰柳
诸友屡邀宴	率儿起敬酒
明月照小径	父女并肩走
喁喁儿时事	指天询北斗
儿卧酣酣睡	父傍泖夜守
听儿呼吸匀	喜儿不解忧
儿虽已长大	仍是一孩幼
睡时仍踢被	不能自察纠
乘车惧颠簸	嘱儿紧抓绶
饭桌用饮食	嘱儿垂双肘
坐时儿弓背	嘱儿挺胸钮
食罢不刷牙	嘱儿勤加漱
隐镜疑伤目	嘱儿另选购

琐琐复絮絮	惹儿嫌父朽
二日匆匆过	留计苦无有
儿自凌空去	父自归窗牖
再视儿睡处	抚床泪如漏
小径仍似昨	父影独佝偻
重见尚无期	念儿平安否
自爱更自重	莫貽他人口

### 寄梁上元

筋骸无病梦初回	新春遥远祝凯杯
窗前总说太阳事	睡中还向巨星飞
燕来燕去自有意	花开花落应相催
此心与回共休戚	千难万劫不成灰

### 我离绿岛

我离绿岛时	厚云掩朝阳
脱我囚犯衣	换我平民裳
十年如一梦	此梦仍未央
抬臂觉肘痛	著袜抚膝伤
试步双足软	合唇齿半残
仰头望苍穹	天人皆述惘
金堂酣歌舞	壮士泣沙场
丹心化为泪	巨星引眉扬
高僧怒飞雀	奇异出画坊
野村相面客	俯首甘异乡
独念狱中友	生死永不忘

### 谢虞和芳

孤岛浑吨梦初醒	日暮方知草色青
英雄枉被兀 误	柔肠空付儿女情
极目江山如画	愿君慧眼看苍生
战马仍嘶人未老	待碎残月迎晓星

注：六十年代初期，国外盛传柏杨将遭处决，虞和芳正留学德国，百方营救。

### 寄孙观汉

一九七七年四月一日下午六时十分，获释返抵台北，无家可归，暂住旅舍，欲致函孙观汉先生叩谢，久不能成一字，先寄数语。

今日踉跄回台北 人物都非两渺茫

去时家园如完瓿 于兹覆巢鸣寒  
念我身老童心在 仍将丹忱酬热肠  
先把无穷感恩意 第一修书报孙郎

## 诗人的祈福

柏杨

一九九二年八月五日于美国凤凰城国际桂冠诗人联合协会致词

当协会主席班杰明·于松先生(Benjamin R. Yuzon)通知我被选为国际桂冠诗人的时候,我被这一项突如其来的荣耀震惊,因为我从没有想到在许多年前一段悲惨岁月中,写下的诗篇,会在我生命中发生这样的光芒,尤其会长先生给我的通知书上,指出我的诗集——英译的 POEMS OF A PERIOD 是:“一个天赋作家根据真实经验的监狱文学,其中充满坚定的指控和历史研究。”这一段褒奖的话,特别唤醒我沉重的回顾。

中国的优秀作家和诗人,跟世界上对人类文明有贡献的其他国家的作家和诗人一样,总是走在时代的前面,不愿牺牲自己的良知、不愿屈服于权势、不愿为世俗的荣耀或利益,甘心在专制独裁者之下,当一个被阉割过的宦官。这些作家和诗人常常惊世骇俗,写出由性灵转化而成的作品,每一个字都是智慧的火花,强烈而耀眼,在人们脑海中产生震荡,于是不可避免的,冒犯了专制独裁者,或者虽无意冒犯,而只是不屑于奉承,但得到结果却都一样。作家和诗人心目中只有博爱与和平,追求的只是平等,从法律平等到人格平等。然而,这种特质却是专制独裁者最畏惧的炸弹,他们因畏惧而愤怒——愤怒作家和诗人暴露他鄙贱的一面,严重地伤害了他们的自尊,他们要人民一致认为他们是英明的、勇敢的,而且永远不会犯错。所以,任何形式的专制独裁者,都像是一个黑社会的头子,为了防止自己丑恶面的暴露,往往采用“杀人灭口”的手段。于是,诬陷、逮捕、下狱、处决,甚至屠灭全族。在中国,作家和诗人是一种最危险的行业,所受专制独裁者的摧残,每个时代都会发生。不过也产生一种现象,迫害成为检验人格的标准,官方越重视的作家和诗人,人民越轻视,这些被称为“摇尾作家”“摇尾诗人”的人,他们的作品也越卑屈堕落。而官方越迫害的作家和诗人,人民越是敬重,这种极端对立的发展,就文学本身来说,是一种畸形生态,但它却一直存在。

所有专制独裁者的内心,都充满了自卑情结,一首被世人赞扬的诗,会引起专制独裁者的嫉妒。一首纯感情的诗,也会触怒专制独裁者的神经。专制独裁者对作家和诗人的畏惧,说明作家和诗人的力量。协会的宗旨“透过诗歌的友爱与和平”,就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我个人的悲剧发生在本(二十)世纪六十、七十年代,它是中国从传统的酱缸文化中转化为世界性民主、人权,自由、平等的巨变中一个不可避免发生的献祭。我曾遭受逮捕、拷打,凌辱、囚禁,长达九年二十六天,但国民党也终于结束了它一党独大的专制统治。

我本来要亲自到凤凰城出席协会,但因为目前必须遵照医生指示,不宜长途旅行,所以请允许由我的妻子张香华,她也是一位诗人,代我出席向各位致谢,也特别请求各国诗人朋友,本着你们对人类的爱心和对和平的追求,继续赐给中国人祝福。

——原载一九九二年九月台北《文讯杂志》



